"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 王友琴 •

1．牛鸡之间

多年以前，当我开始写作文革历史的时候，我首先采访了数百位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放在纸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种评估，即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纸面记录其实和文革史实之间相差甚远。大量的文革故事在发生之时没有被报告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由于纸面上的文革和实际发生的文革之间的巨大的裂沟，这种第一手的调查对于写出真实的文革至关重要。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不但讲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这个网站的建立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２．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像"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１９６６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１９６６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

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

这场杀戮从８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

１９６６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两年之后，１９６８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像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了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自己的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绝望中才那样作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的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

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大量的"专案组"被建立起来。这些"专案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

并且强迫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一所中学，就会有几个麻袋之多。但是在１９８０年前后，这些材料都被火烧了。

在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１９６６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１９６８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亡的两个高峰。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份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

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

"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

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３．记录每一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２１４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４６０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杀戮和１９６８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

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１９８６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工人，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份。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困难，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１９９９年，我把整理出来的篇章总称为"文革受难者列传"。开始用"列传"一词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４．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

我曾经采访一位１９６６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像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３４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

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３４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３４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

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象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治疗。

５．为什么在电脑网上？

假如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应该把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刻写在博物馆的墙上；假如能出版一本文革浩劫死难者纪念册，应该把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白纸黑字印刷出来。在有可能这样作之前，只有感谢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片新的空间，使得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网上文革死难者纪念园。

建立这个网站，就像我的调查一样，得到见过面的和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帮助。我写下

的来自调查的受难者名录和"文革受难者列传"文章被送进了电脑空间，并且可以不断增添修补。网站原来仅仅放在我所服务的大学中，为了有一个比较简短的网址，又租了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网站的内容现在是双份的。

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当我道谢的时候，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我记住了这个说法。我要向所有对建立这个网站有所帮助的"义工"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也以这"义工"中的一员自居。

这里是一个非金石砖木所建立的纪念园，也看不到花草和树，但是这里闪耀着"义工"们的善意的理性的眼光和他们的义务工作留下的道道笔触。

在网站的首页之后，您可以看到已经被写出的文革死难者的名录。您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可以看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有的人我们了解较多，也就写得很多。有的人我们知道得很少，就只能有寥寥数语。对一些我们知道死亡时间和地点却不知道死者姓名的人，都列在"无名氏"栏里。一些新的文章也还在写作之中将会补上。收录在这里的文章和资料，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的调查，都写明资料的出版来源。

我们也在这里提供了电子信箱地址，您可以写信给我们，对这里的记录提出修正和补充。我们更希望您寄来您的文章，为您的亲人朋友，或者您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受难者，在这里留下事实的记录与灵魂的感受。

建立这个网站，最初只是因为只有这一种形式，是我的朋友们和我力所能及的。但是现在我也意识到，这种形式虽然有其局限，但是也有传统的记载和纪念方式无可比拟的长处。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和图画；这也是一种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相当便利的双边互动的形式，这种双边互动可以促进这个网站的内容的继续增长和发展。

网络技术提供了全民写作和阅读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我们已经可以用和司马迁十分不同的物质手段书写历史。但是活跃在电脑网络空间的人们，大多数都是文革后的一代年轻人。坦率地说，文革的历史对你们相当隔膜，但是也正因为文革的结束你们才有了比上一代人好的生活。所以，希望你们能帮助比你们年长的人，来阅读这个网站，并给这个网站投送文稿。谢谢你们。

写于２００１年4月

文化：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

岁月流逝。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十年了。据说，现在低年级的大学生，已经不知道"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尽管这四个人曾因其猖狂肆虐、以及因其被"一举粉碎"而给中国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而家喻户晓。事实上，连那些在成人时代经历了"文革"的人们，记忆也淡漠，他们言谈之间或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文革"，往往与历史相差甚远。历史正在被忘却。如果历史能因忘却而不再重演，那实在是大幸运。但历史自身已经多次告诉我们相反的结论。遗忘恰恰是通向灾难循环再现之路。对往事的记忆和分析，才能增强人们对未来的把握能力。

随着思想的深化，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要想不再重食苦果，就得克服它在成因。 "文革"的成因，应该用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即"多元"的。"多元"似乎常被当作"多样"使用，但更确切的意思应是"多原因"的，由多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决定的。说"文革"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是指它的成因可能包括：发动者的意图和方法，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现实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制约，经济因素的影响，等等。如标题所示，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一个部分，即文化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卷入"文革"的大多数人的一种观念系统及心理状况。几乎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文革"，作为一种行动，受到来自外部的命令和来自个人内部的某些信条的双重制约。后者是指人在某种处境中成长而在内心建立的具有约束性的行动准则。具有普遍性的这类准则，是文化模式的重要构成。本文着重讨论这种内源性的行动原因。这也许不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排斥这些原因，我们将无法解释"文革"的一些重要特征。"文革"是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下兴起的，煽动起很大的狂热和普遍的暴力行为，虽然实际上受伤害最大的正是群众。对"文革"的打击对象的迫害往往是用"群众专政"的方式进行的，使用这一方式比判刑监禁远为普遍。极少数几个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操纵控制着几亿人。除了强权的裹挟和谎言的欺骗之外，显然还有另一些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对当时发生的种各事变的反应。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强化、扩大了"文革"的灾难。

当我们追寻文化原因的时候，必然会联系到所谓"传统"。"文革"是一种民族生活中少见的反常状态，但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将会使我们看到，无论发动者还是被发动者的思想，都带有传统特色。存在着那么一个"文化的边界"，人们的思想行为局限于某个文化圈子里面。但是人们并不完全自觉那些久已存在的东西。所以，本文所分析的种种文化因素，有些是在意识层面的，有些是在非意识层面的，还有的，可能是某种人格分割的结果。

1、由于一种非现代的法制观念，人们在恶性的权力膨胀面前丧失了理论的批判能力和自卫能力。"权"，竟成了可以"夺"的东西。

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所谓"伤痕文学"中看到这一类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设计：一个忠心耿耿的、工作出色的、学有专长的、善良正义的……好人，在"文革"中被"揪"出来，被批判斗争了。

自然，指出"文革"中被迫害者的善良甚至杰出，是证明这种迫害的罪恶的很有力的方法。然而，如果这些被迫害者是坏人--犯有一般公认的错误或罪行，或者，如事实那样，大多数

是一般的人，并不特别好或特别坏，那么，这种迫害就会增加合理性或合法性了吗？所以，这种方法实际上可能扭偏了人们的视线：过分注重了迫害对象是否好人或以为平反就解决了一切，却忽视了"迫害"这一方式本身，--这一动名词不仅意味着对它的对象的损害，而且意味着它选择对象的原则的错误，意味着不经过法律的程序、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由非法律机构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方式的错误，并不需要用迫害对象的完美来反证。人类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生活的规则，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艰辛才建立起来的，对我们的生活现实，也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最大的权力或无限制的权力。但是，1966 年初夏，当"文革"的打击对象由"三家村"扩大到各个单位的"牛鬼蛇神"时，当时大多数人对这种权力的恶性膨胀很少注意。被作为运动对象的那部分人往往深感委屈和不理解，急于表白或检讨自己以求过关。对运动有反感的群众往往也只停留在认为那些被"揪"的人是"好人"，是"搞错了"。人们难以在思想原则上对那种越出法律把一些人打成"牛鬼蛇神"，并对"牛鬼蛇神"进行随便虐待的情况作出批判，在当时的那种高压之下，自然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制。唐代诗人杜牧发明的"牛鬼蛇神"一词，本是用来形容诗的"虚荒诞幻"风格的，后来转为比喻坏人，"文革"中就变为一种实指，更不要说前面还冠以"横扫"这样专横可怕的动词了。这是一个荒诞的现象："文革"中，一方面是文学艺术在政治行政手段下大受摧残，弄得八亿人看八个戏。另一方面，一些本属文学的词汇，夸张的，比喻性的，又大量进入本该要求用词精密准确的政治、法律范围，比如什么"牛鬼蛇神""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挂起来"等等。这种"一元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回到精神领域的混沌状态，原先在不同领域发生的分化进步被代之以混乱倒退。个人和群体的思考能力在这种混沌中退化。

从 1967 年 1 月的"一月革命"开始，进行了两年的"夺权"斗争。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权力，变成了用一个简单的动词"夺"就能易手的东西。同时，这种"夺"又是在最高权力指导下进行的。权力的授予，权力的内容，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转移，种种复杂的问题，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加以探索的问题，一个"夺"字便囊括了。然而接着又几年都"夺"不清。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两派武斗，伤亡很多人。这一阶段所分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奇怪的是宣传口号的思想却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领袖、忠于"文革"，攻击对方是反当时的"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于是，"夺"变成了缺乏思想原则或政策方面的意味而纯粹围绕"权"的斗争。"文革"中最响的口号之一是"路线斗争"，确实在政策方面有一条极左路线的推行，但另一方面，还有这种无路线分歧的争夺，以人划线，重在权力。两派都希望得到当时拥有大权的"中央文革"的支持和认可，并无不同的政治理论主张。这种派性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往往通过不公开的阴谋的方式进行，或者就变成某种武力冲突。这种重权力而缺乏社会理论主张的斗争，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种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历史上多动乱而少变革的情况，社会进步受阻，给老百姓带巨大苦难。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深层观念，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苦难。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深层观念，深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比如，在《三国演义》中，那些曲折复杂的"三国"之间的斗争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首先就建立在对这种争斗的"有趣"表示接受的基础上。人们很少会问，三国争斗的实质性分歧是什么？或者，这些争斗是否含有实质性分歧？一种对权力的内容和行使、对法律的应用范围的非现代观念，使人们在接受"文革"的种种做法时，并未觉得发生多么严重的精神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震动或冲突，往往只是在身受痛苦后才产生不满的念头。

1966 年 6 月，运动全面铺开的时候，首先是从大、中学校开始的。正如后来"十六条"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剃阴阳头，挂黑牌子，用皮带棍棒抽打，

都是在北京的中学里首先发明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成为"文革"中地位不高而受害很深的一部分人。多年之后，人们有时用原谅的口吻说到那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受了蒙骗，这些人自己也可能这样想。其实，文革开始时，当时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年满十八岁，大学生的年龄更大。他们已经具有成年公民资格，有选举权，他们本来就该拥有相当程度的判断能力，否则，似乎就得修改宪法，提高选民的年龄下限。而且，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在平均线之上。把"文革"中的野蛮行为归因于经济不发达、文化程度低、愚昧无知等等，是有道理的，但也太嫌粗略。因为"文革"的暴行恰恰是在学校--相对来说文化高的地方开始的。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对校长、教员大打出手，中学校长和教员成为"文革"最早的一大批受害者。但教育工作者首当其冲的受害，也说明了需要反省教育工作本身。一个高中学生，可能已经拥有了选举权，也掌握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知道了什么是元素周期表，知道怎样用数学模式描述自由落体运动，然而，却没能确立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准则并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以前没有打老师，可能并非因为他在思想上认为法律不授与他这种权利，而仅仅因为没有机会，所以一旦环境许可，他很快就打起来了。当然，这样的问题在成年人身上也是同样重要的。

"造反有理"曾是"文革"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一种现代"造反"在一段并不太久的非常时期内被鼓励发生，它和传统的"造反"不同，但在某些层面上，它留存了传统的深刻烙印。

2、对他人痛苦的无所谓甚至幸灾乐祸态度，使人看不到社会失去公正法则自己也将身受其害。一种下意识的残酷使人难以超越个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正视事实并维护正义

"文革"造成了数十万人丧生。"文革"结束后，为数百万人恢复了名誉。按照"文革"的惯用语，称它的打击对象为"一小撮"。实际上，这"一小撮"的数字的绝对值很大。制造灾难的元凶，以及他们的死党，已经受到审判，这些人的数目不大，不用其他人反对，只要其他人保持中立，这些人在数量上也远远无法和"一小撮"相匹敌。这些人在人数上占极小比例，他们才真正是"一小撮"，他们控制、镇服一大批人，必然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关系及过程进行的。

首先，被打击者是分切成一批一批的，是有一个百分比例的控制的，以保持被打击者在批量上尽可能接近"一小撮"。"一小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字眼儿。以"撮"来作为人的度量单位，自然是包含了对人的蔑视与污辱。"小"，则是欺骗、安定"大多数"的有效的精神威慑武器--使"大多数"感到一种虽不牢靠然而毕竟存在的安全感，感到自己不属"一小撮"之列的幸运，感到"一小撮"总是要完蛋的便不再同情他们或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罪。甚至"一小撮"被打倒，腾出了房子和职位等等，对其他人不无好处，更不要说因为自己"没问题"而带来的优越感了。这种打击"一小撮"的方法对人类深具腐蚀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在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但这个数字是战后才被揭露的。这些犹太人一小批一批地从各地运来。一方面是保密，另一方面是冷漠，使大多数人难以及时重视小部分人的苦难。当然，最后，大多数人也吃尽了战争的苦头。

"造反派"是现在电影、小说中"反面人物"，好象面目都差不多。实际上，作为"文革"中一种积极的、走红的人物，"造反派"并不总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名称也有过几次改变。常有文章控诉"文革"对自己的迫害。如果把各篇文章拼接在一起，会发现这一文章中控诉别人的人，可能正是另一文章被别人控诉的人。倒也未必是作者说了假话，因为各自说的是"文革"不同时间的事情。只说别人不说自己，确实显得"厚脸皮"。这里并不想对这种情况作更多的批评，只试图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今天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只记得自己被整而

忘了自己整人，那么当时的问题则出在自己身受痛楚时才反感"文革"，灾落他人时却不管不顾。

几年以前，作家冰心说到"文革"中有幼儿园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脏水时，提到两种有关的解释。一种认为孩子是受了"革命口号"的蒙骗，另一种认为残忍行为来自"人性恶"。冰心赞成前一种。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原谅孩子们，前一种解释自然是适宜的，但后一种解释其实也能成为一种原谅理由，因为这种解释只追究天性的因素，却排除了人的选择可能。如果人不拥有选择可能，那么他自然也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是简单化的。残酷行为显然和"文革"领导者的支持、纵容及暗中指使有最大关系，但报纸上也登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的话。种种耸人听闻的酷刑的细节，一般并非由指令性设计而来。想象力和创造性为什么朝这一方向发展而不朝相反方向呢？这很难用对"革命口号"的服从作出充分的解释。另一方面，把问题一下子归结到至高至深的"人性"上，又过分简化了事物发展的中间过程。就算人类有攻击的本能，但攻击什么，怎样攻击，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性的习得。当然，对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正处在文化模式的学习阶段中，和成年人不同。

看起来，林彪，"四人帮"这些人具深谙控制、操纵群众的方法。狂热的崇拜和绝对的服从往往和残酷的行为互补。他们要人们服从他们，听命于他们，为他们扫除敌人。他们可以强迫人们这样做，但也可以给予人们一些"好处"使他们这样做。这"好处"可能是物质的奖赏，职位的提升，还可能是给予一种虐待同类的特权，或者，欣赏别人的痛苦的资格。后一类给予是廉价的，可以说不费一文，然而，不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一个普普通通的、曾被教师管着、被考试压着的学生，忽然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忽然出人头地，高踞于万人之上。这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使他们乐于执行某种罪恶的命令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内心缺乏道德感的人不可能战胜这种诱惑。况且这些诱惑又有种种"革命口号"包裹于表面。这些口号，在语言修辞上，是夸大的，虚张声势的，迎合了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取向。关于那个时候的文字语言风格，就非常值得研究。回顾"文革"历史，最狂热最绝对的服从和崇拜往往是和最严重的迫害行为同步发生的，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联系之一。

事后，一些人说，他们是受骗了，他们当初是出于革命的愿望等等。他们说得很真诚，也很少或不提那些年里造成的悲惨事情；也许，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没听说。"文革"十年，我们真的就象小《牛虻》里那个早年的"牛虻"--亚瑟吗？由于种种原因，五、六十年代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在小说里，亚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嫉妒心时，无意中泄露了革命活动的秘密。如果我们真是亚瑟，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使我们推托掉自己的责任，推卸掉良心上的重负。--然而，可能正因为这种心理的需要，我们的记忆才替我们编造了一个简化了的或者美化了的过去。记忆，是有选择的。人很难记住那些不想记住的事实。特别是在今天"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社会大思潮转换了方向。对于"文革"，人们会记得"我受了迫害"，却可能"忘"了他怎么加害于人；人们会说，"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却"忘"了他当时洋洋得意，唯恐别人不知道他那有幸受宠的地位。正视事实的结果是不愉快的。所以，你难以承认你的邻居被抄家时你无所谓的心情，如果你们吵过架，你还可能闪过"活该"的念头。同样，你也很难承认当你的某个很出风头的同学被游了街，你也会有过"谁让他那么骄傲"的想法。更不要说，在批斗会上，因为上纲高，嗓门大，拳头重，你会获得某种赏识和青睐，这使你乐不可支，野心勃勃，一心只想表现得更加出色一些，却不想你攻击别人是"特务"、"反革命"之类是否具有证据，将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你说你从来不曾思考你

行为中的善恶问题，那么不会是因为来不及，多半是你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别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如果保持缄默，听之任之，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这一不公正原则。现代社会的基础正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所以，一个现代人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原则问题，从而也关注别人的痛苦。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和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性伸缩的道德范围，或者说人们往往多利害关系的考虎，少是非原则的关心。"文革"的教训说明了这一传统必须转变。

六十年前，鲁迅曾说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医学学校里看到的一些幻灯片子。幻灯片是关于日俄战争的，这一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幻灯片上，日军正确下一个替俄军做侦探的中国人的头颅示众，许多中国人围着观看这示众的情形。这种麻木和冷酷，使鲁迅对国民精神的病态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感独。这种"看客"态度起码错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人丧失了是非心和道德感，人格退化。二是使人们在欣赏别人的痛苦时纵容了这种制造痛苦的原则，最后免不了弄到自己头上，大多数人都吃大苦头。也许，正是一个羞为"看客"的想法，促使鲁迅拿起笔来介入生活，试图改变生活。然而，这不容易。用"全体利益"来说服人是困难的，因为一个人享有的是个人的利益，比如，经济落后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低了，但是一个想改变自己低生活水平的人却不必非依靠于发展经济改善全体生活水准，通过增加自己在一个总额不变的财富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能达到目的，而且，看到其他人没有他所有的，往往使他更感惬意。所以，除了呼吁人们反省自身、改善道德之外，必须通过法律制度，遏制种种无用有害的争斗，把生活的活力导向那些生产性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去。

揭示一些令人难堪的往事，并非为了针对某些个人，不过是为了说明，如果不能克制自己低层的欲望，不能经受权力--残酷的诱惑，不能超越既得利益去关心是非原则及生活前景，就算第一次是"上当受骗"吧，第二次、第三次还会继续如此。

3、大跨度的虚伪，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消弭了心灵的紧张，但做戏式的行为也使生活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必定会记得小说揭露的一批形象生动的关于虚伪的故事。虚伪也许是文明社会难以避免的东西。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控制人类一些原始的、本能的欲望，所以它们之间总是相冲突。由于这种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他心里的欲望。病的发生。但《儒林外史》表现了另一种虚伪，不是心灵和行为的冲突，而是行为和行为的矛盾。读书人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可以背得出"圣贤"种种教导，但他们做起事来，却并不遵守这些，而且，并不为此感到内心不安。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事实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虚伪的严重程度。孔孟之道、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和把女人的脚人工制成残废、把男人阉割了做太监这些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并存，彼此相安无事，各时各，无所谓。这也给后来的批判者带来了麻烦。如果只批评那些"圣贤"书上的话，可能曲解了整个生活事实，因为有些话本是只说不做的，另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这里使用"大跨度的虚伪"，指的是矛盾着的两端，中间相隔太远，差得太大。比如，一个人说的是他想改善孤儿院的伙食，实际上，他只肯捐给孤儿院无济于事的两块钱。这是一种虚伪，但是一种跨度不算大的虚伪。说的和做的一旦拉开了距离，好象橡皮筋拉长后产生

一种紧张，毕竟还对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他不致走得太远。但是如果说的和作的差得太大之后，比如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整个心都献给孤儿院，同时却贪污公款大吃大喝，这时，紧张已不复返存在，好象橡皮筋拉得过长，断了，人格的两端分裂开了，彼此不同，却并不紧张。比如《儒林外史》里两个讲"纲常"的秀才舅爷，妹子一死，妹夫把姨太太扶了正，这两位收了妹夫的银子，就再不管什么"纲常"不"纲常"了。小说没有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想来也没有什么内心冲突，所以小说也就不写了。再往后，这两位可能也依然又讲纲常又捞钱地活下去。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虚伪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封、资、修"，是和传统的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甚至还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树立这方面的样板人物。做人要做到私念"闪"一下都没有过，实在是太"完全彻底"了。另一方面，他们争夺权力，玩弄权术，大搞阴谋，生活上也腐化堕落。---当然，由于他们是上层人物，当时一般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那一面。但是，却使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分裂也是严重的。

比如，"劳动光荣"这个口号，很多年里一直叫得很响。"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的党的机关进行，被冲击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体力劳动者，运动一开始，各单位"有问题"的人便被命令去劳动。到 1966 年 8 月，各单位有了人数众多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而"牛棚"则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说法。"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要唱"牛鬼蛇神歌"，以及扫马路、扫厕所等等。机关单位没有我少正经活路可做，就让"牛鬼蛇神"们在大太阳底下拔庭院里的草。把劳动视作一种侮辱，一种惩罚。所以，事实上，"文革"弄得劳动越来越不光荣了。更不要说极左路线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数最多的体力劳动者农民生活困难，很难让人羡慕。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轻视劳动的思想是很重的，这和体力劳动者劳而不获的传统经济结构相适应。长衫、长指甲这些上层阶级的服饰标志都是和不进行体力劳动直接相关的。"文革"中，说"上山下乡光荣"，"走'五七'道路光荣"，实际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首先被派往边远艰苦的农村，而且几乎没有回城的希望；受到批判的干部才长期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政治身份的优越，人们也不会热心参加劳动。

粉碎"四人帮"后，从 1978 年下半年到 1981 年底，纠正了三十万零一千余件冤、假、错案。当时，这些案子的罪名都是"三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反对者。这种平反于是便含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是纠正当时的审判原则，二是纠正当时的假造的事实。后一问题则跟道德水准明显有关。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口号，他怎么可能捏造事实、制造假案呢？"文革"有一个重要的口号叫做"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量的假案，说明了"文革"对人们灵魂和道德的腐蚀与破坏有多么严重。

除了那些根本不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或根本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一般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这种矛盾时，会感到苦恼。如果这种苦恼能延续保持下去，可能产生试图认识及改变这种情况的冲动。但是，改变是困难的，尤其当看到周围的人们可能采取另一种态度时，又加上了一层因自己与众不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需要克服。但是，这种苦恼长期留存将引起精神的焦灼和紧张，于是，它就可能被导向另一方向，用一种圆通的办法来消弥这种紧张。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可以在这里这样做，到那里那样做。把人格中在逻辑上非一致的、矛盾的东西索性分割开来，也就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紧张。但这种"人格分裂"，也不是一种完全的"分裂"，只是容忍自己行为的不一致性，放弃保持自己道德原则中逻辑性一致的努力，把一种行为的分裂统一于更低一层的私利之上，以保持或获得一些安全或物质利益。一些最"聪

明"的人通过这种分裂得到了好处。他们高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当然，还要辅以别的一些办法。于是，他们得到了职位提升或进大学之类机会，得到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他们并未给人民带来过什么实际利益。次"聪明"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找寻或守卫着自己的某个关系，某个"后门"，某个能钻过去的空子，一边仍然说着好听的假话，空话、大话。如通常所说，他可能是"看透"了的，但他的这种"看破红尘"并不意味着真是"四大皆空"、无我无欲、超越现世了。"看透"往往只是一种了解世故而又抛弃了是非心或道德感的状况罢了。

一旦虚伪变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况就加倍严重了。坏事情的存在，毕竟还不意味着大家认为它是好事情，如果一旦坏事情被当作还可以的事，就更少纠正的希望了。一个作家，可以把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写在纸上；一个干部，可以说上一通爱国爱民的道理，然后又用公款吃喝玩乐……。这类对自己行为中的矛盾无所谓的态度，使得生活好象成了做戏，真假难分。挥拳头，喊口号，跺脚，慷慨激昂，都不过成了可以担任的几个角色的一个。这种做戏感松弛了人们内心的紧张不安，消除了产生因文明压力而形成的精神病的危险，但是，这种分裂也使我们损失了那种认认真真正视人生的勇气和把握人生的力量。做戏做得多了，自己实实在在在的思想也的不到了，各种行动都变得软弱了。这是对一个民族生存活力的销蚀，虽然表面上并不使人感到痛苦。

也许，以上话语，全属多余。控诉历史，还不失为一种心理的宣泄；剖析事实，反省自身，不会令人愉快。最初看到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主人公不是觉悟的英雄，就是陷于绝境的受难者，曾经感到毫异觉得和自己的经验不符，更不要说这些描写中往往存在不少人为编造也填补不好的漏洞。然而渐渐也悟出了编者用心良苦。这两种人都不存在的道德选择的问题。前一种是因为已经作出了选择；后一种人，身陷绝境，毫无办法，为了证明他的毫无办法，还得添加一些偶然因素，这样，他毫无选择的余地，也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德问题对他来说不复存在。这种"英雄+造反派+受难者=文革"的模式，虽然简约太甚，却也使人心安。对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的认识，要从感性的真实走向理性的真实，首先就得克服一种内心的障碍－－心灵由于惧怕正视事实可能带来的痛苦而产生拒斥。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仅仅是缺乏认识能力，而且还可能是我们不愿意对自己作出理性的、批评的判断。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也就不该惧怕正视历史。难道我们只配在高压下顺从，却不能在太平的年代主动承担相形之下多么微小的反省的痛苦？

把"文革"和"文化"相联系，强调"文革"的文化原因，并不是要把"文革"的责任推向一种虚无飘渺的根源。首先，不能把"文化"当作一个空洞玄妙的概念使用；其次，"文化"的内涵并不止于一些形容词所描述的特征；再者，"文化"也并不只体现于古代的经典著作中。文化活生生地渗透于历史过程中。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生活的研究。对"文革"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思考，是我认为那种认为"文革"是和"五四"相似的对传统文化的"断裂"的说法，是轻率的。但我也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讨论，将有助于把时下正热的文化讨论推向深入。

人民有权利调查事实

余杰在他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引用了我所作的关于文革的研究。余文所引是建立在我对９１所学校的调查的基础之上。我曾访问了３００位文革的经历者，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在这些学校中，有２８位教育工作者和３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很多人在被毒打和受侮辱后自杀。对被打死的人的姓名年龄和性别，被打死的日期和地点，在我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一些文章中都有清楚的记载和说明。这些校园暴行的发生，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这些暴行未能被报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人们对文革有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说法。余秋雨在这篇访谈中说："二十年前，中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在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之后，正式宣布今后再也不准任何人离开法律程序对其他公民进行非法的调查、取证、审查。"　　照余秋雨说来，不是在政府和司法部门工作的普通人，就不被准许对事实（比如文革的历史事实)作调查和研究;像我所作的这种研究以及数百位文革经历者的见证,就都变成了非法的?余秋雨的这个说法令人震动。首先，"不准进行非法的……"，你怎么可以先断定那是"非法"的呢？另外，"调查、取证、审查"，三者有很大的不同，不可以这样放在一起。文革中所有的工作单位都成立了"专案组"来"审查"甚至"隔离审查"（即在各单位自设囚室关押囚禁在那里工作的人），余秋雨对此并不陌生。现在普通人当然不能这样来"审查"别人，但是，人民有权利调查事实真相，更应该取得证据，然后才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正义。人民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惩罚作恶者，但是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知道和了解事实。对千万人深受其害的文革，余秋雨可以不调查不取证，但是不可以不准老百姓这样做。　　请余秋雨说明，在何时何地，政府与司法部门"正式宣布"了他所说的这一规定。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样的规定违反宪法，文革研究者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请法院审查这个规定的合法性。如果这是余秋雨自己编造的，或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愿望作出的解释，那么请他发文说明。不然，这种说法现在这样堂而皇之地登在报纸上，是对从事和关心文革历史研究的作者与读者的一种恐吓，也是对文革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种恐吓。

东厂胡同两惨案

一．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左奶奶和马大娘，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著他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东厂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东厂"设于此地，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口外，是"考古研究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大批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这一事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城。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在８月１８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协助下，抄家，打人，焚书，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早年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１９６６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他们逼左奶奶交出黄金、手枪和所谓"变天账"。左奶奶交不出来。他们就毒打左奶奶。北京城里传统的居民院落中，多设有葡萄，夏天绿叶成荫，还结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

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一旦回家，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里等候。左先生从大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一起被打。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左奶奶和马大娘的一声声惨叫，她实在无法忍受。她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拷打声突然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火葬场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都会猛然一惊，回想到那一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　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８月２４日，东厂胡同２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在那一带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就是红卫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头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那位母亲平常穿著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１９６６年8月２４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马大娘这样被红卫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数千之多。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和丈夫曾经拥有劈柴铺子，孙琢良眼镜师拥有过眼镜商店，那都是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至少１０年了。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当权者，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这样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类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Ｑ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获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她反感暴力，同情受害者。在无数受难者中，马大娘的故事是个罕见的例外。她不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被害的，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全名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的居民们没有忘记１９６６年8月的恐怖和死亡，但是他们一直就叫他们左

奶奶和马大娘，没有唤过他们的名字。这是北京胡同的方式，表示一种礼貌和亲近。有好心的被访者应笔者的请求，到各家去问，但是没有结果。

如果能获准查看户口档案，就能找到马大娘和左奶奶的全名。但是不要说档案，连文革时代广为散发的红卫兵传单和报纸，如果要在北京图书馆查阅，都必须具有"中共中央组织部"或者"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研究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二．诗人和考古学家之死

陈梦家，男，１９１１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和"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１９６６年9月3日自杀。

１９８０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份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１９３１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２０岁。大学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１９３６）、《西周年代考》（１９４０）、《西周铜器断代》（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尚书通论》（１９５６）、《殷墟卜辞综述》（１９５６），等等。

１９４０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１９４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陈梦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１９５１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那是１９５２年。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１９５１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１９９０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１９８４来了。这么快。"《１９８４》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１９４９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１９５７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当时对"右派份子"的处罚分为六个等级。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劳改营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１９６０年，在食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为政府在国外工作，设法给他们带来一些黄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黄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特别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和其他中国知识份子一样，他忍耐著，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１９６６年８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

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８月２４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２０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８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１９８４》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１９５０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１９５７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像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八旬老人党晴梵被打死

党晴梵，男，1885 年生，陕西省合阳县人，文革前任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家住西安。从 1966 年 8 月 30 日开始，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到他家抄家，并且殴打他。他家中的书画财产被走。1966 年 9 月 4 日，党晴梵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他的血喷溅在他的房间的墙上。党晴梵被打死的时候 81 岁。到党晴梵家抄家的红卫兵不久后成为新成立的"红色恐怖队"的成员，继续施暴于西安。

党晴梵是陕西合阳县人，其父亲经商，他生于 1885 年，考过秀才，后来放弃科举，到上海进入由归国留学生办的"中国公学"，剪了辫子。他是同盟会会员，最早的国民党党员，曾经跟随于右任，当过陕西靖国军秘书长，于右任是总司令。于右任离开后，他改作学术研究，研究先秦思想和古文字，著有《先秦思想论略》。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曾经给杨虎城出主意，接触过共产党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他倾向共产党，在 1940 年代发表不满国民党的文章。1948 年他被共产党方面的王震接到共产党占领区陕北，在王震的军队中。1949 年共产党执政后，他成为西北大学教授，并担任当时掌管西北地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副部长。他当副部长时，正部长是资深共产党人江隆基。（江隆基后来担任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共产党党委书记，在 1966 年文革开始后，江被中共甘肃省委撤职并"斗争"，江在 1966 年 6 月 25 日自杀，距离党晴梵被打死只有两个多月。）1955 年，权力机构调整，"西北军政委员会"被撤销，党晴梵被任命为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这一职务没有多少实际权力，但是级别很高，属于省一级领导人。因党晴梵年事已高，基本上待在家里，不参与多少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6 年 7 月，陕西省政协秘书长和共产党统战部负责人频繁到他家中，问他关于当时"批判""三家村"的看法等等，气氛相当严重。

1966 年 8 月初，党晴梵被通知去省政协开会，到了那里，看到已经布置好"斗争会"会场。大会发言和大字报都早已经准备好。和他一起被"斗争"的还有茹欲理。茹欲理也是政协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过陕西省检察院院长。给党晴梵的罪名是"反党（共产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此后，党晴梵原来享受的可以坐小汽车等等待遇都取消了。

在那一阶段，参与"斗争"党晴梵的省政协干部，虽然叱骂党晴梵，还把大字报贴到党晴梵的家里，还没有殴打党晴梵也没有抄他家。当文革继续发展的时候，抄家打人以致打死人的行动是依靠年轻的红卫兵来实施的。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会见百万红卫兵后，迅速在北京和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抄家打人并且大量打死人的暴力活动。1966 年 8 月 30 日，红卫兵到党晴梵家抄家。

在党晴梵家的抄家进行了多日。党家住在自己私有的一座单独的四合院里。当时党晴梵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和他的幼子以及一个老保姆住在一起。他的长子一家住在同院单过。党晴梵被关在一间房间里，和他的家人隔离开。不准他的家人和他见面或者谈话。他的家人听到他被红卫兵喝叱和殴打。

前往党晴梵家抄家的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当时这所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在 1966 年 8 月，他们的父

母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被"打倒"，而是仍然在该省的最高权力岗位上。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对老师和同学施用暴力，手段相当残酷。他们侮辱殴打折磨教师。教地理的女老师是回族人。他们给她剪了"阴阳头"，会把猪油和痰盂里的脏水混合起来强迫她喝下，他们强迫她站在架高的桌子上被"斗争"，然后推倒桌子使她摔下来。他们也残酷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女同学，只因出身于教授家庭，学习成绩好，被红卫兵一层一层楼梯往下推和打，从四楼一路摔到一楼。他们把暴力虐待带到了校园之外。在党晴梵家的红卫兵，有的在党家住了下来。在党家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有几十个之多。

党家所有的东西都被仔细检索。9 月 3 日，也就是党晴梵被打死的前一天，有一些卡车开到党家，把他家的所有书籍字画以及家具衣物都拉走。当时红卫兵虽然只是个青年学生的组织，当时因为在当权者的支持指导下，所以能调动大卡车来进行抄家活动。

党晴梵收藏有一些古书，其中较珍贵的有一套元代的雕版《南史》。他还收集有商代的青铜器拓片和甲骨文资料等等。书籍字画当时被当作"四旧"，被查抄走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是不但他们的书籍字画被没收，他们的生活用品也都被拿走，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生活资料；另外，除了红卫兵，还有干部模样的人来帮助。党的家人知道把生活用品拿走是为了从生活上惩罚他们，还没有想到接着会有谋杀发生，并把剩下的家人扫地出门。（文革结束后，在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个古书展览会上，展出了党晴梵的那一套元代雕版《南史》，展品说明说这部书的来源是"捐献"的。）

9 月 3 日党家的东西被卡车运走后，红卫兵也撤离了党家。党家安静下来，党家的人以为这样事情就过去了。但是，9 月 4 日中午，有三个红卫兵，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来到党家，进了党晴梵的房间。党家的人不敢阻拦，因为这只可能招致红卫兵更厉害的暴力行动。这三个红卫兵进了党晴梵的卧室。进去以后，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大约一二十分钟后，这三个人就出了房间，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党家。

这三个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是高二或者高三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红卫兵从一开始抄家就来到了党家，在抄家过程中相当活跃。

党晴梵的家人在红卫兵离开后立即进入他的房间。他们看到党晴梵在床上，满头是血，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床边墙上都有喷溅上去的血迹，血迹有一米多高。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楠木笔筒，笔筒上有血。他们估计党晴梵可能是被用这个笔筒砸死的。笔筒很硬也很重，用这个笔筒猛击头部的结果，可以把党晴梵打死，并且有血溅得很远。但是，到底党晴梵是怎么被杀害的？笔筒是否唯一的凶器？这样的细节，只有在场者知道。党晴梵的家属当时不被允许在场。红卫兵离开之后，他们才进入党晴梵的房间。看到党晴梵身受重伤眼看要死，他们不敢呼救，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杀害党晴梵的红卫兵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又来了另一拨红卫兵，是和前一拨红卫兵一个学校的，他们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进门以后他们直奔党晴梵的房间。这些人进房间看了，看到党晴梵正在死去，就退了出来，没有作什么就离开了。这些红卫兵中有一个的名字是令狐静平，他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的西北电力管理局局长。令狐静平没有参与杀害党晴梵，他是这场杀戮的目击者之一。

党晴梵很快死亡。当天晚上，陕西省政协来了两个干部，对死亡现场作了检查和记录。

这两个干部叫党晴梵的家人不要往外说此事。这两个干部的名字是郑殿辉，何岗。半夜的时候，火葬场的人来到党晴梵家，用车运走了党晴梵的尸体。这显然是陕西省政协的干部安排的。

党晴梵的尸体被火化后，骨灰没有留下。实际上，在 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的人，不但被活活打死，而且连骨灰都不准留下。在这方面，党晴梵不是唯一的例子，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被指为"阶级敌人"的死难者的下场。在文革后，为死难者平反的时候，却不把这种会议称为"平反会议"，而是一律称为"骨灰安放仪式"。这样的修辞方法含有尽量淡化历史的意向，但是其实很多人连骨灰都没有，在仪式上的骨灰盒子里，根本就没有骨灰。文革后，劫后余生的人们，能得到平反已经是庆幸不尽了，那时候也没有追究骨灰的失落和为什么文革否定后，对这些残酷的细节也只能含糊过去。

党晴梵死了。第二天，1966 年 9 月 5 日，他的幼子和长子，以及长子的妻子和孩子，连加他的老保姆，全部被"遣返"，也就是强迫离开，扫地出门，押送往原籍农村。

这一"遣返"，也是 1966 年夏天红卫兵从事的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之一。这个说法"遣返"，是当年用过的原话。我们会注意到没有用"驱逐"而用了"遣返"这一较为客气的说法。实际上"遣返"并不是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词语。甚至"驱逐"也仍然和实际情况不合。当时发生的是用通过红卫兵的暴力性的抄家，以"打死人不偿命"的残酷手段，威胁和迫使"遣返对象"顺从地离开城市，到农村接受"专政"，很多人实际上很快就死在"遣返地"。另外，当地的公安局系统配合红卫兵行动，强行迁出户口。公安局的人并不出面打人，但是在红卫兵身后支持他们。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况。这种特别性使得一方面造成失去法规的"无法无天"的恐怖，另一方面是恐怖的推行仍然相当有秩序而且有效率。

党晴梵被打死，他的家人只有顺从地离开，来到党晴梵的老家，陕西省合阳县。在那里，他们身无立锥之地。党家的老保姆老家在别处，也被红卫兵押解走。

就这样，在 8 月下旬到 9 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党晴梵由原来的"省政协副主席"，被抄家并打死，而且，党晴梵的家人也都被驱逐到农村。通过红卫兵和政府联合行动的之手，对一个家庭的巨大迫害完成得迅速而彻底。

在党晴梵被害之后，在西安，红卫兵在 9 月间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恐怖队"的组织。简称"红恐队"。这个组织的名字就体现了他们要作什么。"红恐队"成员戴着他们的红色袖章，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成群结队，公然进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动。到党晴梵家抄家和杀害了他的一些红卫兵，成为"红色恐怖队"的成员。他们在"红色恐怖队"建立之前的行动，这时候变得更加明确和系统化。

由于西安的红卫兵的领导及骨干有很多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在 1966 年的所谓"红八月"之后，北京的文革领导人很快把文革的矛头对准各省的共产党的"当权派"，并且扶植起大批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随着身据高位的父母被"揪出来"，早期的红卫兵失势了。他们中有些人和"造反派"的冲突，使得中央文革抛弃甚至镇压他们。但是 1966 年夏天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否定。当"红恐队"和"造反派"发生冲突的时候，西安交通大学的造反派找过党晴梵的家人谈话，他们的目的是搜集所谓"保皇派"也就是保卫过前中共陕西省委的那一派的罪证，所以一度想用党晴梵之死作为对对方不利的材料宣传。

但是接触以后，"造反派"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党晴梵当时头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他们眼睛里，这样的人被打死，算不上他们要攻击的红卫兵的"罪"或"错"，因此不必调查和揭露。

1967 年，党晴梵的儿子设法到了北京，到 "中央文革小组""群众上访接待站""上访"。他试图改善一家人的处境，希望北京的领导人能对他父亲这样的情况有所怜恤。"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掌握领导文革的大权，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接待站有一些干部接见"上访"的群众。他得到的回答是：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对党晴梵的问题作"定性处理"。

1971 年 9 月发生了林彪事件。从 1972 年开始，文革当局对之前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干部的政策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政协给党晴梵作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随后，他的家人被允许回到了西安。党家的房子已经被占用。在他家原来的房子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屋。

后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恢复了工作。党晴梵在省里算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对他的死，统战部派几个干部作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时间太久，不可能弄清楚了；这是林彪路线的错。其时林彪已经死，并且从"毛主席从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叛国投敌"的"反党集团"头目。

1976 年，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1977 年，中共陕西省委给党晴梵"平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把一个空骨灰盒子放了一下，因为党晴梵的骨灰根本没有被保存下来。党家人再次要求调查党晴梵之死。中共陕西省委把案子交给了陕西省公安厅。但是仍然不了了之－－没有结果就是这件事的结果。

1980 年代中期，全国政协巡回了解文革中的事情，关于党晴梵一案，还是没有结果。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文革后当局的政策是，对文革中的死难者，给予"平反"，但是对害死他们的人，却没有追究也没有惩罚。

1980 年代，中共北京市委曾经派两个干部找党晴梵家人调查。因为陕西省政协"审干处"写信给中共北京市委，说当时已经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干部王申，在文革中杀害了党晴梵。王申在 1966 年时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以及"红色恐怖队"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调查的目的是要决定该干部是否得到提拔。党家人不知道后来王申是否在晋升方面为此受到影响。

党晴梵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 81 岁的高龄。这样一个高龄老人被活活打死，分外残酷。同时，应该指出，他并不是象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因为年迈体弱，所以受到一般性的殴打就死亡了，也不是因为他有心脏病那样的突发性疾病，在受到殴打折磨后，疾病突然发作以致引起死亡。党晴梵被殴打折磨数日后，又被红卫兵以重物猛击头部，头部大量流血，血喷溅到他床边的墙上。他被重物猛击后很快就断气死亡。另外，党晴梵也不是如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在人多手杂或者群情失控的的混乱情况下，被打过头或者被失手打死的。他的被害，是一种谋杀。

党晴梵的被害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是当时在陕西和全国发生的大量杀戮的一例。

在西安，本网页通过调查了解到的就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被毒打侮辱后自杀。读者可以键击"死亡发生地"和"西安"发现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在西安的受难者中，有一名是袁玄昭老师，西安第五中学的教师。他是党晴梵的学生。他被学生关押在校中，遭到大量殴打和侮辱。有学生用弹弓打死一只麻雀，然后逼迫他把死麻雀整个吃下去。还有学生强迫他吃下了一整盒鞋油。他逃跑不成被抓回，遭到更大折磨，最后自杀。他死于党晴梵之后。

党晴梵的死，是红卫兵的行动结果。同时，又不仅仅是"群众组织"的"过火行动"。首先，红卫兵的广泛建立以及在校内校外大规模施用暴力，是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局直接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各省，中共省委也积极组织和支持当地的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除了大方向方面的理论指导和行政方面的措施安排，在北京和各省的权力当局还介入了局部的细节性的迫害行动。这场大规模的迫害，不但伤害以致杀害了大量的普通人，也杀害了党晴梵这样的有很高地位但是当时被文革当局当作打击靶子的人。在党晴梵的案例里，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权力当局和"群众组织"紧密配合进行迫害和杀戮的情况。这是国家机器组织的群众性犯罪。这样一种犯罪方式，是文革的特别的犯罪方式。

西安是中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在两千两百多年以前，汉王刘邦在那里建立了汉王朝，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汉族""汉人""汉字""汉语"的来源。刘邦率领军队进入关中地区的时候，和当地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盗，抵罪。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不能杀人，不能伤人，不能偷盗，就是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律令。但是，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文革把这最基本和重要的律令打破了。红卫兵公然打死了一个八旬老人党晴梵，却从来没有被当作是一种犯罪。

30 多年过去了。党晴梵的家人一直想要和当时殴打和杀害了党晴梵的红卫兵谈话。他们想要知道事情的经过，也希望听到作恶者的忏悔和道歉。

留美归国博士董铁宝之死

董铁宝，1917 年生，男，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在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关押在北京大学 28 楼，不准与家人见面。在"隔离审查"中，1968 年 10 月 18 日，董铁宝自杀身亡。

董铁宝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取得力学博士学位，1956 年回到中国，任职于北京大学。

据《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50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记载：

"1956 年 11 月 7 日，校刊 96 期报导，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 7 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博士廖山涛，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据说他们回国，是因为周恩来有信到美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那是 1956 年，比较宽松的一年。1957 年夏天就进行了"反右派运动"，不知道那时董铁宝有什么感受。但是他显然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

他回国十年以后，1966 年，文革开始。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这时文革中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化最为严密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1968 年 8 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 900 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 28 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当时被关的人的主要种类分为有"历史问题"和有"现行问题"两大类。现在不清楚董铁宝当时是被作为哪一种人被"审查"的，也不清楚他的外国留学经历是否是他被"审查"的"原因"。

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最后活着走出来"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大量打耳光。

据说董铁宝的妻子曾经到 28 楼请求见董铁宝，被拒绝。后来，就发生了他自杀的事情。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 28 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董铁宝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和女儿当时是中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作为所谓"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后来董铁宝的妻子写信给周恩来，说明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

请求给予照顾，把她的儿女调回到北京。她的信起了作用。当其他同龄人还远别父母在农村时，董铁宝的两个孩子回了北京，这就算是当时因"归国华侨"身份受到的"优待"。这种"优待"的相对值不算低，但是其中的绝对值当然很低。

据《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记载，在董铁宝自杀的 1968 年 10 月，在北大，还有两个人自杀。一个是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10 月 16 日上吊身亡。另一人是当时的"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崔雄昆从"清队集中地"28 楼出走，10 月 17 日被发现死在游泳池内，法医鉴定是自杀。

关于董铁宝，《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的记载只有一行：

"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没有写他是怎么自杀的，也没有说他当时是被关在"牛棚"里面"隔离审查"。这样，他的死就显得相当含糊不清楚了。

校史写作还有另一条规则：对于北大在文革中的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只记载系级以上和教授级以上的人。其他一律忽略不计。董铁宝得到简单记载，还是因为他是留学回来的博士，1956 年得到了较高达级别。

比如， 北大数学系的教师陈永和，1954 年大学毕业，因为年轻而不可能有所谓"历史问题"，可是由于业务很突出，遭人忌妒。他和一些人打桥牌，聊天，可能发了一些牢骚。他们被说成"反革命小集团"。陈被"隔离审查"。1968 年 11 月 11 日，陈永和在学校被关押的时候跳楼自杀身亡。他的死离董铁宝的死只有三个星期，可是他的死在《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中不见一字记载。

费明君一家的故事

费明君，男，1950 年代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55 年先被定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送到青海劳改营后，又改罪名为"日本特务"。费明君 1972 年死在青海。

华师大的一位与费家人有来往的老师，讲了费明君一家的故事，由王友琴记录如下。

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 7 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上，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带不住，自己掉下来。因为手铐掉下来，公安警察上来要打。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说，小孩子太小戴不上手铐。公安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

到了甘肃，劳改农场说不能收留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劳改营的人。于是把他们送到酒泉火车站。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垃圾为生，一直到 1961 年。当时安徽因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到上海说需要劳动力。

这样他们就到了安徽定远县。定远县在凤阳南边。我"四清"时去过那个村庄。大跃进时，那个村庄 60％的人饿死了，地跑荒了一半。定远县严桥公社。我住的那家，没有门没有窗，土基做的桌子，吃饭蹲着。彻底的"泥巴文化"，什么都是泥巴作的。这家人老的老，小的小。饿死人，最早的一批是地富和地富子女。公共食堂不让他们吃，首先吃的是干部和干部亲属。有的人饿得快死了，爬到食堂要点稀饭吃。不给。死了，用门板抬走，埋掉。死一个抬一个，门板都没有了。"四清"是搞"阶级斗争"搞不起来，因为地富（地主和富农－－记录者注）都死光了。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的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费的女儿来找"四清工作队"诉苦，不管。

1972 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通知严桥公社。公社开"批斗大会"斗费的妻子。费家小三找公社武装部长，说，为什么斗我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回到村子里，扬言要用老虎钳子把党委书记（共产党）的牙齿拔光，还说，我还住在这里，你敢来，只要我不死，叫你灭门绝户。两个星期后，党委书记作了几个菜，请他吃了，说，当时上面让"以大批判开路"，只好那样作。后来他还是被"军宣队"弄去打得昏死过去，又在县医院被救活。

文革后，他们到上海。找到华师大保卫主任。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的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费家小三就去北京，找到了费明君的朋友，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是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一周后他见到了赵紫阳。赵听了他四十分钟。他人还未回到上海，华师大已经接到通知。他一进门，人先问："你怎么见到赵紫阳的？"学校安排他去总务科。去考木工，他也名字都写不好，因为没能上过学。后来他当了木材厂厂长。他哥哥在华师大门口开了个饭馆。

历史学家的命运--傅洛焕之死

傅洛焕，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1966 年 6 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杀。

按照江青的说法，文革是以她到上海组织人写文章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标志开始的。由姚文元写的这一文章发表于 1965 年 11 月。实际上，文革也因此对历史学工作者打击得更大和更早。

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近郊，1966 年时有一千多学生，一千多教职员工。1966 年 6 月初工作组被派到学院里领导"文革"运动，发动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的攻击。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 年 6 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

在这一时期被"斗争"后自杀的和死去的历史学教授，我们知道的还有：

北京大学历史系汪钱（+竹字头），在 1966 年 6 月 11 日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1966 年 6 月 15 日开煤气自杀。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降级。文革开始又被批判"斗争"。1966 年 9 月 27 日和历史系的其他教授一起到昌平县劳动。他们被分成甲乙两组，向达被分在"问题更严重"的甲组。乙组的人在乡下两星期后可以回家了，但是甲组的人不准回家。向达有尿毒症，腿疼，排不出尿。不准向达去医院治病。到 10 月下旬，向达已经不能行走，才准他回城，送到城里，已经不能救了。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 1966 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

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6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翦伯赞和夫人，在毛泽东指示把他们释放回家当"反面教员""养起来"之后，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６４号。当时由北京大学发给他们夫妇每个月生活费 120 元。这在当时是能维持中等程度生活的钱数，但是显然其中的侮辱性非常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

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1949 年前是清华大学的历史教授，1950 年代开始当北京市副市长，在 1966 年和 1967 年遭到无数场残酷的"批斗"。1968 年 3 月他被公安部逮捕。1969 年 10 月 11 日吴晗死在关押中。他的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1969 年 3 月 18 日去世。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 年神经错乱，1975 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 年 9 月 23 日自杀。

北京的人民机器厂的一个学徒工遇罗克，写文章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上海文汇报把他的文章当作反面文章发表，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后来遇罗克又书写

了著名的《出身论》。1970 年 3 月 4 日，遇罗克被以"反革命罪"枪毙，时年 28 岁。

作历史研究的人受到了这样的迫害。傅洛焕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另外，他是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时代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1950 年代曾任台湾大学校长。这种亲属关系也成为傅洛焕受到攻击的另一"理由"。

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后来，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投水自杀的人，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洛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这是否真是普遍现象或有什么原因，无从得知。但是在文革期间，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迫害中，自杀的人很多，看到的案例多了，所以人们才有了这类经验，总结出这么一个说法。

比如，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

作家老舍在 1966 年 23 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 年 8 月 24 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 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

吴伟能，男，１９５３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 1968 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因为参加两派斗争，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 1959 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吴伟能的父亲，1958 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别人说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话。这些话被揭发出来。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他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

关于 1968 年 11 月 5 日在圆明园池塘中发现的尸体，哪些面朝上，那些面朝下，未见报告。那时正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进行的时候。那个运动在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比 1966 年导致傅洛焕死亡的运动更加大规模和系统化，于是，也有更多的人被害死。根据文革后的一份"内部文件"，在北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三千人自杀，有两百人被打死。从各个学校和单位的死亡密度来计算，死亡数字应该大于此数。

并非一个人的遭遇

顾文选，男，1934 年生，1954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后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在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处死。顾文选活了 36 岁。

顾文选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杀害。顾文选被害时，正值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文革中，对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犯"，都"立即执行"。"立即执行"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不准上诉。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帝时代，判处死刑，都允许申诉并要经过上级司法机关的批准。文革的死刑判处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即使中国当局允许阅读文革时代的文献记录（实际上是不准阅读），我们也不可能看到顾文选的上诉书，不能看到顾文选对自己的案件的说法和对自己的生命的辩护。顾文选也没有能留下遗言。在文革时代，监狱当局不会让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写下遗书并予以保留。也不允许被判死刑的人在公众前讲话。文革后被揭露出来的是，被判了死刑的辽宁省女干部张志新，在 1975 年 4 月 4 日被押往"公审大会"会场的时候，先被切断了喉管。这样的措施，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绝对不准他们发表他们的声音。说都不允许，写则更不允许。顾文选在大学生时代就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他没有结婚，也就不可能找到他的妻子儿女以了解他的死亡经过和他的生平往事。在笔者书写"文革受难者列传"诸篇的时候，一般来说，对受难者，都曾经采访过和死者曾经相识的人，如死者的同事和朋友，可能的时候，都尽量访问过受难者的家属。家属对受难者的死亡年代和死亡情况一般记得最为清楚，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也都愿意为历史写作提供资料。然而，非常遗憾，对顾文选，从来未能得到任何机会这样作。

关于顾文选，笔者只是从力所能及的文字资料里，搜寻到了一些有关于他的零星记载。这些文字记载非常简略，有些最初就根本不是为他而写的，只是从有关别人的文字记录中找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简直就象从考古者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一些残破的竹简。通过这些竹简似的材料研究顾文选，简直就象在研究古代的一个人物。实际上，在文革文献资料不公开的情况下，研究文革人物有时就变得像研究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对于收集到的为数甚少的文字记载中的人和事，笔者都作了尽可能作了进一步的材料搜寻，加以尽可能清楚的说明和解释。这样作"案例研究"的方法，也像是在作古代人物或者事件的研究。但是由于材料封锁，不得已而用于研究其实还只是 40 年远的历史。

笔者发现的关于顾文选的这些文字记载，仅仅体现他的一生的几个片断。但是，这些片断正是他生命中的一些关键片断。因此，通过这些这些片断，能拼装出他的经历的一个大轮廓，使我们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角度来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尽管关于顾文选的生平，只能了解到他的生命轮廓的粗线条，这些线条和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一系列历史事变紧紧纠结在一起。在顾文选这一案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最高权力当局发动的几次所谓"政治运动"决定了他的个人命运。这种个人遭遇和"革命"历史的紧密关系，使得觉察和认识到这种关系的人不能不感到震动与悲愤。以下是笔者找到的关于顾文选的文字记载。这些片断，在时间上是反向排列的，这是一个逆时间的回溯。

片断 I：

这是一份"通知"。首页上半部分印了两段"最高指示"－－当时把毛泽东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这两段"最高指示"都是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巩固革命专政"的。凡是公文，甚至个人

的通信，都以毛泽东的语录开始，是文革时期的特别的行文体例，在文革中盛行了至少五年。首页的下半部分，是通知的全文：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份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一日

在这份通知中，顾文选的名字列于五十五人之首。他的"罪行"也被编号列为五十五人中的第一号。关于顾文选的"反革命罪行"，材料里是这么写的：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1, 关于顾文选的判决和死亡日期

笔者没有能找到顾文选的死刑判决书。这份材料发放二十天以后，顾文选被判处死刑。他是 1970 年 3 月 5 日被处死的。因为时间如此靠近，所以他的判决书里，不可能与这份材料有不同的内容，这份材料的内容应该就是判决书的内容。虽然没有找到他的死刑判决书，却能知道他被处死的日子，是因为他和遇罗克一起被处决，遇罗克的家人记得这个日子。至于遇罗克是什么时候被判处死刑的，现在不得而知。遇罗克被平反后，他的家人收到了遇罗克的平反书，那上面未写他是 1970 年 3 月被判处死刑的。遇罗克的平反书上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 1310 号 遇罗克，男，1942 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分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 年 1 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份"再审判决书"上，说遇罗克是 1968 年 1 月被判处死刑，其实，他是在 1968 年 1 月 5 日被逮捕的。他的家人记得这个日子。法院弄错了。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疏忽，弄错了判决的日子。也可能是确实在抓他的当月就判了死刑，但是没有"立即执行"。当然也可能是在 1979 年他们找不到当时的判决书，就把他被捕的日子当作了被处死的日子写在纸上。遇罗克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家庭，他的家人记得他在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杀害。这样我们才知道了顾文选被害的日子。

2, 顾文选被处死的时代背景："一打三反运动"

1970 年判决了一大批人的死刑，是因为当时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一个缩略语，

是指"打击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是一个"运动"。所谓文革，主要是由一系列的"运动"所组成的。死刑本来是应该按照罪行依据法律来判决的，但是文革时是由文革领导人发动的"运动"来进行的。1970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1970〕4 号"文件。

《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之前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这一《指示》，与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的 1970 年 5 号和 6 号文件）相结合，统称为"一打三反"。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迫害人的形式与 1968－1969 年之间的"清理阶级队伍"有所不同。那一次主要是通过所谓"群众专政"来作的，在各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专案组"和"牛棚"，后者是指建立在各单位里的牢房。"一打三反"则主要通过国家的"专政机关"来执行。"一打三反"前，就有一批人被逮捕与被杀害。比如，林昭在 1968 年 5 月在上海被枪决。（见"林昭"）笔者调查中的另一个案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陆在文革前就患有精神分裂症，曾经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的有些话，也就是说，一个精神病人说的话，也被当作"反革命言论"，而且，更进一步，用这些话就判了他死刑。陆洪恩在 1968 年 4 月 28 日被枪决。"一打三反"，是在被捕与枪决的人数方面，大大提高了规模。这是一个专题运动，"打"是主题中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并且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判处死刑。

就北京市来说，在 1987 年编辑的内部印出的《北京文革'大事记'》中，摘录了 1970 年 10 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认真执行政策深入开展"一打"运动的情况报告》。其中说： "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市又查出叛徒、特务、反、坏份子 4823 名，其中 6 月以后查出的约占四分之三；清查出外地流窜来京的反、坏份子 934 名，其中 6 月以后查出的占三分之二。同时，破获反革命和较大的刑事犯罪案件 3138 起，破获一批通敌叛国、阴谋暴乱的大案要案，抓获了一批阴险狡猾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案件下滑，凶杀、抢劫、纵火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案件减少。" 读这一报告，需要注意到，在"一打三反"中被"查出"的这 4823 名北京本地人和 934 名外地人，是在刚刚过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揪"出了 8 万多"阶级敌人"的基础上（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 1968 年

11 月的报告），又追加上的。顾文选就是"一打三反"中被处决的一个"反革命"。

和顾文选一起列为"同案"的周鸿东，笔者未能发现任何关于他的经历和背景的记载，也未能找到知道他的人。希望读者中的知晓者能够提供。

3，当时判处死刑的程序

当时判决死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在北京市，早在 1967 年 2 月，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前，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就发布布告：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牟立善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任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

当时正是所谓"一月夺权"的时候，文革后还有人认为那时"群众"真的可以"夺权"，其实最有实权的"专政机关"，连表面上的"群众"夺权也没有过。到 1970 年，"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一统管制"公检法"三个部门。

司法系统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是人类社会史上最重要的发展和进步之一。可是在文革时代，这三家不但都被"军管"了，而且，从这个名称也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三者已经合而为一。"公检法"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三个独立的单位。

在民主社会，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独立，这是建立在权力的分工和互相制衡的原则上的。在文革前的中国，就整个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存在"独立"的司法系统。但是，在司法系统中，在机构设置上，这"公检法"三者还是三家，分别称为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而不是一家。到了文革，三家公然合并成了一家，"公检法"成了一个词。这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贯彻的结果。在 1968 年，毛泽东发动所谓"造反派"夺权，然后他决定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叫做"革命委员会"。他不但制定了名称，还规定了这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形式。

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在文革后，仍然有相当一些人还在肯定文革反对"官僚制度"的正面贡献。其实，一方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强调过一般意义上的"反对官僚主义"，更没有在文革中致力于采取有关的措施让人民少受官僚主义之苦，另外，他所说的"打破重叠的行政机",听起来好象有道理，实际上作了的，是取消了像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分开并且独立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结果，是取消了审判方面的法律程序，在制造对人的迫害方面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提高效率啊。

文革前，法院张贴死刑布告或者一般徒刑的布告，布告上都写明审判员或者法院院长的名字。这多少也是一种文革后才开始说的所谓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另外也多少体现了法院院长的责任。但是在宣判顾文选的时候，不但公检法合并为一，而且"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一个集体名词，不署个人的姓名。这种大名词，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得被判刑者面对一个集团，无处可以对话申诉，又使判决他人死刑者更加高高在上，老百姓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也就

更能杀人惩罚人，无所顾忌。

文革前，判处死刑，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但是在"一打三反"中，中共中央的文件明确说明："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这样的做法在"一打三反"之前就实行了，在"一打三反"中更加体系化。法律的这一程序方面的改变，是一项很重大的改变。司法系统就在这种改变中被进一步"一元化"了，而且，就以这样不正式的方式宣布出来。

上文写到的在 1967 年被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刘传新，后来称为"军管会"的第一号人物，执掌北京公安局工作，一直到毛泽东死去和"四人帮"被关押。刘原为南京军区某部军副政委，掌管北京的"公检法"长达十年。直接受过他的迫害的人的数字，十分巨大。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谭宗级的文章《"五一六通知"评析》说："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见《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7 年，页 21）笔者曾经询问谭宗级教授这个数字的出处，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谭宗级教授说，这是从中央文件里引用的，可靠的。他在中央党校这样的高层机构工作，能够看到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加之中共中央不会夸大这样的可能损害共产党形象的数字，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只会少、不会多的数字。

死于冤狱的就有 9，804 人，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那么还有进过监狱不死的人，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刘传新作恶之多，由此可见。另外，据说他不但大量抓捕北京人，而且把文革前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干部也大批关押和送到农村劳动，有几千人之多。

1976 年毛泽东死去以及"四人帮"随之被逮捕，中国的上层权力拥有者发生了大变化。在文革中被刘传新关押迫害过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回到权力位置上。1977 年 1 月 27 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公安局长的职务。他被"隔离"在东交民巷他居住的院落里受"审查"。1977 年 5 月 18 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开"声讨刘传新大会"的通知。半夜里，他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刘传新自杀，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失势，也很可能是由于惧怕他用于别人身上的残酷做法，在那些人恢复权力之后会用到他自己身上。但是他惧怕的人中间，不会有顾文选这样的人物。这不但是因为顾文选已经被杀死，也因为顾文选本来也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普通人。刘传新可以算是政治迫害机器中的一种典型人物。他是像前苏联的贝利亚一类的人物。贝利亚在斯大林时代主持秘密警察工作，权倾一时，在他指导下，无数人被流放或者枪杀。在斯大林死后，贝利亚自杀，被新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为"反党份子"。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刘传新这一类的人物，还没有得到清楚的记载与分析。

在"公检法"合并而显得"精兵简政"的同时，实际上建立了新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有"三办"和"六办"两个新的办公机构被建立起来。"三办"专门负责"一打三反"，"六办"是专门负责"清查 516"的，那是"一打三反"之后的一个"运动"。后来这两个"办"又被合称为"三六办"，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可能直到毛泽东快死的时候还存在。在这方面，毛泽东根本不在乎"重叠"不"重叠"。他要的是"一元化"，即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这方面，他彻底打垮了人类历史上人们探索试验而建立起来的关于权力的平衡和制约的思想和方法。他的这种思想，至今未

能得到清算。

同时，这个材料还告诉我们，当时作这样的判决的过程，在"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作用之外，有"革命群众""讨论"的部分。至今有人认为"大民主"是文革的主要特色。也许这种由"群众"来讨论，会被当作这种说法的重要根据吧。但是从这份材料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种"群众讨论"的功能是什么。首先应该注意到，顾文选的主要罪状是"反动言论"，但是材料中没有介绍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关于这一点，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法，把这种"反动言论"列作"防扩散材料"，一律不准复述。如果真的是要"群众"来"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那就应该告诉大家他到底说了什么"反动言论"。不告诉"革命群众"顾文选到底说了什么，却要群众"讨论"对他的处理，这根本不是真要群众来参与定罪过程，而是恐吓群众，逼迫他们再也不敢讲任何可能当局不准讲的话，不敢说任何可能会被指控成"反动"的言论。为了免于受到顾文选那样的惩罚，也没有"群众"敢对顾文选被重判提出异议。如果贴近事实去看文革，很容易发现关于文革的说法如"大民主"多么远离实际，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理解。在下面，我们还将对"群众"在这个案件中的作用作进一步的分析。

4，文革中以什么"罪行"判决死刑？

"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顾文选死刑。"反革命罪"又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从这个材料看，顾文选被列为55人中罪行最为严重的人，把他判为"现行反革命犯"，所根据的"罪行"是两条。

一是他的"反动言论"。

材料要群众讨论对顾文选的"处理"，却没有给出他到底说了什么"发动言论"。只是笼统称之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罪名当时普遍运用。"专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干脆将此简称为"恶攻罪"。经过文革，特别是经过"一打三反"，"恶攻"变成了一项正式而普遍运用的大罪罪名，就像"谋杀""强奸""抢劫"一样，而且比这些更严重，犯了后几项罪的人属于"刑事犯"，犯了"恶攻"的人，在监狱中作为"反革命犯"以区别于"刑事犯"，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而且也更可能被加重判决。 "恶毒"是个形容词，根本无法设定多"恶毒"算是"恶毒"的标准。一个玩笑，甚至一个口误或者笔误，都可能用"恶毒"来形容，紧接着就可能变成死罪。想到由于"恶攻罪"被判处死刑的人们，如顾文选，如陆洪恩（陆洪恩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在文革前就患有精神分裂症。请看关于他的条目）。另外，必须注意到，从这份材料来看，绝不是顾文选曾经在公众场合表达过他的不同意见。私人谈话中说的话被"揭发"出来，就成为死刑的根据。

和顾文选一同列在55人中间的人，有一个名叫闻佳，是其中最年轻的，女性，当时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文革开始时，闻佳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三的学生。根据笔者的调查，闻佳后来被判18年徒刑。判她如此重刑，所根据的"罪行"是什么呢？事实上，在闻佳被捕前，在1968年底的寒冷的冬天，因为她的父母的"问题"，她无家可归，只好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安身，并且准备在那里绝食而死。她在厕所里被"校卫队"发现。被抓起来受审讯时，她在绝望中，直说出了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反动言论"。在"防扩散"理论下，闻佳的"反动言论"从未被公布，除了审讯她的人，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也无从知道法庭是以什么标准定的这样的重罪。由于她说了从来没有向公众说出的"反动言论" ，一个20岁的年轻女性被判决18年的监禁和苦役。

在 1966 年夏天，闻佳 16 岁的时候，她被同班的红卫兵当作"狗崽子""斗争"。在"斗争会"上，她站在教室前面，有人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落在地。她和她的母亲被驱逐出门，他们的东西都被砸坏或者没收。一个年轻的女性遭遇了如此多的摧残，她当然应当有怨有怒。但是这些怨怒根本没有发出，她就被投入了监狱。

毛泽东死了两年半以后，由于邓小平的新政策，1979 年春天，释放了一批闻佳这样的"恶攻""反革命犯"。因为她被判刑前是在校中学生，她是被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扭送"（这是当时对此类情况的专门用语）到"专政机关"去的，所以她曾经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找学校当局，希望解决她的困难，学校当局告诉她，如果被判刑前是大学生，当时可能由原大学安排工作，但是她是中学生，所以他们无法为她"落实政策"。据那时和闻佳谈话的干部说，她觉得闻佳的健康状况很差，精神有些不正常。一个在文革时代的监狱里度过了十多年的年轻女性，身心当然受到极大的损伤。闻佳得到这样的答复，就离开了，以后也没有再去那个中学。没有发现有人知道闻佳离开后去了什么地方。希望有读者能告诉她现在在哪里。

把"反动言论"当成重罪甚至死罪，在"一打三反"之前就有，只是在"一打三反"中，变成了普遍应用的不容质疑的法律。被杀的所谓"反革命"，就这个 55 人的材料来看，他们的所谓"反革命行为"，主要就是"反动言论"，而且，是一些私人谈话中发出的言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冠冕堂皇地写着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甚至在文革中修改过的新宪法中，虽然去掉了"迁徙自由"，却依然保留有"言论自由"。然而，在实际上，言论被当作判处死刑的根据。回顾历史的时候，需要注意到这样的矛盾，即一个时代的写在纸上的宪法，和实际生活中的执行的法律，差别可能有多大。

顾文选的第二条罪状是逃离中国，在材料上被称为"叛国投敌"。共产党总是宣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在 1950，1960，1970 年代，普通人民根本不被允许得到护照出国。如果他们想要离开中国，只有秘密离开。秘密离开中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另外，竟然可以成为判处死刑的"理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残酷的执法。在德国有过"柏林墙"。在 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以前，试图偷越"柏林墙"的人，有一百多人被哨兵打死，这是非常凶残的事情，因此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指使这种射击的人被起诉。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在越墙的时候被抓住了，他们因此被判刑。笔者认识一位当时的东德大学生，曾经因试图越墙而被判刑一年。也就是说，他们被判的徒刑，是离死刑相当远的徒刑。由是，当我们回看往事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样的重刑是别处也发生过的事情。

在这 55 人中，最普遍也被认为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就是这两项。顾文选不幸两项都具备，就成为 55 人中的第一名，最大的罪犯。顾文选被判了死刑。这五十五人中的一部分人，像顾文选一样，很快就被枪决了。另一部分人被判了长期刑期，从十年到二十年都有。他们被当作"反革命"被判死刑或者重刑。

到 2001 年为止，仍然有人认为文革是一个"大民主"。这样的看法的根据，是当时普通人可以对各级领导干部"造反"。且不说当时的"斗争会"等形式是多么野蛮和违法的手段，也不说可以"造反"的内容仅仅是那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的看法无视顾文选、林昭、陆洪恩这样的人的被残酷杀害的事实，无视闻佳这样的人被判重刑的事实，创造了一个文革神话。这是令人震动的事情。在这份材料上的 55 人之中，根据了解，被判处死刑的除了顾文选，

至少还有田树云、孙秀珍、朱章涛、王文满、沈元。他们的主要"罪名"，也都是这两项。他们被判死刑的材料，说明了文革时代判处死刑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文革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也是作为罪恶的特征之一。

顾文选的这份"罪状"，还强调顾文选曾经"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也就是屡犯重罚的意思。

顾文选怎么是判过刑的呢？他上一次进监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要看下一片断。

片断 II：顾文选从劳改农场逃亡

《阳谋》是一本关于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历史的书。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包含了作者丁抒收集的大量事实。丁抒曾经访问了北京大学的"右派份子"黄继忠老师。他从黄继忠那里了解到顾文选的情况，写入书中： "鸣放"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曾主持召开控诉大会，由该系在肃反中无辜被斗争的学生顾文选等上台控诉。黄被打成"极右派"，送清河农场劳改。

顾文选成右派後，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留在清河劳改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有一天，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劳改的原来北大的老师黄继忠。对黄说："我恐怕以後不能常来看你了。" 此时顾文选已经绝望，决定出逃。他设法逃到了苏联。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将他像畜生似的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後又送回远东，引渡回国。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中，顾文选被枪决。(《阳谋》，丁抒，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330 页，1995）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1 关于黄继忠老师。

据丁抒的书，黄继忠老师也在 1957 年被定为"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在后来能够回忆顾文选的人中间，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顾文选的人。他和顾文选在同一劳改农场，他和顾文选有过师生关系，而且他们也一起在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由于这些原因，所以顾文选决定逃亡的时候，来向他告别。但是黄继忠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告别。他后来听到顾文选被判死刑的消息，才知道顾文选来看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决定要逃亡。当时，顾文选是来向他作长别的告辞的。后来这告辞成为生死的告辞。黄继忠在 1979 年主持了给顾文选开的平反及纪念会。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八十年代到了美国，曾任伯宁顿学院教授，有英文著述发表，后来退休。他伯宁顿学院的美国同事帮助笔者和黄老师联系，但是发现他患重病住医院，不能接受访问。

2 "右派份子"的"处理"

对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的分六类"处理"：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二类撤销职务，监督劳动；三类撤销职务，留用察看；四类撤销职务，另行分配；五类降薪降职；六类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大逆转》，159 页，明镜出版社，香港，1996。）顾文选在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又被判刑，显然是按照第一类，也就是最严重的

一类处理的。

处理分成六等，对于控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是有效的方法。右派份子本来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罪行"是不具体，不实在的。但是这种"处理"方法，提供了机会来收集他们的新的"罪行"。如果他们不服，就可以把他们为自己申辩的话和所谓"认罪态度"也当作新的"罪行"。这样，其他人就必须接受定罪，以免再被加重处罚。

当时身据高位、在报纸上发表言论后来又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得到的惩罚，反而比顾文选这样的大学生为轻。"第一号"右派份子章伯钧，原来是林业部长。成"右派份子"后撤了职，但是仍然住在原来的大房子里，直到在文革前夕去世。储安平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成为"右派份子"后，每月还有 100 元生活费。但是大学生"右派份子"如果被开除学籍，即使不像顾文选那样被判刑也没有被送去"劳教"，在城里有个工作，每个月只有二十多块钱工资，直到文革结束。对于这样的特别的处罚方式，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和顾文选一样被判刑的北京大学的"右派份子"，还有别人也被逮捕。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说：

1957 年 7 月 27 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521 页）

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曾经在 1957 年 5 月 23 日和 5 月 27 日，也就是顾文选讲话前两天和后两天，到北京大学演讲。林希翎后来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判刑 15 年。据说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布置了对林希翎的逮捕。

对于大学生作这种残酷的惩罚，配合了"切实纠正"所谓"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中共中央通知》描述了这一点，1957 年 10 月 15 日。）身据高位的文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7 日）上写诗说"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哪许一丝丝"。这样的"诗"现在看起来根本就不是"诗"。但是，问题还不在于此。这种"诗"帮助合理化对"右派份子"的残酷"处理"方式。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以及当时身据的高位，更扩大了这种想法的影响。而且，实际发生的事情比"诗"里所写的严重得多。不但是"一丝丝""温情"都没有，而且用了非常恐怖的手段，那就是在学校发动同学老师"批判""斗争""右派份子"之后，又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关进监狱。

3 "右派份子" 在文革中

顾文选在文革前就服完了他的徒刑。丁抒书中说的"永不能回到社会"，意思之一是，服完徒刑之后，他不能回到社会上和别人一起工作，而是必须留在劳改农场。这种情况，当时的专门说法叫作"留场就业"。也就是说，虽然已经不是在押的"犯人"了，但是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不得离开，直到死亡为止。

文革开始的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九年了。文革中，"揪出"了一大批新的"牛鬼蛇神"。这些新的"牛鬼蛇神"中，有一大批就是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的领导者。由于 1966 年所有的大学的中共党委的负责人都被"打倒"，所以，可以说，那些在大学里主持把一大批

教授和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也都变成了"敌人"。他们遭到毒打和侮辱，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饱受折磨后自杀身死。但是，他们被"打倒"，丝毫不意味着 9 年前被他们"打倒"的人有翻案的可能。在当时的政策下，任何替自己辩护的行为都可能被叫做"翻案"，而"翻案"就被当作"反革命"行为。在文革中，不但"右派份子"是"运动"打击的"牛鬼蛇神"的主要类别之一，连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右派"，仍然被叫做"摘帽右派"，而一些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则被叫做"漏网右派"，都遭到各种残酷打击。"地富反坏右"成为一个虽然长达五个字但是人人能流利使用的新汉语词语。

在一篇题为"劳改纪实"的文章里（《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6－141 页)，作者梦波，1957 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被送到清河农场劳改。他和顾文选的情况和遭遇类似。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在 1966 年夏天，红卫兵到劳改农场"造反"，毒打了在那里被"劳改"的人。紧接着，劳改农场内部也组织了对那里的"右派份子"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殴打。那个夏天在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劳改农场中的暴行和北京城里的不但时间上同步，也一样残酷。留在城里的"右派份子"，也遭到残酷的迫害。而且，在体力虐待的残酷方面，远远超过了 1957 年。章乃器是前粮食部长，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 年 8 月 24 日被红卫兵抓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东侧的"吉祥戏院"。那个戏院里，当时每日有被打死的人的大量尸体运出。章乃器在那里被打成重伤。他没有被打死，但是被国务院行政机关从原来的大房子里赶了出来。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抄家和殴打后，到北京颐和园附近青龙桥投河自杀，因水浅未死。后来他失踪。只可能是被打死或者自杀了。至于那些本来就是普通人的"右派份子"如果幸运未入劳改农场，文革中至少都进了本单位的"劳改队"和"牛棚"，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加判了徒刑，进了正式监狱。

顾文选在文革开始后逃离劳改农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上。

片断 III： 1957，顾文选被划成"右派份子"

1998 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了一些校史方面的书籍，其中篇幅最长也最为正式的，是两卷本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有一段关于顾文选的记载，照录如下(见该书 517 页)：

（1957 年）5 月 25 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

关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的注释与说明：

"三害"是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害"。1957 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要人们批评这"三害"。但是听从这一指令提出批评者，如顾文选，很快就被说成是"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反而是对"三害"的批评成为一种罪过，批评者并且因此受到严厉惩罚。毛泽东后来很得意地将此称为"阳谋"，也就是说，一种公然玩弄的诡计。在强权压迫之下，没有人能质疑这种"阳谋"本身的非法性。

1957 年 5 月 19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出席共青团"三大"

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别的事情，并且成立了一些学生社团，其中之一叫做"百花学社"。这个阶段非常短促。一个月之后，6 月 21 日，《人民日报》就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参加贴大字报的学生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也解散。顾文选的讲话出现在这一短促的阶段中。由于北京大学的学生的活动总共延续了只有一个月，现在看来，除了这个讲话，顾文选也不可能在那一时期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活动。

但是，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定为"右派份子"，并且为之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 年 1 月 31 日的记载，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和 1958 年初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把 589 个学生和 110 名教职员，一共 699 人，划成了"右派份子"。699 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应该注意到，当时全校学生人数是 8983 人，教职员人数是 1399 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绝对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超过了百分之五。（附记：在同书的 1982 年的部分，890 页，说，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 716 个右派份子。716 个和 699 个是两个不同的数字。不清楚是 1958 年时数错了，还是在后来又再次有"反右补课"。无论如何，这个不仅仅是数字，数字后面是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些数字代表的人因此而吃尽苦头，有的为此失去生命。） 北京大学划出的"右派份子"超过了百分之五，不知道这是上级规定的"比例"，还是北京大学领导人自己的决定。

这段记载中说到的那天谴责和警告了学生的江隆基，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北京大学 716 人成为"右派份子"，应该是江隆基主持决定的。当时各个单位的"右派份子"，都是由各单位的中共党委或者总支决定，然后报上一级党委批准。这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的"中共中央通知"里写得非常清楚。早在文革之前，这种"一元化"就已经如此严重，不是通过司法系统（那个司法系统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而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有权直接地惩罚普通人民，也无须以法律为量刑准则。 1957 年 11 月 1 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1958 年 2 月 1 日，新的第一书记陆平向全校师生员工作关于处理右派份子的报告。1959 年 1 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 1966 年 6 月 1 日晚，由毛泽东命令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陆平是"黑帮份子"。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开始了全国攻击教育界人士的高潮，陆平也因此在全国变得人人都知道。文革中陆平遭到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斗争"。除了在"斗争会"被"斗争"之外，他被长期关押，还曾经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逼供。

江隆基在兰州大学，也被中共甘肃省委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1966 年 6 月 17 日，江隆基被一些学生从从家中揪出，拖到操场。学生用桌子板凳层层相迭，强迫江隆基跪在上面，头上套了一个十多斤重的铁笼子。6 月 18 日，中共甘肃省委定江隆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6 月 23 日，在兰州大学开大会"斗争"江隆基，罚跪，戴高帽子，游街，都用上了。6 月 25 日，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江隆基自杀。

江隆基，1905 年生，陕西人，1924 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代初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没有材料显示他反对共产党中央或者反对毛泽东。事实上，他代表共产党统治大学十多年。因为毛泽东要改变大学，就"打倒"当时所有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被"打倒"，是文革中各大学共产党党委负责人的共同命运。他在死前遭到那么残暴的对待，则是当年他参与反对"温情主义"的结果。他的死，是共产党人被共

产党吞噬的典型例子之一。

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说"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这显然是当年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的说法。由于未能找到有关记录，所以我们不清楚顾文选讲话的具体内容。但是，虽然江隆基和北京大学当局说顾文选说的不是真的，他们显然都没有调查过顾文选所说是否真实，因为顾文选是从杭州考到北京大学的，他说的他经历的"肃反"中的事情，发生在杭州，他下午在会上说话，当晚江隆基就在会上提出谴责和警告。当江隆基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当然根本不可能对顾文选所说的事情作过任何调查。也许正因为知道在"运动"中是不讲道理的，所以，文革中江隆基遭受折磨和侮辱的时候，他很快就自杀了，他不抱希望，不会指望上级会调查清楚他的"问题"。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在 1957 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等 589 个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希望他当时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意识到也不能预测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他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战斗理想和目标；也不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仅仅把自己当作了这场残酷"革命"的失败者或者失意者而绝望，而不曾否定这种残酷的争斗本身。不能把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看作他在早年的行为的"报应"，因为比江隆基在迫害人方面起更大作用的负责干部，并没有遭到类似惩罚。但是，在江隆基的死和顾文选的死之间，仍然有逻辑上的联系。是从 1957 年的迫害出发，才走到文革的更大的迫害的。是在 1957 年把"一丝丝"的"温情"都痛加批判之后，暴力迫害才能愈演愈烈。在 1957 年的大学，就为文革准备好了迫害的思想和进行迫害的人。

这是与顾文选的悲剧相关联的另一个悲剧。革命的车轮用人血来润滑。一度在车上指挥革命的人，也会被抛下车去碾死。

片断 IV 顾文选"控诉"了什么？

1957 年 7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作者署名是"闵刚侯"。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事情，虽然没有写名字，却和顾文选有关。

这篇文章是在"揭发"6 月 6 日章伯均和北京六位教授的谈话。其中有一段：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运动揭露出来多次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份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可以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是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去了。他说，今天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造成的。

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北大二学生，当是上文引用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里面写到的顾文选与周铎。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强化了费孝通的批评口气以作为费孝通的"罪行"的。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非常明显的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我们难以判断是否费孝通在其讲话里真的用了"黑暗"这样的词。从后来的事实看，不但是"黑暗"，而且是"血腥"，不但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而且剥夺了人们的生命。但是在当时，夸大人们的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的激烈程度，然后以此为理由给人定罪，是普遍的事情。特别是因为不允许自我辩护，所以各种夸大性的"揭发"相当容易发生。不过，我们可以判断他在讲话中，大概是确实提到过顾文选的。我们也从中知道顾文选所说，是关于 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事情。

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对于"右派份子"的处罚，当时是对原来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比地位低名气小的人为轻。费孝通是从有名的大教授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费孝通被降了几级。只知道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原来是一级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后，降了一级，成为二级教授。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因为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却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这是一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处罚方式，可是站在权力当局的角度来看，有利于控制情况和警告大量的普通人。

据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到 1957 年 8 月 7 日止，全市已经发现高校教授右派份子 192 人，占教授总数 1390 人的 13。8％。（转引自《大逆转》，365 页）北京的高校，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比例是 13。8％。对这些教授们，当时大多数被降职降薪。由于在 1956 年以后，大学教师的工资就很少提升，所以到文革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的收入，仍然不算低的。这甚至成为他们在文革中成为打击目标的理由，因为他们仍然属于高薪阶层。

费孝通，1910 年生，1933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1938 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40 年代任教于西南联大，1957 年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1957 年，费孝通因为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气候"文章，是当时报纸上受攻击最多的"右派份子"之一。他成为"右派份子"后，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在文革中，费孝通也被"斗争"，进过校园"劳改队"，住过"牛棚"。文革后，"右派份子"被"改正"之后，他担任很高的职务，也常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种文章。但是始终未见他写到他所经历的"反右派运动"，当然也没有再提到他当年讲话中说到的顾文选后来的遭遇。1957 年，为顾文选在"肃反"中被"错斗"，他为此感到震动，说了上面引用的一些颇动感情的话，也在道义方面表示同情。文革中，顾文选被枪毙，可是，文革后，费孝通可能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却不再为顾文选的遭遇说任何话了。虽然言论环境变了，但是费孝通也变了。即使压力撤去，被扭曲的心态不能像弹簧那样恢复原状。 顾文选已经被枪杀，再也没有可能来说出他后来的更悲惨的遭遇。活着的人如费孝通，有亲身经历，对当时的事件发展，从"右派份子"的角度有清楚的了解，同时又有写作的能力，是应该写出他的见证的。他没有写，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他是应该写的。

片断 V： 顾文选在"肃反运动"中

据北京大学的一名和顾文选在同一时期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学生陈奉孝说：

"顾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

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印入《没有情节的故事》，497－498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

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奉孝，当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在 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像顾文选一样。笔者未能找到这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文章。希望读者中知道这篇文章的人能提供其更详细的内容。可以从别的材料来了解"肃反"是怎么进行的。

肃反的指导性文件之一，题为"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上署明的发出日期是一九五六年三月十日。在这个"规定"中，在分条列出了所有的可以定为"反革命份子"的类别以外，有一条说：

"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份子。这种人可以不计算在 5％左右的坏人以内，列入审干范围去处理。"

这条规定，从侧面证实了每个单位是有 5％的打击对象的定额的。

参加了"肃反"的人们也证实说，当时各单位都是要凑够 5％的比例，拚命威逼恐吓，要抓出足够的"反革命"人数来。这里有来自上面的领导机构的压力，也因为本单位里有的人要趁机立功买好。 要注意到，在 1955 年进行的这一场"肃反"运动之前，已经在 1950－51 的"镇压反革命"中，枪决了 71 万人。71 万是《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 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提供的数字（737 页），毛泽东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 100 万。

在杀了这么多"反革命"，还关了大量的"反革命"以后，还要进行一次全民性的"肃清反革命"，除了扩大"反革命"的定义之外，自然还需要加大审查对象的人数和对他们施加各种压力。为此，全国竟然有 75 万专职肃反干部，作了 328 多万人次的外出调查（同上书，740 页）。这是一场动员了大量人力的运动。作为结果，是"清查出重大反革命份子 10 万多名，一般反革命份子，反动份子、刑事犯罪份子 6。5 万。查清个人政治历史问题 177 万多人，其中问题严重的近 13 万人。"（同上书，740 页）

这些数字的来源，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他显然是这场"肃反"的总指挥。

为了"挖"出百分之五的"坏人"，"审查"了多少人呢？在《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一书中，关于 1955 年到 1956 年的"肃反运动"，作者朱正指出，当时每个单位都按照统一部署，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本单位选定运动对象。为了"造声势"，还选出一些人来逮捕，造成运动所需的紧张空气。他根据一系列材料，分析道：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在"肃反"中被整肃；当时全国的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共计约 670 万人，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

样宽泛。（256－261 页）

把社会中的一个很大数字的人群，划出来进行"审查"，审问隔离，再从中又划出一部分作为受到永久性处罚的"敌人"，这样的做法，几十年来不断实行，以致有的中国人已经把这样的做法视为像刮风下雨一样的常态，不从根本上去质疑和反对。

1949 年共产党夺得政权的时候，顾文选只有 15 岁，还是未成年人。他的家庭，也不是什么在文革时代被认为"有问题"的家庭。我们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上面引述的 55 人的材料中，有些人的名下列出了他们的当时被认为是很"坏"的家庭背景。顾文选的名下没有写出他的家庭背景，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家庭没有什么"问题"，否则当时会把这一点写上。由此看来，他的年龄和家庭背景，使他自身在"肃反"中不至于成为"运动对象"。他在肃反中被"斗"，一开始不会是因为他自己受到"审查"，而只可能是因为他批评了对别人的审查。

在"肃反"中他受了第一次打击后，顾文选还是没有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反感迫害并且希望消除迫害，所以他才到会上去"控诉"，要不然，他在看到了"肃反"的种种可怕之后，会变成一个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人，不会作这样的发言。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中还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份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份子"。这样，顾文选就被框住了。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同情被错整的人，控诉自己遭受的迫害，其实和从根本上怀疑否定这个"肃反运动"，是有所不同的。据以上的记载来看，顾文选的"控诉"，据费孝通说，是关于他在肃反中"被错斗"。所以，顾文选并不是从整体上否定"肃反运动"，而是揭露了"肃反"中的问题。但是，当时这就成了最严重的"罪行"。这当然是因为最高当局不允许对"肃反"提出批评。同时，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没有人从整体上反对"肃反"，没有人作深层的否定，于是大学生顾文选就成了站在最前排的先锋人物，也就最先被击中。

主持"肃反"的公安部长罗瑞卿，1906 年生，四川南充人，在中学时代参加共产党，"镇反""肃反""反右"运动时期的公安部长，并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成为军队的最高权力圈中仅次于林彪的人物。后来林彪把他当作敌人，和毛泽东一起把他确定为文革的头一批打击对象。罗瑞卿在 1966 年 3 月在高层被清洗，立即被撤职并关押。他在 1966 年 3 月 18 日跳楼自杀，没有死，但是摔断了腿，后来截肢。

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兴起以后，罗瑞卿从秘密关押变成了由群众"斗争"。1966 年 12 月，罗瑞卿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装在一只箩筐里，拖到北京的体育场里，和其他"反党份子"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斗争"。他被装在筐子里，是因为他的腿在自杀时摔断，不能走路。这种所谓"大会斗争"，除了咒骂以外，还包括体罚和殴打。在十万观众挥舞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之声中，拖出一个装在箩筐里的断腿人来作"斗争"，实在是文革最无人道最为野蛮的场景之一。而且，文革时代的摄影作品还将此作为正面的画面来记录，这是在丑恶之上又加了一层丑恶。

也使人吃惊的是，被装在箩筐里"斗争"的人，对于他自己被安的罪名不承认，但是对他自己曾经发动的对几百万人进行过的与此类似的"斗争"，并未觉得不安－－在 1990 年代出版的他的女儿写的关于他的书里（《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罗点点，南海

出版公司，海口，1999 年），细腻深情地写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遭遇多么不公平，却一字没有提到他曾多么残酷地对待千千万万的别的人。这本书并且热情赞美罗瑞卿在"镇反""肃反"中的作用。这两个"运动"害死了无数人，顾文选，仅仅是那受到残酷对待的人中的几百万分之一。

对罗瑞卿的个人历史的这种描述，显然表明这本书的作者只认为：她的父亲是不该受到那种野蛮的"斗争"的，但是他对别人所作的类似的事情，则是完全不必质疑的。这是从个人利害关系为中心对文革做出的描述和判断，却没有道德和逻辑的基础。这样的描述中隐含的原则是非常有害的。也许因为没有直接说出来，也就没有读者察觉并与之争论。

最后一个片断：在阿 Q 群体之中

这是跟顾文选有关又不直接有关的一个片断。

在"公检法军管会"的"通知"里说："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在历史上，也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和一个政权，可以把普通人民控制到这样严密的程度。他们不告诉人民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到底是些什么，却要求每一个人都"表态"来支持杀死这些人。他们不但杀人，还要造成一个"众口一词"的形势。他们用恐怖来塑造舆论，这舆论又反过来支持恐怖。

笔者未能采访和顾文选相识的人，但是采访过数位曾经参加过"公检法军管会"要求"革命群众"对这 55 人的"处理"作的"讨论"。据他们说，"讨论"的时候，一片声音，都是"枪毙枪毙"。

在三十年后，一位被访者说：你能想象那时候北京人有多坏吗？他们根本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他们喊过"枪毙枪毙"，就赶快回家吃饭去了。

鲁迅写的阿 Q，就曾经很兴奋地去看杀头，在他自己被杀之前。文革年代，普通人也活得像鲁迅笔下的阿 Q，会兴高采烈地参加"公判大会"，把别人被枪毙当作好戏看。

和顾文选同列于一份名单上的五十五人中有张郎郎，他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他最初也是内定要判死刑的，后来改成了十年徒刑，活了下来。他告诉笔者，他曾经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到他的学校去，让学校的人一一对他的"处理"表态；他的父亲和 16 岁的弟弟也被揪来，站在台下，听着会场上一片"要求"枪毙他的声音。让张郎郎永远不忘的是，黄永玉和刘迅两位老师，听说是要"讨论"关于他的"处理"时，没有出席这样的会。据说他们两人装病，以此为由不来学校。

黄永玉和刘迅，都是画家。在黄永玉三十年后写的书里有一段，写到张郎郎。

张郎郎的父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张仃。他们两家在 1950 年代是邻居。黄永玉看着张郎郎长大。书中说：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

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上，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完的孤寂啊。（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三联书店，北京，1998）

黄永玉的这段描写，夹在介绍他们的有趣而充满活力的邻里生活的描写中，对于不了解当时的情况的人来说，可能会晃一眼就读过去了，所以需要对当时的背景作一说明。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环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暗暗保持沉默，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仗义直言""挺身而出""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周七月，也是和顾文选一起被列于 55 个人的名单上的一个人，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后来和张郎郎一起被判刑。据张郎郎说，他们两个没有如被预期的那样要被枪毙，而是被判十年徒刑，是因为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级别很高，在当时的社会中被称为"革命老干部"的一群人，所以对他们的孩子比较宽大。。那个年代如此残酷，所以不枪毙就可以被当作"宽大"。张郎郎和周七月被判十年，只是因为他们曾经结交过几个法国来的学生，而且是法国的"左派"学生，因为向往"革命"来中国留学。

结语

由以上六个片断，对顾文选的一生作一个顺时间的跟踪，我们可以看到：

他被整肃了一次。他心里不服，说了出来，因此他遭到更大的惩罚。他不能忍受这第二次惩罚，于是决定逃走，结果他遭到第三次惩罚，这次惩罚使得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满与违抗，因为这是死刑。

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一种把人送上死地的逻辑。

1949 年，顾文选是个仅仅 15 岁的少年。从 1955 年开始，他逢上了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的"一打三反"这一系列的"运动"，他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迫害，最后被枪杀。他开始受迫害于"肃反"，他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关进监狱于"反右派运动"，他被枪杀于文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的遭遇"？一个毁灭人的过程。

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孤立的命运。

顾文选初次被整，是在 1955 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在"肃反运动"中有一百多万人被整肃。其中有一大批人被关押判刑。其中最有名的是"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在文革结束后被全面"平反"。因为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作家，所以他们的故事在文革后被报告。其他一百多万人的故事，和未被说出。曾经为当时的"反革命"案子抱不平的顾文选，已经死了。顾文选被划成"右派份子"，是在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据上引的《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 国情手册》，"反右派运动"中给 552，877 人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据丁抒在《阳谋》中的研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数实际上多达一百万。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相当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升级"处罚。在北京大学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的 589 个学生中，象顾文选一样入了监狱又在文革中被判死刑枪杀的，还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哲学系的黄中奇。(上引《没有情节的故事》，511－512 页)。

在这四个人中间，被了解相对较多的是林昭，她在 1968 年 4 月底在上海被枪杀。（见名录中"林昭"。）在这个网页上，在文革中被判处了死刑的"右派份子"，已知的还有：陆鲁山，姚祖彝、王桐竹、孙本乔，他们一起被以"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的罪名，在南京被枪毙；在上海复兴中学工作过的后来去宁夏工作的朱守忠，他在宁夏被划成"右派"，又在文革中被枪毙。请看网页上关于他们的条目。

顾文选被判处死刑于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是文革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966 年的红卫兵运动和 1968－69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已经迫害死了大批的人。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据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33 页）说：

据统计，1970 年 2 月到 11 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 万多名，捕了 28・48 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据作者王年一说，这些数字是从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笔者查找了传达到普通人的"中央文件"之后，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数字。显然，即使在文革后，这些材料也并没有允许普通人知道。不过，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1980 年 10 月 16 日）"，有这样一段：

此件和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可先传达到全体党员，经过适当时间再向党外宣布。

两个审查报告各有七个罪证附件，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这些固件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

中共中央 1980 年 10 月 6 日

（引自《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 年，内部发行）

由此推测，很可能这些"一打三反"中的逮捕人，枪杀人的数字，就在这"七个罪证附件"中。谢富治在罗瑞卿之后长期担任公安部长，这些数字与他直接有关。王年一有可能看到这些"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的文件，所以得到这些数字并在他的书中引用。这些数字为什么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仍然是"党和国家机密"，也是需要解释的事情。在 1980 年，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为在文革中受害的人平反，但是他们不愿意让普通人知道整体的大情况，以免引起对整个制度和统治当局的怀疑，应该是原因之一。

这一系列的巨大的数字告诉我们，顾文选的遭遇，远远并非一个人的命运。顾文选经历过的"肃反""反右"和"文革"，都有数字极其巨大的人口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人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垮了，有的在第二次打击中垮了，顾文选经历了第三次打击后还不愿倒下，于是被杀害。

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个设计好的所谓"政治运动"，国家机器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如此巨大的数量，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

对顾文选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可以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迫害与杀戮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斯大林杀害"古拉格群岛"上的政治犯，以及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杀戮。但是中国人对自身的这方面的遭遇的理解和记载，目前远不如其他民族对他们经历的这种反人类的事件全面和深入。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非常遗憾，关于顾文选，笔者能够收集到的只是一些这样的片断记录。因此，对他个人了解极少，不知道他是高是矮，也不知道他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方面的资料不够全面的情况对本文来说有可以原谅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体质或者性格方面的特色其实没有对他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命运是和一连三个所谓"政治运动"缠卷在一起的。是这三个"运动"，即"肃反""反右"和"文革"，把他，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的中国人，推向苦难和死亡。

这里考察的是顾文选一个人的遭遇。他作为一个人被无情地迫害死了。这就是我们从他的故事感到的震撼，因为我们也是人。

"遣返"，对城市和平居民的非法驱逐--何洁夫之死

何洁夫，男，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农业大学的会计。1966 年夏天，何洁夫和高吉章被强行"遣返"去原籍广西农村。1967 年 11 月 14 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活活打死。他们 7 岁的儿子看到父亲被打死，精神收到刺激，以后一直不能完全恢复正常。

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注销户口驱逐出北京，被押送到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是和在校园暴力中受难的老师一样，这十万人的悲惨故事一直在关于关于文革的记载的架构之外。

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道。但是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的"第四号通令"，可以了解到这一迫害是怎么发生的。

"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 7 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ーー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 1966 年 8 月 29 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其时，红卫兵正在进行所谓"破四旧"，在各处抄家，打人，焚烧文物。8 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以致尽管焚尸炉把尸体不计姓名地成批焚烧，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

这个通令制定了对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的处置方法。而当时正在疯狂进行的暴力抄家，为这一打规模的驱逐行动提供了实施的条件。在死亡的威胁和棍棒挥舞之下，近十万人被没收了一切所有物，被扫地出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

这十万人要么离开，要么在北京被打死。有的人当时天天被打，或者已经被关进红卫兵设立的监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离开北京和不离开北京，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区别。再说，他们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北京的红卫兵主持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逐行动，包括抄家，打这六类人，没收财产，注销户口，处理其中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一只碗，一家人只准许带一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

有些人在去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 1966 年 8 月 29 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

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一个这样的老年女人。1966 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经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亡了。有些人活了下来。他们在红卫兵的棍棒下离开，后来，打人情形比较缓和的时候，1966 年年底，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北京，进行所谓"上访"，就是去"中央文革小组群众来访接待室"（在陶然亭附近）和"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室"（在北京西城区西安门附近），申诉他们的问题，说明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也不属于要遣返的人员之列，试图回京。他们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钱，只好在火车站过夜。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命令被遣送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结依法处理。"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比红卫兵"西城指挥部"的"六类"稍加详细。这十类人如下：

（一）坚持发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确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正（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行文可以看出驱逐对象范围之广，包括了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和"右派份子"，甚至包括了"摘帽右派"，包括了"家属"，等等。当时大量的"小业主"也都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另外，也可看出界线含糊。 "表现不好" 是弹性很大的词语。当时社会上的别的人竞相显示自己的高度"革命性"，宁左勿右，怎么会承认这些人"表现好"。另外，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讲，这些人被强迫离开后，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据，那些人不希望他们可以返回。

后来，这些人中有的继续上诉，因为他们在农村也实在没有"出路"。但是，在 1968 年和 1973 年，这些人的行为被称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的行动不但没有成效，反而受到新的残酷打击。

住在北京东单一带的一户人家，1966 年时是工人，在工厂做事，他们的"成分"在五十年代被划成是"小业主"，因为他们有 400 块钱的资本在一家出租小人书的店里。1966 年 8 月他们被当作"资本家"驱逐到山东农村。他们多次上访无效。历尽艰辛，他们在 1978 年回到北京。他们在八十年代又不被准许参加"工商联"，因为他们的资本太少。他们的邻居只有 90 块钱资本，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对待。

毛泽东死后两年，1978 年，被遣返的人中的一些人再次回到北京要求"落实政策"，后来获准回到了北京。

何洁夫是那些人中永远不可能回来的一个。

何洁夫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职员，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学的会计。他们夫妇被列入"遣返"名单之中。在北京农业大学，1966 年夏天有 69 个人被强制遣送回乡。

何洁夫夫妇和孩子被遣送到广西农村。1967 年 11 月 14 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打死。他们的只有 7 岁大的儿子看到父亲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后来也不能完全恢复正常。

高吉章在文革后回到了北京农业大学。

何洁夫是被驱逐的十万北京居民中的一个，十万分之一。

活人怎么成了"红八月"的"牺牲"--华锦之死

华锦，女，1914 年生，北京第八中学，中共支部书记。1966 年 8 月多次遭八中红卫兵毒打并且被关押在学校中。1966 年 8 月 22 日早晨被发现吊死在关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红卫兵宣称她是自杀的。她的家人和学校的很多老师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华锦死时 52 岁。

1966 年 8 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作"红八月"。"红"的象征意思是革命，具体表现是当时兴起的大量采用的红色装饰，如红色毛泽东语录本和红卫兵的红袖章等等，另外，实际发生而未被报告的，是"红色恐怖"的口号和红色的人血。

红卫兵学生打死人是从 8 月初开始的，最早的杀戮对象是教育工作者。8 月 5 日，在与华锦的学校距离不远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字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校园暴力在文革领导人的鼓励下蔓延发展，不断有教育工作者和别的人被打死。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 8 月下旬达到高潮，每日有数百人被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华锦就死在这一校园杀戮的高峰期间。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一接见和后来的七次，把红卫兵运动领导向了高潮。当时的中学里，文革前的学校负责人如华锦这样的人已经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份子"批判并且"靠边站"。领导各校 6 月 7 月文革的"工作组"已经受命撤离。新建立的"红卫兵"组织控制了各个学校。红卫兵开始暴力攻击已经被"揪出来"的学校领导人和教员。在"8。18"接见的第二天，8 月 19 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这三个学校的前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界的前领导人。

这三个中学都位于北京西城区。在 1966 年 8 月，西城区是北京各区中打死人最多的区，也就是说，是暴力行为最为严重的地方。

中山公园紧靠天安门城楼西侧，距离第八中学大约两公里。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华锦是怎么去那里的。当年八中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在一个红卫兵学生手里。那个学生骑在自行车上，一手牵着绳子。温寒江跟在自行车后从八中跑到了中山公园，身后还有学生用鞭子抽他。

文革发展到那个时候，"斗争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是在群众大会上对"斗争"对象不但责骂诅咒，而且很凶猛地打甚至打死。那一天，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被斗者跪成一长排，被拳打脚踢，被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红卫兵打一阵，发言"批判"被被斗者一阵，高呼口号一阵，又打一阵。如此下来，北京教育局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浑身是血昏死在舞台上。其他人也被严重打伤。据目击者说，斗者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因为个个头肿如斗，满脸是青紫和血渍。

在 8 月 19 日的会后，华锦等人在第八中学里继续被打被关。8 月 22 日早晨，据说她被发现吊死在关押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宣称她是自杀的。在当时，"自杀"被称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自杀本身就是一大罪名。

相反，华锦的家属和学校的一些老师都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他们无法提供目击证据，

因为华锦是被单独关押的。最后见到活着的华锦的人是红卫兵而不是他们。但是他们有如下理由：

1、在 8 月 21 日夜，第八中学的一个工作人员，住在附近，听到有人在楼道里打华锦，打到很晚，打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才安静下来。他没有看到，但是听到了声音。

2、华锦已死，已经不能说出她到底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摧残，但是从被打的别的人的故事，可以知道八中红卫兵打人的严重程度。比如，韩九芳，第八中学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韩九芳遭到残酷殴打，背上被铜头军用皮带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高烧昏迷。那时华锦已经死了。韩九芳的丈夫周昕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周从清华大学赶进城里到医院恳求大夫救她。医院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救不活了。周抽了四百毫升血输给韩九芳。周又拿了韩的血样赶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化验出红霉素能起作用。找到红霉素后，超量给韩九芳注射才起了作用。因为剂量太大，注射时护士问："这样治合理吗？"大夫说："这就叫'死马当作活马医'。"经过种种努力，几个星期后韩退了烧，保住了生命。但是从那以后开始有癫间症和其他后遗症。医生说，想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是不可能了。她后来人表现迟钝，不能走路，背上的两个大洞变成了两个大伤疤，一直不能自理生活。她被打成这样的时候，是 43 岁。她比华锦年轻九岁。

3、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同一时期还打死了学校外边的"牛鬼蛇神"8 个人。

4、华锦生前无任何自杀征象。作为资深干部，她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不是脆弱的人。当她被打后，她没有说悲观的话，却曾经鼓励别的跟她一起被"斗争"和毒打的老师坚持下去，不要绝望。第八中学有一个语文老师申先哲，在被打和侮辱后，不能忍受，自杀了。但是申先哲当时没有被单独关押，自杀前向家人表达了他的绝望的心情。虽然申先哲的"自杀"其实不同于一般的自杀，他是在受到很大的暴力攻击和侮辱之后，看不到改变的希望，面临的是更多的折磨，所以才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死和华锦的死仍然有所不同。

5、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立在校园中的"牛鬼蛇神劳改所"里，1966 年 10 月 3 日，六中红卫兵打死了校工徐霈田之后，把徐的尸体用绳子吊起来，下面放了一个倒下的凳子。他们伪造了徐上吊自杀的假象，然后通知警察来看尸体。他们把尸体吊得太高，根本不可能踢倒那个凳子，所以当时警察虽然已经得到上面的命令，不管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但是一看就知道是制造的自杀假象。在六中，当时那个"劳改所"里有十多个老师被一起关在那里，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一伪造自杀的经过。虽然当民警来的时候他们不能说任何话，但是后来他们作为目击者向司法部门作证。只是华锦是单独囚禁的。

但是，尽管持被打死看法的人有以上这些理由和证人，在 1966 年 8 月，他们无法说出他们的判断。在华锦被打死的当时，也不可能由医生来客观地作死亡如何发生的症断。因为在那时候，即使是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那样明明白白被打死在很多人参与或目睹的施暴现场，也不被当作什么大事情。卞仲耘在 8 月 5 日就被打死，不但未见有任何制止的措施，反而成为大规模虐杀教育工作者的开端。报纸广播和电视每天对红卫兵表示极其热烈的支持，从未对他们有任何批评。从卞仲耘之死到华锦之死，已经相隔半个多月。在华锦死去的同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也被打死。在他们之后，北京还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在文革后的发表的一份材料提到，1966 年 8 月的两个星期中，西城区有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致残的不可计数。但是这份材料未曾提供确切人数和

死者的姓名。

和华锦同样身份的中学负责人们，如果经过了 1966 年的"红八月"未死，后来又在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遭到残酷迫害。在 1969 年，这些人得到"犯了走资派错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这样的"政治结论"被送到农村劳动。

华锦和其他与她身份相似的人得到正式平反，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是在 1978 年，也就是说，华锦已经死了 22 年之后。这时候，她是自杀还是他杀的情况被提出来。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的说法是，对文革的案子平反时，"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后一句话的实际意思是，给被迫害的人平反，但是不追究迫害死人的人的责任。

在"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1978 年 6 月 3 日作出的"关于华锦通知的昭雪决定"中关于她的死写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锦同志积极参加运动，严守党的纪律，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勇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严刑拷打，不幸于 1966 年 8 月 22 日凌晨壮烈牺牲。

三十年来，华锦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好干部。华锦同志的牺牲，是我党教育事业的一个损失。"

这种说法是当时这一类文章的公式。实际上，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其中包括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的，是毛泽东。林彪是跟在毛泽东的身后挥动他的小红书的人物。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在"红八月"里毛泽东和林彪及"四人帮"有何冲突。他们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以后，原因也与是否要对人民比较人道这样的问题无关。

在华锦的"昭雪决定"中，关于华锦的死，用了"牺牲"一词，既不是"被杀害"，也不是"迫害致死"－－－一度被用来描述那些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的人们的一个常用说法。

"昭雪决定"的写作者也许是不得已才这样写的。但是这个词实在用得不对。

"牺牲"一词，现代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说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华锦在 6 月就被"揪出来"被作为"黑帮""斗争"，显然不是她所愿意的，8 月被打和被关押，以至失去生命，更不是出于她的选择。是文革的领导者为了他们的目的而剥夺了华锦和她的同事们的生命，而不是华锦为了什么目的舍弃生命。华锦的死和这一意义上的"牺牲"毫不相干。

"牺牲"还有另一意思。"牺牲"在古代的意思，也就是这一词的原意，是"古代为祭祀宰杀的牲畜"。在古代的祭祀仪式中，人们宰杀牲畜，表示对上帝或者祖先的敬意。最隆重的仪式要宰杀猪牛羊各一，举行仪式后，再分肉吃。华锦和她的同事们从未对毛泽东的文革表示反对，他们也显然没有能力反对文革。在文革前，他们也就只能根据上面发下的教学大纲并使用统一的课本教学生，并不能由他们的意愿构造学校。打死他们这些人，一般人真的难以想象出文革领导者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华锦和她的同事们还非常努力地试图跟上文革的步伐，但是文革给他们排定的角色是充当"斗争"对象直至结束他们的生命。因此，有人想也

许他们真可以被比喻为是文革的"牺牲"。杀害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没有别的意义，只是为了刺激搅动红卫兵的忠诚、残忍和疯狂，推进文革的后来的步骤。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个比喻有很不准确的一面。在古代，人们用被饲养的猪牛羊作"牺牲"，而不是活人。另外，古人宰杀猪牛羊，用刀子一下子杀死，还有专门的屠夫。他们的漫长复杂的仪式过程是用于祭祀的，而不是用于杀死猪牛羊的。在 1966 年 8 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和在密室中被拷打的华锦和她的同事们，和古代的"牺牲"相差太远了。

是文革造成了华锦的这样可怕的死亡。再用"牺牲"这样的词语来掩盖她所遭受的残杀，则是文革的遗产的表现。

房产之祸--黄瑞五一家五人之死

1966 年 8 月末，一个恐怖的消息在北京东郊管庄的玻陶水泥设计院传开：技术员黄瑞五，8 月 28 日在城内西城区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了；红卫兵三个小时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由其保姆抱出得以活命；被打死的"原因"是因为红卫兵在黄家抄家时发现了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一个空子弹壳。

在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为黄瑞五一家的惨剧提出抗议，没有人敢批评红卫兵正在大规模进行的抄家打人活动。这个恐怖的消息所带来的信息是警告：人们不但必须注意家中是否还有红卫兵抄家索取之物，即武器，黄金，白银，外币，字画，旧书等等，还要注意一切可能引起联想之物，如空子弹壳。从市中心传来的消息迫使人们再次仔细检索，以免遭到黄瑞五那样恐怖和悲惨的杀身之祸。

黄瑞五家五口人被杀害之日，1966 年 8 月 28 日，正是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走向最高潮的时候。破除"四旧"是中共中央在 1966 年 5 月的关于开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就指明的。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两天以后，1966 年 8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关于"破四旧"一份倡议书。这封倡议书的发表，使"破四旧"成为一个内容非常具体的"运动"。在"破四旧"中红卫兵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改变街道和商店的名字，焚烧书籍，禁止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式样和头发式样，破坏寺庙和教堂，砸毁艺术雕塑和壁画等等。这些行动并且立即发展为大量侵入普通人家，除了搜查文化物品之外，还搜查私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他们在抄家过程中毒打甚至打死被抄家的人，或者，把人拘禁在他们设立的牢房虐待拷打甚至打死。暴力迫害从校园发展向整个社会。这场空前的红卫兵的集体暴力行动，导致北京有数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遭受殴打、侮辱和折磨后自杀。

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北京城里有自己的房产的人们。实际上，在抄家行动一开始，在棍棒皮鞭的威胁和红卫兵的命令下，有自己的房子的人们，到政府的房管部门，把房产证书上缴了，以致当时上缴房产证书的政府办公室需要排长队等候。由于物资匮乏，当时买食品和日常用品常常需要在商店排长队。排长队购物是匮乏经济的常见景观之一。文革开始后，排长队增加了新的恐怖内容：和排长队上缴房产证书同时发生的，是火葬场也发生了火葬场焚烧尸体要排长队的现象。因为 1966 年夏天大量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北京的焚尸炉也供不应求。但是，上缴房产证书，放弃对私有房产的所有权，不能使房产所有者免除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打死的噩运。

黄瑞五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那座院子里有十多间房，是他家的私有房产。黄瑞五的父亲 1949 年以前当过教授和翻译，1966 年文革开始时，已经去世。住在 20 号院子里的有黄瑞五的外婆、母亲，一个单身老佣人，再加黄瑞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岁的孩子。外婆已经 80 多岁。黄瑞五的母亲陈玉润，曾经当过小学教员，当时已不在工作。黄瑞五 196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在东郊管庄建材部玻陶水泥设计院工作。这个单位现在的名称是"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

8 月 28 日，北京第 38 中学的红卫兵到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抄家。他们在黄瑞五的房间里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是红卫

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

黄瑞五的大姐黄炜班，是北京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她结婚后另住在外，这一天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中。看到红卫兵毒打她的外婆、母亲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人，她试图婉言劝阻，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被红卫兵一起毒打。

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瑞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黄瑞五的妻子汪克宽，当时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单位，因而侥幸免难。他们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半，由一个保姆带领。保姆机警，告诉红卫兵她不是黄家人后，立即抱着孩子离开了黄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红卫兵从火葬场叫来车子拉走了尸体。尸体烧后，骨灰被丢弃。黄瑞五的妻子被命令迁出户口。黄家的院子被没收另用了。

黄家五口人在三小时内被打死，当然是极大的惨案。然而，更悲惨的是，在 1966 年 8 月的北京不是个别偶发案件，而是和一大批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的。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同一天，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到北京地安门东大街 93 号朱广相医生的住宅抄家，并且殴打朱医生。朱医生曾经当过北京平安医院的院长，地安门东大街 93 号房子，是他的私产，住着他和妻子以及儿女和孙儿女。朱医生的邻居李丛贞，是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朱家的小孩子们都叫他"李大爷"。李丛贞老人见红卫兵毒打朱医生，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由于这一劝说，李丛贞被红卫兵一并绑在房前柱子上，用棍棒和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见李丛贞的头耷拉下来，也不再发出惨叫声，还说他"装死"。接着，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李丛贞是否真的死了，就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他们见李的身体对刀劈完全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松绑上卸了下来。李丛贞被打死后，朱医生一家被押往二附中关押了两个多月。他们被释放时，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占用了。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前一天，1966 年 8 月 27 日，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因为她丈夫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已经有一人被打死，他们离开家试图躲避灾祸。在途中她到城中弟弟家停留。她的弟弟孙菊生，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物理老师，住在西交民巷前细瓦厂 2 号。他有祖传的五间房子。孙启坤到达时，孙菊生一家已被北京第 31 中学和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并且被监禁在家中而且遭到多次拷打。孙启坤被扣住。她被打死在弟弟家中。

一位住在西城区西单附近灵境胡同的居民告诉笔者，1966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一辆三轮平板三轮车从灵境胡同里拉出来十来具人的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这位被访者说。那时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轮车运生猪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 月正值高温季节，人们本来只穿单衣，被打死的过程中，衣服被打烂了，所以尸体几乎形如裸体。尽管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位被访者仍然怀有极深的恐惧，为那一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也为不知道说出事实是否会带

来麻烦的忧虑。

在 1966 年夏天，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数千名居民，同时，把十万居民强行驱逐出北京。在北京市的各个区中，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西城区是北京的中心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这一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也都在这一区里。西城区不但被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区。西城区的被打死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个区的总和。

黄瑞五家住在西城区。在黄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 年 8 月 24 日，在西城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是北京各区中最早建立的"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海淀区等区的"纠察队"都是在其后模仿成立的。他们声言"纠察队"的功能是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西城区纠察队"当时名震北京甚至全国，被简称为"西纠"。"西纠" 发出了十道"通令"。这些"通令"被印制成大张传单张贴并且被编印成书，指导当时的抄家以及驱逐居民的行动。这些"通令"也散发到全国各地。"西纠"实际上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红卫兵在那一时期的龙头领导力量。

1966 年 8 月 28 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 38 中学的红卫兵。8 月 24 日"西纠"成立时，第 38 中的红卫兵是发起单位之一。

上述打死李从贞大爷的红卫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这个学校也是"西纠"的发起学校之一。他们在 1966 年 8 月 25 日，即西纠成立的第二天，在该校校园中打死了靳正宇和姜培良老师，以及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

"西纠"的其他发起学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校长沙坪和一个校外司机的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和附近饭馆的一个 18 岁的女服务员，还在校外打死了七个居民。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三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打死了学校负责人华锦和 8 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六中校内中设立监狱，在那里打死了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以及被抓来的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何汉成当时 70 岁左右，在西城区绒线胡同拥有房产。何家还有四人在被抄家时被打死。

西城区的高被害人数，无疑和黄瑞五家遭受的这种三小时内被打死五人的高强度杀戮，以及"西纠"各发起单位的高杀人率，有直接关系。

"西纠"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们的大力支持。"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毛泽东制了"001 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 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 号"袖章。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照片上的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

在 8 月 31 日接见的第二天，即 1966 年 9 月 1 日，北京在一天内被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是在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后。

1966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旧"

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中说，北京红卫兵在 1966 年 8 月底到 9 月 20 日，打死了 1，772 人，没收了 50 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等。这些被当作红卫兵的"功绩"。文革领导者当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无从知道黄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计算在此数字内。亲眼见到 1966 年夏天的杀戮的北京市民说，北京那一阶段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应该大于此数。然而，仅仅 1，772 也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

这一文件从未允许普通老百姓或者学者阅读。在文革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份 1980 年 70 号文件，在其"附件"中，有关于 1966 年夏天红卫兵杀戮的人数等内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许发到"省军级"，也就是说，依然不准老百姓和学者了解有关事实。文件说，附件只发到"省军级"，是因为"附件"的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

为什么 1966 年夏天红卫兵杀害的人数要被算成"机密"呢？

在 1966 年夏天的"破四旧"中，当局实行的搜查没收私人拥有的房产以及黄金白银和外币，可以看作是文革实行的一项新经济政策，也是文革的社会改造计划的一项内容。先不论这一社会改造计划的对错，需要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掌权 17 年，权力极大，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做到的。为什么要同时杀害如此巨大数字的和平居民呢？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发动组织红卫兵来殴打折磨甚至杀害大批普通人呢？社会改造计划的需要不足以说明 1966 年 8 月杀戮的成因。1966 年夏天发生的事实，证明这场杀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革领导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杀害黄瑞五及其家人，杀害李丛贞、孙启坤这样的人，不可能用为了没收私人房产来解释。这样的残酷的杀害只能说明文革的最高领导者们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会。与民主社会由人民来投票决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领袖可以任意杀害黄瑞五那样的普通人民。

文革受难者老舍
老舍，作家，本名舒舍予，老舍是其笔名，1899 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 年 8 月 23 日，老舍和其他 28 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 月 24 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老舍是个作家。但是他的自杀却难以和历史上任何作家的自杀类比。

老舍在遭到中学生红卫兵"斗争"和毒打以后，还面临将要来到的更多的暴力折磨；他在这种境况下投湖自杀；身为作家，他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死后，当局不准留下骨灰。另外，他所遭到的迫害和死亡不是孤立的个案。 同一时期，北京有数千人被"斗争"而死－－实际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也有一大批的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斗争"后自杀。

要理解老舍之死，也需要了解：这种暴力性"斗争"怎么运作？怎么会在 1966 年夏天如此普遍地进行？这种有领导的通过"群众"之手来进行的暴力迫害和杀戮的方式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老舍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 28 个人。那天和他一起被打的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在《肖军纪念集》中，列出了其他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 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其中还缺两个名字，有待补正。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这 29 个人被红卫兵"斗争"，首先是因为早在 1966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对这些人的清除，是对一个群体的清除。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

在当时的体制下，"作家协会"有一批领固定薪金的"专业作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被批判斗争的。在北京作家协会，会长老舍"靠边站"了，新成立的"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军代表，还有作家浩然。他的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文革中成为"突出阶级斗争"和"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样板之作。尽管老舍也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是老舍的作品和浩然的作品也确实有相当的不同。文革批判打击了一大批作家，但是不是每个作家都受一样的惩罚的。奖谁罚谁的差别，明确显示了文革在文学领域的取向。

在红卫兵运动掀起之前，一批文艺工作者，比如上述 29 人，就在本单位被"揪"出来了，也在本单位里的会议上被批判"斗争"。与 8 月之后不同的是那时他们只被咒骂和当众罚站等等，没有被毒打。

后来发生的对他们的残酷的暴力性攻击，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在各校普遍建立，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8 月 5 日，北京发生了第一例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的事件。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8 月 18 日大会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可以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老作家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下午三点，在 8 月的烈日下，这 29 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四点钟，这 29 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从他们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这 29 人被强迫在火堆前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 29 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1980 年，笔者和肖军先生有一次谈话。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以致头上鼓起了大包，满背流血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 28 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关，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多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 29 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昏倒在地。他的儿子和女儿不见他回家，到机关来找他，也遭到殴打。肖军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9 月底才获准许回家。

肖军曾经讲到他的一些看法：他说他家中当时上有老，下有小，有 11 口人需要他负担。他从 1940 年代起就多次受到"批判"。他的工资比较低，每月 110 元钱。难得包一顿饺子，

只能买五毛钱猪肉加在白菜馅儿里。如果他死了，他家人怎么活下去？他得忍辱负重活下去。他认为老舍和他不太一样，一直比较"顺"，前几次"政治运动"都没有遭害，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所以可能在心理上对承受这样残酷的对待较少准备。另外，老舍不但年纪已老，而且腿有残疾，走路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体力强壮与否，也与能否继续承受红卫兵的暴力折磨有一定关系。

在"文庙"毒打之后，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 8 月 23 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杨沫文集》下册，第 5 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年）

那晚，老舍后来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因为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 月 25 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后，1978 年 6 月给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报道文章里说，他的骨灰盒里装着他的钢笔和眼镜。文章没有直接说老舍的骨灰盒子并没有他的骨灰。那时候的这类文章虽然给文革的受难者平反，但是说及文革中的一些可怕的事情时，尽量模糊委婉。

1994 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和老舍的儿子舒乙见面，向他询问为什么老舍的骨灰盒子里只有他的钢笔和眼镜。舒乙说，老舍的骨灰当时没有留下来，因为火葬场不让留骨灰。老舍去世的时候，舒乙 31 岁，他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到火葬场操办了老舍的火葬手续等等。是两个年轻的妇女办的手续。其中一个是梳小辫儿的姑娘，她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笔者曾经询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上面的规定"，是哪个权力机关发的文件。舒乙回答不知道，只记得是那个梳小辫儿的姑娘说的。在舒乙发表的关于老舍的多篇文章里，没有提及有这样一个"规定"，也没有说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如此规定而不准留老舍骨灰。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文革档案，笔者不能确定这是一个写成书面文字的"规定"，还是一个来自文革高层领导的口头命令。但是确实，在 1966 年 8 月下旬被打死和被打后自杀的人们，都没有能留下骨灰。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 28 块钱的事儿吗？"被打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 28 元火葬费，但是不能要求保留骨灰。比如，从笔者的调查知道，1966 年 8 月 27 日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中关村中科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1966 年 9 月 8 日被打死的北京第 25 中学教师陈沅芷，他们的家属交了 28 元钱，但是没能得到死者的骨灰。这里面一定是有某个"上面的规定"在起控制作用，才可能作得这么一致。希望有读者会提供关于寻找这样一个"规定"的线索。

有一种解释说，不准保留骨灰不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打击死者，也是因为技术上不许可。当时北京大批人被打死以及被打后自杀。在 8 月 18 日后，死人数一天比一天上升。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资料，在老舍被送往火葬场的 8 月 25 日，北京有 86 人被红卫兵打死。第二天，8 月 26 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比前一天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高达 125 人。以后仍然逐日增加。此外，还有一批人象老舍一样，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这样，8 月下旬每日的非正

常死亡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的正常死亡人数。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的尸体成批送往火葬场，尸体上既没有标明姓名也没有作过血迹清洗。火葬场的停尸房爆满。焚尸炉超负荷工作。也就是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和杀戮造成了分别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

但是技术性困难显然不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对这些被害死的人们的高度蔑视以及进一步迫害他们的恶意，才会有这种不准留骨灰的规定及其实施。在文革当局的逻辑中，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在普通人这一边，对他们的被虐死都只有容忍接受了，也没有可能再关心他们的尸体处置。但是要知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在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还容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当局的无限权威却一直延伸进了火葬场。文革对个人的迫害一直继续到死后的骨灰。

老舍投湖，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肉体上不容他。他已经在前一天遭到了残酷的暴力性的所谓"斗争"；这一天他如果从湖边转去机关，他显然会在那里又遭到毒打，整个北京城的打人风，那时正方兴未艾；他面临的将是漫长的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虐待和侮辱；甚至在老舍死后，当局连他的骨灰都不准存放。－－在老舍之前自杀的人，已经遭受了这样不准留骨灰的待遇。他投湖，而且没有写下任何遗言。他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难道他死得心甘情愿，或者自惭形秽，故而不置一词，黯然离世？这显然不可能。他一生写作，笔头很勤，是个多产作家。书写文字，表达想法，是他的职业。在他生前，大概是日日动笔的。他在 8 月 24 日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有笔和纸。有人看到他投湖以前在湖边坐了一整天。也就是说，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用文字写作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 1966 年恐怖的 8 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文革结束后，老舍得到平反，而且得到当局的高度礼遇。他的朋友和家人，发表了一批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但是都没有写到他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被"斗争"被毒打之后和自杀之前，他对他身受的暴行作了任何评说，也没有写到他对自己在 8 月 23 日之前受到的批判的反应，也没有写到他对于在他之前身受迫害而自杀的相识者与同行的死的评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他没有说过适合于发表的话，或者写纪念文章的人没有认为应该写出他生前的真实看法。

巴金是老舍的老朋友。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说，1966 年 7 月 10 日， 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这个时候，北京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吴晗等人已经在报纸上遭到猛烈攻击，吴晗已经被涌入他家中的学生侮辱和殴打。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已经一个多月不上课，在校园里开会"斗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当时人民大会堂是不准许普通人参观的，所以能进入大会堂是一种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表现。巴金写道："我到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一个多月，没有停到人提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么事，很替他担心，现在坐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真是万分高兴。"（该文收于巴金《探索集》中，见《巴金全集》，第 16 卷，156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老舍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被打以后，深夜

回到家中，告诉他的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该文见《老舍之死》一书，第 61 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7）

可以理解，巴金和舒乙二位都是愿意为老舍说好话的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按照他们的描述来推理，在 1966 年 7 月和 8 月，眼看着文革对一大批人的严重的迫害，眼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支持红卫兵(老舍被打发生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五天之后)，眼看着他人和自己受到暴力摧残（在老舍被打和自杀之前，已经有一大批人被打甚至被打死)，老舍非常看重的就仅仅是"我没有问题"，以及希冀着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理解"吗？他的全部焦虑就限于此？有没有别的？当作家的身体遭到残暴对待的时候，他的精神的关注也已经被文革的巨轮碾压榨干而只剩下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和最高权力者对他的态度？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文革的这一整套做法和想法，只能在文革的框架里面为自己撇清？他有没有别的关怀和思考？

老舍得到平反后，出版了《老舍写作生涯》一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年）。该书"内容简介"说："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这本书中有老舍写的一篇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原来发表在 1951 年 10 月 1 日的《人民文学》上。主要部分摘录如下(见该书 247－249 页)：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不能老拿不定主意啊！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在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齐，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个卖油饼的敦厚老师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

......

读上面老舍的这篇文章，不能不感到震惊。

首先，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活脱脱就是15以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一场文庙"斗争会"的翻版。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者说明和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只是煽起仇恨，然后，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打被斗者。

老舍写的这个斗争会，不但和他所自己遭受的那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在老舍描写的斗争会里，老舍写出的唯一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历时漫长的一个故事，应该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是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问细节，不讲法律准则，一片喊打之声就兴起并实施了，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并无不安。在老舍被斗的故事里，则是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该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面提供旅行花销的。他发表过他在美国写的关于他的旅行的文章。这一访问不是秘密，也完全可以说清楚这是什么性质的旅行。但是，在杨沫所描写的围成一圈展开的"斗争"过程中，就可以使他再遭红卫兵的皮带毒打。而且，在1966年，因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

老舍是作家，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的过程一步一步写了出来，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斗争会的心理机制。他所经历的，可能就是15年后毒打他的一些中学生红卫兵所经历的。从他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当然，最让人难过的是，1951年老舍描写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他热情满怀，毫无反省。他为这样的新的生活形式叫好，这种新形式是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结构部件之一。这种"斗争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后来都一步一步发展，到了文革时代，处处实行。文革十年，几乎每一个人不是"斗争"过别人，就是被别人"斗争"过。这种"斗争会"违反法律程序，激发人的非理性，鼓励暴力虐待，是一种对人的迫害。这种形式的发明是一种可怕的发明。不能说文革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斗争会"中有老舍的责任，归根到底，他是受害者。但是，他曾经参与接受、确认和颂扬这一最终害死了他的机制。

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 15 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15 年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这类"斗争会"，从"斗争"他不认识的人，到"斗争"他的同事和熟人，最后，"斗争"到他自己身上，而且，这一次的"斗争"比从前的更为残暴，逼他选择了死而不是继续被"斗争"下去。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也感到了惭愧，毕竟他不可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只会在"斗争会"上跟着主持人喊"该打该打"的人，他不该完全失去了理智、良心和道德感。

为李洁之死忏悔

王友琴　　我要深深地谢谢关秋兰老师，为她的忏悔，为她的忏悔给我的鼓励。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作文革史的研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但是，我却未曾料到，这一研究会给我带来那样的心理上的痛苦。用"痛苦"来形容也许不适当，因为不是那种明显而清晰的"痛"或者"苦"，但是却会使我在我写作的时候和之后感到压抑和忧郁。

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尽可能收集来自那个时期的各种文字和照片资料之外，我还访问了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因为我坚持认为，文革的很多事实，特别是普通人民的遭遇，缺少被记录和被报告，所以需要调查。感谢许多被访者，花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我回忆和见证文革。他们讲述，然后，我整理访问记录，把一个个人的遭遇和一件件事情写出来。比如，关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关秋兰老师曾经任教四十年的学校，我发现了这样一些从未被报告过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1966 年夏天，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被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她被剪光了头发。她被打，手臂粗的棍子都打断了。当时刘美德已经怀孕几个月，有目可睹。有一天，《北京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和照相，红卫兵摆好了一张桌子，强迫刘美德跪在桌子上，有一名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刘美德的背上。摆好了这样一个把所谓"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形象，由记者照相。照相完毕之后，站在刘美德身后的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一脚踢到地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北大附中是 1966 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对联的发明地。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万红，父亲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于是她就成了"混蛋"。班上的一些男红卫兵要打她的时候，她奔进了女厕所试图躲避。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有同学用铜头皮带打她，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

还有一个故事是：1966 年 8 月 27 日，"破四旧"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学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架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时年 37 岁。他的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那一天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陈的尸体被送走烧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陈家人付 28 元火葬费。陈家告债才借到这笔钱。陈的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后来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文革后，中共北大附中学支部赔偿陈家两千五百元钱。拿到钱的时候，陈妻哭道："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要钱作什么？我要人哪。"

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打人者向上述三位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家庭表示道歉。

在纸上，在电脑键盘上，我记录下来这样的文革故事。对写作历史来说，这些故事绝对真实而有力。但是这些故事让人痛苦，甚至即使只是记录而不是身受。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的心情有时会变得很低沉。

记得当我访问一个万红的同学的时候，她告诉我万红怎么被虐待，她的 15 岁的女儿在旁

边听着，难过得哭起来了。我不能哭，但是也会久久不能克服自己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感到压抑的心情。

我的一个总是支持我作文革研究的朋友，这时候开始为我担心，连连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写这种故事？这会伤你的。

我十分感谢她的关心和好意。但是，已经开始了，我就要作下去，虽然这类故事好像看不见的铁丝刷子一样会时时摩擦着心灵让我难过。幸亏，这种调查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耗时耗力，于是调查就常常占据了我的思绪并转移了注意力。另外，这种时候，我提醒自己，让自己想一些有关的却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关秋兰老师的忏悔。

1997 年的夏天，在北京，有人告诉我，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关秋兰看了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想要和我谈谈。我当然很愿意。80 年代初我是北京大学学生的时候，我就听到过关老师的名字。那时她是著名的模范中学老师，听说她的学生非常喜爱她尊敬她。90 年代后期我真的见到她时，她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当着一所民办职业高中的校长。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但是人显得很精神，行动也很敏捷，谈吐爽朗，思路明快。

我们见面的那天天气又热又闷。在这样的大热天一位老人不辞辛苦来赴约，我很感动。关老师从小在印度尼西亚长大，1949 年来到北京上中学，后来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她的父亲侨居印度尼西亚当老师。她毕业后也愿意献身于她想是"阳光下最神圣的教育事业"。因为她是从海外来的，文革前她就被被划入"控制使用"类别。文革开始后，她被打入北大附中的"劳改队"，又称"牛鬼蛇神队"。1966 年 8 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三个"劳改队"。这三个"劳改队"是按照所谓"罪行"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关老师是在"劳改二队"。在"劳改二队"中有 12 名教职员。另外两个"队"中还有十多人。

关老师告诉我，在"劳改二队"中，有一个女职员，名叫李洁。我先前已经听到过这个名字，知道她在文革中被打死，可是不知道关于她的详情。关老师说，李洁曾经告诉她，她在年轻时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开了自己的家来到北京，那是日本军队占领统治北京的时候，她和一个日本男人同居，后来那个男人离开了，有过的一个孩子也死了。李洁在 50 年代初"肃清反革命"的时候曾经"交代"了这段历史，当局也给她作了"结论"。以后她就在北大附中管理图书资料和作一般的职员工作。文革开始。李洁历史上的事情被公布出来。1966 年夏天，李洁被毒打。红卫兵学生命令她跪进一只抽屉里，这样她动弹不得，他们用通炉子的铁条打她。查抄李洁的东西的时候，发现她保存有一份关于她家人的坟地的文书，可是打她的人硬说是农地的"地契"，是她的"变天账"－－保存下来等待"变天"的。他们几乎把她打死。两年以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李洁又被学生毒打。学校当局看到她不行了，把她送去海淀医院，她死在那里。医院的诊断书说是死于"脾脏破裂"。

关老师说，他们 12 个人在""劳改二队"，不但被强迫"劳动改造"，而且被打被侮辱。在 1966 年 10 月，她悄悄去了在北京城里的"国务院群众来访接待站"。因为她觉得，按照当时的共产党的政策，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劳改二队"里的人。她跟接待人员谈了她自己从海外回国的经过，她还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

因为进城去"告状"，第二天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负责人训斥了关老师。这些人在 1966 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红极一时。8 月 1 日，毛泽东曾经写信支持他们，还特别提到他们的领

导人之一彭小蒙。毛的妻子江青曾经叫他们"小太阳"。彭小蒙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向全国实况转播。可是后来，当文革的打击目标进一步扩大的时候，他们渐渐失势了。在文革后，彭小蒙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她受了迫害，但是一句没提他们怎么残害过别人--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他们学校一带的和平居民。

关老师告诉我，那一次她去"国务院接待站"的时候，她也同时"反映"(这是那一时代对上级权力机关说什么用的动词)了他们劳改二队的别人的事情。但是，她独独没有提李洁的事情。她没有为李洁说一句话。后来，李洁进了"劳改一队"，再后来，李洁被打死了。关老师感到内疚。

我说，就是向"国务院接待站""反映"了李洁的事情，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甚至还可能起相反的作用。我调查到的受难者中，有一位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胡秀正老师，在 1966 年夏天受到迫害，因为那迫害是不合当时的政策的，就去"接待站""反映"并交了写的材料。结果这反而成了新的罪行，叫做"翻文化革命的案"。"翻文化革命的案"在当时被当作一种"现行反革命罪"。这位老师在 1968 年因此被"隔离审查"，她在被关押中死去。我说的是真的故事，并不是我编出来安慰关老师的。

关老师并没有顺着我的思路来想这件事。她说，文革结束后她去找过李洁的妹妹，她想要为她作些什么。但是在 1966 年她没有替李洁说话。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觉得自己和其他在"劳改二队"里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人，而李洁在日本占领时期跟日本人结过婚，是个"有问题"的人。

关老师说，她其实了解李洁的"问题"是什么。人都可能作错事。谁能说自己不作错事呢。在事情过去二十年后，怎么可以再为此把她打入"劳改队"中，怎么可以那样野蛮地拷打她呢？

关老师说，知道不应该打李洁，可是却不说， 让她被打死了。

"我觉得对不起她。"关老师对我说。

我想跟她肯定，这主要是制度的错，不是个人的错。不过我没有说出来。我想她了解这一点。她在说的是另一层面的东西。

猛然间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段故事。当人们要用石头砸死一个妓女时，耶稣说，你们中谁是无罪的，就砸吧。结果，所有的人都放下石头离开了。这个故事有很深的意思，我并不是在这里简单地以此比附李洁的事。

文革中很多事情是那样发生的，先设定了"有问题"的人，然后，大家来"揭发"和"斗争"，向她扔石头，或者，旁观别人砸死她，还心安理得。文革之后，不少人坚持说他们之所以参与了迫害别人，是因为怀有"革命理想"，他们以此为理由，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他们不感觉内心的紧张和良心的责备。

分别之前关老师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我很快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心宽体胖的前辈老师，内心有很热烈很敏锐的道德追求。她对文革往事的深刻记忆，她对他人痛

苦的同情,她对自我的清晰分析,她对她所作的事情的忏悔之情,都和这种道德追求有关系。

我也曾经曾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现过这四者之间的一定关联。这样的人之一是已故作家王小波。我第一次和他谈话,一提起我在作文革历史研究和寻找文革死难者,他立即说出在他的学校,北京二龙路中学,有一位女老师张放,她在 1966 年被红卫兵毒打,在 1968 年"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审查"而自杀。他的记忆十分明晰,他的口气充满同情,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帮助我弄清这些事实。显然并不是和他同龄的作家们都是这样的。

对文革,说出事实,承认错误,向受害者道歉,以及为自己所作忏悔,这些都是重要的。这些方面互相关联,然而,也在道德的阶梯上有所区别。忏悔是一种道德的境界。不在那种境界中的人,很难体会那是什么。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可能是象"内存"太低的电脑,就不能运作比较高级的软件。

可惜我没有机会就此与关老师多谈。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字一句在电脑上和稿纸上写下文革故事的时候,尽管还是会感到压抑和忧郁,我会常常想到那个炎热的下午关秋兰老师的那番谈话。她向我展现了人性中挣扎奋斗而趋向善意的力量。她的忏悔提升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李文波之死和八月杀戮升级

李文波，男，1914 年生，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居民，1966 年 8 月 25 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1966 年 8 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和那场残忍又奇特的杀戮一起消失在历史记载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10 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 1966 年 9 月 25 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 63 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 1966 年 8 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这篇文章说，红卫兵到李文波家以后，先翻箱倒柜，又打了李文波夫妇一顿，然后就到屋顶去抄翻。后来李文波要求上厕所，从厕所回来，李文波就举刀砍红卫兵。这篇文章还说，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文章还写道：1966 年 8 月 25 日，"红卫兵小将

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当成了塑造他们的"英雄"历史的材料。

32 年后，即 1998 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 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与前不同的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事实方面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他们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那种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和描述是生活中引人深思的现象。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过一篇小说《薮》，揭示了在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日本导演黑泽明据此拍了一部电影《罗生门》。他们对人心和世事的这方面的洞察相当震撼人。他们作的是虚构文学，李文波事件却是真实的。红卫兵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又会有不同。如果能比较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将不但能在事实方面而且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在周恩来 9 月 10 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这个法律研究人员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分支持。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上面提到的红卫兵的文章中，说到李文波的妻子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说她的名字。经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了李文波妻子的名字叫刘文秀。1966 年 9 月 12 日，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判决书号是：66 中刑反字第 345 号。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判决刘文秀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觉。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 8 月 24 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们的房产证书交上去了；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当时 52 岁，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正因为如此，文革后，1981 年 3 月 26 日，中法 81 中刑监字第 222 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布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这座房子建于 50 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 1949 年以前有产业，1966 年时没有正式工作。他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写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家中出事的时候，他们被抓到崇文区公安局里关了几个月。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首先遭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在校园"劳改队"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遇到的冲突，成为对他们发动更残暴的暴力行动"理由"。8 月 26 日，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在校中被折磨死。

也在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8 月 26 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内，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奋地说："他们开始报复了。我们不能手软。"在高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同学被剪了头发和遭到殴打。

8 月 26 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会议开始时，一般的教职员列队从东门进入会场；当时已被打成"黑帮份子"的老师、干部则从西门进去，他们中有附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人。这些从西门走入的人早在 8 月初就已经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会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会后她昏迷在地，是由她的丈夫来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老师刘树华从东侧进门时，红卫兵大声命令他站到"黑帮份子"那一边去。刘树华 26 岁，刚结婚不久。结婚前他曾追求过另一女子未成，红卫兵以此说他是"流氓"，在学校的墙上给他画了一张桌子大的漫画，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字。那天晚上刘树华和其他"黑帮份子"一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鲤被打得最厉害。"斗争会"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身后，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借口。之前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丧生。

8 月 27 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厂的工人陈彦荣，37 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8 月 28 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门东大街 93 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丛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8 月 29 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据这个学校的一个红卫兵说，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共有十多个。死者之中，除了孔海琨，现在调查到姓名的还有该校教师杨俊。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1966 年 8 月 26 日到 28 日，是北京"打全堂" 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8 月 26 日，她听到有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第 152，155 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 13 个"人民公社"进行的屠杀。从 1966 年 8 月 27 日到 9 月 1 日，325 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22 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 81 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部编，1988 年 2 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 325 名被害者的名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 统计资料，在北京 1966 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在这四个区中，杀人最多的是西城区，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崇文区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有相当关系。

1966 年 8 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李文波事件

1966 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以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在李文波之死前后的暴力杀戮的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 月 26 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 8 月 25 日到 8 月 26 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 8 月 26 日到 8 月 27 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 9 月 1 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 8 月 31 日，死亡人数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

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日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从上面的图表中还可以看到，从 8 月 24 日到 8 月 25 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此后，8 月下旬每日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 1966 年 8 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 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 7 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接着，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 月 17 日，北京 101 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在校园里使用暴力攻击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的一位干部说，在 8 月 18 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那里的一些人在"八一八"大会之后立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 8 月 18 日会见的第二天，8 月 19 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8 月 19 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8 月 22 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 8 月 18 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1966 年 8 月 23 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 29 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天的"斗争"之后的第二天，8 月 24 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1966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

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 2 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 6 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曾经开有一家卖劈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 70 来岁，马大娘 50 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不忍听到，只好关紧窗户，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卡车来拉走了他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 1966 年 9 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 年 8 月 25 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 8 月 28 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 90 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同一天，或者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动和杀戮发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始大规模升级。李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五，为什么无人反抗？

1966 年 9 月 5 日，李文波死了 10 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 8 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

1966 年 10 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没有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 8 月下旬到 9 月底的 40 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 1，772 人。1，772 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当年八月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 1，772 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了头，这数千人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死的……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行，造成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历史，使人发问的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怎么会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 1966 年北京的八月杀戮中仅有的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动，甚至坚忍到死。为什么没有人动手反抗？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1980 年，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 1930 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说，他想最后自己一定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1966 年夏天在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残酷了。

1966 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1966 年 8 月 29 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小标题是"七、给出路"。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ーー引者注）

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 1966 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这样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辩护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了；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殴死在火车上。假若李文波能从 8 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作选择，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戮的结局。

李文波已经死了 34 年了。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道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 1966 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万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乎没有提到 1966 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这里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罗文先生在 2000 年 8 月 16 日拍摄的。他是文革中因撰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遇罗克的弟弟，他在 1999 年写了《我家》一书，记载了遇家的故事。 由于城市街道扩建，当年李文波家所在的这栋建筑，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谢遇罗文先生，摄下曾经发生过恐怖历史的这个场景。

梁光琪之死

梁光琪，1912 年生，女，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中共支部书记。1966 年 8 月 25 日夜间在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

女十五中在文革中改名为广渠门中学。

1966 年 8 月中旬梁光琪和女十五中的校长等人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并且被剃了"阴阳头"。当时，北京已经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 年 8 月 25 日，发生了"栏杆市事件"：女十五中学的红卫兵在学校附近的"栏杆市"一带抄家，他们声称被抄家的居民李文波（见"李文波", 李文波家住在广渠门内大街 121 号）用菜刀袭击了他们。李文波当时就被红卫兵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被公安局用警车抓走。9 月 12 日，刘文秀被北京法院判处死刑，9 月 13 日被枪决。

在栏杆市事件发生之后，红卫兵以此事件作为借口，在全北京展开了更加狂暴的杀戮。梁光琪作为该校的负责人，首当其冲。

就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1966 年 8 月 25 日夜间，梁光琪在女十五中学内被打死。她的家人不知道她死在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关于是谁打死了她，据说后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推说是外校来的人打死的。实际上，像她那样在同一时期被打死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有一批。即使是在文革之后，也没有对他们的死亡作过调查。文革后仅仅是给他们作了"平反昭雪"。

梁光琪是山东荣城人，出身在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中。小时候缠过脚，几年后放了脚。她毕业于荣城城关小学，后来又读了威海师范学校和济南师范学校。1938 年去延安，1942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0 年代她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1958 年有"中央机关支持地方"的行动，她以前是教书的，就到了中学，曾经担任第 26 中学、第 49 中学、第 59 中学的副校长，后来到第 15 女子中学任第一负责人。她是 14 级干部。

1966 年 8 月初，由于梁光琪和她的丈夫都属于"革命干部"范畴，她的二儿子当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中学生，也当了红卫兵，参与过抄家和打人。但是梁光琪很快被"揪出来"并且关押在学校。学校通知她的儿子去送东西。她的儿子和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到了女十五中。他们先到了学校的"文革委员会"，那里的人对他们很不客气。但是还是允许他们去了关押梁光琪的地方。在关押梁光琪的地方，当时也关押着别的一些人。他们看到梁光琪的头发被剃了半边，露出白的头皮。梁光琪原来是个整齐利索的人，这时面目全非。他们只和她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没有想到几天以后，梁光琪就被打死了。她的儿子也就此成了她家最后见到她的人。

梁光琪的尸体胡乱被烧。当时她的丈夫跑了一星期，想要个"说法"和"结论"。没有结果。后来他自己也被关了起来。

曾经陪同梁光琪的儿子一起给她送东西的同学，其父亲是财经部在四川的造币厂的厂长，后来在四川被打死了。梁光琪的丈夫后来再婚。和他结婚的那位女士的丈夫，也是在文革中

自杀的。——文革害死的人不但数量多，而且密度大。

梁光琪的儿子说，梁光琪人缘很好，能处人，过年过节，年轻教师都到她家过节，她不是那种不留余地的，有民愤的人。——但是，实际上，文革中被打死的人，大多数都和他们平时的为人如何没有关系。梁光琪和一大批中学校长是文革选择的目标，打死他们是红卫兵的集体行动，文革选择目标不是以人缘好坏为依据的。

梁光琪的儿子还说，他以前对李文波，可以说是有仇恨。以前他认为李文波是坏人。没有李文波，就没有他母亲的事情。看了网页上的"李文波之死与八月杀戮升级"以后，他认识到这不能赖李文波。李文波是个小人物。事情不是因李文波发生的。——梁光琪被打死是她的家庭的巨大悲剧，死亡无法挽回，但是理解悲剧真相，依然是重要的。应该为他的这个认识感到欣慰。

医生刘浩之死

刘浩，1926 年生，男，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作为"特务"遭"隔离审查"。1968 年 5 月 31 日，刘浩在被"隔离"时，被发现上吊自杀身亡，时年 42 岁。

刘浩的母亲，住在山东 ZHAN（雨＋沾）化县东营，她得知儿子自杀后，服剧毒农药自杀。不知道她的名字。

刘浩身后留下了五个孩子，最大的 15 岁，最小的只有三岁。

陆军总医院现在名叫"北京军区总医院"，位于北京市区，东四十条。刘浩是这个医院的骨科主治医生，他的妻子是同一医院的妇产科的护士长。刘浩是医术很好的医生，原来在天津的医院工作，后来被调到北京，军队的首长需要时，会有车来接他去西山给首长看病。1968 年初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被揭发是"特务"，被"隔离审查"。

刘浩被"揪"出来的场景是非常野蛮而又像"做戏"一样的。医院里召开大会。他在礼堂旁边的小屋子里先已经遭到野蛮殴打。然后听到台子上有人在扩音器里大声宣布"把反革命份子、特务刘浩押上来！"于是早已经准备好的人，就把刘浩从人群中沿着长长的过道押到台上，按着他摆好所谓"喷气式"姿势，开始所谓"批斗大会"。他的妻子在同一医院工作，必须参加这样的"斗争会"。另外，刘浩还曾经被押到医院的各科，当时称为"游斗"。

当时医院内有一排平房，专门用来关人打人。刘浩被关在那里。有一天，他的妻子在那排房子附近看到几个士兵，都是壮小伙子，围绕成一圈，毒打骨科的一位老医生沈天觉。他们把沈医生的脸和脖子都打肿了。幸亏有两个女干部过来说："不要打了，再打要打死了。"他们才停止了打。沈天觉在刘浩死亡之前就自杀了。

刘浩的家就住在医院的宿舍里，但是对被"隔离审查"的人来说，咫尺天涯，不能和家里的人见面。刘浩死亡的前几天，他的 15 岁的大儿子在院子里走，忽然见到爸爸走过来，说："我想小亮，你去抱他来让我看看。"他可能是找机会从关他的地方溜出来的。小亮是他最小的儿子，当时只有三岁。他的大儿子赶快回家带来了弟弟，可是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父亲。

1968 年 5 月 31 日，刘浩被发现吊死在敷料间里。医院的敷料间里有床单等等。勒死他的是用敷料间里的床单撕成的布条。因为布条不够长，还续上了一截鞋带。

他的妻子坚持要查看尸体。她看到刘浩的双手有很深的淤青。她怀疑是有人绑住了丈夫的手，勒死了他，然后伪造了自杀的样子。她从来不相信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丈夫会自杀。她找到了上级领导。她质问："鞋带能吊死人吗？"领导说："怎么不行？"她说："你试试拿鞋带把我吊死吧。"可是没有人理睬她。所以，她后来对"政工干部"总是反感。 刘浩身后留下了五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三岁，最大的十五岁。刘浩非常喜欢孩子，花 400 块钱买了一个照相机，给孩子们找了很多相片。他也曾经兴高采烈地在下雪天带全家去吃涮羊肉，在星期天带全家逛北海和颐和园。他死了，他的妻子一个人的工资，要养 5 个孩子和老人。

有一次她到菜窖旁边捡喂鸡的白菜帮子回来，剁成馅子包饺子。她捡菜帮子的时候碰到丈夫的同学，但是她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只是事后才回忆起那人的眼神很怜悯。最小的孩子六岁的时候，问她为什么别人有爸爸，自己没有，她告诉孩子，你的爸爸到月亮上去了，同时自己下了夜班还尽量和孩子一起玩。她尽了最大努力来让孩子们有一个较好的心理和物质环境。由于经受过度劳累和各种压力，使她在 1977 年得了半身不遂，至今仍然瘫痪在床。

刘浩的母亲听到刘浩的死讯，非常悲痛。老人因此自杀。她喝了剧毒的农药。可是她死后，家里的人不敢告诉乡亲她为什么自杀，因为刘浩被说成是"反革命"和"特务"，为"反革命"和"特务"去死，当时也是大罪行。他们只好对外说，是因为和媳妇闹了别扭，想不开而自杀的。

刘浩的骨灰，当时家人送回了他的老家。他们把骨灰盒埋在刘浩的祖父母的坟墓旁边，可是不敢给立碑留标记。文革后，刘浩被"平反"，要给一批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家人到老家去看，挖了一下，没有找到，他们也不愿意再东挖西挖，就在那里取了一点土，放在骨灰盒里，带回了北京。

文革后，1978 年给刘浩"平反"时，给了他的家属四千块钱，同时开始给还没有工作的小孩子每个月 20 元。刘浩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最近有一个已经被"下岗"了，还不到 50 岁。

家人不会忘记父亲。从 1995 年开始，每年刘浩的忌日，5 月 31 日，他的妻子都会在家里挂起他的照片，在照片前点上香，放上点心和花。孩子们都会回来，给父亲的遗像磕头。一年又一年，刘浩已经离开他们三十三年了。

他们也还会想，刘浩为什么被害死了。他们想，刘浩聪明能干，是非常好的医生，而且热爱生活，懂得欣赏生活，这样的人可能遭到嫉妒。他们也想，那时候医院里分成"红总"和"红联"两大派，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一派的革命，拚命"揪"阶级敌人。他们也知道有人生性狠毒，借机报复整人，好自己往上爬。但是这些个人性的邪恶，都只有在文革这样的大形势下，才能发挥出来，害死了许多刘浩医生这样的人。

在刘医生死亡的一星期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了"转发毛主席关于《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批示的通知"，号召"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作好。"

毛泽东批示的这个新华印刷厂的"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由"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组织写的，其中不但在原则上鼓吹和强调那种迫害人的思想，而且提供具体的整人方法，比如刘浩被"揪"出来的场景，就和那个文件中的描写非常相象。

像刘浩这样被害死的医生不是个别的。仅仅在这个"网上纪念园"里，就有一批。医生是个古老的职业。他们的工作是治病。人都是会生病的。医生和其他人之间会有矛盾。但是普通人不会愚蠢到为自己的利益去杀害医生。考察这个"网上纪念园"里死亡的医生的故事，我们会知道这样残忍而荒唐的对医生的迫害，只能是文革的产生物。

一封等待了两年的信

娄瘦萍， 1904 年生，男，1938 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1967 年，他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离开出走，被抓获，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 10 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 1968 年被逮捕，1970 年被判刑 15 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缺乏营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4 年 1 月，娄瘦萍死在劳改营中，时年 70 岁。 韩国远，男，牙科医生，娄瘦萍的妻弟，1950 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到贵阳铝业公司。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斗争"。1967 年，他逃离贵阳，到长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娄瘦萍的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怕贵阳单位里的人追来，决定继续逃亡，离开中国。娄瘦萍的女儿当时是初中学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在东北营盘被抓。韩国远被判处死刑枪毙。他的外甥女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她还不到 18 岁。他的妹夫被指控为同谋，被判 15 年徒刑，死在劳改营中。

****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１９９８年，我给一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电话，他说他自己的故事将来再写，他要先写关于别的受难者的故事，并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帮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一篇文章，题为《医学教授娄瘦萍》，文字流畅通顺，并不需要修改或润色。我把文章寄给编辑苏晓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国》１９９９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是在１９９９年的增刊２００号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６７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１５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１５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２５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２５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

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

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收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３０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中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１０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路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一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路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回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了解。

娄瘦萍生于１９０４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１９３８年他毕

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１９４９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１９５７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１９７９年８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９年的２２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１９５０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１９４９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读了７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１９５１年"

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 1966 年 8 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１９６６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１９６７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１０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

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１８岁的娄玉方被判１０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１９６８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他被判刑１５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１９７０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１９７０年2月到１１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１９６７年1月１６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１９８７年在费城去世。　　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他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１９８９）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１９７１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

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１１）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２０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１９７０年9月２７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接处的涔澹农场，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６６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囚犯的"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准确：

１、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年；

２、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四个

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１元５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有人能接济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１元５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１８岁。她被判刑１０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１９９０年代毕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

我希望将来能够访问娄玉方，听她自己说出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不应该忘记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人世，看到人间可能发生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总是致力于迫害人压抑人，这种邪恶在文革时代大行其道，毁坏了无数人的生活。娄玉方的故事也会是对人生力量的一种激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生活。读者中有认识娄玉方的人，请把我的这一希望转告她。

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将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文革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再也无法使文革的受难者们复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全都书写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害死他们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出真实的历史，说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所遭受的迫害，说出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经历的痛苦，不需要隐名埋姓，临时另取一个名字，不需要惧怕作恶者的威胁。让我们为此努力。

****

(附文） 医学教授娄瘦平

作者： 江 雁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澹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

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棉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关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

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

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农场四面环水，冬季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澹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陆洪恩之死

陆洪恩，男，1919 年生，1943 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4 年起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文革前一年曾因患"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1966 年 5 月再次发病，因发病时曾有所谓"反动言论"，1966 年 5 月 28 日被公安局拘捕，1968 年 4 月 27 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决死刑枪杀。

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个在发病时在小组会上说了一些并不严重的批评文革的话的人，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监禁两年后判处死刑枪杀。陆洪恩的遭遇浸透了"文革"的血腥和残忍。

陆洪恩出身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他的妻子胡国美，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任上海舞蹈学校的钢琴伴奏师。认识陆洪恩的人说他极为聪明，不但有音乐天才，还富有文采，文章写得很好。这应该是事实。因为上海交响乐团是高水准的乐团，他应该是个优秀的艺术家。1965 年 1 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谓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只好把他绑起来送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随后，陆洪恩被送回上海。

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隋月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接受治疗，病情缓解后出院。他能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

1966 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他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他得到的回答是：对陆洪恩，不要送医院，不用你管。

那时在上海交响乐团发生的事情是，团里分组进行"政治学习"，讨论姚文元刚发表的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发表在 1966 年 5 月 11 日的《人民日报》上。"三家村"是三个人联合使用的笔名，他们以此笔名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发表了一些杂文。姚文元的文章声称要揭露这些杂文的"反动本质"，把这些杂文的内容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射和攻击，目的是要让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对这些短文的这样的攻击，也成为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斗争"的一条"理由"。当时的人们都只能唯唯称是，照着《人民日报》的说法发言。但是陆洪恩在小组会上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看法。团里的人和他辩论。他亢奋起来，滔滔不绝地陈述别人都不敢说的看法。当有人驳斥他的看法，说他和苏联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一样。在这种刺激下，陆洪恩说，你们说我是，我就是，并且说了"赫鲁晓夫万岁"。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在 1956 年开始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残酷迫害并给受害者平反。虽然赫鲁晓夫只是部分地否定了斯大林，他被毛泽东当作"修正主义"的头目抨击，并且在文革前夕遭到中共越来越凶狠的咒骂。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时，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陆洪恩是有精神病的人，在开会辩论时，在对峙的情况下，陆洪恩越说越激烈。因为陆洪恩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并且负气喊了"赫鲁晓夫万岁"，这就被当作了"反革命事件"。结果，陆洪恩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捉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现在回观往事，我们可以认为，陆洪恩对姚文元文章的不满，是相当理性的思考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姚文元文章的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的方式非常反感，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都知道把真话说出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说在文革前和文革刚刚开始时，一般人已经被驯制成不形成或者不表达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的顺从者，没有人敢在公众场合说出自己和权力当局有违逆的想法。陆洪恩精神失常，所以不能懂得必须躲避锋头保护自己，他径自把他的看法说了出来。他不能意识到他犯了大忌，将遭大祸。

在拘留所里，生活条件不好。陆洪恩得不到烟抽，而他是个吸烟很多的人。最不人道的是，陆洪恩从 1965 年第一次入精神病院之后，一直服用有镇静作用的氯丙嗪，被公安局拘留以后被停了药，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

据说，陆洪恩在关押中见到红色的东西就试图破坏，那时候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等东西。这种对色彩的狂躁反应本来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然而，由于红色被当作"革命"的象征，所以陆洪恩对红色的反感也变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另外，据说他在关押中呼喊了"反动口号"，和毛泽东有关。具体喊了什么，不详。在文革中，大力追查所谓"反动言论"、"反动标语"和"反动口号"等等，但是被"揭发"出来并且被用来定罪的这类材料，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作"防扩散材料"，都不予公布，也就是说，除了少数"专案组"的人以外，不准一般群众知道。不准"扩散"的目的之一是怕引起听众共鸣。但是，这些没有明确核实过的材料却可以被用来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陆洪恩 1966 年被"拘留"，在拘留所被关了一年后，在 1967 年转为"逮捕"。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文革时代，司法部门就不遵守法律。在"革命'的名义下，抓人斗人，都是可以受到赞扬和奖赏的"革命行动"。

在陆洪恩被关押期间，他曾被押回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斗争会"上，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现在的人们可能不能想象在交响乐团这样的地方，怎么能殴打折磨侮辱乐团里的成员。但是在文革时代，交响乐团不排练也不演出，全部时间用来进行文革，作出了大量野蛮残酷的事情，而且，根本不被当作什么值得惊讶的特别的事情。在"斗争会"上打人甚至打死人，在上海，1966 年 8 月之后一直在发生。就在上海交响乐团，1967 年 1 月 31 日，已经是陆洪恩被拘捕半年多之后，在上海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里，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乐团的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被拖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拳打脚踢。她被男人狠打耳光，被罚跪请罪。在这场"斗争会"之后，当天晚上，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顾圣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钢琴演奏家之一，1937 年生，1954 年入上海交响乐团，曾经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顾圣婴死亡的时候，30 岁。

更残忍的事情接着发生。1967 年 1 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打倒"了原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了文革的新的权力机构。毛泽东决定把这种新的权力机构改名叫做"革命委员会"，而不再象原来那样叫做"人民政府"。张春桥和姚文元担任"上海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他们就是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人中间的两个，在文革中掌有

极大的权力。"革命委员会"实行毛泽东所说的"一元化领导"，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有判处死刑的大权。

1968 年 4 月 27 日，上海"革命委员会"属下的"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在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当时已经被改名叫做"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对陆洪恩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除了陆洪恩，还有另外 6 人被同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 6 个人的名字是：柳有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杨望义，张鹏宏。因为陆洪恩是交响乐团指挥，是公众中的知名人物，所以笔者得以听说了他的死亡，并且设法调查到他的有关情况。和陆洪恩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另外 6 个人，笔者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为何被判死刑，希望读者中有知情者能告知。

据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宣判陆洪恩等 7 人死刑的大会的全名，叫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这种"公判大会"在文革时代是各地常用的方式。这种"公判大会"没有法官，没有检察官，也没有辩护律师，也没有陪审员。这不是一个"判决"的程序，而是要公众接受这个判决以及其中包涵的信号的方式。一万人参加这个"公判大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判决有参与决定权，而是去表示拥护这个判决，去接受这种残酷的"专政"。这样一种形式，是从 1950 年代开始实行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对法律的极大破坏。不幸的是，这种形式在文革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普遍使用。而且，这种概念深深毒化了人们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意识。即使在文革后，很多人说到这样的"公审大会"，也仅仅强调在这样的会上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们是无罪的，不是"反革命"，但是不曾指明这样的"公判大会"本身是违法的，这是文革领导者的犯罪行为。

《解放日报》的同一文章还报道了"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一小撮积极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出，作为判处 7 个人死刑的理论上的根据，是些什么。批评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就可以作死刑判决的依据。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至于这是否事实，又在另一层面上形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对陆洪恩的行为，根本没有允许为他辩护，也不允许把他说话的上下文和情景以及意思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考虑他精神失常的因素。

《解放日报》的报道还说："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文革前，判处死刑，准许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虽然据说最高人民法院从来没有推翻过下面的判决，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需要这样作。这种宣布判决、立即枪毙的做法，在法制史上是空前的。判决不是正常的判决，死刑执行也不是正常的死刑执行。对这样的方式，应该提出起诉，进行审判。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可能进行这种审判。

"文化革命广场"的容量大概是一万人。上海当局除了召集满广场的人来开"公判大会"之外，还组织各个单位的人收看电视上的"公判大会"实况转播。当时的各个单位，业务工作可以随时扔下，参加这样的文革活动，而学校本来就是在全面停课之中。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私人电视更是少见。上海是现代中国技术最发达的地方，不幸，当时的技术不是被用来造福于普通人，而是用来为文革服务。在上海，1967 年，举行了几十场电视台上的"斗争会"，

可以算是在迫害人方面运用了别处没有用的"高技术"。陆洪恩被判死刑的公判大会，不但有现场的一万多人参加，而且通过电视转播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当电视节目中没有交响乐也没有故事片播放的时候，电视技术被用来播放判处乐团指挥死刑的场面。

电视观众在屏幕上看到，陆洪恩被五花大绑，健康状况极坏，两年的监禁，把他折磨得完全不象一个 49 岁的人。以恶劣的生活条件虐待被关押者，这本身是一种犯罪，但是当时被公开作为警告和威胁普通人民的手法。

《解放日报》的报道还说：大会宣判后，七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这时场内场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革命群众"对枪毙陆洪恩等人"拍手称快"，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写实的。文革煽动和鼓励人们使用暴力，相当一些人的恶意在革命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对于杀死他人，不但没有同情，还欢欣鼓舞，积极参与，甚至以害人牟利。文革杀人，到 1968 年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手段比判处死刑还残酷。即使是不参加直接杀人的人，在 1968 年也变得相当麻木而缺乏同情心。在没有比文革在摧毁中国人的道德方面作得更彻底的了。当时的很多人，冷漠，也卑劣，即在狼的面前像羊，在羊的面前像狼。在陆洪恩这样的待宰的羊的面前，恻隐之心并没有多少。另一方面，解放日报这样报道也是夸大的，因为良心尚存的人们不是仍然是有的。报纸没有作问卷调查，怎么能说人人赞同，"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方式的用意之一是造成人人如此的假象，对那些心里不服的人们造成心理威胁，从而迫使人人都这样作。这种报道方式，就像"群众公审大会"方式一样，用"多数"来恐吓和压服别人，是非常恶劣的宣传手法和征服手段。

枪决陆洪恩等人的布告贴在上海街头。看到过布告的人说，布告上有他们的照片，模糊不清，更使人觉得恐怖，因为看了让人觉得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就会被枪毙。

陆洪恩被判死刑的时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在上海外语学院被对立派的"群众组织"抓去关起来。他们强迫他"交代"和陆洪恩的关系等等，试图抓到他在对待陆洪恩问题方面有什么"划不清界限"的"错误"，可以整他。只因胡国安一贯行事小心谨慎，总算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所以被关了两天后被释放了。

陆洪恩被枪决后，有公检法方面的代表到陆家通知陆洪恩的妻子胡国美，并向其索取打死陆洪恩所用的子弹费。

据传，对陆洪恩判死刑，张春桥，"四人帮"之一，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过："陆洪恩不是精神病，是反革命。他喊赫鲁晓夫万岁，为什么不喊毛主席万岁？" 笔者无法看到当时的会议记录，无法知道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在上海判处死刑，一定经过张春桥和新建立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最后批准。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听过陆洪恩指挥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他作为音乐指挥的名声的。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在文革时代，陆洪恩不是仅有的例子，即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了当时会被当成"反革命罪"的话，被判重刑甚至被判死刑。对这样的人的判刑甚至枪毙，至少涉及了几个层面上的非法。

首先，他们精神失常，和文革的恐怖气氛，和遭到残酷的"斗争"，包括殴打侮辱等等非人待遇有关。陆洪恩在文革前就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不遭受文革时代的迫害，他的精神病不会变得那么严重，而且是可能治愈的。从当时一批"斗争对象"被活活打死的事实，可以知道那时的暴力程度有多么严重。

在北京，在 1966 年夏天红卫兵运动掀起时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上海，总的来说，被活活打死的人数没有北京多。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斗争"后自杀的总人数，根据文革后的 1984 年上海对文革案件的复查，有 11，510 人。其中有一些人被活活打死，一些在饱受折磨和虐待后自杀，因此在各个局部，上海可能和北京一样残酷。在遭到残酷的"斗争"以后，他们未经法律审判程序就被关进监狱。在他们被关进监狱之后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当然已经无法说出。和他们一起被关押但是活着出来的人后来说出了当时监狱里的殴打、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心理折磨。这种通过"革命群众"之手或"专政机关"施行的暴力迫害是非法的。

第二，他们当时的言论是在已经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发出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对于精神病人，不仅他们的的言论，就是他们的行为，甚至类似暴力攻击和杀人这样的极端行为，都不能作为量刑和判罪的依据。因为精神病人在发病的时候，无法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负责。另外，只有专业医生有权作精神病鉴定。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中，一个嫌疑犯，即使他没有精神病史，只要他的律师、辩护人或家属，提出他有精神病方面的问题，法庭都必须使他得到精神病专家的检查，获得专业医生的结论。对于有精神病史的嫌犯，法庭必须首先考虑这个因素。而陆洪恩一案非常明显，因为他因"精神分裂"住院治疗的经历，还是仅仅一年以前的事情，直至"案发"，他还在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病历具在，无可怀疑，否认他的病情因素，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知道了故意不承认。

第三，陆洪恩这样的人，虽然精神不正常，但是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打架毁物，不对公众造成危害。定他们罪的"理由"，只是他们说过的一些话。既然当时的宪法上写有公民有"言论自由"，言论就不应该成为定罪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定死罪的理由。即使这些话是精神正常的人说的，也不应该是罪，更不应该是死罪。但是，在文革中，这类言论当时被称作"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机关内部还将之简称为"恶攻"。"恶攻"是当时最大的罪之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 1967 年 1 月 13 日联名发出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一般被简称为"公安六条"）第二条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但是他们没有给出定义，什么样的言论是"攻击诬蔑"。不小心弄脏了毛或林的照片，开个玩笑，都可以成为"恶攻"，成为"现行反革命"。

另外，尽管这种"恶攻"言论可能并不是向公众作出的（陆洪恩在这方面是个特例，但是这是因为他精神不正常。），也没有任何录音或文字记录可作证据，只要有两个人揭发（这两个人可能受到了包括拷打在内的威胁或者利诱），就可以坐实。然后这种"恶攻"就可以成为重罪甚至死刑罪。如果作自我辩护，那就会当作"抗拒从严"的例子受到更残酷的处罚。"恶攻"罪名在文革中害了千千万万的人。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酷法，却在文革中一直被认为理所当然。另外，各地都会有一些想通过"挖掘阶级敌人"来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这种"恶攻"的话和证据，来把一些人圈进"反革命"的范围。而被"恶攻"绳子套上脖颈的人，如果他们神志还清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

全，只有拚命声明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或者想过这些话，却不能质疑这一定罪原则。直到 1979 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对领袖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人们听了才意识到文革的规则的残酷程度。在历史上，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杀害人不是少见的现象，但是，他们杀人，常常找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一般是"谋反""贪污""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理由"可能不是他们真心想的理由，而是他们找的借口，这种指控也可能根本不是事实而是假造的，但是，能够放到桌面上来的，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文革时代，"中共中央"，也就是毛泽东和林彪自己，发出指令说"攻击诬蔑"他们两人就是有罪，是重罪，这样的酷法，史无前例。只是文革十年反复贯彻这样的信条，以致人们都有了"从来如此"的印象。

第四，确定对陆洪恩等人处以死刑，没有经过正常法律程序，其中重要的是辩护和上诉。如果允许辩护，即使可以把说赫鲁晓夫好话当作判"反革命罪"的根据，至少还可以请上海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为他的病情出庭作证。另外，文革前判处死刑，被告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如果最高法院驳回，死刑才得以执行。文革中改变了这一制度，死刑批准权到了各省和直辖市，由各省和直辖市在文革中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批准死刑。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理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三位一体，死刑由共产党党委会决定。在上海，1967 年的"一月革命"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枪杀了陆洪恩和林昭，还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姓名的人。 有人记得，1969 年 10 月为"庆祝国庆"，上海有六十多人被枪毙了。张志新是在 1975 年 4 月由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决定判处死刑枪毙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其中起了最后决定的作用。

1981 年，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中的两个，受到了审判，张春桥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了 18 年徒刑。能够用法律程序而不是谋杀或秘密囚禁来解决共产党高层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审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时候，他们明明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最得力的帮手，他们的最大的罪名竟然是"反对毛主席"，他们杀害陆洪恩以及类似的普通人民的罪行，却没有被得到起诉。

陆洪恩本来是一个在乐池里把美好的音乐带给人们的人。交响乐曾经通过他手中的指挥棒流向爱音乐的人们。他不幸患精神病，如能得到医疗，病情可能缓解甚至痊愈。但是，在 1966 年，文革开始的第一年，他被逮捕，在文革的第三年，他被杀死了。

胡国美和陆洪恩的儿子叫陆于为，父亲被杀害时他 18 岁。他被送去新疆劳动 11 年，直到 1979 年才返回上海居住和工作。

陆洪恩死后，他的妻子胡国美生活在忧郁和压抑中，现在已经去世。为了他的死，为了寻求法律正义，应该再审判一次"四人帮"和其他文革的领导者。

1968 年 4 月 28 日解放日报关于枪杀陆洪恩等人的报道全文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

本市举行公判大会镇压现行反革命

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一致表示，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 性，充分发挥群众专政威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

本报讯 为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上海市公检法领导机关昨天在本市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严厉判处了一批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会上，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柳友新，彭振邦，陈霖，尤咏仁，陆洪恩，杨望义，张鹏宏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判处其他三名现行反革命罪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昨天，本市一万多名无产阶级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充满了深仇大恨，参加了大会。革命群众齐声朗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参加大会的和会场外收看电视实况转播的革命群众，不断振臂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本市公检法领导机关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他在分析了当前大好形势后指出：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是接近全面胜利，阶级敌人越要作垂死挣扎。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跳出来，疯狂地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我们坚决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最后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专政机关的工作要同群众专政结合起来。广大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布下天罗地网，筑起铜墙铁壁，一切阶级敌人都将无处藏身，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必将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揍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会上，还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发了言。他们对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罪犯公判大会表示坚决的支持，他们在发言中还一致表示：在这场政治大革命中，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提高革命警惕性，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 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大会宣判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柳友新等七名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场内外的革命群众长时间的高呼口号，无不拍手称快。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打"小流氓"和南保山父子之死

南保山，男，南鹤龙，男，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9 号居民，1966 年 8 月下旬被打死。他们是父子。

南保山的儿子、南鹤龙的弟弟南鹤龄，在 1966 年 8 月初，因他的一个朋友被第 28 中学的红卫兵打了，他赶去帮助，和红卫兵发生冲突。据说南鹤龄用刀子捅伤了一个红卫兵。

红卫兵的成员都是青少年。对男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好斗的年龄。在平常的时候，在男性青少年之间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学校的老师或者警察会出面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在 1966 年夏天，红卫兵利用他们的巨大特权，把这类冲突变成了"文革"的一部分，开展了一场对一部分同龄人的暴力行动，当时他们把这一场暴力行动叫做"打小流氓"。实际上"打小流氓"是红八月的"红色恐怖"的一个部分。由于被打和打死的"小流氓"当时就是缺乏社会地位的人物，对他们的迫害和虐杀，即使在文革后也几乎没有人提起，甚至有人可能还认为打这些人没有什么错，因为他们是"小流氓"。

"打小流氓"是和红卫兵打教育工作者差不多同时开始的。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卞仲耘。1966 年 8 月 7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郊区）红卫兵在城里的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小流氓"。在 1966 年 8 月 13 日，在北京当时最大最好的会场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南鹤龄是那天被斗的"小流氓"之一。

这个 1966 年 8 月 13 日的"斗争小流氓"大会，据笔名"老鬼"的当时第 47 中学的学生马波的《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说："1966 年 8 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人制止。"

南鹤龄在那个大会后被判刑 15 年。南鹤龄进了监狱，他没有被红卫兵打死。他的父亲和哥哥在家里，却在红卫兵此后的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中被打死了。

在"打小流氓"大会后，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学生红卫兵领袖们簇拥在毛泽东和林彪的身边，最受支持。接见后，暴力事件大规模升级。北京社会中的大批居民，遭到红卫兵广泛的暴力攻击。

1966 年 8 月底，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达到高潮时候, 南鹤龄的父亲南保山一天被揪到区联服务社"斗争"，被用棒子打死了。南保山是个剃头师傅，从前在家的前面开过一个小理发店，算是个"小业主"。1966 年时他已经年老不做什么事。南鹤龄的哥哥南鹤龙，没有在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作，有时在街上给人理理发赚点钱。红卫兵毒打南鹤龙后又把他锁在家里，不给他吃的喝的，只给了他一壶花椒水。花椒水不能喝。一个邻居，退休的小学教员，曾经偷偷送给他水喝，却没有敢给他食物。因为知道送去的水如果被发现，和花椒水在外观上也难以区分。如果送食物，被发现了，红卫兵定会知道是有外人送来的，一定会追查，这样会祸延自身。南鹤龙被关和打了几天以后，连伤带饿，死去了，当时 26 岁。

1966 年夏天后南家人就从 179 号院消失了。同院的邻居说，南家兄弟不爱念书，老留级，粗野，出口就是脏话，还打架，也没有找到一个国有单位的工作。但是，这能是红卫兵打他们和把他们打死的理由吗？

南鹤龄被判了 15 年刑。不知道为什么，据说他在 1996 年才回到了北京。1998 年，有人看到南鹤龄在北京月坛附近的一个市场上摆摊子。但是那个市场很快被撤销了。

孙启坤孙玉坤两姐妹之死

孙启坤，女，北京永定门外台型机床厂退休会计，1966 年 8 月 27 日被打死。
孙玉坤，孙启坤的姐姐，北京西交民巷前细瓦厂 2 号居民，1966 年 8 月 29 日被打死。

孙启坤的丈夫是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北京铁道学院在 1969 年被命令迁出北京，文革后在北京复校，现在名为北方交通大学）。1966 年 8 月，她的丈夫在学校里每天挨斗挨打，她也被罚扫大街等等。

铁道学院当时的暴力现象非常严重。据一位并不认识孙启坤的受访者说，她的母亲文革前是铁道学院一个系的负责人。在受到零星殴打之后，一天接到学生的通知，要她晚上去学校里"开会"。她知道是要去挨打。她告诉了家人，但是想不出办法可以不去，只有去，因为违抗命令只会遭来更严重的殴打。他们想出的唯一的保护自己的办法是：穿上厚一点的长裤和长袖衣服，希望棍子和拳头落下来的时候，少一点疼痛。当时可能是九月初。尽管当时天气还很热，这位系负责人在外衣里面穿上了毛衣毛裤去挨打。

孙启坤原来是北京永定门外台型机床厂会计，1966 年时已经退休。因为她被罚扫大街，她的丈夫在学校天天挨斗挨打，他们决定逃离学校。而且，在他们逃离的前一天，北京铁道学院里有一个人被红卫兵打死了。这显然是促使他们下决心逃离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逃离是非常大的风险，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虽然暴力行为如此严重，却极少有人逃离的原因。最后，孙启坤被打死的结局也说明了逃离遭到的惩罚更可怕更严重。但是留在学校，也可能会被打死，所以他们离开家和学校。

孙启坤和丈夫离开家后，曾独自到了城里她的弟弟家。在那里，她被红卫兵抓住。

在他们逃离前一天北京铁道学院被打死的那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孙启坤的弟弟并不知道。据北京铁道学院的一个子弟说，1966 年夏天北京铁道学院有一个教授被打死，他是俄语教授，是被铁道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打死的。这位被访者当时是少年人，已经不记得那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而且也不知道这位教授的名字，只记得他的儿子的名字是张悟。也许使孙启坤夫妇逃走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一位教授的死，而不是这个大学中还有别的人也被打死。当然，在更坏的情况下，是这个大学中还有别的人也在 1966 年的夏天被打死。

孙启坤的弟弟孙菊生，是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教师。他的学校在北京东郊，但是他家住在西长安街南文昌胡同 6 号，在人民大会堂的西边。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有一个独院。因为这个情况，虽然孙菊生在他的工作单位并没有被"揪出来"，但是作为有房子的人，孙启坤到达之前，他家已经被抄了。抄孙菊生家是在 8 月 23 日开始的。当时人们家里没有电话，所以孙启坤不知道弟弟家也在灾难中。

查抄有私人房产者的家，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的重要一部分。抄孙菊生家的是北京第 31 中学和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进门就打，然后把他们全家赶到一个小屋子里，每天只给一点窝头吃。除了用皮带打，后来还用了一种钢鞭，外面是塑胶皮，里面有电缆钢丝。孙菊生的妻子被打得昏过去一次，用凉水喷醒。

红卫兵还在孙菊生家住了下来，一连打了几天。他们有二十几个人，轮流打，一个打累

了，别的人继续打。

他们把孙家的家具和箱子都搬走。他们抄走孙家的一些东西，他们说东西都交到了国家银行。这是真的，因为后来在银行找到了一张记录清单。在 1966 年夏天，国家银行参与帮助红卫兵抄家和没收财物，这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了单据。银行有保留单据的传统规则，这一方面还没有被破除。但是抄家的人拿走了孙菊生的妻子的一只翡翠镯子和一只金壳手表，根本就没有列入这张清单，后来当然也无从找到。

孙家人说，他们那个地区，正好在"西纠"的那条线上，所以被打得特别厉害。"西纠"的全名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当时以残酷和暴力著称。孙家旁边的住在一个绿门里的邻居，比他们还惨，那人被打得五官都看不出来，脸上除了青紫块，还有烫伤。

孙家人有的比较值钱的东西是一些字画古董，但是红卫兵并不问字画古董，因为他们不懂。他们要孙家人交出金子和枪。孙家人交不出来，就被打。打了几天以后，在 8 月 27 日早上，在他家的中学生红卫兵告诉孙菊生家人，说，我们要走了，今天晚上要给你们送点礼，等着吧。他们的意思就是晚上还要打一场。也就在那天中午，铁道学院的大学生红卫兵追查孙启坤，追到了孙菊生的家。他们说，姐姐没有来。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说，他们来就抓起来。

就在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孙启坤来到了孙菊生家。她是一个人来的。她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如此严重，她来的时候，手里还提着一包梨，意思是来"分离"的，因为"梨"和"离"同音。也许她只认为是临时避一避风头的，或者认为弟弟住在市中心，人民大会堂旁边，不会像学校里那么野蛮。她一进门，就被抓了起来，在弟弟家的北房打，当时北房的家具已经都被搬走了。问孙启坤她丈夫在哪儿，她不说。至死不说。她一会儿说是要去天津，一会儿说是去远郊区，一直没有说出丈夫在哪里。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学生，轮流打孙启坤，用鞭子沾了水打。

孙启坤的皮肤被打得全部变了颜色，她全身"简直像一个色彩斑斓陶瓷罐子"，目击她被打的人这样形容。红卫兵还用绳子勒她的脖子，勒一下，又放一下，然后又勒。

铁道学院派来了一辆汽车，要把孙启坤送到西城区公安局去。当时孙启坤还能走出来，走到门口的时候，还对孙菊生的妻子点了一下头。但是在汽车上她昏迷了。到了西城区公安局，公安局说这个人不行了，要送医院。铁道学院的人又说汽车还有别的任务，要把汽车开走，他们从街上找来一辆三轮车，让孙菊生把孙启坤送到医院。孙菊生当时也被严重打伤，他艰难地背起孙启坤要上三轮车，走了两步，突然觉得背上的人一下子沉了很多－－多年之后，这位前物理教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背上的人死去的时候，会突然变重了很多。可是除了 1966 年 8 月这种非常恐怖时期，别的人没有这样的经验，无从讨论这一现象。孙菊生觉出背上的姐姐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把姐姐放了下来，看到她已经死了。但是铁道学院的人还大声叱责孙菊生："你故意把你姐姐摔死了，你是杀人灭口。"

当天晚上，孙菊生被扣在公安局。孙启坤的尸体被送火葬场烧了，还找家里要了火葬费。这也是当时的普遍行为，红卫兵打死了人，就叫家属出 28 元钱火葬费。孙菊生随后被送往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在那里的"劳改队"里"劳改"。他被押到学校的时候，只有身上穿着的背心裤衩，还沾着姐姐的血迹。他在学院中其实当时并没有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但是照当时的逻辑，既然他在城里的西城区被当作"阶级敌人"打了，他就是"牛鬼蛇神"了，所以

就进了"劳改队"。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独处东郊，离北京城和其他大学都比较远（北京城区有很多中学，北京的大学多数在西郊），所以打人的风气当时没有北京别的地方严重。孙菊生虽然进了学校的"劳改队"，却感到非常庆幸，因为在这里他虽然受侮辱和别的苦，但是看来一时不会有被打死的危险。他在劳改队里的同事们看到他衣服下面的吓人的黑紫色的被打的痕迹，听到他姐姐的死讯，也只有庆幸自己没有遭到最坏的对待。孙菊生还当了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劳改队"第三队的副队长。他还曾经告诉同事，如果被鞭打，他的"经验"是，尽可能保持身体静止，这样可以减轻痛苦。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时代的一个物理教师可以传授的"经验"！

孙启坤死了，铁道学院的红卫兵继续寻找她的丈夫。他们又追查到孙启坤的姐姐家中。孙启坤是姐妹中的老二。他们的大姐叫孙玉坤，住在西交民巷前细瓦厂 2 号。孙玉坤的丈夫从前是东北军的长官，历史上和周恩来有过交情，文革前当着"政协委员"，本来这就是个虚衔头，文革时这更不能帮什么。孙玉坤被打。孙玉坤当时 58 岁，身体相当好。据说开始总打不死。后来红卫兵不耐烦了，就往要害处打，很快把她打死了。孙玉坤在她妹妹孙启坤被打死两天之后被打死。

孙菊生活了下来，他的大学搬出北京。文革后大学一直停课，在很久以后才部分恢复上课，那时候他已经被退休。他就此离开了学校。他有一项才能：画画。他是中国画猫画得最好的国画家。在画店里可以见到他画的猫。笔者在 1990 年代初访问他的时候，除了他的两个姐姐的遭遇，他也说到，在天津有一个画画的人叫张奇义，被打死了，又被丢在厕所里，说他是自己摔死的。

文革后，孙菊生的儿子找了北京西城区法院，想要说说孙家的事情。法院的人说："那是特殊时期。"没有受理。

学生王光华之死

王光华，男，北京第六中学学生。1966 年 9 月 27 日，王光华被红卫兵绑架进设立在六中校园内的"牛鬼蛇神劳改所"并遭到多次毒打，第二天，9 月 28 日，王光华被打死在那里。时年 19 岁。

1966 年，王光华在北京第六中学上高中三年级。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有母亲和妹妹。认识王光华的老师说他是个"有礼貌，品行端正，学习好"的学生。王光华的父亲在 1956 年以前是个"小业主"，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六中红卫兵刚开始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他曾经表示过不同意。但是红卫兵立即就压倒了一切不同的声音，把这个说法变成了学校里至高至尊的原则。

1966 年 7 月 8 月，在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之外，就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门口，食堂门口，教室门口，教室里黑板两侧，无处不贴这副对联。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的两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强迫各写一百副"对联"并到各处一一张贴。这副"对联"还被谱了曲子作为"歌"唱。

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父亲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是"好汉"，父亲"反动"的学生是"混蛋"。这种把学生分成两个天差地别的等级的说法煽动起了前者的极大的狂热，所以，这副"对联"在当时比其他别的文革口号都更多占据了视觉听觉世界。随着"对联"地位的确立，相当一批学生受到他们以前的同学、那时的红卫兵的语言和肢体的攻击。

王光华所在的北京第六中学位于西城区，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这个学校有相当多的干部子弟，也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校之一。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监狱。他们一身而兼任司法制度中警察、检察官、法院、监狱和刽子手的职责。他们自行决定在这个监狱中关押谁和拷打谁以至处死谁。这个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数十人在那里被严重打伤，有三个人在其中被打死。王光华就是三个被打死的人之一。

在 1966 年夏天，红卫兵建立校园监狱关押拷打人，甚至在其中打死人，第六中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学校。在相当多的学校都有自设的监狱。六中的这一所建设得最为完备，所以在当时，有不少别的学校的红卫兵去参观"学习"。比如，景山学校的一些红卫兵成员，被认为"革命意志不够坚决"，也就是打人不够凶猛，被组织起来去六中的监狱观摩。在那里他们看到满地的血迹和墙上用人血描过的大标语"红色恐怖万岁"。

1966 年 8 月初，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销后，六中红卫兵掌管学校，把工作组时期就被"停止反省"的一些教职员组成"劳改队"，到 8 月中旬又把他们都关在这个监狱里。有九个教职员自始自终被关在那里。还有其他的人，包括二十来个学生，或长或短被关在其中。

这座监狱原来是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因为学唱歌有很大的声音，会影响别的课，所以一般学校的音乐教室和别的教室有所隔绝，单成一体。学校在六月初就停了课。相对隔绝的音乐教室就成了建立校园监狱的场所。不但第六中学的红卫兵用音乐教室建监狱，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也在音乐教室关人和打人。六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监狱门口挂了一个"牛鬼蛇

神劳改所"的牌子。又在后面建了一个岗楼。岗楼下面安装了一个大功率电灯，通宵长明。监狱建成后，有红卫兵在墙上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加惊叹号。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走过广场的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第六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8 月 25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成立。当时简称"西纠"。六中红卫兵是"西纠"主力之一。负责掌管六中监狱的红卫兵是"西纠"的领导人之一。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红袖章。每逢大会，"首都红卫兵纠察队"都和军人一起担任纠察。西纠的十道"通令"用大号铅字印刷成法院布告那样的尺寸张贴街头。红卫兵进行了烧书和砸毁文物，并且把近十万北京居民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在 8 月和 9 月，数千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其中西城区被打死的人是北京各区中最多的。

王光华在六中监狱中被打死的那天，监狱门口贴着六中红卫兵的一张"通告"。通告上说："没有指挥部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去打人。"从这张"通告"的措辞，可以了解当时有什么样的"革命秩序"。实际上，不但六中的红卫兵常常来那里打人，外校的人也来打。关在监狱中的老师说，"外校的红卫兵来，都要来打一过，就跟玩儿似的。"

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见毛泽东，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攻击文革的对象，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车票和食宿，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革命大串连"。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低，这样的旅行是一般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钱作的。这种"串连"掀起了极大的狂热。六中红卫兵规定只有红卫兵才能外出"串连"。王光华不是红卫兵。但是他和四个同学，都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在 9 月 7 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他们在火车上失散了，后来分头回到北京。9 月 26 日，其中的一个学生被抓到校中被打得昏死过去。9 月 27 日早上，另外三个学生被抓到学校的那个监狱里。他们被迫给红卫兵磕头。每人被打一百棍子。这三个学生每人都被打掉一颗牙齿。他们流在地上的血，被蘸了涂描墙上的"红色恐怖万岁"大字。

9 月 27 日傍晚，王光华回到北京，立即被抓进监狱。一进门，十几个红卫兵成员围上去一起用棍棒皮带打王光华。他被打昏在地失去知觉后，被关在那个监狱里的六中前负责人汪一净被叫来给王光华作人工呼吸。王光华回过气来以后，红卫兵又打汪一净。那天汪一净的手臂被打坏骨头。

汪一净，女，第六中学在 1964 年时的负责人。早在 1964 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中，第六中学的干部子弟就起来攻击校方。上面派来"工作组"到六中，撤了学校几个负责人的职，其中有两个人被送农场劳动改造。他们的主要罪名是"打击干部子弟"和"不贯彻阶级路线"。 汪一净在那时候就被打过，只是和文革时代的暴力殴打相比，那算是很轻很轻的。1966 年文革开始后，这样重的处理还被说成是他们受到了"包庇"。汪一净和其他几个 1964 年被撤职的人又被抓回六中，关进了"劳改所"。

当天晚上，王光华和跟他一起去"串连"的学生都被关在那个监狱里。半夜，王光华呼吸急促，生命垂危。但是，第二天上午，他再次被毒打。下午，王光华死了。

红卫兵没有通知王光华的母亲，直接叫来了火葬场的运尸车。被关在监狱里的四个老师一起把王光华的尸体抬了出去，抬到学校的前院。一位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死了的人好象比活着的时候重得多。他们抬着王光华的尸体走过夜色中的校园，觉得尸体非常沉重。他

们自己已经被关了两个多月。开始的时候，看到红卫兵把打人当乐趣，看到有人在监狱中被打死，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打死，非常紧张；后来，就变得麻木了。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出去时，他们甚至也觉不到害怕，他们好象已经丧失了感觉的能力。

火葬场来运尸体的人，见到王光华的尸体，说："这个小伙子身体够棒的。" 王光华的尸体是在北京东郊火葬场烧掉的。

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块钱，书包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都被几个红卫兵分了。王光华死了以后，六中红卫兵到王光华的家中，没有告诉家人王已经死了，却骑走了王光华的自行车。多日之后，六中红卫兵向王光华的母亲索取 28 块钱，告诉她这是王光华的火葬费。

王光华被打死后，和王光华一起去"串连"的其他学生，还被关在监狱里，遭到各种刑罚的折磨。他们被关到 10 月 2 日的半夜。

王光华是 9 月 28 日被打死的。两个月后，北京的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学红卫兵的不可一世的地位动摇了。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暴力行为受到惩罚，而是因为由高级干部子女发起和领导的中学红卫兵，开始和新起的正在攻击高层干部的大学生组织发生了冲突。六中红卫兵命令被关在监狱中的人为他们制造武器，用以攻打大学生组织。这些大学生组织受到了文革最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文革领导人曾经极其热情地支持中学红卫兵，毛泽东的妻子称他们是"小太阳"，但是这时开始抛弃他们。

1966 年 11 月 19 日，王光华被打死 82 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等人来到第六中学，解散了六中监狱。九个被关的教职员被带到公安局住了两个多星期后释放回家。其中有一位教导处副主任出狱一个月后就去世了。

文革进行了 11 年才宣告结束。王光华死了 12 年之后，1978 年，在第六中学，当年在"劳改所"里抬过他的尸体老师主持召开了他的追悼会。政府发给他的家人 400 元钱。

1998 年，在香港出版了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一书。在书中有一篇题为"关于制止武斗的一些情况"。陈伯达说"我约当时北京市负责人到北京市区一些地方，发现有私设的，立即解散这些私设公堂和拘所，立即放人。我还到过一些学校、机关处理这类事件。"在注解中，作注者特别指出了陈伯达到北京第六中学解散劳改所之事。

他们忘记了的是，陈伯达在 1966 年 9 月 6 日也去过一次第六中学。那一次，他是去热烈支持六中红卫兵的。那时候，六中的监狱已经建立了近一个月。而王光华被打死，是在陈伯达那一次到六中三个星期之后。文革领导人一手造成了 1966 年夏天的"红色恐怖"。数千名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被打伤致残，或者在遭到残酷折磨后自杀。三十年后，陈伯达的书隐瞒了王光华们的死，歪曲了文革的整个的大图景。杀害王光华和隐瞒忘却王光华的死，都出自文革领导人的无人性。

1996 年，有一位学者告诉我，关于王光华，他听一名前六中红卫兵说，王光华有劣迹，1966 年去上海"串连"时，强奸了上海的资本家的女儿。

我向单承佐老师问起了这件事。单老师 1951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66 年时是北京六中的教导处副主任。他曾经被关在六中的红卫兵监狱中一百多天。文革后他担任过六中校长，1996 年退休。他是一个非常平和稳重的人。谈起文革往事，尽管他自己身受重害，他却说得非常平静而客观。也许是他的职业和经历造就了这种如此自我克制和谦逊的性格。可是当我提起关于王光华的这个说法时，他一震，愤怒的火花闪过了他的眼睛。他说："这完全是胡说。在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给他找了那么些罪名，也没有这一条。怎么在三十年后，造出这样的谣言！"

显然，单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

王光华被打死的时候，只有 19 岁。三十年后的关于他的死的记录和说法，能使他的灵魂安宁吗？能使我们的灵魂安宁吗？

****

谋杀——写给王光华同学

作者：木船

死亡的帮凶，似乎与你

一样年轻，却带着狰狞面具

四面逼近。从黑色的网

一寸寸地，抽出绳索，一丝丝

冷冷地观看，你的心

如何变得青紫，又如何

缩紧

巨掌在慢慢收拢，如冰刀般地

尖利，将你和惨痛

搓揉在一起，从活着的躯体

一滴滴，挤出生命汁液

一分分地浇灌，这片疯狂的

褐色土地

三十四年岁月，缓缓地

移过，无辜灵魂，依然是

十九岁的年纪，你终于飘在

蓝色透明的天空

象是一朵

自由的

云

凶手，已行将衰老，继续

以彩笔,涂抹着现场的

血迹，高亢的音调

日渐虚弱，却始终歌着

嗜血的青春，

毫无悔意。

只在午夜，那混浊的

眼珠，会看到你穿透黑夜的

真正年轻、发亮的眼睛。看到你

捧着那颗滚烫的心，你永恒地

站在那里，没有

一点声音，仿佛

还期待着，能照亮兽穴的

一个角落，将人的良知

轻轻唤醒。

我

无法面对，你冰雪般的

纯净，我要道破，一个

埋藏几十年的

心中隐密：阴谋的

编织，是有他，有她。

可是我

我也并没有远离

罪恶的阴影

当你的上空在迸裂坍塌，我

没有向你伸出自己的手，而是

怯弱地屈从了

乌云的重压，暴力的

酝酿中，我已经闻到足够的

血腥。可是我

还是以可耻的沉默

同谋了他们

对你的

谋杀。

注：王光华，北京中学生，因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于 1966 年 9 月 28 日被十几个北京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队员毒打致死。当夜，被焚尸灭迹。

医生和所谓"里通外国"

王中方，男，1913 年生，福州人，1941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文革前是福建医学院临床内科教授，临床内科教研室主任。1968 年 7 月王中方被"隔离审查"，罪名是"里通外国""特务嫌疑"。1969 年 4 月 28 日王中方在被关的地方死亡。学院当局通知家属王中方"割颈动脉自杀"。没有准许家属看到尸体。家属不相信他自杀。

林庆雷，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

医生的职业，是超乎党派、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没有神经正常的人会把医生当作敌对势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医生受到"斗争"和迫害。王中方医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医生 1941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这是由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好的现代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福建开诊所当医生。1950 年代，私人医院被取消，他成为福建医学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每月工资 240 元。

王中方作为教授和医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攻击。1968 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在全国开始疯狂的"挖"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当时个单位都自设牢房，把单位里的"审查对象"关押起来，而且使用刑讯逼供。据说，福建省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被打得受不了，招供出来一个 200 多人的"反共救国军"。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来审讯。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王中方的哥哥住在美国，他比其他人还多了一条罪名，是"里通外国"。"里通外国"在文革中被列为主要重罪之一。这是从古代留下来的一个词语。"里通外国"的原意是说帮助敌对国家作危害本国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实际上连一般的和国外的亲戚通信通电话都作不到。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中方犯有这项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关起来，然后找证据，如果找不到，就长期关押这个人，刑讯逼供。 1968 年 7 月，王中方在医学院被宣布"隔离"。接着，学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里抄家。因为是医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里。"造反派"在他的家里，把地面掘开，掘了六尺深，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家当时连收音机都没有一个。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邻居的家，说邻居是王中方的收发报员。邻居家有一个收音机，他们硬说这是从事"特务"活动的收发报机。从福建省电台叫来了一个工程师，叫他鉴定这个收音机，证明这是当"特务"使用的"收发报机"。那位工程师看到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民用收音机，闭口不说话。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这不是"收发报机"，但是不肯认错，就在这个收音机上贴了一个封条，离开了。

王中方被关押。这就是当时人们俗称的"关牛棚"。他家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这是 1968 年的"隔离审查"最残酷的一个方面。一般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允许家人见面。但是大量被"隔离审查"的人却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准家人见面或者通信。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的每一个"单位"发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觉得这好象是一种原该如此的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当我们在申明被关在"牛棚"里的人是无罪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建立这"牛棚"本身是一种大的犯罪。

王中方从 1968 年被关到了 1969 年。九个月过去了。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家中只有上中学的儿女。1969 年 4 月 29 日，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说，王中方在"隔离审查"的地方自杀了。他的妻子要求看尸体，但是不准许她看她丈夫的尸体。她问是以什么方式自杀的，他们说，他是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了颈动脉，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尸体立刻被焚化了。

王中方的妻子从来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杀的。她说，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许自杀。再说，王中方死亡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九个月了，如果他想自杀，为什么不早一点自杀？如果他是自杀的，为什么不给妻子孩子写一封遗书？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杀，为什么不让她看他的尸体？她坚决相信王中方是在被关押的地方被那些"审查"他的人刑讯逼供打死的。但是，当时王中方被当作"畏罪自杀"，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取证。

在文革后，虽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纸"平反书"，但是，当时"审查"他的文字记录是不开放的，调查也仍然不能进行。胡耀邦实行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在全国，都不允许受难者家属追查他们亲人在

监禁中的死亡经过。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后，也没有打人的人受到惩罚。 这个"里通外国"案，不但害死了王中方。林庆雷，也是福建医学院的内科医生，他比王中方年轻，当时是主治医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他也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林庆雷也在审查中被宣告"自杀"。在福建医学院，仅仅为这一个案件，就造成了六名医生的死亡。这六为医生分属内科、外科和脑神经科。这些医生选择救死扶伤为职业，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成为合格的医生。在缺乏训练良好的医生的中国，他们更显得宝贵。但是他们就被这"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残酷地整死了。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岳，是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他没有像哥哥那样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关押了好几年，1974 年才被"解放"（这是文革时代当局使用的说法。这个说法表明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力先监禁压迫人，然后恩赐一个"解放"。

但是当时没有人敢质疑这种说法。后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一点。相反，文革后的官方报纸继续宣传要"感谢党"来给人"平反"，却不问最早是谁造成了灾难。）王岳也不是被关在正式监狱中，是单位里的"土专政"。他的罪名也是"里通外国"。他的"里通外国"也一样荒唐可笑，但是当时无人能质疑，现在也没有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里通外国"案件作出解释和分析。

王岳在 1943 年到美国留学。他的导师 SELMAN ABRAHAM WAKSMAN 是链霉素的发明者，在制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岳是他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中国。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于乌克兰，在 1916 年成为美国公民。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的 RUTGERS 大学教授，经过十年的努力，发明了链霉素。这是在抗菌素青霉素发明之后发展出来的第一个抗菌素。链霉素对于治疗肺结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链霉素之后，WAKSMAN 教授还发明了别的抗菌素，对治疗人类疾病有伟大贡献。由于 WAKSMAN 教授的成就，他在 1952 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王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也是 WAKSMAN 教授正在链霉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王岳回国后也从事抗菌素的研制。在 1960 年代初，在中国国内研制"庆大霉素"的时候，王岳曾经写信给他的导师求教。据说他写信还预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与美国人通信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实际并不享受这样的自由。WOKSMAN 教授给往日的学生回信，和他讨论抗菌素的研制，并且提供了资料。文革中，王岳遭到"斗争"。王岳和 WAKSMAN 教授的通信，成为他"里通外国"的罪证。

王岳的罪证是由他的"专案组"罗织的。但是"里通外国"成为文革的重要打击目标，是由文革领导人制定的。1967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条"的，第一条就与此有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

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

这个文件编码是"中发[67]19 号"。文革时代，这类文件指导文革运动，具有高于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为犯有"里通外国罪"受到迫害，显然首先是由于这个"公安六条"第一条的作用。

现在，我们会无论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逻辑：王岳和他的美国导师通信讨论制造抗菌素，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罪"。难道他们把"里通外国罪"定义为"和外国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导师通信这件事情上，第一，这是一些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和政治无关。第二，这绝对不可能和"出卖情报""盗窃国家机密"有关，因为讨论的双方，王岳和他的教授 WAKSMAN，后者比他对抗菌素懂得多，美国的医药业也远比中国发达，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王岳可能从 WAKSMAN 教授得到资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为结果，王岳领导制造了新的抗菌素，对千千万万中国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帮助。对这样的贡献，应该大力奖励赞美才是。但是在中国，在文革中，王岳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

这是疯狂残酷的举动，然而，不能仅仅归因于福建某些人的愚昧和虐待狂。因为这是文革的大方向决定的。

这不仅是发生在王中方和王岳身上的故事。实际上，从文革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所谓"里通外国"的疯狂侦探和处罚，是为了把中国人和世界绝对隔绝开来，是为了愚弄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别的社会制度和别的生活方式，不让人民知道在别处有比较好的生活。对于外国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处的东西，比如电视等家用电器和先进的药物，中国当局没有兴趣学习引进。他们打击现代医学，"斗争"医生，把医院从北京赶走，用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毫不相干的名义。在他们设计的新社会里，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仅仅受过非常少的医学训练的"赤脚医生"，和世界的先进医疗技术无关。文革当局告诉人民，针灸和草药就能治病。回到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却清楚作出来的主张。迫害医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在这个网页上，关于医生，已经有了上海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陆瘦燕医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黄骅县歧口卫生院的王炳尧医生的故事；有北京陆军医院的刘浩医生的故事；有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协和医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有的是笔者和朋友了解到的，有的是网页的读者提供的。

在中国古代小说《三国演义》里，描写了医生华陀，他在民间行医，受到尊敬。当关云长中了毒箭，他给关云长刮骨疗创，治愈了关云长的手臂。这一小说里的著名片断塑造了能忍耐疼痛的将军关云长和医术高明的医生华陀两个英雄。后来，华陀被残酷多疑的曹操请去治疗曹操的头痛病。曹操疑心华陀的治疗方法是要谋害他，下令杀死了华陀。曹操的残酷在于，如果他怀疑华陀的医疗方法，他可以不接受华陀的治疗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把给千万人治病

的受人尊敬的医生杀死。杀死华陀是一种罪恶。所以在小说里曹操被当作一个多疑和残忍的反面典型。《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故事也许并非确凿的真事，但是，从中传达的道德判断是非常清楚的。

文革杀害的，不是一个两个医生。据笔者的调查，在每一个医院，都有医生被"斗争"和"隔离"，相当数量的医生被整死。但是文革在这方面的罪恶，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和记述。

王岳活了下来。1985 年，他访问了美国。他见到了导师的儿子，却没有能再见到他的导师。WAKSMAN 教授已经在 1968 年去世，享年 80 岁。他去世的时候，王岳正被关在"牛棚"里，不但不能为导师之死哀悼，反而正在为他们的通信而惨遭虐待。

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经使用过抗菌素治疗疾病。在抗菌素后面发生过的这些故事，跟健康虽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值得被知道。这些悲惨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疗的，需要别的有效的疗救方法。

一个医生的遭遇

王祖德是个医生。

他 1938 年生于上海，1949 年小学毕业，1955 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那年他实足 16 岁。王祖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医生。在 1949 年以前，开过私人诊所。五十年代后，私人诊所不允许存在了，他们进了国有医院。

王祖德在医学院念书时，逢上了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当时是个刚满 18 岁的青年，还很天真。他觉得自己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更不是一个会介入政治的人。在所谓"鸣放"时期，他没有写过大字报。只是在会议上，他对班里选班干部六人选六人的方式有过批评，认为等额选举的方式让人心理上觉得不民主。在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章伯均被整成"右派份子"后，他也提出过疑问：这样搞的话，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看到班里他的要好同学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不由地在"批判会"上为他们辩解。因为这些，他几乎被定成"右派份子"。当时，他就读的大班六十个同学中，已有五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仅仅因为"右派份子"的名额指标已"满"，他才得以幸存于"右派"之外。但他仍然是一个被"内部掌握"的"右派边缘分子"。到了文革，这些材料被抛出来，他就被称为"漏网右派"。

毕业时，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同学都被送去"劳动改造"。像王祖德这样虽然没有划成"右派"但被认为"有问题"的毕业生，在毕业生分配的红榜上没有名字。他们待分配了一段，才作为另类处理，分配了工作。王祖德被高教局分配到同济大学医务所。他清楚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个医生。

文革开始，1966 年，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医生就受到冲击，他们的家被查抄。王熊飞当时是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的医生，而且是个在浦东有名的好医生。他医术高明，工作积极，还当过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是文革来了，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敌人。1966 年 6 月，《人民日报》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王熊飞医生的年龄和职业地位，使他立即成了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他的儿子则稍后。

王祖德自己是医生，父母是医生。在医生圈子里，王祖德听说，毛泽东因中风瘫痪，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为他针灸治疗。他对弟弟讲起过这件事。弟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无意间告诉了朋友。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不仅他弟弟成了"反动学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却立即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先是学校里贴出了有关此事的大字报，后来又"揭发"出他 1957 年的"漏网右派"问题，再"揭发"出他平日有过的一些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1968 年一月，他被关进同济大学"学六楼"，遭到当时的所谓"隔离审查"。

"学六楼"现在已经拆掉，位置在现在的留学生楼旁边。学六楼在 1968 年被用来关押被"隔离审查"的人。王祖德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后来被"隔离"的老师越来越多，陆陆续续关进来，一个人一间，两层全关满了。后来的同济校长李国豪教授也曾被关在里面。二楼的窗上还造起了铁丝网。

当时掌管同济大学的是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叫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代表、 "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作的第一

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在学校中不经法律程序关押人甚至打死人，从 1966 年就已经开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这一套做法更加体系化和权威化。他们用整座楼来关押和审讯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和"阶级敌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在王祖德被关押期间，一系列由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签发的文件下达到各地，指导如何确定斗争对象，如何审讯，如何组织斗争会，如何定罪等等。从 1968 年初，开始了文革中历时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轮迫害高潮。在同济大学，王祖德医生首先被关了起来。

王祖德被"隔离"期间，几乎每一天都被审讯逼问，而且被殴打侮辱。整他的主要是学生，也有医务所的一些人。那时大学生都不上课，其中参加所谓"专案组"的人，夜间审讯可享受免费宵夜，还有机会用公款旅行作所谓"外调"。这些人没完没了地要他写"交代"，包括要他"交代"1960 年到同济大学以后，八年来有过的"反动思想"和说过的"反动话"，等等。王祖德坦然地面对了自己的"问题"，对自己说过的话，他都承认了，从 1957 年学生时代的言论，到有关毛泽东健康的议论。他希望，讲清楚之后，该怎么了结就怎么了结。

可是，整人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搞清问题"。折磨和整治一个活人，这本身成为这些人的乐趣和目标。同时，他们一心要把王医生的事情搞成一个"反革命大案"，作为他们进行"对敌斗争"的大功劳。那时每抓出一个"阶级敌人"或者"反革命集团"，学校里就贴出大标语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专案组"无休无止，提出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要王祖德交出武器，还有发报机。同济大学的人到王祖德家数次搜查，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他们不满足于整治王祖德一个人，开始迫害他的整个家庭。他们说王祖德家是个"小台湾"，是个特务机构。他们还把他的父亲王熊飞绑架到同济大学，就"隔离"在王祖德附近的房间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和谈话。但是父子能互相听得见被打的时候发出的惨叫。这对王祖德是极大的刺激和折磨。

到 1968 年 9 月，王祖德已经被"隔离"了 8 个月。王祖德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地"斗"，也不断被殴打。他一次又一次数小时在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以"坐飞机"（指低头弯腰，双臂被折向后面）的姿势被"斗争"。几个月下来，他已经被打得不象人样子了。整整 8 个月，除了审讯和"斗争"他的人，他不能见到任何亲人和朋友。他能听到的唯一来自家人的声音，是父亲被打的惨叫声。在长期的肉体和心理的摧残中，他绝望了。他把绳子挂在"隔离室"的门框上，试图吊死自己，但是绳子断了，他没有死成。

在绝望和愤怒中，他作了两件特别的事情。在一次要交"交代材料"的时候，写上了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两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觉得宁愿死，他再也不愿意这样活下去。他写下的白居易诗句当然被视为是一种反抗，因此招来了打手们更残酷的殴打。此后，他用一节被打断了的眼镜柄，在墙上划了一些道道。（他在隔离室中被打的时候，眼镜框子被打断，断下很尖的一段。）他叫来"专案组"的人，说这是他写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他不愿意活了，他宁愿被关进监狱，他宁愿被枪毙。就这样，同济大学当局报告上海公安局要求逮捕他。1968 年 9 月，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开了"批斗会"，宣布他被逮捕。他随即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被逮捕之前，他们再次毒打了他，他瘸着腿带着满身伤痕进了看守所。那时他 30 岁。

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她死的时候，20 岁。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 58 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 60 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 1969 年。

在上海，在 1968 到 1969 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个。这是上海的残忍，也是文革的残忍。

王祖德被关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二楼。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王造时被关在一楼，王造时后来死在狱中。看守所里半夜也有人惨叫，肯定是在用刑。对他的审讯很快，因为他只希望速速了结，承认了所有的指控，包括当时最可怕的罪行：写反动标语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判决过程很快，因为那时没有法院和检察院的分工,没有辩护也没有上诉这些程序。在看守所关了两个月后，宣判他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刑 12 年。

宣判后，他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那里有十个监房。他被关在三号监。三号监有五层，每层有 99 个房间。主要都是"反革命犯"。当时监狱里的犯人分两类，一类是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算是后一类。王祖德是医生，监狱当局让他在监狱里给犯人看病。作为医生，他登记过成千上万个反革命犯的名字。这些人被抓进监狱，又被送往青海、新疆和安徽。

被判刑之后，他才第一次被容许家人探望，才第一次知道亲人的惨死。他的妻子是他在大学的同班同学，在他被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来送东西，可是不准见面。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 7 岁，一个才 1 岁。他的妻子表示愿意等他。可是后来迫于压力，也为了孩子少受牵连，她提出离婚。他平静地同意了妻子的离婚要求。

他是医生，他凭着多年来作为医生的本能，继续在尽力为病人服务，也全力抢救过垂危的人，在他眼里，所有的病人，不论他是不是犯人，都是必须救助的生命。他救活了一些人，也有很多没有救过来。1974 年，他被减刑释放，但是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一个劳改单位，劳动仪表厂，作为"留场人员"工作。他说他自己的心情一直处于彻底的绝望之中，只是那种绝望感很难表述。

毛泽东在 1976 年死了。又过了两年半，1979 年 1 月，王祖德全家被作为"冤案"得到"平反"。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也都得到了"昭雪"，可是，去世十多年的他们，听不到这一切了。同济大学在当年逮捕他的同一个大礼堂开会，给王祖德"平反"，他也在那个时候回到了同济大学工作。可是，他已经家破人亡。

如此惨烈的一家人的悲剧，究竟为了什么？

毛泽东五十年代中风，这究竟算什么秘密！？其实这在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就已经被提到。1957 年 11 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不能站着讲，他就此作了解释。这个讲话在文革中也流传过，作为"反帝反修"的"伟大文件"。就是在这个讲话中，他说不怕发生战争，因为中国有六亿人，打死三亿还有三亿。这个说法震惊了世界，因为不但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们无论如何不敢对他们的选民说这样的话，而且刚批判了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也觉得太疯狂。但是毛泽东这样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被认为是有气派。三亿人的生死可以由一人来定，还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极大不幸。

王祖德在私人谈话中提到了毛泽东中风，就被定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所谓对高层领导的"恶毒攻击"，当时被当作最严重的罪名。对王医生的这种定罪方式，是同济大学某些人一手造成的，同时，也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案例在当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例如，在北京大学，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例如，在湖南省津市涔澹劳改农场，1969 年关入一个姓傅的农民，他四十岁得了第一个儿子，高兴万分，他抱着婴儿不会唱儿歌，就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改唱成"东方红，太阳升，我家出了个傅毛毛（儿子的小名）"。为此，这个人被判刑 7 年。文革时代的公安局和法院把"恶毒攻击毛主席"简称"恶攻罪"。这种"恶攻罪"甚至导致许多人被枪决，例如，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说的话，被作为"恶毒攻击毛主席"。陆洪恩在 1968 年被判处死刑遭到枪杀。

王祖德医生，郑培蒂老师，这位姓傅的农民，音乐指挥陆洪恩，以及那些犯了"恶攻罪"的人们，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唱的歌，对毛泽东何损之有？但是，为了个别人的无上权威的确立，王祖德医生和类似的案件中的普通人，就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灾祸。为一句毛泽东请陆瘦燕医生针灸的传言，王祖德的一家，被害死了三个人，没死的也被整得死去活来。

曾为毛泽东针灸的医生陆瘦燕，也在文革中被害死。陆瘦燕是上海中医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医师。1969 年 3 月，陆医生被"隔离审查"。他被批斗逼供。1969 年 4 月 27 日，陆瘦燕死在"隔离审查"中。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来，他们的努力带来了医学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品质。他们是可尊敬的一个社会群体。但是，当政治的癌症了控制社会的时候，医生和所有的人都一起遭难，无法幸免。

了解王祖德医生的人说，80 年代他平反回到同济大学，后来当了校医院的院长，他宽宏大度，居然仍能与迫害他的人共事而且一视同仁地对待这帮人，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

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王祖德医生的遭遇的简单梗概。仅仅就是这梗概，也让笔者多次

在电脑键盘上停下手来，悲愤难抑，无法继续。事实上，王祖德医生遭受的外在的和内心的折磨和痛苦，一定远远多于此。他是一个医生，这使人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俄国人写的一部关于医生和革命的长篇巨作。文革在迫害人方面的严密程度和严厉程度，都史无前例。因此，和王祖德医生的悲惨遭遇相比，日瓦戈医生留下的诗和书信，以及那位替他保存了诗稿的兄弟，都显得几乎像是无法遥望的"奢侈"了。但是人类忍耐和追求的力量也许是相通的。希望有一天，王祖德医生会写出他的外在的和内心的历程，作为历史和人性的见证。

校园"劳改队"的建立和吴兴华之死

吴兴华，男，北京大学英语教授。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2 年"摘帽"。文革中被划入"劳改队"并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殴打和抄家。 1966 年 8 月 3 日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被说成是"装死"。当天夜里去世。红卫兵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不顾吴的妻子反对，命令医生解剖了尸体。吴兴华生于 1921 年，死时 45 岁。

吴兴华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郭蕊，曾经在文革之后的 1986 年发表一篇题为《从诗人到翻译家的道路－－为亡友吴兴华画像》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吴兴华的家世，早年的聪慧，大学时代的友情，后来的写作和翻译等等，相当细致生动，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形象。但是，对于他在文革中的死，却含糊其词，令外人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也没有提到他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

这样的写法显然是当时出版审查所要求的。这种写法是当时的通例。但是发表的描写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文章都用这样的写法。当局一直对如何描写文革有严格的控制。在八十年代的一批关于文革死难者的文章中，都主要写死难者生前是一个好人（当然在什么是"好人"方面有一些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提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起了给死者"平反"的作用，比起文革时代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迫害和杀害，这当然是极其大的进步。而不准提他们的死亡经过，是为了掩盖文革的历史以避免深究文革领导者的责任与产生文革的根源，也很明显。

吴兴华的才华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

吴兴华原为燕京大学的英语教授，1952 年北京大学从市内搬到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吞并了燕京大学。吴兴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系主任。1957 年，吴兴华被打成"右派份子"，降了两级。五年以后，1962 年他被摘了"帽子"，仍在西语系工作。四年以后，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是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起源地。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下令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当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接着，"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执掌校政，领导开展对大学原领导人和教师的攻击。全国学校停课，以北京大学为样板进行文革。

工作组很快就制定了打击对象，并用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和召开斗争会的方式推进文革。6

月 11 日，历史系副教授汪钱（＋竹字头）在学生和工作组的"斗争"后，在家中锁上房门服用"敌敌畏"自杀。死前非常痛苦，呻吟嚎叫，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也是同事还听到了这些恐怖的声音。两年以后，1968 年 6 月 24 日，化学系的老师卢锡锟自杀，也是服毒，死后人们看到他一定是由于非常痛苦，用刀把自己的手臂砍烂了。

这样恐怖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同情和善心。1966 年 6 月 18 日，未向工作组报告，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校工就用暴力"斗争"已经被"揪出"的几十个干部和教员。高帽子，下跪，都被使用了。中文系的学生把厕所的大便纸篓扣在系领导人程贤策和向景洁头上，把他们打得满身青紫。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生物系讲师胡寿文的脖子上，拉倒在地，拖了就走。胡被勒得几乎不能呼吸。他尽力用手拉住绳子套，才免于窒息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当晚北京大学工作组开始反对这样的行动。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维护工作组的绝对领导，而不是出于对法制和人道的考虑。随后，在北京主持领导文革的刘少奇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像北大工作组一样，制止"乱斗"。

"不乱"的"斗"继续大规模地进行，有序而无情。工作组对所有的教师和干部作了"排队"，把他们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宣布了一批"有问题的人"的名单，他们不被准许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当时全天除了"学毛选"就是开会。）而被命令聚合在一起作体力劳动。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每个学校都建立了的"劳改队"，又叫"专政队"或者"牛鬼蛇神队"的早期雏形。

董怀允，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被贴大字报和批判斗争，并被打入这样的雏形"劳改队"，不能忍受，在 1966 年 7 月 28 日自杀。

1966 年 7 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 ，毛称北京大学 6 月 18 日的行动是"革命的"。毛下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到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在大会主席台上用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对"牛鬼蛇神"的全面暴力迫害开始了。

工作组被撤，聂元梓在北京大学掌权。一份在文革时代写下的"北大文革大事记"说：

1966 年 7 月 27 日，聂元梓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出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倡议，得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的欢迎和响应。另外，在聂元梓同志的倡议下，黑帮份子被革命师生员工揪了出来，实行监督劳动。

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吴兴华被打入"劳改队"中。

1968 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著名的"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

用。

当时还有来自各地的大量红卫兵到北京大学 "学习革命经验"和进行"革命串连"。火车和公共汽车都不向红卫兵收票。每日到北京大学来的可能有上万人。一批"劳改队"中教师，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有他们的罪名和姓名，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大叉子，被强迫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门口拣拾垃圾。那里来往人多，随时会被打或被侮辱。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了头发，拎着一只破筐拣西瓜皮。每来一拨要"斗争"他的学生，他就站在一只反扣过来的水果筐子上，被强迫"自报罪行"，或者被打。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七八次。

"劳改队"里的"牛鬼蛇神"不能抗议这样的虐待。"劳改队"外也没有人试图制止这类行为。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一个外国人，用结结巴巴的中国画，劝说红卫兵："你们不要打他们。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没有人听他的。虽然人们都知道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是对"劳改队"中的人，惩罚是无边的，不用遵循任何法律。

在"劳改队"中的人也被抄家，被封房子，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已经挨过红卫兵的打。

8 月 3 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又昏倒。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半夜，他的妻子被叫来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死了，死于急性痢疾。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吴兴华的尸体被解剖。

这种对死者的凶恶的手段不只是单独施用于吴兴华的。同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谢家荣被"斗争"后，写了遗书，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在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被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也是非常大的罪名。自杀死了的人还被诅咒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而且会株连家人。谢家荣的家人立即销毁了他的遗书，告诉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权力当局他是心脏病发作死去的。谢家荣还是被怀疑是自杀的，并被送上了解剖台。医生剖开了尸体后，说他不是自杀的。但是那些人认定谢家荣是"牛鬼蛇神"，他的尸体被切开了，不容缝上，就被拉走火化。直到三十年后，谢家人才公布了真相，说出了那张被烧了的遗书。

自杀能变成罪名，解剖尸体不是为了医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自杀这一"罪名"。1966 年夏天的杀戮，就是这样地穷凶极恶，不但整死了人，连尸体都不放过。

吴兴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写过和翻译过一些美丽的诗，他编写的英文教材也是极好的。他本来应该有平静而多产的学者的一生。可是他被打了，被侮辱了，被害死了。在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被切开了。他死了三十年后，有人问他的家人，在他死后，他们有没有问是谁强迫他喝了沟里的污水，应该追查这样的坏人。他的家人说，那时候，是他们被逼问吴兴华是

不是自杀的，而不是他们可以问问题。他们只能申辩无辜和乞求不要剖尸。那时候，红卫兵掌有生死大权，更掌有控制话语走向的大权。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6 年 8 月 24 日，另一位英语教授余大因（＋丝字边旁），在被抄家殴打侮辱后，上吊自杀。中国最好最流行的英语教材，前面几册是许国璋写的，最后一册是她写的。1968 年，吴兴华去世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

当吴兴华在"劳改队"被害死的时候，家属不能调查他是怎么被害 的。他被害死去，他的身体在他死后还被切解。在吴兴华死后二十年时，关于他的悼念文章还不能写出他是被害的。他的死和死后的遭遇，都和文革竟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希望在电脑网络上，关于他的死亡，能作一个真实的记载。

严双光之死

严双光，男，1929 年出生，四川成都 132 工厂（现在已经改名为峨嵋 XX 厂） 工程师。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1971 年 9 月 8 日在兰州空军司令部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被打死。家属见到尸体时，看到他身子肿胀，嘴里只剩了一颗牙。他被打死时 42 岁。 1996 年，笔者曾经访问严双光的弟弟严四光先生。他介绍了严双光之死。

2001 年，笔者在电脑网上读到了《严济慈先生访谈录》（金涛，中国科技史料 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 年，第 20 卷，第 3 期， Vo1.20， No.3，1999，可见于网上"新语丝文库"，www.xys.org ），其中说到严济慈的第二个儿子严双光怎么在文革中被打死。

严济慈生于 1900 年，浙江省东阳县人，到法国留学学习物理学。他是把西方现代物理学引进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文革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在这个很长的《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中，有一段是关于他的儿子严双光的。

（文革中）"最要命的事情是我的二儿子双光，他在成都 132 厂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是副总冶金师，没有总冶金师。132 厂是苏联帮助建的，设备都是苏联提供的。据说他是看不惯厂里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造反派对他恨之入骨。他有一阵子逃了出来，在外面流浪一年半，也不敢回家。后来回家，造反派半夜三更派人抓他，他从火车上跳车跑了回来。以后他以为形势好些了，自己又回到厂里，结果被造反派关起来活活折磨而死。1971 年 9 月 7 日，我们接到双光已死的电话，我同四光火速赶到成都，双光躺在一领芦席下面，遍体鳞伤，嘴里只剩下一颗牙……造反派不让我们看尸体……那时赵紫阳在四川，我在成都见了赵紫阳，希望他过问此事。直到 1981 年双光的事才得以解决，给他开了追悼会。"

这段谈话的记录中有两处删节号，原文如此，这一定是因为严济慈当时非常难过，甚至哽咽流泪，才造成这样的不连续。这也造成了没有说清楚在"造反派不让我们看尸体"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又看到了尸体，并知道他的儿子"双光躺在一领芦席下面，遍体鳞伤，嘴里只剩下一颗牙……"。但是他一定是看到了，否则不能有这样的细节，特别是"嘴里只剩下一颗牙"这样的细致观察。对一位父亲来说，这是痛彻肺腑的记忆。

笔者访问过这里所提到的"四光"，也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他告诉了我他了解的严双光之死，比严济慈在这里说的详细。

因为也看到《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严双光的儿子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很是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的同学曾经严小雄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在小学和中学里，严小雄的同学听说的是：他的父亲去世了，因为在作化学试验的时候出了事故。他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被文革害死的，一直以为他是死于工作试验事故的。

对于对文革时代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人被害死了，不但完全不可能诉诸于法律伸张正义，还蒙受可怕的罪名，并且连累家属。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可能，人们都尽量隐瞒这样的事情，比如，用这里采用的方法，把被谋害说成是死于偶然的事故。特别是，严双光的儿子只有 9 岁。这样的方式对孩子来说，在当时是最有利的。

严双光的孩子在那时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爷爷奶奶在北京，他们养大了他，并编造了关于他父亲之死的故事来保护他。但是，即使在今天，偶然发现这种向儿子隐瞒父亲之死的故事，使人不禁对严双光之死又增添了一份悲愤之感。

《严济慈先生访谈录》中关于严双光的叙述比较简略。以下是笔者对他的弟弟严四光的采访记录。采访时间是 1996 年 6 月 19 日。采访地点是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严双光 1929 年生在法国，1952 年南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昌 320 飞机厂，这个飞机厂原来是蒋介石时代由德国人帮助建立的飞机修理厂。严双光参加过制造第一架飞机"新中国青年号"。这架飞机现在放在北京小汤山航空博物馆。1959 年，严双光被调到四川成都 132 厂。这是由苏联援建的一百多个工厂之一。严双光在南昌时是中心实验室主任，到成都后是厂里的副总冶金师。当时实行苏联的"一长四师制"，即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冶金师、总设计师负责制。文革起来，他被"批斗"，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都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厂里打得一塌糊涂，两派用飞机上的机关炮互相打。他离开了工厂。後来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牛师长在街上被杀，说是跟他有关系，还说他是武斗的幕后指挥，其实他当时根本不在四川。"造反派"在全国通缉捉拿他。在秦岭上，他被抓住，他告诉抓住他的人说，他若被送回成都一定没有命。抓住他的人後来把他放了，对外说他能飞檐走壁，逃走了。因为他生在法国，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也是文革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1971 年，他被关在兰州空军司令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忽然说他死了，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知道。我和小弟弟去料理后事，看了，嘴里只有一颗牙。身体上看不到明显的伤口，但是身子肿胀，听说是用铁链子裹着塑料皮打的，所以成这个样子。那里的墙上、地上，都写着很大的墨笔字："打倒严双光"。

他是 1971 年 9 月 7 日死的。我们是 9 月 10 日到的。跟我们接谈的军人，几天后突然不见了。因为 9 月 13 日发生了林彪事件，他们和林彪有关系，被关起来了。後来，那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管人被关到北京秦城监狱（秦城是北京郊区一个专门用来关押高级干部和特殊的政治性犯人的监狱。）。我们要去问那个人双光是怎么死的。到了秦城，办了手续，等了几个钟头，监狱的一个主管人员出来了，问我们来作什么。我说：我哥哥被他整死了。那人问："就是一个人？"意思是一个人不算什么严重的事情。那口气和那表情我永远忘不了。他认为只是一个人的死，不值得问。一个人被打死被当作小事情。不让见。我们只说了一个人被整死，就是那个人亲手杀死的，也轮不到提起。

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害死人的事情太多了。

1978 年胡耀邦过问此事。当时赵紫阳是四川省委书记，给他平了反。写 "结论"时，说他是"好党员，好干部"，什么好词都放上了。

双光留下一儿一女，爷爷奶奶养大的。

双光在建厂过程中，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主张质量第一。没有听他的。结果，一个飞机厂，贴进了四个厂的钱。厂房都推倒了两次重建。试飞摔掉很多飞机。

听说他被关在"学习班"里，是用机关枪押着的。被毒打以后，又押去"批斗"，上楼梯时

倒下来，死了。

是军队干部整死了他。

以上是严双光的弟弟严四光讲述的关于严双光的故事。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严双光 37 岁，正是年富力强又有经验的工程师。从 1966 到 1971，是文革最残酷激烈的时候，他被打死。用几年的时间，迫害死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厂的领导人，除了满足一些人的权力欲和虐待狂以外，对社会和人民有何益处？而且，不管他是谁，打死他都是大犯罪。但是这不仅仅是打死了他和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还因为"不可杀人"这一最重要的社会信条被破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为了自保，也要学会害人。在这中间，有一大批人不事生产，不作工作，在 10 年文革中长长短短地充当打手，手上染了别人的血。有一批人的灵魂受到了毒害，在这样残酷的迫害失去了良知，把别人的生命当视若弃履，甚至变成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当一个人的被谋害不能让社会成员呼吁社会公正，却迫使受害者家属忍气吞声，甚至掩盖血迹，强装欢颜，整个社会被毒化了。

当年，严四光的家人到秦城监狱去向那个军队干部调查他的死亡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就死了一个人？"因而被拒绝。那个时代在继续害死很多人的同时，不把一个人的死看作重要的事情。文革对生命的蔑视的价值观可能一直延伸到几十年后的人们的思想里。在文革后，在关于历史文字中，这样的一个一个的"一个人"依然几乎是永远被忽略不计的。象严双光这样的文革受难者，地位级别不够高，关于他的追悼会就不会见报。他的事迹又不被认为可以当作"反四人帮英雄"来宣传，所以也不会被报纸杂志纪念。这种对待历史和个人生命的价值观可能导致什么严重后果，是我们今天应该想的问题。

由于文革的受难者们被忽略不计，历史的大图景发生了大的歪曲。这几年来，有人开始质疑当年毛泽东给林彪的罪名："叛国投敌"与"篡党夺权"，试图修正对林彪的评价。这些罪名可能是没有足够事实根据的，也许林彪真的没有想要"叛国投敌"与"篡党夺权"。然而，我们要知道，林彪的真正的罪行，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人的残酷迫害，比如对严双光的迫害，在关于林彪的记载中，是一直没有被报告的。林彪得势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不会被记录；後来，在毛泽东对林彪的指控中也不会有这样的内容，因为这类迫害是文革的主调，在文革中只有不断强化而从来没有被否定过。在笔者看来，对历史的这种"修正"是远离事实也远离道德原则的。

在文革时代，严双光的真实故事没有被告诉他的儿子严小雄。严小雄在北京的爷爷家长大。当时在小学和中学里，就开始给学生建立以后要终生伴随的"档案"。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要填写表格，报告自己的家庭的"政治"情况。表格上有一栏，叫做父母的"政治面目"。这个学生的将来和现在，都要和父母的"政治面目"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小学生年纪小，有的学生不懂表格里的关于父母的"政治面目"一栏是什么意思。在严小雄的学校里，有的学生填了"饭店骨干"，有的学生填了"长方脸"－－因为以为是指父母的身体外貌。严小雄在表格上填的是他的爷爷以及爷爷的职务等等。人们问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他说是在作试验的时候死了。他的同学们把他的填表的特别性，和在"政治面目"一栏里填上"长方脸"以及"饭店骨干"这样可笑的事情都连在一起并且记住了。他们今天把这些事情这和文革时代对所谓"政治"的强调的荒唐连在一起，但也仍然没有想到严小雄的父亲有那么不幸的死亡故事。严小雄的父亲的

故事一点都不可笑，只是充满血腥。

因为他的中学同学的帮助，笔者後来找到了严双光的儿子严小雄。和他多次通信，了解到，他在进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了他父亲的死是一种什么样的死，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他的父亲也得到了"平反"。笔者寄给他上面的他的四叔的谈话记录，并且请他补充关于他父亲的死的事情。他说他不知道谁打死了他的父亲，也没有听说有人後来为此受到了惩罚。

当年，严济慈不得不向他的孙子隐瞒他的儿子是怎么被打死的，现在，应该是让真实的历史被记录和显示的时候了。

文革受难者杨朔

杨朔，1913－1968，作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在文革中杨朔被"批斗"，1968 年 8 月 3 日自杀。

杨朔可能是最为中国人知道名字和作品的作家之一，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印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因而得到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有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

文革开始后，杨朔的散文不再在语文教科书中。杨朔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斗争"。他在 1968 年 8 月 3 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死亡。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杨朔得到平反。

1980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是对文革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从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内部"存在一些"规则"：比如关于刘少奇（1966 年 8 月前最高权力圈子的第二号人物）和陶铸（1966 年 8 月后的第四号人物，1966 年底被"打倒"）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长。关于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

另外，在当时的报纸上，虽然登载了一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们的名字和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美德，但是对他们死亡过程本身则回避直接描述或者含糊其辞。报纸上有一则为杨朔平反的简短的消息。报道简单地说杨朔"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个"说法"，指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自杀身亡的人的情况。

文革中发生的大量自杀，无法找到历史上可比的情况，所以很难用现成的词语来描述。"被迫害致死"这种说法，比简单地说"自杀"要好，因为文革中的自杀远远不同于平常条件下的自杀。文革中自杀的人，在"斗争会"上被"斗争"，被咒骂，被打，被戴"高帽子"，被"游街"，被"挂黑牌"，被体罚，被侮辱，被恐吓，被关押，他们是在遭受了种种残酷的心理的和肉体的折磨之后自杀的。描述他们的死，必须强调指出他们死前身受的残酷的迫害，因为他们不是仅仅因为善感多愁过于敏感而自杀的，不是仅仅因为长期的忧郁或者一时的气愤而死的，也不是象屈原那样因为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与世人同醉而选择了自杀以表明个人意志。

但是，另一方面，"被迫害致死"这一表述回避说出"自杀"，会使以后的人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这种表述使得文革时代的恐怖比较模糊，减低了对文革事实的显影的清晰度。这显然也是这一表述那时被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因为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虽然否定文革，但是不愿意暴露太多的文革阴暗面。

文革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有词条"杨朔"。词条用一千多字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没有提到他的文革中的遭遇，也没有提他是怎么死的。这部书里其他的

人物词条，在文革中自杀的人，比如考古学家陈梦家，也都不说明这一点。

新一代的年轻的学生继续在教科书里读杨朔的文章。但是对他的死，可能完全不知道。

很多年过去了。1997 年出版的张光年的《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年版）写到了杨朔的死。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作词者，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该书第 259 页载 1975 年 11 月 12 日日记：

"晚杨朔的弟弟杨玉玮、杨朔女儿杨渡来访，严文井在座。玉玮细谈了杨朔因病逝世情况及他为此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谈了两小时。"

该书 263 页载同年 12 月 6 日日记：

"上午九时，与严文井、韦君宜、王志远同车到八宝山，参加杨朔同志移灵式……"

从这样的记载可以看出，在 1975 年，杨朔去世七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了一次骨灰重新安放的仪式。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的一个主要意义，是对他的"问题"的作了新的"结论"。这是因为在林彪死去、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之后，对文革中被"处理"的一部分人有了新的比较宽松的"政策"。不仅是杨朔一个人，有一批类似情况的共产党干部，在文革开始后受到"斗争"或者关押后自杀，他们自杀的时候，自杀本身就成为他们的一大严重罪状。在 1975 年，如果没有发现他们有别的"问题"，就给他们重新作了一次新的"没有问题"的"结论"。另外，他们早先死亡的时候，很多人的骨灰都被扔掉了，不准家属保留，当然更谈不上有葬礼，新的结论作出后，为他们举行了追思仪式。

在这个"移灵式"（这似乎不是当时所用的名称，可能是张光年沿用了他习惯的说法）之前，杨朔的弟弟和女儿与张光年以及另一负责人严文井谈话，大概就是为了这第二次结论的事情。可以看出，他们的意图很明显，说杨朔是服用安眠药过量而死的，是要说明杨朔并非自杀。他们作了调查，颇费了一番时间，要说服张光年和严文井。从张光年的记叙的口气来说，他未说是否信服这一说法，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他只是记载了这一段谈话。

这样的谈话可能很难被未经历过文革的读者理解。为什么在杨朔死了 7 年之后，他的家属要为他作这样的抗争。出现这样的谈话，是由文革的特定背景决定的。

在笔者所作的关于文革的调查之中，以下四个实例都相当有代表性，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杨朔的家属和张光年的那一场谈话，那个谈话的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1966 年 8 月 4 日，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队"中劳动时，被逼迫喝了校园中水沟里的污水，其中从附近化工厂排出废水，然后中毒昏倒，当天晚上死亡，时年 44 岁。但是北大那时的权力者硬说他是自杀的，是"对抗运动"，"畏罪自杀"。他们命令医院解剖尸体。在这种情况下，主导对话的题目是他是否自杀，而不是追究是什么人强迫他喝了污水而害死了他。

1966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谢家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斗争"（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他写下了遗书。家属发现他死亡时，也

看到了遗书。但是他们当即烧毁了遗书，报告说他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尽管如此，谢家荣还是被送上解剖台进行尸体解剖。解剖后医生作证说没有证据说他是自杀的。他被打开的胸腔还未缝合，就被拖走火葬。这样作，尸体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为自杀者会遭到的死后斗争。

李季谷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李因其"历史问题"被"审查"。7 月 25 日，他的专案组逼迫他"交代问题"，强迫他跪了一整天，并用燃烧的香烟多次烫他的后背和脖颈。审问延续到深夜。当天夜里，李季谷教授投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的丽娃河自杀身死。学校当局说他"畏罪自杀"，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因为李季谷已经身死，就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由历史系的另外两个也在被"审查"的"牛鬼蛇神"举着这张像站在台前，替他接受"批斗"。李季谷和杨朔的死日相隔不到 10 日。

吴伟能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干部。1968 年年底，他被办了"学习班"ーー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１９５９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吴伟能的父亲，1958 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据说吴伟能对别人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这被当作"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动言论"。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４日晚上，吴伟能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项罪名。虽然他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

人出自本能就热爱生命，愿意活而不愿意死。如果不是因为遭到难以忍受的残酷的殴打和侮辱，很多人是绝不会自杀的。但是，文革当局却把在遭受侮辱摧残后的自杀，视为对文革的反抗，视为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把自杀也当作一项"反革命罪行"。在当时，无数人被"斗争"，他们下跪，他们低头弯腰作"喷气式飞机"状挨斗，他们诅咒自己是"牛鬼蛇神"，他们承认他们应该被"砸烂砸碎"，他们写下"检查""交代"和"认罪书"，他们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面他们的名字打上了红色的大叉子。当时的社会制度，使他们无处可逃。最后，他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文革当局甚至不准人通过死亡来逃避迫害。文革当局要强迫人变成甘愿被斗、甘愿下跪、甘愿诅咒自己、甘愿不象人样子地苟活着的人。

文革中，一大批人遭到"斗争"后自杀，死后，还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要"遗臭万年"。 自杀可以成为进一步迫害的借口。他们死后仍然要被戴上各种罪名，一旦"定案"，家属子女继续蒙受迫害，上学就业都受到大的影响。文革的残酷不但在于逼人自杀，还在于继续残害已经自杀的人。这种对人的逼迫的极端程度，后人很难想象。

在文革的这种话语系统中，在害人者方面，他们对自杀者大张挞伐，另外，还竭力要把不是自杀的人说成是自杀的，以此制造对死者以及死者家属的进一步的迫害。在被害者家属方面，不能指责和追究造成死亡的害人者，却只好声明死者不是"自杀"以保护死者及其家庭避免更多的迫害。了解了这种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 1975 年，杨朔死去 7 年之后，家属前往说明的是他并未自杀是病死，而不是追究谁把杨朔关押起来"斗争"而害死了他。在文革的话语系统中，他们只能争辩这个问题。

细察文革时代的逻辑，当时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象当时的无数的死亡一样，令人气愤，也令人难过。

杨朔的遭遇令人感叹。

杨朔以优美的散文著名。杨朔最优美的散文，如收在语文教课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在 1961 年。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写的都是一些被普遍认为美的好的东西。同时，借物抒情，他通过描写这些东西来表现他的感情。

他写荔枝蜜："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

他写茶花："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砂，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他写浪花："老泰山（文中的一个人物）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浪潮，激扬飞溅，早已经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然而，如果看到当年发表这些优美的文章的杂志，1961 年的文学杂志，会叫人吃惊：印刷那些文章的纸张糟糕极了，不但粗糙，而且根本不是漂白的。直白地说，就跟那时候人们上厕所用的草纸差不多。

1961 年，正值大饥饿的年代。几千万人被饿死。没饿死的人，普遍得了浮肿病：病人看似白胖，在用手指在手臂上腿上按一下，会出现一个小凹窝，在失去弹性的身体上，这个小凹窝要好一阵才能平复消失。食物匮乏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自然是最深的，因为饥饿的感觉是最令人难受的感觉之一。但是实际上，当时不仅严重缺乏食物，也严重缺乏别的东西，比如，纸张，布匹，做饭用的锅子，吃饭用的碗，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子，全都买不到。杂志用草纸一样的纸张印书，就是由于没有平常用的白纸。

政权推行的荒唐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人民的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这种灾难不仅造成了生命的死亡，而且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在家庭中，人们为食品而起纠纷，在社会上，人们为了得到一些生活必须品而不惜道德上的亏损。

从杨朔那一时期的文章看，他常常在外国；在中国的时候，也总在旅行，住在风景区的旅馆里，比如，在广东的从化温泉、四季如春的昆明，北戴河。他显然是一个有些特权的人，也许没有饿肚子。但是他不是聋子瞎子，杨朔一定不会不知道普通人民在经受的苦难。他应该知道高级宾馆里的生活，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浮肿的人并不是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1961 年的生活里没有蜂蜜，饥饿中的祖国不象含露乍开的茶花，人民不但没有民主权利而且还在饿死的地方也不能叫作"人民的江山"。

但是 1961 年的苦难现实好象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笔。他写出的文句，和现实中的饥饿和贫困好象没有一点联系，如果不是印在那么难看的纸张上的话。

用传统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话语说，他的文章是在"粉饰太平"。这种批评也许过于简单。也许他的文章背后有他的复杂而审慎的考虑。但是除了这些散文，他好象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感受的另一类记录。

而且，更为讽刺性的是，如果要把他的这种写法指为"谎言"的话，还只有在那一由于经济困难而在出版方针上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允许写这种优美型的谎言，才对这种文章予以高的评价并选入语文教科书中。在大饥饿年代之前和之后，他都不能有这种机会。1961 年，他的文章回避了饥饿、匮乏和死亡，但是至少还在歌唱优美，这些文章没有在吹亩产粮食几十万斤的牛皮，歌颂毛泽东也不到后来那种肉麻和荒诞的程度，也不在提倡"斗争"、"专政"和杀戮。

1966 年文革开始。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 1966－1967 学年读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教育部的报告说：原有的政治语文历史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一报告的批示写道：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

在这种背景下，杨朔的文章被清除出教科书。文革连虚假的优美也不再需要。从文革的发动者方面说，他们已经彻底巩固了权力，接着要"继续革命"，所以不在乎美化现实；而且，粉饰太平毕竟还意味着对太平的价值肯定，美化现实也仍包含有对美的向往。新起的文革文体，一方面充斥着夸张、暴力、和粗野的词句，正和现实中对人的残酷的迫害相称；另一方面充斥着"最最最最""蓝天为纸，大海为墨，也写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这样的迷狂语言，和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树立配合。杨朔风格不能为文革所容。

早在 1966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明确写了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原来的文艺单位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文革领导人派军代表管理控制了所有的文艺机构，并且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在那些地方，虽然没有象在学校那样红卫兵学生打骂甚至活活打死被斗者，但是也相当野蛮。作家队伍在 1957 年就遭到一次大规模清洗，在文革中，从 1966 年开始，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是全部被打击。

1968 年，杨朔在单位里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他在"斗争会"上被"斗争"。他自杀的时候，55 岁。

文革后，杨朔的文章重新被印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但是，他的死却没有真实地记载在百科全书里他的小传中。当局也始终不准许对 1959 到 1962 年的大饥饿以及文革的恐怖和杀戮发表真实的记录和报告。说出真实，现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放和记住张放之死的人们

张放，女，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员，1966 年夏天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她不堪虐待逃离学校到河南新乡朋友家中。该校红卫兵负责人追到新乡，把她抓获，要把她带回北京。在新乡火车站红卫兵负责人打她耳光。张放在新乡写下遗书自杀。她的尸体被埋在新乡坟场上，未留标记。

第一次听到张放的名字，是在和已故作家王小波通电话的时候。那是 1996 年，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读过什么王小波的作品，打电话原来也是为了找他的妻子而不是为了找他。多年以来，为了记载文革历史，我和很多文革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谈话，我注重了解的文革事实，是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被迫害的遭遇。

不巧，那天王小波的妻子不在家，他接了电话。我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他立即就理解了我在作什么或者我要什么。他说，你调查过二龙路中学吗？二龙路中学有个老师叫张放，在文革中自杀了。

我说我已经调查了将近 100 所学校，但是，二龙路中学不在其中，这样，我记录下来的 100 多位受难的教育工作者名单里，也没有张放老师的名字。

王小波说，张放是个女老师，是物理老师。1966 年夏天，"红八月"的时候，和邻近的中学一样，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打人打得很厉害。学校领导人和一批老师都被抄家并遭到毒打。教导主任的父亲母亲，据说是"资本家"，被毒打后，上吊自杀了。张放也被打了，被严重打伤了。但是她在 1966 年没有死，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再次被整，她自杀。

我立刻在电脑里的受难者名单中加上了张放的名字。那里已经有一个长长的名单。事实上，调查文革历史是一个繁难并且令人痛苦的工作。在调查中，要弄清楚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以及死亡经过，往往要经过很多周折，花费大量时间。这不但是因为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也是因为许多人为制造的困难。而且，在终于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因为是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件或者不幸的个人遭遇，所以，其中绝没有其他研究工作可能有的发现的快乐，而只是带来另一份悲哀。

王小波对张放的记忆与叙述也使我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人们对一个人的死亡和不幸遭遇的记忆与叙述，实际上是不相同的。正是因为看到了种种不同的反应，我才对王小波的反应印象深刻。

我曾经向当年曾经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文革后成为作家的人询问清华大学附中的文革。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开始校园暴力迫害的地方。在清华附中，在 1966 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的所谓"红八月"里，有一名教师在红卫兵举行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有一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服毒自杀。还有许多其他的残酷行为发生了。但是这些故事却没有被描写和报告出来。当我问起这位作家他们班里是否打过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时，他说："打过，打得不重。"我继续追问，是怎么打的，他说，

有两个女同学被剃了头发。"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吃了一惊。初中学生，把同班的两个女同学剃了头发，那怎么会是"打得不重"？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不会是因为选词不当所至，而是反映了一种对他人痛苦的漠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不被觉察的对他人痛苦的漠视，比较王小波对他人痛苦的敏感要普遍得多。当然，当对红卫兵的赞扬还在公然发表的时候，这种漠视相比之下也就讽刺性地显得像是错误"不重"了。

后来我读了王小波的杂文。我感觉到他在杂文中所作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包括对1996 年兴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思潮的抵制，是和他对文革的看法，对死难者的记忆与同情，在原则方面贯穿一致的。但是，在我有机会见到他之前，他却不幸去世了。1997 年，王小波的妻子请我给他的杂文集写一个后记。我写了。我首先写到了他告诉我张放老师的死。我感谢他对我的文革研究的支持。我认为他对文革的记忆和对死者的记忆，和他的杂文的成就有相当的联系。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成为书的"后记"，但是被发表在 1998 年第三期的《方法》杂志上。这个杂志在不久以后就被查禁了。

我想不会有很多人注意到我的这篇文章和其中的关于张放的段落。但是，我总是想，对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学女教师的死亡，应该记忆而不应该漠视，这不但关系到文革历史的真实，更关系到文革记录者的道德原则。

张放生前教书的二龙路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西单附近，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过一公里左右。二龙路中学的旁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部"。应该特别指出，害死了张放的校园暴行就发生在这样的文明的核心地区，而不是什么偏僻荒野的地区。这是因为，文革就是从上而下地被发动起来的，校园暴力就是从北京市中心扩展到全国的，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的发动和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王小波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二龙路中学初一的学生，他还没有上过物理课。也许正因为此，他把没有教过他的张放老师误记为物理老师了。不过，对一个没有教过自己的被害老师的记忆，其实更表现出了他的敏感。他的同代学生中，很多人不记得 1966 年到 1968 年的校园恐怖和他们被害的师长和同学。

张放不是物理老师，是英语老师。提到 1966 年 8 月张放在学校挨打，她当时的同事只能说"太痛苦了"，却不知道怎么描述。对于和她一起经历过红卫兵恐怖的人来说，回忆和描述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暴力程度。和二龙路中学只有一街之隔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那里，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当场活活打死。在那里，还有其他老师被严重打伤。

在 1968 年，开始了文革的第二个迫害高潮，这就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张放活过了 1966 年。1968 年，她继续被整。她不能忍受，就逃到了河南省新乡，她的朋友家中。文革时代的严酷"斗争"，当然是和对个人行动的严格控制配合在一起的。几乎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在当时敢于公开说出，这种把人关入工作单位设置的牢房"审查"的行为是违反宪法违反人道的。在这种情况下，逃离工作单位，当时就被视为最为"严重"的反抗行为了。不然，就只

有逃离这个世界，自杀。也就在二龙路中学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里，35 岁的化学教师胡秀正，在 1968 年 8 月 11 日，在她被关押在校中"隔离审查"的时候，从学生宿舍的 5 楼上跳楼自杀了。

二龙路中学当局派了一名人事干部和一名红卫兵头头到新乡押解张放回京。这个红卫兵头头在 1966 年就是打张放的学生之一。他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在新乡火车站打了张放耳光。张放不能再忍受，她留下了遗书，自杀身亡。她的遗书里写到了她在新乡挨打的事情。文革后，1979 年时，这份遗书还保存在新乡公安局里。

1979 年，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由于家属要求落实政策，学校派青年教师张效松陪张放女儿唐京京去新乡寻找张放遗骨。在新乡凄凉的坟场里，她们找到了结束文革后唯一一座无主的坟，推断可能是张放的下葬处后，花 50 元雇人掘墓开棺。张放身材矮小，当唐京京看到母亲 35 号的塑料鞋时，确认了母亲的遗体，悲痛可想而知。张效松亲手帮京京把遗骨入殓，火化后拿回北京。由于当时打张放的红卫兵头头在学校任领导职务，张放亲属强烈抗议，难以开追悼会，西城区教育局调走了他，调到别的中学。

1979 年时张放的女儿唐京京是大北窑一带一工厂的工人，她弟弟参军了，她父亲再婚了。现在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但是，知道张放的王小波，见证了张放的苦难的她的同事们，还记得张放：一个被文革害死的人，一个穿 35 号鞋子的小个子的女人，一个母亲，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曾经在有三千年历史的北京城的中心的一个中学里教书。

在我们能责备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前，我们确实不必多加责备那些忘记了学校里的死亡和残暴的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赞扬那些牢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人，那些记住了张放和别的文革受难者的人们。我向他们再次表示敬意。

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

•王友琴•　　李敬仪，女，１９６６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１９６６年8月3日晚，从家里被拉到校中"斗争会"上，遭殴打和"游街"。在"斗争"过程中身亡，时年５３岁。

吴天石，男，李敬仪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李敬仪一起被"斗争"。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５６岁。

李敬仪和吴天石，是江苏省最早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死去的两个人。就现有资料来看，也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的两个人。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兴办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１９４９年以后，学校的领导人换成了共产党人，学校也改换了名字。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员，一直在教育界工作，１９６６年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１９６６年5月１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５１６通知"。这个"通知"也一般被视为文革的开端。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于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这五个"界"，首先成为文革的清洗重点。

"516 通知"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一年以后才读到了这个"通知"。在"５１６"通知发出的同时，５月4日到２6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后来被简称为"彭陆罗杨"，被指控为"反党份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被软禁了。毛泽东圈定了名单，北京的中央大报点名批判一批人的作品。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找到了一批人，作为文革重点打击对象。后来文革进一步发展，从省到市到县，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在每一层每一个单位都要找出打击对象予以严酷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就是由于层层处处都有打击对象而全面发动起来的。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开始被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而教育界是"５１６通知"中说明要"夺权"的五"界"之一。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１９６２年出版，这本书也成了"毒草"。当时正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的"批判"。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领导人出过书的人也不多，写这本书也就成为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后，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当时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做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斗争"，文革后"平反"的时候，不同阶段的受害者们都混同在一起。有些人就回避说明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也是整别人的人。

吴天石夫妇之死，虽然在文革通史上不见记录，但是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所以老百姓对此也有解释。有人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低的人整倒。有人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据１９６６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却的纪念》(《新华日报》，１９８６年８月３日）说，当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这里所说的"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是指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４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著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这一讲话发表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内部"是怎么和郭沫若谈的，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后，好像就"过关"了。他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的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小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服从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却不被准许这样作。只有郭沫若可以这样"检讨过关"，别的人则非要被重重地整不可。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点名批判。

在文革后的这篇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　陈光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不"天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运作方式。

事实上，回顾历史，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抗。从最开始，"彭陆罗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还有千千万万被"批斗"的人都检讨了。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级。和吴天石一样，他们都依然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性的"斗争"，其中有的人像李敬仪吴天石一样被当场斗死。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投降的士兵，可以投降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的打击对象，不管他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严酷。

为什么这样？对文革的这一特点，只能解释成，打击这些人，不但是一种目的，也是一

种手段。因为这种层层设立打击目标和不准投降的穷追猛打的做法，可以用来发动文革运动并且建立文革的无上权威，所以被实施于文革的整个过程中。

１９６６年6月1日，毛泽东指示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从此开始发动学生攻击文革对象。大中学校停课。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各学校。工作组支持最早起来攻击学校领导的学生，其中有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组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揭发批判"教师和干部，并且宣布一批人"停职反省"并准备"处理"他们。暴力攻击也在这时发生了。在这一阶段，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干部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

但是，在理论上，工作组不提倡用暴力方式"斗争"文革对象。１９６６年6月１８日，在北京大学，有学生设立"斗鬼台"，把数十人拉来"斗争"，包括戴高帽子，下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等等。１９６６年6月２０日，当时领导文革的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止"乱斗"。

１９６６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前往北京大学说"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并且在会上当众拥抱了当着他们的面打人的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江青还在中学生集会上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说法。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持。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１９６６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象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性"斗争"。

１９６６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著拖鞋。他们被架著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著，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著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著。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５３岁和５６岁，并不很老。他们在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多么严重。

在吴天石死去的同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当时５０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就在那一天，１９６６年8月5日，中共中央

发出文件正式撤销了刘少奇在6月间要求"制止乱斗"的通知。

就这样，在１９６６年8月初，校园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不断升级。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斗争"而死，还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暴力进一步发展，从校园内延伸到校园外，大批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都。学校，更是保存和发展文明的处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杀戮，却自南京和北京的学校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夫妇的死，卞仲耘的死，标志了文革以所谓"斗争会"来杀戮生命的开始，也标志了这种"斗争会"被广泛应用的开端。"斗争"本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到那时，１９６６年8月初，变成了一种在群众集会上对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杀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殴打，包括用铜头皮带抽打；游街，还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报罪名；颈上挂黑牌，还常用细铁悬挂很重的牌子；剪头发，尤其是对女性，剪去半边，称为"阴阳头"；戴"高帽子"，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飞机"，又称"坐喷气式"，是指在"斗争会"上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状如飞机的姿势。加上各种可能是"即兴"发明的残酷折磨。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于死地。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主要在于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还在于其相当程度的随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稳定性，有言在先，依法处罚。在"斗争会"上，打人者有一群，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时的情绪就可决定下手的轻重。被斗者生死叵测，只能绝对忍耐顺从，"低头认罪"，以免打人者一时性起，就下毒手。在这种"斗争会"上试图说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还在于其用"革命"的名义。这些暴力行为都是伴随著高亢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进行的。任何对暴力的抗议，都会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从１９６６年8月初开始，这种暴力"斗争会"成为到处可见的文革风景线。以下是几个例子：

１９６６年8月4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共青"操场上，近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学生拉出"斗争"。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游街和抄家，被强迫跪在操场的司令台下。

１９６６年8月１９日，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第四、六、八中学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把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随后，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东城区幼儿园等校的老师们也被"斗争"，被打，被剃"阴阳头"。

１９６６年8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礼堂举行的"斗争会"上，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被打死。在"斗争"过程中，有人叫嚷要拿盐来撒在被打者的伤口上，姜培良的儿子也被强迫打父亲。该校学生曹滨海被指控反抗了红卫兵，他的母亲樊希曼也在那天被打死。打死三个人后，还有红卫兵到姜培良家中，要打死他的全家。幸好他家的

人闻讯逃走，才幸免于难。

在文革时代,无数人惨遭迫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公开反对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暴力"斗争会"的威慑。

１９９６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他们的死有关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共有１６条，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当时已经通过电话知道了吴天石之死。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５２８页)。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的打杀事件。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不是什么最高当局未曾预料之事。

"十六条"用热情赞扬的口气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被称为"闯将"，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是什么呢？事实非常清楚，他们的主要突破，就是这种暴力性的"斗争会"。

事实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斗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不过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的反应。没有人出来制止暴力。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一画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暴力的增长。

江渭清的书没有写到，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８月３日所发生的，一直被称为"革命行动"。在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校园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学校中发生。例如，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也是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当场殴打折磨死的。南京的校园杀戮也发展到校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率先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根据北京的一项"内部"统计，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文革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校园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可是却从来没有被当作罪孽或耻辱。相反，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８月３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

显然，名称的使用，权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设立，都在弘扬强化８月３日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则。从文革一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先被他们的上级抛出作为打击对

象，继而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打死，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死亡日期还被用作传播暴力迫害信号的载体，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不幸。

"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胡秀正之死

胡秀正，１９３３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１９６６年９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并被打被"斗争"。他们后来试图纠正对他们的这一对待以回到北京。１９６８年夏天，她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审查对象"，罪名是"企图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她先遭大字报"揭发""批判"，又在几十人的会议上被迫"交代"她的"问题"，后来又被关押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即受当时所谓"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五楼坠下身亡。她去世时３５岁。

照片上的胡秀正，朴素，严肃，端正，一副典型的中学女教师的形像。她也确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通的中学女教师。胡秀正１９５１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升学。她毕业后先在这所中学当实验室管理员，一边在业余学校学习。她从１９５４年起在这所中学当化学教员。１９６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她已经有十二年教龄。她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六十四元。她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师，每月工资六十八元。他们有一个女儿。另外，他们赡养胡秀正的寡母及外婆外公。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又明确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个完全负面意义上的名称。胡秀正也不能例外。当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受到批判。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胡秀正似乎不该成为教师中的"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她是普通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师中，胡秀正不算级别高的老师。她没有上过正式大学，也算不上这所学校里的"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文革要打击的主要类别。另外，她年龄不大，１９４９年时１６岁，不太可能有什么"历史问题"。她也不是一个个性张狂的人。在文革中，一般来说，级别高、年龄大的老师以及个性突出的老师往往首当其冲受到迫害。他们会因其学术地位高而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斗争，或者因其教学历史长而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或者因为好发议论而被认为"有反动言论"。这些人所受迫害的程度一般也更为严重。为什么胡秀正这样情况的人也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打击对象受到残酷整治以致身亡呢？

一，１９６６年：被抄家赶出北京

胡秀正的"问题"，起源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划分"。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是北京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员。第八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相距大约一公里，同属北京西城区。他们在１９５８年结婚。１９６６年时他们住在师大女附中附近的教工宿舍里，他们的女儿当时三岁，"全托"在附近的幼儿园中，周末回家。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的父亲，住在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队。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被划成了"漏网地主"，并被命令参加"坏蛋会"，也就是说，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对象"。关于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胡秀正去世二十八年后笔者访问张连元的时候，他还能详细而流利地一口气讲述出他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以及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划作"地主"。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共产党掌权以前，在１９４０年代，他父亲经历过不少事情并有过起起落落变化。由于他父亲的阶级成份问题，在"文革"之后的１９７９年已经得到"平反"，所以他父亲１９

４９年以前的历史上的种种细节，在今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他讲得如此清楚而详尽，并且还很激动，这实在是因为当时关系重大。当他因为父亲的历史而被打被关被斗争，以致最后失去妻子的时候，曾不知多少次地思索和整理这些故事。他也曾被迫写了不少的文字材料为他父亲的事情"交代""认罪"。所以，他把他父亲的历史细节记得如此清楚。笔者发现相当多的文革时代的过来人有这样的特点：直到今天，他们对他们的父亲青年时代的历史，甚至记得比自己的历史还清楚，因为在文革中无比强调"阶级出身"，他们也因此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叙述父亲的历史，后来，对他们自己的经历，却可能没有需要回忆与叙述的场合。

在今天的情境中，人们对这样的陈述，会觉得是一些根本不相关的事情。不论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又与胡秀正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她的丈夫的父亲。他历史上的种种事情，都发生在胡秀正认识他的儿子之前。胡秀正不可能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哪怕张连元的父亲真是罪大恶极之人，又与她有什么相干？然而，不幸的是，这不是文革时代的判断方法。

这个离胡秀正远而又远的事情，在文革中成为致命的罪过，并且直接导致胡秀正受迫害以致身亡。胡秀正被整死，她的罪名不是别的，只是"为反动公公翻案"，进而又被上升为更严重的"翻四清的案"和"翻文革的案"。按照文革的标准，"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遭到严厉镇压。

１９６４年张连元的父亲被划成"漏网地主"之后，张连元向他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报告了此事。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向学校所在的西城区区委汇报了此事。张连元阅读了共产党的有关规定，认为"阶级成份"应是按照１９４９年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的。按照这个标准，他的父亲不应该是"地主"。张连元曾经给中共华北局写信，请求"复查"他父亲的问题。

１９６６年6月，文革的领导者下令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从事文革。１９６８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并掌握学校大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和杀戮。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8月２２日，张连原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历史教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成重伤，几乎死掉，后来终生残废，不能工作。红卫兵从校内打到校外，不但打学校的老师，也打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到张连元也被打的那一天为止，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了八个人。

那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的两个干部来到北京，要把张连元和胡秀正抓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老师"反攻倒算"，为父亲"翻案"，"妄图翻'四清运动'的案"。这指的是张连元曾在１９６４年后写信给共产党上级要求复查他父亲被划成"地主成份"这件事。这两个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学，和八中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掌握大权。八中的红卫兵给生产队打了长途电话，证实了来人的身分。于是，初三（五）班的红卫兵把张连元叫到物理化学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张连元一进去就被劈头打了一顿。然后，从张父村子里来的两个人开始审问他。他们一边审问一边打他耳光。后来，红卫兵学生开始轮番用木棍、铜头皮带、绳子、扫帚等抽打张连元。在打张连元的过程中，曾有别的老师来到办公室，开门看到红卫兵正在打张连元。

有两个人试图阻止红卫兵打他。一个是实验员，名叫张良银。他对打人的学生说："先

不要打。你们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红卫兵把他硬推了出去。另一个是物理教师周国正。周老师是天主教徒，为此当时他自己也在被批判，处境不好。但是他开门看到学生打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打。"他试图劝阻学生继续毒打张连元。当时学校的人都有目共睹，从 8 月初到 9 月 3 日那一天，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打伤了多少人，都知道红卫兵的残酷无情。在那样的恐怖气氛中，实验员张良银和物理老师周国正出来为正在被打张连元说话，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无怪乎二十八年之后，张连元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俩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对他们俩心存深深的感激。虽然今天我们作为听众或读者，在对这两个人的敬佩之余，还是会为没有较多的人这样作而心感遗憾。但是，我们也因此更要记得他们的名字。在一个恐怖的时代，他们作了不平常的事情。他们勇敢，他们仗义，在同事朋友落难的时候，当别人收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尽管环境如此恐怖，他们伸出了他们的手，他们作了努力来试图制止罪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想当英雄，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为当年所作的感到自豪。

9 月 3 日，张连元被打了一整天。红卫兵打他耳光，用打了结的粗绳子、扫帚和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抽他，用车床上的三角皮带敲他的脑袋。他们强迫张连元跪下，他们把脚踩在张连元的背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打他。张连元在看不见打人者的情况下，精神极度紧张，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又强迫张连元腿直著，身体弯成九十度，头仰起来，头上顶著一个罐头盒。他们打张连元，还不许他动，不许罐头盒掉下来。罐头盒一掉下来，就更凶猛地打他。他们打累了，在一旁休息，同时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头顶著罐头盒。时间一长，张连元的整个下身麻木得失去了知觉，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他们狠命打他，但是他的腿动不了。他们觉得很开心，一边毒打，一边狂笑。整整一天，他们不给张连元喝水，也不给他吃饭，却找来了一块非常肮脏的窝头，外面是乾裂的长了毛的，可是里头却象浆糊一样，又酸由臭。他们强逼张连元吃，不吃就打，吃慢了也打。有两个红卫兵拿著民兵训练用的木枪要捅死张连元。张连元想，他也要被打死了，就象已经被打死了的同事华锦和那些他不知道姓名的校外的八个"牛鬼蛇神"一样。他们之中有的人就是被木枪捅死的。但是一部份红卫兵认为应该把他送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处理，说："别打死了。留给村儿里的人打吧。"　晚上，红卫兵把张连元一个人锁在一间屋子里，还跟他说："不许逃跑，要跑抓回来打死！"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开门，一边开锁一边说："准他妈的死了。"

9 月 3 日，八中红卫兵还抄了张连元的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他们夫妇的户口迁出了北京。9 月 4 日，他们用张连元的钱叫来了一辆卡车，把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二人连同他们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大队。到了那里后，大队干部又强令他们交出随身带有的一切财物，现款、手表、钢笔。到了村里，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分别关押，不准见面说话，全天有人看守。在那儿，他们被打，被游街，被体罚，在斗争会上被斗。胡秀正也曾经被戴了高帽子游街。当地的一个干部告诉他们那里的中学红卫兵如何打人，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了，然后威胁他们说："再不老实，就把你们交给中学的红卫兵。"当时，中学红卫兵打人最凶，而且最无顾忌，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打死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敌人"。他们打死了人，最多不过被说作是革命中"难免"的"过火行为"而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坚持这个说法。张连元和胡秀正没有办法，只好按照生产大队干部要求的口径写检讨认罪。一星期后不再有人全天看守。他们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但是仍然没有行动自由。张连元的父亲被打得更厉害。他被施以一些残酷的刑罚。有一次，他被强令在立起的板子上跪了一整夜，不许动一动，也不许上厕所。老人被折磨得几次要自杀。

张连元的遭遇告诉我们，一，"翻案"被当作可以被打死的"罪名"。张连元在学校原来还不属于"牛鬼蛇神"，但是当村子里来人说他为父"翻案"，红卫兵立即开始毒打他。他既不能作肢体自卫，也不能作任何自我辩护。二，在１９６６年9月３日，在北京红卫兵已经造成大量伤亡以后，红卫兵依然把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暴行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有恃无恐，手下无情。三，一些红卫兵用非常恶毒的方式来折磨残害人，以打人取乐，一任邪恶的愿望发泄，这种恶意根本不是用"革命理想"能解释的，比如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顶罐头盒，强迫他吃霉变的窝头，都是这类例子。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有十万人在被斗争被游街被抄家被打以后，又被迁出户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像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车站上或者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车站和火车上被打死。这是文革领导者的重大行动之一。这一行动清洗了北京城。尽管被驱逐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尽管比例达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一事件确一直未被报告，这一数字也只在"内部"知道。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导。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记录，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的一项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纸"通令"　，即所谓"第四号通令"。这一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七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１９６６年8月２９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不到两星期以后，９月１１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又发出了"第八号通令"，其中写道：我们要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之一。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通令"，在那时给了他们可以把胡秀正夫妇驱逐出北京的权力。这两个"通令"都不长，但是这些文字背后，是十万人的悲惨遭遇。胡秀正和张连元身受的灾祸，仅仅只是这些文字导致的后果的冰山一角。

二，１９６７：所谓的"翻案"活动

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关押在村子里的时候，他们几次设法通过胡在北京的妹妹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北京新市委写信和打电报，请求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信都被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又被转到中共天津地委，接著又被转到固安县委。这是当时对这种信的常规处理方法。张连元和胡秀正设法请求固安县委不要把信再转给公社。但是固安县委仍然这样作了。这样的把上告的状子层层下转的处理方式会导致什么结果，每

个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想见。这样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即把告状信转给有权力的被告，写信人请求解决的问题不但不可能得到解决，还会遭到更大大报复性迫害。实际上，这也就是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处理"人民来信"的人的本意。他们并不打算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可是普通人没有别的办法，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投寄这类信件。

张连元和胡秀正有个三岁的女儿，被留在托儿所里。他们被长期扣留在村子里，不许他们看望孩子。直到这一年的１１月３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在一再请求之后，胡秀正终于被允许回北京看孩子。随后，她把自己的户口要了回来并落在了北京。这时，她开始设法要把丈夫从农村弄回北京。她曾经去"人民来访接待站"请求帮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别的办法。在现存的材料中，有一张１９６７年1月１３日由北京邮电医院门诊部开出的诊断书。胡秀正给生产大队的两位共产党支部书记写信，说她生病，她的母亲病重住在医院里，她的孩子也病了，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要求学校里的同事帮忙。胡秀正以这些为理由，请求书记准许张连元请几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儿带到村里去。经过多次交涉，张连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张连元没有再回农村。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里。那边拒绝给他户口，也不还给他从他家运去的家具衣服等东西。这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半年以前能有权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由于其领袖人物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时随著他们的父母被冲击清洗，在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运动中，他们失势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指示，不准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其实，这种"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的情况已经在北京公然实行了三个多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人，试图以按照政策他们不属于应被驱逐出北京的人为理由重回北京。他们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饱受折磨，被驱逐到农村后，作为"阶级敌人"也无处安生。他们的境况十分悲惨。可是，紧接著，１９６７年3月１８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布告"，（这时军事管制委员会执掌很多有关的权力），再次重申肯定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的"遣送"行动，不准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这份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会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北京的街上到处贴著这张"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这时候，张连元住在北京没有户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张连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当局宣布动员张连元遣返。张连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谈他的情况，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强调他的户口不在北京，就应该离开。北京有特别严格的户口制度。在当时的北京，没有户口，不但不能得到定量供应的粮食以及不能工作赚钱，而且根本不准居住。到各家"查户口"是当时常有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被注销北京户口驱逐出北京，这是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得到这样的地位，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户口"对一个人来说性命交关。胡秀正和张连元为恢复张连元的户口而拼命奔走，是十分自然而且不得不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恢复张连元户口的努力始终未见效果。直到胡秀正因为"翻案"被"隔离

审查"时，张连元仍然没有能在北京恢复他的户口。相反，他们的努力导致了他们受到新的一轮迫害。在１９６６年，他们的罪名是"翻四清运动的案"。在１９６８年，他们新增加的罪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俩个人都因此被"隔离审查"。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身亡。张连元活了下来。张连元的户口直到１９６９年７月才又在北京恢复。其时，胡秀正已经去世近一年了。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胁下，１９６７年5月间，张连元写了一份材料，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这份材料由张连元和胡秀正两个人署名。他们在材料中尽可能使用了一些当时可以找到的"理由"。他们说他们都是普通教师，属于文化革命所强调的"群众"，而不属于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打击群众正是当时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手段。他们由此指出不还给他们户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另外，当时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因文革运动发展而也受到批判，他们因此指责是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了他们一家。胡秀正也曾经和张连元一起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接待站"谈话并送了这份材料。他们也给江青等文革领导人写过信。他们的燃眉之急是要让张连元的户口转回北京而不是被驱逐到农村去。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可能反对文革，只是希望尽可能从文革的宣传中能找到一些理由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他们夫妇的行动后来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实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翻他们自己的案，他们试图说明他们不应该受那样的惩罚，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标准。甚至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案"，就是在文革的第一年，两个村子里来到干部和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将他们毒打后强行送往了农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法律上的立案的手续，也从未有过审判和定案。（当时被打死的数千人和被驱逐的十万人，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翻案"的意思是不同意已经定下的案子结论并试图改变。然而在当时，很多案子根本没有定过，或者是定得很草率的，特别是没有容许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比如张连元的父亲的成份，据说"四清"工作队三榜定案都不是地主，但在工作队离开前的前一天晚上宣布他是地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被定罪的人或他们的家属会提出对他们的定罪的不同意见。他们并不是反对定罪的标准，而是提出他们的案子不符合那些既定标准，故而提出申诉。这从法律程序来说完全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这种申诉就可能给申诉人带来惩罚。比如，在１９５７年，有的人就因为对１９５２年的"镇压反革命"提出申诉而受到处份。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们有新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的"翻案"本身可以成为罪名。文革中的一个特别情况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之后，有大量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于是，有的过去被这些领导干部定罪的人想要利用这个种会来宣称他们过去受到的处份是错的，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１９６６年秋天，一些因为批评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掌管学校的"工作组"而遭到批判斗争的学生被平反甚至成为官方认可的"左派"之后，一些别的受到迫害的人也开始想要平反。但结果是，除了这仅有的极为少数的一类人以外，别的人为自己平反的努力都被称为"右倾翻案风"甚至"反革命翻案风"而遭到严厉镇压。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结果之一是把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所有党政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在台上的时候受迫害的人就没有问题了，更不意味著迫害的原则被否定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文件，编号为"中发（６７）３２５号"，标题叫做"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的规定"。这个文件说：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

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乱动。

有了这个文件，"翻案"正式成为罪名。

三，１９６８：死于"隔离审查"

１９６８年春天，一个新的运动开始了，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后来被简称为"清队"。根据当时的指导性文件，"清理阶级队伍"的预定目标是"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重点是审查干部和教员。"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中迫害人最多最狠，时间也最长的一次运动。之所以能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运动是由上而下相当有组织地进行的。在上面，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搞这一运动。１９６８年5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上的一份材料上批示：

文元同志：建议次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握看过的同类材料中，这件是写得最好的。毛泽东，５月１９日。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为"５１９"指示。姚文元送的这分材料标题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二者一起作为"中发（６８）７４号文件"下发。这份报告里，提到了这个厂的"阶级敌人"有数十个。后来，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８３４１部队还整理了一整套"经验"，下达到每个基层单位，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开展了这个运动。各地在文革中成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掌管审查谁，关押谁，开斗争会斗争谁，以及最后的"定案"和"处理"。毛泽东给"革命委员会"命名并明确制定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和政府不分，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分，监狱和行政部门不分。在文革前这些部门就不分清，但是从来没有像文革中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成一体。一个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关押它的教员和职工。１９６８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杀戮之后发生的最大的一场对人的迫害。

在"清队"时期，有两个特别的词语成为常用的：一个是"专案组"；另一个是"隔离审查"。各个单位都建立了一些"专案组"，搞"审查对象"的"专案"，也就有相当一批人成为"专案组"成员，他们那时的专职工作就是审问和调查被"清理"的对象。被审查的人可以被"专案组"关押在单位里，不得自由行动，不得回家，叫做"隔离审查"。很多被立"专案"的人在这种校园监狱里被关押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在那一时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样的关人的地方。

所谓"隐藏的"的"阶级敌人"有两大类，一是"历史反革命"，意思是在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人，另一是"现行反革命"，意思是当时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当时停课停工，就是要"挖"这两种"反革命"。每次"挖"出来一个，就当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挖"出的"敌人"越多，功劳越大，所以各"革命委员会"都要尽量多"挖"，以显示其革命性并且邀功。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有很多领导干部夸大粮食亩产量，但粮食是吹牛吹不出来的。这一次，把人硬弄成"反革命"，却比夸大粮食产量容易得多。一时间，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被追查。

在文革的前所未有的高压恐怖和严密控制下，从事真正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是极其困难的，从而也是极其少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在那时"挖"出大量的"现行反革命"来。当时"挖"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私人谈话或者私人通讯以及日记中说过写过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东西，另一类是试图减轻或撤销自己过去受到的惩罚，被叫做"翻案"。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１９６８年春天，张连元和胡秀正因为"翻案"在各自的学校中被攻击。胡秀正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列为"清队"的打击对象。胡秀正在学校被贴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她"为反动地主翻案"，"翻四清运动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如１９６６年夏天，她的丈夫受他父亲的牵连，她又受她丈夫的牵连，成为新一轮整人运动的靶子。除了要接受"专案组"的几个成员的反复盘问之外，她还被要求去学生的班里一次又一次地"交代问题"。当时学生依然不上课，正在等待"分配"。学生中的积极份子成为"专案组"成员，一般的学生则被组织起来一上午一上午地听被"清理"对象的交代。胡秀正的"交代"，不断被听众高喊的"胡秀正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断。

以中学生的年龄，对于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划分阶级成份"不甚了了。但是十六七岁的学生也具备推理能力。胡秀正有什么大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给上级党委，要求复查父亲的问题。然后她和丈夫一起被斗争并且被抓到农村，他们家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她的丈夫没有户口。她不得不起来要求改变这种处置。如果说她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行动是"翻案"，是"反革命"，因而应该被惩罚被斗争，那么就意味着她只有接受１９６６年的那个处置，那样她也没有活路。而且，也没有人来说明１９６６年对于他们夫妇的处置是正确的，是革命的最终判定。怎么能这样不给一个人活路？但是，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人对于胡秀正成为审查对象之事提出疑问。在大会小会上，对胡秀正的质问和咒骂声势汹汹，争先恐后。那些表现积极的人的动机可能相同又不同。有的人后来因参加"专案组"而"分配"到较好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只是随大流。但共同的是他们都努力显示出他们非常激烈非常"革命"非常愿意和"反革命"作"斗争"。

由于张连元那时不能跟胡秀正见面，张连元无法知道她所受到的"斗争"的细节。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学生被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起来斗争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志涛４８个小时，学生轮流睡觉休息，胡志涛被连续"斗争"了４８个小时。这样的"斗争会"，在当时是被当作功劳和成就来宣扬的。和１９６６年不同，１９６８年的"清队"一般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人活活打死，但是这类长时间的"斗争"和"审问"，仍然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另外，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大量使用体罚如罚站罚跪等等，也是公开的秘密。夜半审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认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办法。还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熬鹰"。有两位老师，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所有要他们承认的罪状，甚至还添枝加叶说出种种故事，如他们如何当特务，如何搞破坏等等，终于被允许睡觉，然后，他们再来"翻供"，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个学校的一个１９岁的女学生参加这种深夜审讯时，虽然是审讯别人，也因劳累和恐怖气氛而昏厥倒地。

在１９６８年6月，张连元写了检讨，检讨他没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检讨了他给上级写信的"动机和目的"。胡秀正也写了几份很长的检讨，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该对于她丈夫的父亲的生产队做的政治结论有疑问，不该在被揪到村子里以后对此心存不满，不该写信要求帮助。她一再表示认罪，一再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错误"。这些检讨写得非常认真细致诚恳。她忍耐了那么多的侮辱和折磨之后，又做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把自己改造成为那些"

斗争"她的人要她变成的那样。但是，她的努力没有被接受。对她的斗争继续升级。

先是她的丈夫在北京第八中学被"隔离审查"。８月初的一天，张连元终于获得准许回家了。但是，他刚能回家，紧接著胡秀正又被"隔离审查"了。他们的一个邻居，也是胡秀正学校里的同事，晚上来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不能回家了，要张连元给粮票和钱，带给胡秀正在学校里买饭吃用。８月１２日下午五点，北京第八中学的领导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自杀了。他们说胡秀正是在８月１１日自杀的，是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宿舍的五层楼上跳下来的。

尽管张连元的家离学校很近，张连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讯。他抱著孩子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的尸体已经被从宿舍楼旁边移到了围墙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她的身上盖著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师大女附中当局召开大会，声讨胡秀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在死后受到"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学校的几个老师把她的尸体送去了火葬场。张连元收到了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的一些遗物，是一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和检讨书的草稿。遗物中没有遗书，也没有写到任何悲观的或者跟自杀有关的念头。张连元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他想如果她自杀，会留下遗书给孩子和他。他们唯一的女儿还不到五岁，如果她自杀，她一定会留话给孩子。他觉得她不可能自杀。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他深深地了解她。她是坚毅的女子，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工作，承担了赡养家庭的经济重担。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一起经受了暴力和恐怖。他们一起被绑架到村子里，并在那里被斗争折磨。两个月后她设法离开了那里，并又设法让他也回到了北京。她是勇敢而有韧性的人。文革开始后的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灾难，她可以再忍受下去的。她死的时候，她是被"隔离审查"的。她的家人亲友不知道她在关押她的地方经受了什么。她被打了吗？她被侮辱了吗？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她的亲人全都不知道。张连元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从隔离审查室拿回来的每一片有胡秀正笔迹的纸片，不能发现任何自杀的征兆。张连元从来不相信胡秀正是自杀的。他说他只是找不到明确的证据。

他当时根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寻找证据。胡秀正死之后，张连元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在北京第八中学，他和另外一些老师，一共至少有九个人，被关在一起。地上铺了些稻草，一个挨一个地睡在那里，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这些被"隔离审查"的人被押着在毛泽东的像前向"请罪"。被"审查"的人也常常挨打。张连元曾经被打。在被关期间，他们被要求每天写"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还被强迫互相揭发。在他被"隔离审查"期间，他和胡秀正的孩子又被留在托儿所里，连星期天也在那里跟着值班的保育员。

张连元在北京第八中学被一直关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有一天开会，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可以参加老师的活动了，不再受隔离了。用当时的文革术语说，他被"解放"了。也像当时的规则，在被"解放"之前，他必须写一份很长的"自我检讨"。所以，为他的被"解放"，张连元又写了长篇检讨。他保留了他的"检讨"的底稿，所以现在还可以读到。在检讨中他又从头"交代"他的"家庭问题"和"翻案问题"，并且，"感谢""党和毛主席"对他的"挽救"。

张连元的全部"罪状"，就是写了几封申诉信，他想让共产党上级了解，他的父亲在１９４９年的前三年不是地主，后来，他想让文革的领导人知道，他不该被驱逐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因为这些申诉信，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张连元被毒打，被侮辱，被长时间关押，最残酷的，是他的妻子被害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年幼的女儿的童年饱受惊吓，而且

永远不再有母亲了。在他被关押的时候，他写了无数份检讨，认错，认罪，诅咒自己。最后，为了被释放，他还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之后，有两位教师自杀身死。他们是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周学敏老师温文尔雅，她的语文教学法曾经在文革前被推广，她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梁希孔诙谐风趣，他的历史课上笑声不断，而且学生都说学到了很多知识。恐怖的"清队"摧毁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在北京第八中学，青年教师高家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起来，在１９６８年秋天自杀。

不只是在胡秀正和张连元的学校发生了这样可怕的死亡。在别的学校，也是一样。根据笔者的一项涉及上百所学校的调查，在调查涉及的北京的中学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受"审查"而自杀的还有：在清华大学附中，体育老师赵晓东跳楼自杀。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某被打死，炊事员王厚跳河自杀。在北京景山学校，语文老师于共山和季新民自杀。在北京二龙路学校，物理教员张放上吊自杀。在北京第四中学，语文老师刘承秀用剪刀自杀。在北京第五中学，俄语教员何光汉自杀。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被关押在学校时，以头扎入贴大字报用的浆糊缸身死。在北京５１中学，体育教员汤聘三自杀。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工马铁山自杀，副校长王玉珍和丈夫一起自杀。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两位女教师孙历生和方婷之自杀。

自杀，在"清队"时被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被诅咒为"死有余辜"。死后还被开"斗争会"批判。胡秀正的"幸运"只是她的尸体未被弄到会上来再次"斗争"，但是有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１９７１年林彪死了之后，处理人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１９７３年，中共中央有文件说运动中自杀的党员不再以"叛党"论处了。由此，胡秀正有了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说经审查胡秀正没有问题，"故不予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但是这句话是从她在文革后的"平反结论"中转引来的。当时的两次结论，没有给予家属书面材料，只是念给张连元听过，所以现在无法引用。再后来，在毛泽东死了两年之后，她的因为"翻案"而成的罪案才终于翻了案。１９７８年，胡秀正得到了"平反"。她的追悼会是１９７８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的。其时胡秀正已去世整整十年。

张连元的父亲，也在１９７９年得到解决。先是"摘帽"。几经周折之后，他的"阶级成份"不再是"地主"而被确定为"工人"，他也由"摘帽"改成了"撤帽"。

四，谁害死了胡秀正？

在１９７８年的"落实政策"过程中，文革中间由"专案组"整的材料和被审查者的"结论"等等都被从人事档案中抽出烧毁。这些材料当时从来没有给过被整的人一个副本，被整的人从未看到这些对他们生死攸关的文字。但是这些材料在１９７９年由人事干部拿出后，直接烧毁，仍然不准受害者看到内容。在北京第八中学，张连元作为两名教师代表之一，见证这一烧毁文革整人材料的烧毁过程。仅仅一个中学，这样的材料就有整整两个标准尺寸的大麻袋。麻袋里的纸片被掏出来直接投入锅炉，很快燃烧成灰。但这些纸片曾经整死了人，没死的也被整脱了几层皮。张连元也曾经去胡秀正的学校要求查看胡秀正的案卷。那边人事处的

干部告诉他，材料已经都销毁了，为了"避免后患"。

于是，张连元拿到的只是一纸的盖有"中共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支部"红色图章的"胡秀正通知平反决定"。这个决定说："１９６８年8月１１日，胡秀正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不幸逝世。当时强加给胡秀正同志的错误决定和一切诬陷之词，应予完全推翻，给予彻底平反。"这个决定的日期是１９７８年6月１５日，在毛泽东死了近两年之后。

指导"清队"的中共中央文件，都有毛泽东的批示或者"圈阅"。这些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斗争"，一一"传达"到基层。但是在文革后的此类"平反"文件中，按照统一口径，都说成死者是"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这个决定甚至也没有说"当时"迫害胡秀正的"决定"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实际上，"当时"甚至也没有给胡秀正的家属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说法。"当时"的种种做法害死了胡秀正，却未留下任何记录。

文革以后，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北京市，有3，０００人自杀，２００人被打死。没有给出准确的数字，也没有给出受难者的名字。而且，也从来没有让普通的人们或者历史学者了解这个数字。3，２００人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个数字的数量级是缩小了的。从现在找到的一些单位的局部的死亡密度来计算，在北京一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死亡的人的总数可能比三千二百多得多。胡秀正，是这一文革中最大规模的整人运动的千千万万受难者之一。如果说胡秀正的遭遇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是她的主要"罪状"——"翻案"。胡秀正实际所作的，只是设法为她的丈夫把户口恢复到北京；而她的丈夫失去了北京户口，是因为他为他的父亲的"阶级成份"说了不同意的话；而他父亲被划成"阶级敌人"，并不是因为真是有过土地的"地主"，而只是因脾气不好得罪了村里的干部。父亲的冤案发生在先，丈夫因为给父亲辩护而获罪，妻子又因为给丈夫辩护而获罪。辩护本身被认为罪行。这"罪行"又从"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而升级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最后，"翻案"这一"罪状"直接导致了胡秀正的死。

在文革时代的大规模的迫害中，一方面，把一些本来不是"罪"事情当成了罪，比如，批评了毛泽东，文革前的写在纸上的法律至少还并未说这是重罪，但是１９６７年制定的所谓"公安六条"就把所谓"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定为大罪。另一方面，被定罪的人不但不能为自己辩护，而且自我辩护会成为新的罪行，以至被当作"罪上加罪"。这种作法在文革前就有，在文革中更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前者给人带来了大难，后者又把人往灾难的深渊中推了一层。国家"专政"机器，有了这两个巨大的铁轮，横冲直撞，碾碎了无数普通人的血肉之躯和他们理所应有的生活。

退一万步说，即使胡秀正真的做过坏事，允许她辩护又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在法学理论上，关于辩护的重要性可以说出很多道理来。辩护是基本的人权之一。至于不允许辩护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什么，胡秀正的悲惨遭遇体现得很明白。

张连元后来再结婚，他的妻子是林则徐的后代，和他一起抚育了胡秀正生的女儿。文革的结束使胡秀正的女儿有了和母亲不同的命运。她考上了大学，又出国留学。１９９７年，她在英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这时她的年龄和她母亲去世时相仿。她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一个人的生活原来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文革时代，从１９６６年9月到１９６

8 年 8 月，无论她的母亲胡秀正作了多少努力，还是无法逃脱那样的悲惨命运。

程贤策之死

程贤策，男，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 年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1966 年 9 月 2 日，程贤策服毒自杀。

我在文革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来没有听到人提起程贤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杀的事情。虽然这个大学刚刚发生过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还未得到记录和分析，但是，有着著名的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学，却不教学生去认识和分析这些发生在自己学校的重要历史事实，显然不恰当也相当具有讽刺性。不过，这是普遍的现象。

后来我开始调查各所学校的文革历史，特别是在 1966 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们，包括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我跟很多文革的经历者们谈话，请求他们回忆文革时代的人和事。这时候我才听说了程贤策的名字。

北京大学数位老师的回忆和叙述，提供了一个一个的片断，使我能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渐渐拼装出程贤策在 1966 年文革开始后的遭遇，并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过程的线索。

1966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打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北京大学和全国的大学中学在此后全面停课。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一变成了"黑帮份子"，成为文革的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程贤策作为中文系中共总支的负责人，也被宣布停职并且受到"揭发""批判"。除了大字报"揭发"，校园里出现大量的"揪斗"干部和教师的场面：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组曾经在办公楼礼堂开"批斗会"，程贤策是重点被批斗的对象。工作组员和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程贤策站在台下听批判并回答他们的质问。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然后对他们指定的打击对象作攻击。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授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在历史系，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要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他喝下敌敌畏后，毒性发作，非常痛苦，所以他在家里嚎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他的邻居听到了可怕的声音。但是他反锁了门，死在家中。那一天是 1966 年 6 月 11 日。

1966 年 6 月 18 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 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

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 6 月 18 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 6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 事件"。1966 年 6 月 20 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1966 年 7 月 25 日和 26 日，接连两天，"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18 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 7 月 26 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 月 27 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6 月 18 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 7 月 26 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618 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 1966 年 7 月 28 日自杀。

在"劳改队"里，1966 年 8 月 4 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 1921 年，死时 45 岁。

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先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他们作得相当认真。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

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被剪了头发之后，回到家里。当时他和一家人，与他的连襟一家人，合住一个两卧室的单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间卧室里。虽然他们都是系一级的负责干部，但是生活条件相当寒酸，住房如此拥挤，他的连襟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是和当时整个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这不但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也因为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在当时不但不事生产，还专门从事"阶级斗争"，阻碍和迫害那些从事生产和建设性工作的人们。他请他的连襟胡寿文帮他把头发修理一下。那天胡寿文也被强剪了头发。胡寿文说：修他干什么？谁难看？是他们剪的。他比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贤策尽可能把已经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修好一点。他很为程贤策担忧，因为看到他每天"劳改"回来，都疲惫至极的样子，脱了鞋子就靠在床上，无力挪动，一言不发。

后来，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程贤策还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 年 8 月 15 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程贤策是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 100 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的一切的极大支持。在那一天，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宋彬彬的学校已经打死副校长卞仲耘两个星期了。在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之意时，毛说，"要武嘛。"8 月 18 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有几百人被打死。

8 月 24 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 8 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他们可以正式摆开架式，用皮带一口气把人抽上几十下。军用皮带厚重并且带有粗大的铜扣，对人的肉体伤害性很大。在打他们的时候，还有人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是没有枪，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后来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1966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在那一天，离程贤策家不远的另一处北大宿舍里，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于当天晚上在家中自杀。俞大因的丈夫是曾昭抡，化学教授，1949 年 5 月由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后来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被分配到到武汉大学，当时不住在北京。

在 8 月 24 日之后，还有学生，包括附近中学的中学生，来到他们家翻东西，打他们。在北大校园里，暴力攻击也加剧了。有一次，程贤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 8 月 30 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革常务委员会"，聂元梓当了主任，她讲话"确定今后战斗任务"是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天晚上，程贤策和他的连襟一起，在家里的平台上一起听了高音喇叭里的聂元梓的讲话。从 7 月 27 日到 8 月 30 日，在"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大学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暴力迫害正在越来越制度化。各种迹象都清楚地显出已经发生的一切暴行并不只是年轻学生的乱打乱闹，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戮。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第二天，9 月 1 日， 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 月 2 日，程贤策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来到北京大学西北方向十公里外的香山的树林中自杀。

至于程贤策到底遭受过多少折磨和殴打，无法知道。这里我能记录下来的，只是他的几位同事亲友所看到的。我的判断是，他们仅仅知道程贤策所遭受的折磨和殴打的一部分。在我以前写出别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的时候，有人问过我所写的是不是夸大了的。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明确，我的报告实际上只可能遗漏了大量的受难者遭受的酷刑和侮辱，因为死者已经死去，永远不可能说出他们身受的苦楚，作恶者现在总是掩盖和缩小他们对受难者所作的恶行，而旁观者只看到零星片断，缺乏同情心的旁观者还往往对他们的受苦视而不见，早已忘却。

9 月 2 日早晨，程贤策没有在"劳改队"里按时出现。和他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竟然敢在这种情况下迟到缺席感到疑惑。后来他们被叫去开一个"斗争会"，听到说程贤策"自绝于人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的话）"，才知道程贤策已经死了。程贤策虽然死了，还用白纸写了他的名字插在会上"斗争"，两边还站着"陪斗的"人。开会"斗争"已经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学程贤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贤策死了，向景洁"升级"成为中文系的"第一号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斗争"。有一天傍晚，有一群学生到他的家里，把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头上，不顾他家人的哀求，就把他拖出了家门。他们把向景洁绑架到一个房子里，把他头上的罩子取下。接下来的场景完全是按照电影里的某种审讯方式布置的。他们用强灯光照向景洁的脸，问他问

题，而他们自己却在阴暗处听他的回答。窗户都是蒙上的，使他不知道是在哪里。他们审问了他整整一夜。审问的"罪行"，不是别的，是文革前中文系中止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的学籍，这被说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统帅"。实际情况是，林豆豆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不愿意再在清华大学学习，教育部给北大发文，要北大收下她，于是林豆豆就从清华大学来到了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派了专人照顾她，还派了两个教员帮她补课。没有人迫害过林豆豆也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念头。林豆豆后来长期请病假，已经超过了学籍管理条例关于需要因病退学的时间，还是没有请她退学。后来她实在不会再来，中文系才中止了她的学籍。文革带来的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使得林豆豆的事情居然成为中文系的"罪行"，而且竟然用这样凶恶的方式来审讯中文系的负责人。1968 年 1 月 25 日，北京大学校文革委员会以"迫害林彪女儿"的罪名，专门开大会"批斗"学校的一批负责人。如果程贤策还活着，作为中文系的负责人，他也会被拉到这样的"批斗会"上遭到"斗争"。

1968 年，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6 月 18 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狂热的残忍与恶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这样作，是为了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618 事件"。一个丑陋的日子，又用这样的丑陋的纪念和庆祝，是为了再次肯定对人的暴力虐待的"革命"意义。如果程贤策还活着，他那天也一定会遭到这场暴打。从程贤策第一次被毒打的 1966 年 6 月 18 日开始，两年里面，暴力迫害从未停止，还不断发展出新的形式来，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在 1968 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大负责人陆平，曾经被吊起来拷打，北京大学有 24 个人因被"审查"而死亡。

我从与多位北大老人的访谈笔记中，整理出了以上程贤策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程贤策走向死亡的一步一步的轨迹。从 1966 年 6 月 1 日开始，到他在 9 月 2 日自杀身亡，他所经历的迫害都和文革的步骤密切而直接地相关联。6 月 1 日广播北大大字报以后，他被停职被揭发批判；6 月 18 日事件中他被打被侮辱；毛泽东对"工作组"和刘少奇的攻击，使他进了"劳改队"，被剪了头发，挂了牌子；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使他被抄家和遭到进一步毒打。他是在经历了整整三个月的文革以后，才决定自杀的。在这三个月里，文革的暴力迫害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在他自杀的时候，暴力虐待没有停止的迹象，暴力的权力机构却一步步稳固起来，作为文革对象的他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他死后的事情则说明，如果他不自杀，他也一定会遭到更多更漫长的迫害。

他的死，是非常阴暗，非常悲惨的。他的死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的案例。在北京大学里，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发生了一系列这样可怕的故事，有一批人遭到这样的命运。程贤策的死是北大人的集体的文革命运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建立于 1898 年的维新运动中。大学本来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科学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中，北京大学却变成最野蛮残酷的行为发生的地方。暴力性的"斗争会"，包括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等等，校园"劳改队"，校园监狱，都在北京大学校园领先开始，更不要说道德方面的堕落如诬陷、谎言、谄佞等等普遍发生。北京大学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是"文革"真正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的最成功的例子。这种"成功"令人震惊也令人思考。

当我在北大作访问调查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和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谈话。后来我才读到了她的书《绝色霜枫》中关于程贤策的一章。（见附录）应该指出，乐老师关于程贤策

的文革经历的记述有误。乐老师错记程贤策在 1966 年 6 月第一次遭到暴力攻击后立即就自杀了。这可能是在因为在记忆中把 1966 年夏天的那三个月的文革画面叠印在一起了。很重要的是，乐老师的书讲述了 1948 年她和程贤策的相识，以及他们在 1950 年代的交往。这使我了解程贤策在文革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据乐黛云老师的书所描写，在 1948 年，程贤策是最先向她介绍了延安和教她唱了共产党的歌曲的人，是她的领路人。那时他们都是北大的文科学生。1951 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程贤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乐黛云当时掌管一个四千人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划出了八个"地主"。据说即使按照当时写出来的"政策"，"地主"要有特别的劣迹的才杀，但是上面来的一个副县长下令把这八个地主全部就地枪决了。乐黛云面对面地看见了枪杀，看见"陈尸三日"。她当时不能习惯这样的残忍。是作为团领导的程贤策说服了她，要她把这样的"惩罚"视为"必然"，告诉她不要从道德角度去考虑这样的杀戮，从而从理论到实践接受了这种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人的残酷做法。

不知道这个程贤策当副团长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管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杀死了多少个地主。这是不讲法律依据也没有审判程序的杀戮。这样的杀戮，破坏了法律制度，破坏了道德和良心，也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参与者以革命的名义作了这些，在参与杀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改变成另一种人。

乐老师的书里没有写这样的"土改"之后程贤策具体作了什么。我仔细阅读了北京大学在 1998 年为百年校庆所编印的《北京大学纪事》，从中找到程贤策在北大的踪迹：他在 1950 年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团主席，1951 年建立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时候，他当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当过统战部副部长。1959 年，他被任命为专职的中共中文系总支副书记。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每个教员都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用了一个相当难听的比喻性的说法叫"洗澡"。有的人被强迫在大会上"检讨"了很多次才过关。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有些人自杀了。在"院系调整"中，大学重组。所有的教会大学被取消，北京大学搬到了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把 589 个学生和 110 名教职员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 8983 人，教职员人数是 1399 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过了百分之五。当初搞土改斗地主的乐黛云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被她说服未随父亲去美国留学的好友和同事朱家玉成为"右派"后投海自杀。中文系的一批老师被划成右派，还有一批学生也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请读"林昭"网页）。她在成为"右派份子"之后离开北大，回家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又在监狱中被枪决。象林昭这样在成为"右派"后又进监狱又在文革中被枪毙的北大学生，至少还有两名。

一批一批的人成为"敌人"，一旦被指控，就被无情地清洗出去，既不能自我辩护，也逃脱不了残酷的处罚。革命的巨爪不但在校外，也在这所中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学里面，把人一把一把抓起来，糟蹋丢弃。

在这一系列改造原来的北京大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过程中，到 1966 年为止，程

贤策看来一直没有出什么问题，他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文革开始了。这一次，他被指定为革命的对象了。

乐黛云的书写到了程贤策的人格魅力，他的高大的体格和好听的歌声，他的同事们也说到他的精明活跃与文雅的风度，这些该都是真的。但是文革来了，这些都不能帮助他。他被"揪"出来被侮辱被打骂被"劳改"，就象 15 年前在江西的那些地主和 1957 年的北大的那些"右派份子"一样，在一片喊打之声中，毫无办法自卫。

1966 年的所谓"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就象 1950 年的地主，就象 1957 年的"右派份子"。象前几次的革命一样，只要革命的领导人圈定你是"敌人"，你就失去了法律保护和得到社会正义的可能，死路一条。程贤策对这套做法可能理解非常深，在采访中，认识他的人都没有提到他曾经抱怨过他所受的虐待。只有对这一套不够了解的人才会惊讶和抱怨吧。程贤策忍耐了三个月。他自杀了，没有抱幻想。

在 1966 年，程贤策从"革命者"变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看起来，文革好象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且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年轻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与准备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程贤策的死亡是恐怖的，是悲剧性的，他的人生道路也如此。

文革受难者卞仲耘

王友琴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　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 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 。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 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 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 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 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 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 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 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 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 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

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 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 ，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旧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 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 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 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 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 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 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 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 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 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 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 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 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 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 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 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 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 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 。时值 8 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 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 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 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 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 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 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 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 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 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 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 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 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

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 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 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 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 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 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 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 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 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 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 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 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 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 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 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工作了１７ 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 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 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 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 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 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 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 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 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 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 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 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 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 "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 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 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 的领导权"；在５月１６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１９６６年5月7日毛泽东 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 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 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 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 6月1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 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 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 "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 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 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 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 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 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 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 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 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 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 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 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 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 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 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 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 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 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 副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 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 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１９６６年3月北 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 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 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 ，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 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 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 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 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的实质内容 ，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 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 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 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 大字报之一，１９６６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 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 ，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 "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 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 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 供制作大字报的纸

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 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 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 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 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 发批判"者，都作义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 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 ，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 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 （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 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 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 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 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 "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 ，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 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 京西城区的６１所中学，一类３·３％，二类３３·３％，三类５８·４％，四类 ５％；４７６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４％，二类４２％，三类４０％，四类１４％ 。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 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 ，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 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 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 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 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 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 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

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 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 ，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 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 我辩护。

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 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做出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 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 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分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７月５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 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 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 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 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 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日子 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１９６６年6月４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负责 人"划类"的部分。此书也一字未提卞仲耘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

１９６６年6月在北京具体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 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 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 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 ，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揭发" 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检查交代 ，然后定性处理，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 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 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年7月２３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 ，大部分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分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被送去农村劳 动，一部分"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 重处罚，但是不会被活活打死。１９６６年6月１８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 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 ，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 。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 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

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 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 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 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 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 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不"冷冷 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 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６月１８日事件是"革命事件 "。更进一层，８月５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 "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 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 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 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 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首先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让红卫兵 摘掉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 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 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 "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 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 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 "，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 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 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 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 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 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 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 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 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 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 夫说，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 毫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 也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８月５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 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 但是，给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 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

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 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 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 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 ，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把她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 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 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 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 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 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 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 ，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 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 。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 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 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 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 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 ，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其实意思是说， 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 的领导人觉得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 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以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 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７次）。８月１８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 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 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 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 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 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道。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 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 。" 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 为"红色要武中学"。在

８月１８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 ，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五号人物，降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 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 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 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 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在８月１８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 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 项调查，在调查所及的１１５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 有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 的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 工，有：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 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 教师郑兆南，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吉祥胡同小 学副校长邱庆玉，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 瑞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 有一"娴"字。)，北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女书记，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 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大 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 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师范学院党 委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 冷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 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 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 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　　　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 年满１８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 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１３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 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的主要行 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 饭馆的服务员，一个１８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被绑在实验 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 上。来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 校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这个女子当时的罪名是"流氓"，１８岁的女服 务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与"流氓"何干？即使有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 惩罚？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学生又有什么权利来充当行刑人？可是在当时没有人站 出来问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制止这种虐杀。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 到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 死了７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８月下旬有３３３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 共有６１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 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１９６６年8月２０日 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１，７７２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 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死于８月５日，她的死尚未计入此数中。１９ ６６年８月５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８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 8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 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 ，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 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 对被斗者的讥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发生没有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 不安，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 ，裤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 ，使她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 巨轮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 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 的宿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 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这个 １４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 为"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 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 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 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 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 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 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 看到。母亲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 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

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８月４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 "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８月６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楼跳楼自杀。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幸存者却只能保持沉默。 自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惨剧发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 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 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难者们，都被吞没于 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关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 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 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 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写信者可能遭到跟 卞仲耘一

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 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有清晰的是非观念来裁定这是暴行。文革在当时并不是大部分 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无机会发出。人们在 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１９７１年，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 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１９７３年，卞仲 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 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块钱。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 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１９７８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 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４００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 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１９７９年４月，他向北京市 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 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外，他控告一个在１９ ６６年６月２３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 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 ，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 因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 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 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 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所谓"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 期是否适用，是一个未经法律论证的疑问，因为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 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自己"否定"；又因为，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 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追 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使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的说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在她的学校中，１９６８年８月 11 日，有一位化学女 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翻 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 的丈夫（也是中学老师）几乎被打死。她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 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救 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你 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胡 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诉红卫兵杀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 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 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 命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 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１９７８年以前，被害人 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检 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 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 卫兵也不被起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１９６６ 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如此 处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 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 "、"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 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掩盖文革 的起因。众所周知，１９６６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 ，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 明显而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 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 是没有任何进展。又过了8年，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 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１９６６年8月５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 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ＸＸＸ没有联系。因此 ，不能认定ＸＸＸ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ＸＸＸ在１９６６年6月２１、２２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 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 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 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 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谋杀案件，没有 "追诉时效"限制，不论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哪怕没有人 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 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发生大规模校园暴力迫害行动） ，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 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１９６６年8月２７日，在卞仲耘被打死 ２２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 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 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也未追究。

最高检察院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 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 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 准追究。审判"四人帮"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电影界人士。因为江青曾经 在上海当过演员，在这一迫害中，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１９６６年的 红卫兵暴力，则很难被解释为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就不加追查。这样的法 律追究方式，显示了政治需要对审判的客观与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线无法越过，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依 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２７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尧已 经走到了头。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 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 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 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 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 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以及各种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 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平反"文章的准 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 报导。千万教师们在文革初期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 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 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出版的 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 字。

忽略教师们所受的迫害，不仅是因为媒体并不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 受害者平等对待，还显然是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 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 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线。官方规定了对 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 外。

今天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问，为什么杀死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从 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１９６６年5月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五 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6月开始。"工 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 批判会"对她进行"斗争"。 8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 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指责，直接导致了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 的开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师大女附中是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的 学校之一，那里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6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两个局 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八十年 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

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当时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 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 之后，胡克实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他能道歉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 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 实。

假若卞仲耘能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暴力中活下来，在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 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那时，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 涛副校长，被连续"斗争"过４８个小时。那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 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 。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４８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 "中，这个学校在１９６８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 ，历史老师梁希孔。胡秀正老师死时只有３５岁，留下了５岁的女儿。周学敏老师 温和文静，她的语文教学法曾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宣传推广，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 压力。上过梁希孔的课的学生说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很受 欢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难以承受"清队"中那种阴暗残忍的体力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梁希孔老师上吊自杀。

如果能活过１９６８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１９６９年， 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 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 论"，会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 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 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１９７３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学 校。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文革中被该校红卫兵严重打伤。他的肾脏被打出血， 头上的一个大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侮辱。毛泽东死去两年后，１ ９７８年，他重新成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他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6年 校长，被整了１２年，１９９２年病故。他曾对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他对高干 子弟的特殊照顾作了反省，他以为那和红卫兵的产生与暴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 这些看法未能成文发表。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如此剧烈惨痛的经验，他 们的遭遇和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校体制发展变化密切联系。他们如果不能为后人留下 他们的记录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 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导教育界。１９６８年7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掌管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这两 个人还同时掌管北京大学。迟群是毛的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 东的机要员，初中教育程度，原来的职位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作为对比，卞 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一系列职务才升到 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教育程度毫无学校 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方向，相当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改造学校。原有的学校制度被改变：取 消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推荐大学生，等等 。这些改变一直顺利实行，未遭反对。但是，难道毛泽东是因为这个目标而要打死 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实际功用之一，但 是杀害她和类似的人决不是

文革领导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为了"教育革命" ，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 目的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理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被贬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 能对文革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最大动因，应该是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嗜好。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 打伞，无法（发）无天"。"无法无天"可能会给这样的人带来一种放纵的快乐。 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种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 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获得的"无法无天"的享受，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 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乐趣的时候，又不必担心被惩罚。他们的女儿的 老师被打死了，他们却未有任何恻隐之心。在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 他文革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 激昂，精神亢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 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 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 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 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 个名字，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

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１９９３年 ，笔者到校中摄下这张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 楼里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 听说过。"

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陈梦家，男，1911 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 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 1966 年 9 月 3 日自杀。

1980 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1931 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 20 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

等等。

1940 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 1948 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1 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 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 1990 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ーー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 1984 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 1949 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 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1966 年 8 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 年 8 月 24 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 年 8 月 24 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

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 1966 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 1966 年 8 月 24 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 8 月 24 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 年 8 月 24 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 20 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 1966 年 9 月 3 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 年 9 月 5 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 8 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 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 1950 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 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文革受难者沙坪

王友琴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１９６６年8月２２日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巨大的白 色圆

形佛塔，很远就可看到。这个学校在文革中改名为北京１５９中学。

有人说，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可能是被打得最 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头发都被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 物。后来她的尸体被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其他在该校"劳改队"中的老 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说， 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硬不敢进去。"

其实，别的学校被打死的老师，也是一样悲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陈述事实 ，打手拒绝说出经过，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发生在各校的红卫兵杀戮可 能情节不同，但是那些殴打和折磨的共同结果，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死亡。

１９６６年８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一共有十 个教职工和４个学校负责人在"劳改队"中。除了１４个在"劳改队"中的人之外 ，教职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闭、被围攻的还有三、四十人。这种校园"劳改队 "，或者又被称作"牛鬼蛇神队"，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学校园中 建立起来的，后来，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和所谓"牛棚"一样，校 园"劳改队"是最普遍最邪恶的文革风景线之一。

在女三中，"劳改队"中的人被拘留在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劳改" ，走路不许抬头，搬重东西必须跑步。体罚九十度大弯腰站立，可以长达六七个小 时。有人跌倒了，就用铜头皮带抽。罚跪，还要把头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许头顶着 地，有时还在大腿小腿之间压上大砖。有时让人跪着把木牌子衔在嘴里，有时要人 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盖红肿出血。谁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浇头 就是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猛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 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８月１９日，傍晚，在女 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这是第一室）里 ，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妈的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在这种审问中，被审问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为"不老实"而挨毒打， 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又换成铜 头宽皮带打。然后，又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然后，又命令他们 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们用铜头皮带加倍抽。他们用一只塑料鞋底，专 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抽打声，吼叫声，透过窗 户传到外边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这样打到凌晨三点，他们又强迫"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写"揭发材料"，谁 要是不写，谁要是写不出，谁要是写得慢了一点，就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会" 。"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 们被用绳子捆着，用嘴叼着"黑帮头子""黑帮份子""大右派份子"被赶赴"斗 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斗 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 ，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抬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他们捣乱 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 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着，一路毒打，驱赶"牛鬼蛇神"在 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 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着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 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 ，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 着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８月２０日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 大队长叫他们跪着，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 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三天三夜的殴打和折磨之后，１ 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岩梅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校外一个司机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 是"女流氓"。红卫兵把她打死以后，还强迫"劳改队"里的人轮流打尸体的脸。 然后，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 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着他们在那里"游街"。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 个人，不就是２８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 包含着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２８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 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打死， 或者

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笔者已知的有：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８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 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８月２２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被殴打折磨 而死。

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靳正宇、姜培良老师被打死。

８月２６日，清华大学附中２６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 "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 "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８月２７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９月６日，北京第５２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于死亡， 时年３６岁。在此之前，副校长易光轸被毒打后自杀。

９月８日，北京第２５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被打死。

１０月１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邵庆玉被打死。

１０月３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笔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师范学院 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２５中学的一位校工，北 京第１３８中学姓张的负责人，北京女四中的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都在这一时期 被打死。他们的确切死日和全名，还有待继续调查。

笔者已知的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自杀。北京第 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 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 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 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 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 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６５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 杀。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 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

导主任，在被侮辱 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跳楼自杀。他们 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５１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早在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就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从卞仲耘的死到沙坪的死，已 经有１７天。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在８月５日立刻被直接报告到权力高层。但是没 有人来制止天天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 和广播每一天热情报道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 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后， 暴力行为进一步大规模升级。沙坪就被杀害于这一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在 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杀戮，在北京持 续了整整两个月。

事实上，不但在中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另外，不仅在 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仍然被关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 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苕。她在５月间刚生了孩子， 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搞运动"，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 。董光苕的父亲叫董振堂，三十年代从国民党的军队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红 五军"的军长，１９３７年１月在甘肃高台战死。董振堂死后被尊为"革命烈士" ，他的妻子即董光苕的母亲一直受到优待。董母听说校长沙坪已经被打死，女儿关 在学校"劳改队"中不能回家，她想下一个被打死的就会是她的女儿了。她给毛泽 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女儿的处境，请求救助。她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这 封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收到了此信，并对此信作了一个批示。 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苕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苕 。董光苕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 董光苕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在当时算是极大的幸运。她安全活了下来。 但是，三十年后，她和笔者谈到毛泽东"如无大罪恶"的话，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 。她说，她跟"大罪恶"有什么关系呢？

董光苕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他学校的大批老师 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 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 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 他们说一句话。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 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 "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 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苕被"保"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 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群众运动 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 字。文革领导人热烈支持

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 的。

应该说明，１９６６年８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 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 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一个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８ 月３０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 》第４５０页。现全文照录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１)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２)部长、副部长　（３)政副　（４）国副　（５）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６）两高（李宗仁）

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 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打死。至于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们， 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８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 大规模展开，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的时候，由最高层当权者下令保护数字很少 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着宣告这数字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护。

生命的被保护本来是宪法给予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一方面是对红卫兵的赞扬和鼓励，一方面是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 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无法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 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２８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 的小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０月，北京有数千名教育工作者与和平居民被红卫兵 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 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 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杀害教 师和居民，制造了这场杀戮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的这场杀戮上。

１９６６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１９６８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 ，被"隔离审查"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 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 到审问甚至刑讯，"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１９６６年有所不同 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 １９６６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这样，在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 暴力迫害后自杀，一共有四个人丧失了生命。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 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１９５７年被划成所谓"右派份子"，后来"摘 "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 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 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１ 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 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 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 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 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 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 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象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 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 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 。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 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 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文革后，１９７９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 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 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了一半就不能进行了。参与打死沙坪的人住在北京 的军队"大院"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

无声无息的受难者陈彦荣

陈彦荣，男，1929 年生，1966 年时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 年 8 月 27 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当天夜里陈彦荣被打死。死时 37 岁。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体鳞伤。"红旗"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另一同时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未留骨灰，但是要陈家付出 28 元钱火葬费。

陈彦荣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 109 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近。

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织"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也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热烈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是一个和"红卫兵"类似的在 1966 年 6 月间出现的组织。在这封信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时，校园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校发生。大批教育工作者遭到毒打和侮辱。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此校红卫兵打死，成为北京学校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1968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报纸多报了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这无疑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的鼓励和推动。在 8 月 18 日接见大会后，红卫兵对和平人民的暴力迫害和杀害的规模急速升级，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大到北京的普通市民。

1966 年 8 月 27 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里包着饺子，等家人回来吃晚饭。陈彦荣是个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有七个孩子。虽然长子已经参加工作，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才三岁，经济上不宽裕。只有周末才能买几毛钱肉包一顿饺子。因为猪肉贵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饺子馅儿也总是菜多肉少，但是他们总是吃得很香。陈家住着很小的两间平房，很挤。陈彦荣的儿子陈书祥，1963 年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升大学，留校当了初中的老师。参加工作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住在学校的单身者集体宿舍里。

那天下午，陈书祥肚子痛，去清华校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慢性阑尾炎。然后他从校医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时他还没有钱买一辆自行车，总是步行来往。走了半个来小时，六点左右，快到蓝旗营家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有二三十个，都是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的邻居张俊英老太太站在门口，远远看到他过来，连连冲他摆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离开。但她没有说话。陈书祥明白过来以后，扭头就走。到了街角，他转过弯就跑了起来。他紧张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气跑到附近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家。把家中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亲戚，想讨个主意。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向当时的"教师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说了家中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助他。陈书祥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预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 8 月 26 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主持了一个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在五楼的大阶梯教室里，学校的老师和行政干部进来的时候，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所谓"牛鬼蛇神"，他们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红卫兵除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和用塑料跳绳象麻花一样拧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 "。"斗争会"从 7 点一直开到 12 点多。"揭发""控诉"和毒打交替进行，还穿插着大声高呼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等。到了后半夜，散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明天，也就是 8 月 27 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律下到班里去，那潜台词分明是到各个班上挨斗挨打。8 月 26 日晚上被打得最严重的有清华大学主管附属中学事务的副教务长邢家鲤，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团委书记顾涵芬，物理教员刘树华等人。邢家鲤、万邦儒和韩家鳌被严重打伤。顾涵芬被打得失去知觉，扔在自行车棚子里，她的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丈夫来把她背回家去。顾涵芬的头发被剃去半边，即当时所谓"阴阳头"，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从此几乎完全失明。物理教员刘树华 26 岁，刚刚结婚不久。他以前曾经追求过别的一个女子，未成。但是他的有关故事却被学生写在大字报上，说他是"流氓"，还画了大幅的漫画羞辱他，在 8 月 26 日晚上，又在大庭广众前面毒打他。"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回到他和人合住的房间。他妻子不在北京工作，他结婚后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明斋"。他回到房间里，又悄然离开。他到了清华大学锅炉房，爬上锅炉房的大烟囱，从烟囱顶上，往里面跳了下去。据看到尸体的人说，因为从很高的烟囱里面直直地落下，刘树华的两条大腿骨头几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体，极其可怕。刘树华死的时候２６岁。他死的时候，妻子怀孕不久，家中还有瞎眼的老爹。后来他的妻子和瞎眼老爹多次到清华附中"上访"，无结果。刘树华比陈书祥早两年开始在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他的死给陈书祥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他还没想到他自己的父亲紧接着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这天并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第一次打人。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从8月初起就不断被打，几次打得血流在地。也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剃了头发和挨打。这天掀起的是打人狂潮的新的一浪。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之后，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除了焚烧书籍毁坏文物外，还进行大规模"抄家"并打死人。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的杆栏市，一个以前的小业主李文波被抄家和殴打。据红卫兵当时宣称说，李文波用菜刀攻击了红卫兵，是"阶级敌人杀害红卫兵"。此事立刻传遍北京城。此事也立刻报告了文革领导人。查当年的"首长讲话"记录，周恩来总理在几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事件，强调要注意保护红卫兵。文革后，据有的知情者说，李文波根本没有动手刀砍红卫兵，只是曾要求红卫兵让他的妻子上厕所。在当时，这一事件不但导致了李文波夫妇和杆栏市地区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借口。"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红卫兵新的暴力行动的口号。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8月26日，白天，清华附中红卫兵打了一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差一点被打死。 晚上，又召开"斗争会"，直接导致了刘树华老师的死亡。第三天，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走。

天色全黑以后，陈书祥又回到蓝旗营家中。这时红卫兵已经离去。他进了家一看，父母都没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岁，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妹妹才３岁，都还没有吃晚饭。他们的家被抄了，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墙上黏着一些还没有煮的菜肉馅饺子，是他母亲准备的周末的晚饭。抄家的红卫兵把生饺子摔在墙上地下，残破饺子东一个，西一个。红卫兵要陈家交出"变天账"和"地契"，陈家拿不出来。红卫兵仔细搜查了一通，也没有找到，就把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一起带走。陈彦荣的子女们不知道红卫兵把他们的父母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红卫兵会对他们的父母作什么。但是从连日来的暴力行为，他们知道巨大的灾祸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恐惧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的母亲刘万才被放回来了。母亲遍体鳞伤。母亲进家门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红卫兵让送２８块火葬费。他们的父亲陈彦荣已经被打死了。他的尸体需要焚烧。

在８月２６日来他们家抄家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这些人来到陈家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陈彦荣还没有下班。他们要刘万才拿出金条和手枪，刘拿不出来，他们就把刘打了一顿。六点左右他的大儿子陈书祥回到家门口又逃开的时候，陈彦荣也还没有回来。陈彦荣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也有好心的邻居朝他摆手，要他躲开。可是陈彦荣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进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红卫兵就要捆他。他见情况不对，就往外跑。 红卫兵在后面追。陈彦荣跑进旁边的院子里，就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里被打了一通。他的１２岁的儿子陈树刚也被打了。接著，"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他们俩被绑在暖气管子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那时，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也被关在一个厕所里多日，被打得死去活来。陈和刘在清华园中学被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中北京最早开始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7月底，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江青和毛泽东大力支持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他们首先毒打了副校长刘美德。他们剪掉她的头发，往她嘴里塞污秽物。刘美德当时怀孕。

有一次记者来访，红卫兵强迫刘跪在一张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脚踏在她背上，以充份体现毛泽东说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摆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他们把几十个老师职员打入"劳改队"，折磨殴打。他们让图书馆管理员李洁跪在一个抽屉里，动弹不得，用火钩子打她。李洁后来被打死。当时北大附中有 25 个老师和干部职员被打入"劳改队"中，每日受到折磨和侮辱。当时去过北大附中的一位北京大学学生说，那时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使他们这些去"革命串连"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很多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断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着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造地。这个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诅咒为"混蛋"，被红卫兵殴打或侮辱。比如，高中部的一个学生朱同，父亲在 1957 年划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关在一间地上有水的房间里供"示众"，其他学生象看笼子里的动物一样去观看。朱同被打成重伤，不能走路，后来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女学生万红，站在一个凳子上被"斗争"，实际上是一边被骂一边被铜头皮带打。然后有红卫兵把她脚下的凳子一脚踢开，她从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陈彦荣和刘万才被押到北大附中以后，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打。他们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的军用皮带抽打。"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和他的妻子，被从大概 9 点钟的时候一直打到半夜。后半夜一点左右的时候，陈彦荣死了。快咽气的时候，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没有给水。然后，不久，37 岁的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面前。那天晚上，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陈彦荣的妻子被放回家的时候，"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 28 块钱来。"当时的火葬价格是 28 元钱。1966 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 28 块钱的事吗？"这 28 块就是指的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28 块钱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陈彦荣家里拿不出 28 元钱。陈彦荣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是同情他们愿意借钱给他们的人也不能不心存疑虑。大儿子陈书祥到学校去东借西借，凑全了这笔钱。他想把这钱送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把父亲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权力机构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掌握。原来的校长等等都已经是被"斗争"的对象，并且遭到野蛮的肉体折磨。陈书祥作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工作人员，要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收其父亲的尸体，按照当时的规则，需要由本单位领导机构开一张"证明"。他的这张领尸"证明"，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 兵开的。信的全文如下：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 敬礼 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6，8，28

在手写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字样下，还盖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茶杯口大的圆形图章。

陈书祥拿着这一信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到了学校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在那里犹豫再三，不敢进去。打人还在校园里继续进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当时红卫兵把这些人叫做"狗崽子"。北京大学附中是最早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地方。这个文革新词的意思和其中包含的意义很清楚。陈书祥不由不害怕进去以后在那里他也会被打。徘徊了一阵，他在校门口听到有人说，今早有两具尸体被拉走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去问他父亲的尸体事。他无声地离开了。他把那借来的２８元钱交给了母亲。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那 28 元钱。

据北大附中校内的目击者，一位老师，说，曾经看到有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红卫兵骑着摩托车(抄家抄来的)从死尸上碾过来碾过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身体。陈彦荣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丢掉了。留下来的是这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他那天没有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去，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信。后来，他把这张东西保存了起来。

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还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这种圆形图章一直是共产党或者政府行政机构所用，通常被称为"公章"，代表权力。所以当时流行的说法，也把"掌握权力"称为"掌握印把子"。

这一未被使用的"证明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和社会风貌：(1)在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地的暴力迫害程度。(2)红卫兵组织执掌行政大权的情况。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过了他们取代的原先的学校领导，而且具有在文明社会中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杀人大权。他们打死一个人，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不需要经过任何批准。打死人以后，他们没有觉得惊慌震动，更没有觉得有愧。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处理了死尸，还不忘找到陈家要家属付出 28 块钱的火葬费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印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有人被打死了，对他们好象是很普通事情。

对于 1966 年夏天，至今没有过一个细致如实的描写，以致造成了种种关于文革的误解，甚至对那些试图批评谴责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种看法是文革发生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如 1966 年夏天那样杀人。我们知道著名的包公的故事。因为他是著名的清官，皇帝特别赐予他虎头铡刀，可以自行决定对人处以死刑。包公用此铡刀，杀死了犯罪的皇帝的女婿陈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别的人物才有此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别的官员都可如此。高官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这样的杀人权。可以说古代有大量枉法的事情，产生了大量的冤案，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还是有一个法律程序。杀人判刑，要经过法律程序，否则就是土匪强盗或者罪犯的行为了。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开除刘少奇党籍，制造伪证甚至逼死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倒可以和古代的冤狱相比。至少文革的领导人对刘少奇还认为需要一些伪证，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费心制造了一批伪证。可是北京在 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象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

的。

陈彦荣被打死了。他家人没有了主要生活来源。他的大儿子当中学老师，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是３７元。要负担母亲和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单靠３７元工资十分艰难。当时也非常难找到赚钱的方法。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耗费国家的无数财力物力搞文革，普通人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糊口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坏东西。陈彦荣的孩子们想尽了办法挣钱过日子。他们到荒地上打草，晒乾后卖给牛奶场。他们养兔子，卖给收购站。他们也拣大字报纸卖。当时国家无限提供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浆糊。单位里和大街上都一批接一批地贴出了无数大字报和大标语。这样不知用掉了多少纸张。旧大字报可以当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三分钱一公斤。撕大字报是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当时一些穷孩子就守在贴大字报的那些地方，有人来贴新大字报需要覆盖旧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就一涌而上，把旧大字报先撕下取走。1966年底，在北京的冬天的严寒中，有一批这样的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他们穿着不太暖和也不太乾净的衣服，拖着大筐子，在街上奔走，脸蛋和双手冻得通红。这些孩子中就有陈彦荣的孩子。据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的文章说，他曾在北京团城上写过八张纸(整张纸，一般的书本只是这样一张纸的 32 分之一)一个字的大标语。有些人后来甚至还写诗赞美他们所写的标语字体之大，如文革时代最红的"革命诗歌"《理想之歌》中就如是写。这些人以写大字报为壮举，把浪费纸墨当作"革命豪情"洋溢的表现。但是对这些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来说，那个"革命"从来就毫无浪漫色彩可言。

陈家的人在陈彦荣被打死以后，给中共北京市委等写信呼冤。陈彦荣家人的申诉信，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六年以后，陈彦荣的孩子长大要分配工作。当时年轻人的工作分配主要取决于家庭出身，所以陈书祥及其弟妹后来转而要求为被打死的父亲做个＂结论＂。没有"结论"，陈彦荣的子女就不能分配工作。他们的父亲不是犯了死罪的罪犯。他们的父亲被打死了，不能要求追查凶手，却还得乞求给他作个"结论"。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不能掩盖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情的时候，就转而分辨说他们当时打死的人是"坏人"，拒绝认错。

陈家所住的蓝旗营，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管辖。他们作了外调，发现陈彦荣从小就在北京做工，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做过校工，1965 年进了中科院当工人。陈彦荣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工，在 1917 年就开始为清华工作，1958 年退休。他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县。他在清华做工的时候，他的妻子留在乡下。他把在清华大学赚的工钱攒起来，在乡下老家买了一点地。五十年代初"土改"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陈彦荣的母亲，被划成＂富农成份＂，但未被戴上富农帽子，。不算"富农份子"。这就是北大附中红卫兵来抄陈家的"理由"。1973 年，陈彦荣被打死七年之后，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给陈彦荣做了"结论"。，陈彦荣被确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他的死被定为"误伤致死"。当时，这种＂结论＂甚至没有给家属一个副本，所以现在无法抄录出来。但是，能够这样，当时家属们也就感到十分庆幸了。因为陈彦荣的"结论"的说法分明包含着当时当局坚持打死别的人并不错。他们被打死，就是应该的。他们死了，还是"万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家属受到株连，失去城市户口，失去住房，失去上学和就业的可能。虽然事实上在被打死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判过死刑，甚至没有被判过任何罪。

1973 年，文革领导人开展了一个"反回潮"运动，专门打击任何对文革的批评和不满。陈彦荣的大儿子陈书祥因为说过"我父亲死得冤"，在清华附中的会上被点名道姓地批判，说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杀父之仇。"在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最严重

的罪行之一。文革的逻辑是，哪怕按照文革时代的规则父亲被杀错了，儿子感到委屈也是"罪"。紧接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遭到最厉害的攻击，这实际上为文革中杀死陈彦荣和无数受难者的残酷行动再次制造理论依据。

1976 年，毛泽东死去。在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并继而否定文革之后，1979 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又给陈彦荣做了一次"结论"。这个结论是寄给各个子女的工作单位的。这时，政工部门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改变，除了寄给工作单位之外，也给了子女们一个副本。此信如下：

你处 同志系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的子女。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同志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期，被林彪 " 四人帮 " 反动路线迫害致死。经过复查该同志没有问题，经过街道党委研究，给予陈彦荣同志平反昭雪，并撤销第一次结论。

现将结论寄给你们，请将原先结论及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政治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提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上面提到的现在无法看到的那一个。

一个月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共产党支部发出了下列决定：

关于陈彦荣同志抚恤金和生活困难补助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将陈彦荣同志拉到学校，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注：这个句子在语法结构上有问题，也没有准确写出事实。但是原文如此。"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是当时所有的平反书上的公式性的套话。红卫兵是毛泽东直接支持的。十分明显的是，这是因为避讳谈及毛泽东以及红卫兵的责任而只好采用这样的含糊的甚至不通的说法。文革的问题只准归责任于林彪和"四人帮"，而不准涉及毛泽东以及 1966 年的红卫兵。）

关于陈彦荣同志被迫害之死的政治结论由中关村街道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已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附中党支部写报告经一办同意，给陈彦荣同志丧葬费 240 元；抚恤金 180 元；生活困难补助 1000 元，共 1420 元。

陈彦荣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爱人体弱多病，家有七个孩子，当时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现有四人参加工作，有一人待分配，二人上初中。鉴于上述实际困难，经党支委会讨论，由北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准，再给陈彦荣同志的家属生活困难补助 1080 元，共 2500 元，两次付清。

北大附中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加盖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圆形图章）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 1966 年 8 月 27 日那天也被打成重伤，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

1979 年她拿到那些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哪。"

付给这后一笔钱的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这个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候，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并不掌管学校，其中有的成员自己也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严重打伤。

至于这 2，500 元钱从哪里来，是另一个需要想想的问题。这钱当然来自工作的人们。普通的人民辛苦工作，有的受到伤害，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如陈彦荣，其他人即使没被打或者没被打死，最后还要分摊这样的一笔开支。

陈彦荣的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66 年 8 月 27 日，陈彦荣被打死的那一天，据一份"内部"的统计，北京有 228 人被打死。这还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 8 月 23 日被"斗争"和毒打后于 8 月 24 日自杀身死的，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数，以致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烧不过来，出现了火葬也要排长队等候的情景。由于对被打死的人的高度蔑视，红卫兵不准火葬场保存个人的骨灰，有的家属出于恐惧也不敢要求保存骨灰。另外，从技术条件方面说，火葬场也难以作到。从一些红卫兵的打人场所送来了大批死尸，有的是由卡车运来的，有的是由平板三轮车运来的，一车很多尸体，没有姓名标记。大量尸体堆积在火葬场里。火葬场加速焚烧，不能也没有打算给各个人留下骨灰。当时正是八月炎夏，气温很高。火葬场放了大量冰块镇在待烧的尸体堆上。平常火葬场焚烧的尸体，都是身体乾净服装整齐的。

让死者乾净整齐地离开人世间，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这样作了数千年了。但是这些人被从打死的现场直接送到了火葬场，加上他们是被打死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所以尸体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气味极其可怕。目击者说，惨不忍睹，恐怖至极。

1966 年 8 月 29 日，陈彦荣被打死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通栏大标题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的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始终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社论还说："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这样狂热的鼓励，加上煽情而模糊不清的对攻击对象的定义如"寄生虫""吸血鬼""变天账"等等，日接一日，越来越多的人象陈彦荣一样，祸从天降，被活活打死。

在 1966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份文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报告了在当时刚刚过去的 1966 年夏天的红卫兵的"破四旧中的"战斗成果"，其中有被没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来的黄金白银和现款，以及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1，772 人。关于这 1，772 个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人名。作为文革的战利品，这些人和被没收的金银和钱列在一起，他们的姓名当然不被认为有必要写出。这个文件也未"传达"给普通人。

十三年以后，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先已经死去的跟"四人帮"一夥的谢富治也在《北京日报》上被点名批判。谢富治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关于谢的长达近万字的文章里，提到在 1966 年夏天在北京有 1，772 人被打死。文章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一数字，没有说他们是谁，没有说出任何名字，也没有说他们是被谁打死的。另外，文章也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陈彦荣是否被计入这 1，772 个无名的受难者中，无从知道。那一时期，报纸杂志发表了一批文章，是关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在那时被平了反的人们的。但是这些文章所写到的人，只限于非常高级的干部和一些著名人士。即使对他们，也限于写他们生前的种种美德，很少写到他们是怎么死的。在 1966 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高潮时被打死的人，都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被打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可能表示丝毫的抗议。在文革后，他们中有些人的家属得到了一些钱。因为陈彦荣子女幼小等原因，陈家得到的钱比较多，有 2，500 块。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他们没有机会被媒体提到。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可能向社会说出他们的冤情。他们始终是无声无息的受难者。

1966 年的 8 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写入他们的文章和诗歌中。红卫兵在所谓的"红八月"的主要活动，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和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就是抄家打人，制造了北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杀戮。但是这些杀戮在当时和在文革后，都从未被报告。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几百页的专书中，都没有写出 1966 年 8 月的血腥杀戮。几千个被活活打死的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一次又一次被忽略不计。文革的大图景也因此被歪曲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一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年的红卫兵向陈家人表示道歉。是这些人忘记了，还是隐瞒着？或者，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人的生命在他们那儿不值一提？文革以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头头之一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在文革中受了迫害。在文革的第一年，她是毛泽东和江青亲自表扬过的人，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过话，红极一时。后来，残酷的"革命"继续扩大打击目标，把她和她的父母那样的高级干部也当作了攻击对象，也是事实。但是，她绝口不提她掌权时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在北大附中校园里所作的杀戮，也一字未提，他们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毒打，更没有表示道歉和悔过。

陈家的两个兄弟分别说起三十年前父亲的死，都异口同声地埋怨他们自己，后悔自己当时没能及时想出办法来。他们设想，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下班回到家中，他们想如果他们机智一点，就会想办法在半路上迎到父亲，不让他回家。如果能这样，他就不会被打死了。他们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父亲教育程度低，脾气不好，不善说话，落到红卫兵手里一定没好。三十年来他们常常想这个。他们责怪自己不够聪明，反应不够快，没有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他们深感内疚，觉得他们对不起父亲。但是，谁会想到像他们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普通市民，就这样会被红卫兵从家里捉走打死呢？除了文革的领导人和打手，谁能想到这样残酷的结果呢？他们自责。因为他们是儿子，并有正常人的感情心态。他们不是那种冷血动物。他们会如此抱憾一辈子。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和其丈夫一起被抓走并被打。她说，那天晚上和她丈夫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老年女人。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据说，"文革"结束之后，没有人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为那个老年女人"落实党的政策"(这是当时所用的语言，意思之一在于强调这是共产党为受害者作了好事，而不可以是受害者通过法律程序申诉的结果)。所以，这个人的名字都未留下来。没有人来为她申冤。也许，这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存活在世，或者，她的亲友已经觉得＂落实政策＂对死了二十年的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必进行。那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7日，她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然后又一起被送去火葬场

烧掉了。从那时起，她的肉体与名字，都永远地消失了。比陈彦荣更甚，她是一个无声无息而且无名的受难者。

几千人和陈彦荣一样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但是，对他们的杀害是公开地甚至大张旗鼓地进行的。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的很多胡同口都有被打死的人的尸体运出来。大多数老百姓虽然不一定知道死者的名字和故事，但是都目睹或者听说了他们的死亡。这些死亡对普通人当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怖。并且，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和"罪状"实际上更增加了恐怖的威慑力。为了不被打死，为了逃避相当随意的处死，人们不敢说，不敢做，最后甚至不敢想。回顾文革，无数人被折磨，被虐待。是他们喜欢被这样对待吗？显然不是。但是没有人反抗。十亿人，在文革后能找到的反抗过文革的人，廖若晨星。毛泽东部署的每个步骤，都很顺利地进行。有人用人民的"愚昧"来解释，有人用群众的"理想主义"来解释。实际上，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必羞于承认，是对被打死和被打的可能的畏惧，使得无人能站出来抗议。 指向清楚但是又有相当随意性的暴力迫害，这是对文革众口一词人人从命的现象延续十余年的主要原因。

几千人被打死也是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清理城市的计划的一部份。几千可能的"牛鬼蛇神"被彻底清除了。还有，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同时和之后，根据"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通令"，北京市九个城区近郊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这些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注销户口扫地出门，去农村地区。他们被强迫从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离开北京。他们只被允许带走每人一个锅一个碗和极少量的衣物。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站又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毒打甚至被打死。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农村后再遭"斗争"而自杀。这十万人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但是在当时，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选择，他们只好毫无反抗地离开了。是陈彦荣们的生命和血，使得这场大规模的清洗未遭反抗，就顺利完成了。文革的领导者们从中大大肯定了他们自己的无边的威摄力量。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砸毁焚烧了无数文物和书籍。当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和书籍对收藏者来说非常珍贵，人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书籍和文物。虽然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但是扫荡书籍文物的红卫兵如他们自己所得意地描绘的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并不是北京人顿时改变了文化观念和欣赏趣味，是因为这一行动是与对人的杀戮同时进行的。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的全部私人房屋被没收了。有私人房产的人几乎都被抄家，包括那些家中有人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成员的家庭在内。在 1966 年 8 月下旬被打死的人，有相当一部份是那些有私人房屋的人。实际上，北京的私有房屋，特别是那些较大的私有房屋，在 50 年代已经大量被没收。然后，1966 年夏天，北京的所有房屋都不再是私人拥有的了。房产拥有者去政府办公室，排队交出他们的房产证。在生命和房产之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同时，除了失去所有权之外，他们还必须让别人搬进他们自住的房屋。任何可能的私人空间都被剥夺了。

如果站在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打死陈彦荣和其他的数千人，显然能造成巨大的恐怖，而巨大的恐怖必然有巨大的威摄力量，这使得文革领导者所要的建立的文革的权威，红卫兵的权威和毛择东的无上权威，未遭些微反抗，就顺利完成了。陈彦荣和其他同时期被打死的几千北京人的血，润滑了文革的红色巨轮向前推进。陈彦荣的死，是疯狂和混乱的残杀的结果，也是一场显然有计划的城市清洗和建立革命权威工程的牺牲品。

然而，即使是从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为他们的社会"革命"，打死陈彦荣是"需要"的吗？肯定不是，当时的情况，没收私人房产和个人手里的黄金和银子，用和平的手段而不用红卫兵杀戮的手段，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文革的领导者们用了 这种"史无前例"的暴力杀戮，而且为此得意，为此欢呼。动用中学生红卫兵杀戮北京的和平居民，不能用社会改造的需要来解释，而只能理解为这是出于他们的特别的嗜好。这暴力杀戮本身就是他们的文革目标之一。破坏和迫害，给他们带来了愉悦。他们对此表现出来的欣喜和赞赏，他们那种满意的感觉，他们的得意的笑容和姿势，在拍摄于 1966 年 8 月 9 月的多部记录电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没有被那个时代的媒体记录的，是陈彦荣和其他受难者的死亡。考古学家从坟墓中的尸体的姿势，来判断被挖掘出来的两千多年以前秦国的诸国王的坟墓中，有人是被活埋的。这些人的骸骨的挣扎的姿势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未来的考古学家却不可能这样来发现一个 37 岁的壮年男子陈彦荣的死因。在 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陈彦荣和别的有相同遭遇的人，都已经被焚烧成灰。而且，连他们的骨灰都已经被抛弃不见了。除了他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我们不能用文字来加以记录的话。

文革受难者李文波

编者按：这是作者所撰《文革受难者列传》之一。

李文波，男，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居民，１９６６年8月 ２５日，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其时正值北京红卫兵的八月杀戮走向高潮之 际。

一、八月杀戮中留下的唯一姓名

１９６６年8月下旬，在北京，有数千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有大批人遭 到侮辱和毒打之后自杀。当时，中国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通过接见、集会以 及他们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高度赞扬和热烈支持。但是， 数千被害者们的名字和死亡从未被媒体记载或提到；他们被抄家被殴打以致被打死 ，其中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他们的尸体被烧，骨灰一律不准留下。于是，这数 千被害者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声的死亡群体。他们的名字，随同那场残忍奇特的杀戮 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中。出现在下文中的八月杀戮的被害者的名字，是笔者通过 个人的访谈和调查，寻找出来的。

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 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１９６６年9月１０日在"首都 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１９６６年 9月２５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 波已经被打死了。这两个讲话和当时其他的"首长讲话"一起被印刷成书，作为红 卫兵运动的指导性材料，现在也还可以读到。在周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北京师大二附 中发生的另一桩类似事件，但周没有具体说出有关的名字（那一事件中被控反抗了 红卫兵的人名叫曹滨海，见下文)。除了李文波，在周恩来那一时期的公开讲话中 ，没有提到任何别的被打死的人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提到当时有人被红卫兵打死。

二、李文波之死真相

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 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关于李文波，当时红卫兵的说法是，李文波用菜刀攻击红卫兵，然后跳楼"畏 罪自杀"。李文波死后，红卫兵立即在北京传播"反动资本家杀害红卫兵"、"阶 级敌人在搞反革命报复"的消息。在继续进行的抄家打人行动中，"血债要用血来 还"成为新的口号。

一年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报纸《湘江评论》和北京６３中学红卫兵的 《红卫兵之歌》联合印刷了一期"红八月专刊"，以庆祝红卫兵运动一周年，所谓 "红八月"指的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１９６６年８月，其中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忆 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诗），下面有关于李文波事件的文章，题为 "榄杆市前洒碧血"（榄杆市是李家一带的地名）。文章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 日，"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 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文章写明是红卫兵先殴打了李文波夫妇；文章还说，李 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以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象雨 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显然，红卫兵把打死李文波 当成他们的"英雄"历史。

二十三年后，即１９９８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１ ９９８年第三期）。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 ，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 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 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 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 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 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 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李 文波事件在事实方面与过去不同的描述。

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便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 对事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如果被害者能象害人者一样发出他们的声音，通过比 较，我们不但能在事实方面，也能在心理方面，对文革有更深的理解。但是，李文 波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机会说出他们的话。

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他被打死后，红卫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 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 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计划。后来实 行的方法是，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 有数位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 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 刑，他补充说，这等

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 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 份支持。

判决李文波妻子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 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 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 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或重创。但是李文 波的妻子却被判了死刑。

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初中红卫兵。他们搜查 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 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 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 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 然而，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８月２４日， 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交上了他们的房产证书；他们也在家中挂 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 ，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 面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 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 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 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年纪并不很老 ，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 ，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 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 的人。但没有人死亡或者受重创。

这里的照片上，是李文波夫妇的家。这座房子的门牌是广渠门内大街１２１号 。这座房子建于５０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 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１９４９年以前有小产业，１９６６年时没有正式工作 ，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李文波夫妇有三 个孩子，他们在被抄家时逃开了，后来又被关在崇文区公安局里。

三，暴力升级的借口

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第二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上午，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高 三（一）班的教室里，红卫兵高声喊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向我毛主席的红卫兵举 起屠刀了"，毒打了班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昭、戴建中等四人。这些人 当时被称作"狗崽子"。因遭受毒打，郑光昭当晚发生休克，身体抽搐成反弓形， 差一点死去。这样的殴打那一天在清华附中的多个班级里发生。

８月２６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的大合班教室，召开全校性"斗争大 会"。

大会由该校红卫兵的一个领导人主持。会议开始时，一般的教职员列队从东 门进入会场；当时已被打成"黑帮份子"的老师、干部则从西门进去，他们中有附 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学校干部顾涵芬等人。 这些从西门走入的人早在８月初就已经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那晚的全校大 会上，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抽打他们，一直打到半夜。 顾涵芬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会后她昏迷在地，是由她的丈夫把她背回家去的。物理 老师刘树华从东侧进门时，红卫兵大声命令他站到"黑帮份子"那一边去。刘树华 ２６岁，刚结婚不久。结婚前他曾追求另一女子未成，红卫兵以此说他是"流氓" ，在学校的墙上给他画了一张桌子大的漫画，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字。那天晚 上刘树华和其他"黑帮份子"一起被毒打，他和邢家鲤被打得最厉害。"斗争会" 后，刘树华来到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囱顶上，往烟囱里面跳下身死。刘树华身后 ，留下了怀孕的妻子和失明的老爹。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 的三篇文章，同一版面还刊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 命的青少年致敬"，无疑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的新暴力行动有直接的鼓励作用 。而前一天发生的"李文波事件"，成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掀起新的一轮暴力迫害的 借口。当时还没有成为"黑帮份子"的年轻教师刘树华，立刻在新一轮暴力迫害下 丧生。

８月２７日，李文波被打死后的第三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校园里 打死了两个人，都是他们在抄家中抓来的住在附近的居民，其中一个是科学院气体 厂的工人陈彦荣，３７岁，六个孩子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一老年女人，姓名现已 无从查考。同日，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和第三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在西交民巷打死了 孙启坤，一个退休女会计。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也在这 一天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同时被毒打，两天后死去。

８月２８日，已经在校园里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抄了地安 门东大街９３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殴打他。邻居李从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 ，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李从贞因此被红卫兵绑在房前柱子上 ，当众打死。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他是否真的死了，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 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李从贞的尸体从柱子上卸了下来。

８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承泽园， 打死了那里的一个居民、他们的一个同班同学的爷爷孔海琨老人。在那一时期这个 学校的红卫兵打死的人据说共有十多个。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她发表于文革后的一篇文章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到２８日，是北京"打全堂" 的时候。"打全堂"是一个戏剧术语，被用来形容 那时北京到处抄家打人的情况。这是打她的红卫兵的说法。８月２６日，她听到有 红卫兵声称"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绝唱》，江苏文 艺出版社，１９９５，第１５２，１５５页）新凤霞从那天开始，遭到中国评剧院 学员班红卫兵的多次残酷毒打，以致终身残废，再也不能上台演戏。她的同行，著 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被毒打、侮辱后自杀。

在李文波死后发生的大量杀戮中，还有北京大兴县１３个"人民公社"进行的 屠杀。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３２５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 的家属子女被杀

害，２２个家庭被灭门，受难者中有８１岁的老人，甚至还有出生 三十八天的婴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宣传材料特刊，《北京日报》编辑 部编，１９８８年2月。但是在这份文革后印出的材料中，这３２５名被害者的名 字，仍然一个都没有记录。)

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 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 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 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根据一份"内部"统计资料，在北京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杀人最多的是四 个区：西城区、崇文区、海淀区和东城区，其中又以西城区为最，即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所在的一区。西城区的被害人数，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个区的被害人数总和。西 城区之外的其他三区死亡人数相近。西城区、海淀区和东城区是红卫兵最早建立和 开始活动的地区，崇文区却不是，而且是北京最小的一个城区，但是崇文区被杀害 的人数略多于海淀区和东城区，仅仅次于西城区而名列第二位，这跟李文波事件的 关系很大。

１９６６年8月，由于大批北京居民被活活打死，加上很多人在遭到殴打和侮 辱以后自杀，北京城的死亡人数突然猛增，以致火葬场出现了尸体大量积压、尸体 焚烧要排长队的现象。焚尸炉日夜不停，仍然供不应求。据多位目击者说，被打死 的人的尸体，从打人现场一车车运去，没有姓名标记，堆在一起；死者浑身血迹， 衣衫破碎，形同裸体。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冰块防腐，气味依然极其可怕。

北京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如此大规模地殴打和杀害和平居民，除了运用 "文革"的名义，还需要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作为借口。极其不幸，在愈演愈 烈的红卫兵暴力浪潮中，李文波事件就这样被利用了。

四，即使没有发生李文波事件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内部"，各情报机关每日向上报告当日被打死的人数， 他们也许没有报告被打死者的名字，但至少是报告了数字的。根据这样的材料，以 日期为横坐标，被打死的人的数字为纵坐标，做成图表，展示如下：

（图）

从这一图表可以看出"李文波事件"前后的红卫兵暴力程度的变化过程。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２６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从8月２５ 日到8月２６日，被打死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２６日到8月２７日， 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的8月３１ 日，却出现了一个小的低谷。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8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 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大批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到天安门广场 参加集会去了，因此那一天北京市居民被打死的人数相对小了。

图表也显示，从8月２４日到8月２５日，即李文波被打死的当天，被打死的 人数

就增加了一倍。此后，８月下旬每日数字一路径直上升。在李文波被打死之时 ，杀戮规模升级已经成为定势。

北京红卫兵的杀戮开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开始是在校园里面，攻击对象是 学校的教职员工，所谓"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北京大学附中，是红卫兵最 先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在７月底就大规模采用暴力攻击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 的同学。接着，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这些情况被立刻 报告到最高当局，但是他们没有出面制止。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 袖章。红卫兵的领袖们上了天安门城楼。北京最早打死老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 子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最早开始对老师 使用暴力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天安门 的大会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作了实况直播。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与北京中 学红卫兵合影的大幅照片，发表在所有报纸上。这样非同寻常的行动，表明了最高 当局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显然也包括了对他们已经开始的暴力行动的热烈支持。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位干部说，在８月１８日天安门大会举行后的当 天晚上，在"高级党校"这所共产党的最高学府，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暴力攻击" 牛鬼蛇神"的行动。在"高级党校"工作的干部都资历较深，那里的学生也不是普 通的年轻人，而是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但是他们在"八一八"大会之后也立 即采用了当时中学生红卫兵使用的方式，对党校校长林枫等人施用暴力和人身侮辱 ，包括游街、戴高帽子、敲铁簸箕自报"罪行"等等。显然，那时中学红卫兵的行 动成了全国文革行动的示范。

在８月１８日会见的第二天，８月１９日，红卫兵的暴力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北京第四、六、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在数千观众 面前，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其中有人肋骨被打断。８月１９日晚上，北京外 国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里打死了教师张辅仁和职员张福臻。８月２２日，北京 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在各自的学校中，在被连续三天殴 打和折磨之后死去。张辅仁、张福臻、沙坪和华锦，都被打死在"八一八"接见之 后、李文波被打死之前。

在８月１８日以后，北京中学红卫兵从毒打、杀害老师，扩展到对校外居民进 行大规模的暴力攻击，当时他们称之为红卫兵"杀向社会"。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 日上午，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殴打那里的作家肖军 、老舍等人，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２９名"牛鬼蛇神"被押送到"文庙" 院子里（即"首都图书馆"所在地)，被强迫围绕着烧毁书籍戏装的火堆跪下。前 有火堆，后有红卫兵的皮带棍棒，这些人被毒打了三个小时。作家老舍在这一天被 "斗争"之后的第二天，８月２４日，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投水自杀。在同一暴 力浪潮中，老舍比李文波早死了一天。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在北京东城区，离王府井不远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 个居民被打死。其中有家住东厂胡同２号的孙琢良和他的妻子，孙是眼镜师，曾经 开设一家眼镜商店。住在东厂胡同６号的马大娘，是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的女 工，她看到同院居民左庆明的妻子，胡同里称为"左奶奶"的老人，被绑在葡萄架 上毒打，就到胡同口报信，告诉左老先生不要回家，左庆明十多年前开过一家卖劈 柴的铺子，他得信后逃开了。红卫

兵发现马大娘的报信行为后，把马大娘拉来和左 奶奶一起打死。红卫兵甚至提来一桶滚烫的开水，浇烫两位老人（当时左奶奶７０ 来岁，马大娘５０来岁），两位老人凄厉的惨叫声传出院子，邻居们都关紧窗户， 再用枕头把耳朵捂上。左奶奶和马大娘在凌晨时分被打死，天亮的时候，火葬场的 卡车来拉走了她们的尸体。东厂胡同的这六位居民，比李文波早一天被打死。

上文写到，在１９６６年9月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李文波，还提到师大二附 中发生的一个类似事件。在那一事件中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 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 ，受到文革冲击，她曾在给儿子的一封信里说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 ，说是"反动信件"。１９６６年8月２５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日，曹滨海 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 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 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砖砌 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中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 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 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８月２８日召 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 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但是几天之后，８月３１日，毛泽东第二次 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 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 被打死，但是他从此精神失常。据９０年代中期见到他的人说，他仍然没有恢复健 康。

上述杀戮，都发生在李文波被打死之前，或者同一天。显然，这些杀戮跟红卫 兵所指控的李文波的反抗，不可能有丝毫因果关系。上述一系列暴力行动和杀戮发 生的时间次序明显表明，暴力升级的主要动因，是１９６６年8月１８日毛泽东对 红卫兵的声势浩大的接见。"八一八"接见之后，红卫兵杀戮开始大规模升级。李 文波事件发生于八月杀戮的这一大规模升级过程之中。在数千人被活活打死的情况 中，唯有李文波、曹滨海两起被指控的反抗暴力的案例，两个事件发生在同一天。 李文波、曹滨海与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从整个形势来说，是红卫兵的暴力行为 大规模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假使没有这两个事件发生，八月 杀戮的大规模升级也是一样要发生的。

四，为什么无人反抗？

１９６６年9月5日，李文波死了１０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 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 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 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简报写道，从8月下 旬到九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 "的一部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举行的关于文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材 料，这个材料的全文也至今还不准许普通人民查阅。这个材料提供的数字是，在8 月下旬到9月底的４０天里，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这是一个巨大的 数字。但是当年八月

杀戮的一些目击者们认为，实际被打死的人数可能大大高于这 个数字。

不仅如此。这数千北京和平居民的死亡，不是被子弹射杀的，也不是被刀砍死 的，而主要是被中学生红卫兵用棍棒打死的、用铜头皮带抽死的、用沸水烫死的… …总之，是以形形色色残忍手段虐杀的；被打死的过程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跟 一刀断头、一弹毙命相比，这样的死亡过程更加痛苦。这样的杀害当众进行，造成 无比的恐怖气氛。以这样的方式杀害数千人，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野蛮和凶残。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特别需要提出的一个疑问是，在这样野蛮残酷的杀戮中， 为什么只发生了两起事实上还模糊不清的反抗？——李文波和曹滨海，是１９６６ 年北京的八月杀戮中被红卫兵指控为进行了反抗的仅有的两个人。其他被打死的数 千人，还有被侮辱被毒打的无数北京居民，在铜头皮带和棍棒的凶狠攻击之下，都 一直克制顺从，纹丝不动，甚至隐忍至死。这是为什么？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上文写到，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作家老舍在被打后自杀了，１９８０年 ，笔者和肖军先生（他是在１９３０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作家）有一次谈话。肖军在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那天跟老舍等一道被红卫兵毒打。肖军告诉笔者，当他跪在 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 。他想过要反抗。肖军年轻的时候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他说，那时候他心里 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来自各学校 的红卫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争相出手，打人打得发疯了一般，他想最后自己一定 寡不敌众，会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其他被斗者会怎 么样？和他一道被"斗争"的还有近三十个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 煞白，额头上正在流血。如果他反抗，其他近三十个"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 ，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会被报复打死。他想了 又想，最后调动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压下去反抗的冲动，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 毒打。

李文波跟肖军不一样，他在现场就被打死了，他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可能 说出来了。李文波的妻子目击了丈夫被打死，然后她自己被枪毙，也永远不可能描 述她的感受了。但是，肖军事后说出的心理活动，清楚地说明，１９６６年夏天在 北京之所以无人起来反抗，不是由于迫害不够深重，恰恰相反，是由于那场迫害太 残酷了。

１９６６年夏天的红卫兵暴行，并非只是某种失控的暴民政治，它同时又是以 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政府行为，是群众暴力和政府行为的结合。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 施暴模式。它所造成的无边的疯狂和残忍，使得反抗无从发生。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李文波死后第四天，"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 抄的意见"。整个"通令"有七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的小标题是"七、给出路" 。其中一段照录如下：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 类——引者注）份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 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 （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 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

新做人的机会。"

作为实施这个通令的结果，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抄家 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这个数字 占当时北京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在这十万人中，实际上很大部分连当时的所谓" 黑六类"的"标准"也够不上，因为这样的人早就被清洗了。但是，任何自我辩护 都是不允许的。在死亡的直接威胁下，十万人被扫地出门。他们当中，有的被赶到 农村后，无居所也无食物，很快就死去；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殴死在火车上 。假若李文波能从８月下旬的暴力抄家中侥幸活下来，他就会成为被驱逐的十万人 中的一个。

这场大规模的居民驱逐，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完成了。非常明显，在此之前的 八月杀戮，为这场驱逐的顺利进行预先建立了威慑。这十万人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 逐之间作选择。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这场残酷的驱逐，是文革领导者安排的八月杀 戮的结局。

李文波已经死了３４年。他的故事还没有被报道出来；和李文波夫妇在同一个 时期被活活打死的数千名北京居民的故事，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十万 北京居民的故事，也还没有被报道出来。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通史，都几 乎没有提到１９６６年北京的八月杀戮及其大批受难者。

这里刊登的李文波家的照片，是遇罗文先生在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６日拍摄的。 他是文革中因撰写《出身论》被枪毙的遇罗克的弟弟，他在１９９９年写了《我家 》一书，记载了遇家的故事。由于城市街道扩建，当年李文波家所在的这栋建筑， 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感谢遇罗文先生，摄下曾经发生过恐怖历史的这个场景。

文革受难者——陈葆昆
王友琴

陈葆昆，男，北京 101 中学美术教员。1966 年 8 月 17 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北京 101 中学建立在圆明园的故址上，离北京大学很近。文革以前，校园里建有一个喷水池，池里有一个白色的仙鹤雕塑，水从仙鹤的头顶喷出，落在下面圆形的水池里。陈葆昆就在这个喷水池边被打死。

1966 年 8 月 17 日在 101 中学被毒打的，除了陈葆昆以外，还有十多名该校的教师和副校长、教导主任等人，即当时在“专政队”里的所谓“牛鬼蛇神”。红卫兵强迫他们在校园小路上爬行。路面是用煤渣铺的，当时正值炎夏，人们穿单裤或者短裤，在煤渣路上爬行一段以后，他们的手和膝盖都鲜血淋淋。他们一边爬行，一边被打。有红卫兵学生在他们身后，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们的头和后背。

一名当时的学生说，她看到，在爬行过程中，有一个红卫兵学生，脚穿厚重的军用皮鞋，走过去一脚踩住了一位女老师的手，然后转动他的脚，使劲在那只手上碾了几圈。

这些被打的人中的女老师，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即剃去半边头发，头皮一半白，一半黑，当时称为“阴阳头”。（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是由黑白两个部分组成。这个图案也在现在韩国的国旗上。但是红卫兵未必由看到这个图案而命名这种人身侮辱的做法。“阴阳”

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但是古代的哲学家不可能想象到这个词汇被这样使用。）

在喷水池前，这一群“牛鬼蛇神”遭到残酷殴打。那时候，喷水池中的白色仙鹤雕塑已经被砸毁，池子里还有水。很多红卫兵围着打。有一个学生拿来火柴，点燃了陈葆昆的头发。

陈葆昆被打得昏迷过去以后，打人的红卫兵学生把他的身体脸朝下扔进喷水池中。陈葆昆死在喷水池里。喷水池的水很浅，很可能陈葆昆在被扔进水池以前，已经被打死，所以不能在水里挣扎出来。

后来红卫兵学生把陈葆昆的尸体从水池里拖上来，丢在教务处后面的一间小屋里。他们向其他在“专政队”里的老师说：“这就是阶级敌人的下场。”他们命令其他“牛鬼蛇神”打陈葆昆尸体的嘴巴。如果不打，他们说，就是“和反革命划不清界限”。

陈葆昆在 8 月 17 日被打死。第二天，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接见和检阅红卫兵。101 中学的红卫兵都赶进城去参加接见。陈葆昆的尸体丢在学校中无人处置。8 月 18 日大会之后，火葬场来车子把陈葆昆的尸体运走了。

8 月 18 日大会后，校园暴力继续发展升级。101 中学一共有一百多名教职工，先后被关进“专政队”的有 60 多人。到了 1966 年秋天，还把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人张文松等也抓到学校里“劳改”。

101 中学在 1950 年代建立时是一座只供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使用的寄宿学校，文革前已经改成和普通中学一样，但是干部子弟的比例仍然大大高于一般中学，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1966 年夏天，干部子弟在红卫兵运动和暴力行动中是主导力量。101 中学的红卫兵以暴力性和破坏性强在北京出名。

除了殴打折磨教员和学校领导人，101 中学的红卫兵还攻击住在学校教工宿舍中的家属，有两名老人被殴打后自杀，其中一名死亡，一名残废。

101 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到教职员家抄家，烧书，砸所谓“四旧”即一些艺术品和文物，还向教职员要钱要粮票，即使这些教职员还没有被“揪”进“专政队”中。不堪骚扰，有的教职员只好每天清晨就起床，躲到学校附近的高粱玉米地里，直到深夜才敢回家。

101 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把学校大门隔成两个，小的一个写明是“狗洞”，命令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教职员和学生出入学校必须走“狗洞”。他们也在学校殴打和“斗争”了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

101 中学建立于圆明园的废墟上，校园很大，有大面积的苹果园。就在打死陈葆昆的时期，果园里的青果子被该校学生抢劫一空。有的被吃掉，有的太生不能吃，就被扔掉。

1979 年 10 月，文革刚刚过去不久的时候，笔者曾经骑自行车到 101 中学校中，观察那个曾经作为 1966 年暴力现场的喷水池。那里没有一滴水，也没有白色的仙鹤，只见灰扑扑的水泥栏杆和肮脏的池底，旁边仍是煤渣铺的小路。从 1966 年后的 13 年后，文革留下的就是那么一幅贫穷、衰败、麻木的景象。

1995 年夏天，笔者又到 101 中学调查采访。我注意到普通教师的家里的厨房新铺设了白色的瓷砖，干净美观。我也注意到，喷水池重建了，池里设置了一群白色的仙鹤，展翅欲飞的样子。

101 中学的喷水池的历史，也是和文革以及文革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谈到这个学校的正在写作中的校史的时候，一位在 101 中学经历了文革的老师说，“对文革这一段不会很详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无奈。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网之后，一位文革时代是北京 101 中学学生的历史研究者看了网页，发表评论说：陈葆昆是有问题的人，网页上怎么能不介绍这一点了。

对此，笔者的回答是： 陈葆昆被红卫兵学生打死这个事件中，陈的“问题”不是相干的因素。因此，虽然笔者在调查中了解陈葆昆的“问题”，在网页上却没有特别说明。

这个案例，牵涉到什么是“受难者”，也牵涉到对文革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评判问题，所以需要严肃的讨论。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陈葆昆在一个北京的一个工厂劳动，并不在学校教书。他在文革前被判刑三年，监外执行。被判刑的原因是他对男学生有不当性行为。他的家人仍然住在 101 中学校内的教工宿舍里。

非常清楚，首先，陈葆昆的“问题”是三年监外执行的徒刑。他在文革前被判罪的时候，并没有人发动学生打他。尽管他有罪，但是法庭已经作了惩罚。打他是非法的。

其次，101 中学的红卫兵把他打死，则是一个杀人案。至于打死陈葆昆的红卫兵学生犯的是什么性质的杀人罪，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以及通过审判来决定。但是，实际上文革的大量杀人案不但没有得到调查，甚至从来没有被报告。

第三，101 中学的红卫兵在 1966 年 8 月 17 日的暴力行为，并不是只针对陈葆昆一个人，是针对作为一个群组的教育工作者的。毒打陈葆昆以及该校其他教职工的行为，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事件。文革是造成这一杀人案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红卫兵校园暴力的受难者中，陈葆昆可能要算是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他被判过三年监外执行的罪。至于其他受难者，虽然都攻击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作者未发现任何一个人当时是在刑事处分期间的。

一定要说清楚的是：对陈葆昆，他的所谓“问题”，不能成为把文革迫害和杀戮合理化的根据；也绝不能把 1966 年 8 月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解释为是“打坏人”或者“打坏人过了火”。

陈沅芷之死

陈沅芷，女，1924 年 1 月 4 日生，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1966 年 8 月底，第二

十五中学红卫兵抄了陈沅芷家。她的日记被抄走。红卫兵说日记中有"反动言论"。陈沅芷被抓到学校中关押在那里。后来，1966 年 9 月 8 日，陈沅芷在北京第 25 中学校中被打死。时年 42 岁。

陈沅芷 1958 年调入北京第 25 中学，1966 年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学校教书 8 年。

第二十五中学位于北京东城区，离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很近。这个学校原名"育英"，在 1950 年代改名。在文革中，第 25 中学是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之一，也一直是北京红卫兵的主要力量之一。

1966 年 8 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作"红八月"，因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发展和行动的一个月。他们所说的"红"，是指革命。但是，如果贴近看事实，这"红"是人血。红卫兵的暴力行动从 8 月初开始大规模进行。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控制了各个学校，包括指挥车辆和占据学校广播室。红卫兵的暴力行动的最早的攻击对象是学校的老师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然后，在 8 月下旬扩展到校外。在 1966 年 8 月 9 月 10 月，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在校内校外横行无阻。他们抄家，他人，杀害几千人，打伤无数。

1966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沅芷的家，抄出了她的日记。陈沅芷 1947 年结婚。她的丈夫舒芜，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因此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到歧视和侮辱。陈沅芷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些这类事情。红卫兵说日记中有"反动言论"，说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把她抓进学校。

象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

陈沅芷在"教育室"中被毒打。有一次，一红卫兵负责人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站在上面被"斗争"，然后把桌子推倒，使陈沅芷重重摔下。

陈沅芷的丈夫舒芜在 1978 年 12 月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惨状：

"十二年前，一个恐怖的秋天的夜晚，我被叫到二十五中来，被带进一排阴森的房子，门上三个阴森森的大字：'教育室'。一个有一撮小胡子的青年人向我训话说：'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绝食自杀。'虽然我明明知道陈沅芷同志昨天还要家里人送来了粮票，但是我自己当时也是'牛鬼蛇神'，只好一声不响。那个小胡子又说 ：'陈沅芷反动透顶，居然骂我们比国民党还坏，那我们就不客气，是把她捆了起来，是打了她几下。'他赶快又补充说：'当然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打的都不是致命的地方。'他这样向我训话完毕，才叫我进去看。一间大教室的角落里，灯光暗淡，陈沅芷同志的遗体躺在冷冰冰的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的血迹还没有擦干净。这时，又从外面押进一个头戴高帽的人，叫他坐在陈沅芷同志的遗体旁边写交代，有人指着陈沅芷同志的遗体威胁他说：'你要不老实，这就是你的榜样！'最后，火葬场的大卡车从二十五中的后门开进来了。临时从二十五中的'牛棚'里叫来了两位老师，叫他们两位帮着我把陈沅芷同志的遗体抬到卡车上去。火葬场的人一面向我收火葬费，一面告诉我；'黑五类的骨灰，不许领。'这是我和陈沅芷同志的最后分别。"

那一天，是 1966 年 9 月 8 日，陈沅芷被打死了。

十二年后，陈沅芷得到了"平反"。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共产党支部和"北京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实施的结论意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 1966 年 9 月逝世。"这个《结论意见》的日期是 1978 年 11 月。

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陈沅芷的死因，首先是红卫兵的抄家，当时普通公民失去了宪法写有的安全保障；然后，是以日记来作罪名。日记是私人的记录，并不示之于人，但是在文革中可以搜查日记并以日记作罪名。另外，罗织罪名都不经审判，日记上的话被随意歪曲解释。最后，造成陈沅芷之死的，是红卫兵的监禁和毒打。

纵容鼓励中学生用棍棒皮鞭和肉刑来处死他们的老师，这是文革的最残酷和丑恶的一部分。

当时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说，他曾在 1966 年夏日的一天，看到学校里廊檐下，有一个席子卷。他和几个同学好奇，过去用棍子挑开一看，是一具女尸，通体青紫发乌的颜色，非常可怕。他们不知道那是陈沅芷的尸体，还是被打死的从校外抓来的某个女人。因为当时也有校外的人被抓进来打。另外，这个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外打死了一批居民。

在 1966 年夏天，第二十五中学的人，除了陈沅芷，还有一个男性校工被打死。关于他的名字，还没有找到记得的人。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一、题目和背景

或长或短，我们时代的很多人都进过学校，当过学生，因而就有过"老师—学 生"关系。这是一种相当制度化了的关系，通过讲课、练习、考试、评分等中介手 段来传授知识和文明。这种关系在中国有特别长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是老 师，传说他教过三千学生。在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我们未见关于这一关系中的大 冲突的历史记载。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的１９６６年在全中国的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在历史 上是极端特别的。如果不从道德是非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以生活变动的剧烈程 度论之，那么，这一"学生打老师"确实就可以算是"革命"。事实上，这也确实 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在当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中国的报纸每天热烈支持并大版报导"革 命学生"和"红卫兵"的活动，但对学校里面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死亡， 却从不报告，甚至一字未提。

１９７８年后，报纸杂志刊登了一些关于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后 平反的人

物的文章。但这些人多为高级干部或知名人士。老师的地位不高，数量很 大，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在"文革"后，却轮不上被报纸报导。

在现已出版的两本长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 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仅仅记述了１９６６年8月中下旬后学生红卫兵 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未提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就 未能说清暴力行为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如此大量的学生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凶恶的打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河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简单地谈到１９６６年夏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 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 第８６页）作为数量，"若干"显然小于"万"，照此读来，"阴阳头"似乎就算 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仅仅如此。

本文试图写出这一段不该忽略的历史。

二、材料和来源

几年以来，我向１００多位"文革"经历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学校里发生过学 生打老师的事情。这些人大多数是１９６６年的在校学生，有一些是老师，少数几 位是被打死或被严重打伤的老师的直系亲属。在当时的在校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学 生，也有一些大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了解的方式，多数是面谈，有一些是通过电话谈的，有少数是通过写信了解， 其中七例是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得到的。我向网络通讯者发送问卷，他们从网络上 送回了回答。同时很多网络通讯者说他们太年轻而根本不知道这类事情。

在我尽力找到的这些被访者中，都说他们不知道哪个学校在"文革"中学生没 打老师。这里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公然地用拳头打、用脚踢是其最低程度 。为了避免遗漏未打的学校，我也曾在计算机网络上发送过第二轮问卷，请求提供 没打过老师的学校的名字。但是至今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找到的没 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学校的例子是零。

就这样，我得到了下面的７６所学校的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在"文革"中都 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在这个名单中，有＊号的学校是打死了老师的。但是被 打伤后自杀的人未被计入。另外，学生打死了学校外的人也未被计入。

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１０１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广东台山县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杭州第一中学　　南昌第八中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二女子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外语学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新成中学　　四川洪雅县一中　　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厦门第四中学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１０５中学

小学：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好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江西庐山第一小学

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学　　江西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江苏无锡后宝小学

江苏仪征实验小学　　江苏盐城县城中小学　　江苏扬州市湾头公社中心小学

南京林学院子弟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天津金钟桥小学　　天津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学

天津南市小学

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幼儿园：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是中学的红卫兵来打了幼儿园的老师）

以上学校分布于中国各地，可说明范围或广度。

被访者提供的见证的可靠性如何呢？对这些被访者进行分析，他们中大多数属 于不被准许或者不曾愿意参与打老师的学生。他们是目击者，但是可能了解得不够 深或全。打过老师的人或牵涉较深的人则不愿谈此话题，甚至根本拒绝谈话。这些 知道细节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细节。挨过打的老师们也大多不喜欢回忆"文革"。因 为太痛苦，也因为太羞辱。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这段经历。比如，１９６６年强迫 "专政队"里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几位相当聪明，在"文革"后在专业上也有 新成就的老师，都告诉我不能忆及歌词全文，尽管他们当年被迫每日必唱。他们埋 葬了他们的记忆。本文所录的歌词和歌谱，是由一位１９６６年的初中二年级的学 生提供的。至于被打死者，他们再也无法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只可能 比实际情况有所减轻而不是夸大，有大量遗漏而非增添。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收藏的当时人们手写的汇报和油印的"大事记"，以 及群众组织铅印的"大字报选编"等实录性材料。这些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这些材 料一般都未直面描述打老师的情况，但是，透过这些书面材料中对"文革"的颂扬 赞美之词或当时必说的套话等等，可以看到相关的事实。

另外，我系统阅读了当时的正式公开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报》。

因此，本文是在对被访者们的口头叙述、书面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出 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的基础上写成的。

三、学生是怎么打老师的？

1. 规模和程度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 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 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 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 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 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

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已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 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师被打得昏 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岁，已在这所 中学工作了１７年。注（２）

在这以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先已打了他们的校长，强迫她敲着一个 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光，把她推倒在地上爬，把 她的头打出了血。１９６６年8月4日，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些学生发起批斗学校领 导人。他们在操场上押着当时所谓的"黑帮"绕圈子。有人朝他们身上洒墨水，有 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有人动手打他们。"黑帮"的衣服被撕破。北大附中和四中都 是有名的中学，打人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师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是打死了人。

１９６６年8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学生打死了这个学校当时被判监外执 行徒刑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有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水池 ，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 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女老师的头发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 "阴阳头"。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打 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长高 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还有一位语文老师被打裂 了肝脏随后死去。一个学生的母亲也被打死，只因为她给儿子的一封信被同学看到 又被认为是"反动"的。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被铜头皮带打得满身是血。一位副校长被初中二年 级的一个班的学生排起队每人抽几下。被红卫兵裹胁在内的这个班的学生不敢不打 ，否则会被说作反对革命也被打。学校女共青团团委书记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一位 化学老师被打后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身死。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联合斗校领导。 一些学生在舞台上抡开铜头皮带打被斗者。他们口头批判一阵，喊一阵口号，抡一 阵皮带，如此轮番进行。在这座音乐堂里，北京东城区一些幼儿园的一些级别高的 老师也挨了斗和打。

１９６６年8月２４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等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撕去 了他们认为是"右派翻天"的反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强迫清华大学"专政队" 里的学校领导和教授拆掉石头建的老校门并开始在那儿抄家打人。比如，打了清华 无线电系的书记、主任、教授。打后流了血，血流在地上，有人还在血迹旁划了一 个大圈，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字。那一天，他们还抄了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的 家，撕了他的书和画。大学里先已有武斗现象，但不如中学厉害，所以这一次是中 学生去大学校园打。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１３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 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们的 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仓中学，给老师们头上戴字纸篓，往他们的衬衫上打黑 叉。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复兴中学，用榔头打老师们 的头，一位

老师的头盖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时值盛夏，身著单衣 ，学生用一些图钉把大字报钉在她背上，还强迫她在扫厕所时吃屎尿。在扬州市湾 头公社小学，学生们交流怎么用皮带抽人的经验。

2. 起源和蔓延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 称北京大学的校长等为"黑帮分子"。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称北 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很多学校开始模仿北京大学贴大 字报。６月３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往各大、中学校，以取代原来的学校负 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

"工作组"让学生停了日常课程，揭发批判学校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六 、七两个月里，"工作组"把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特别是领导人，划成四个类 别。第四类就是此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教师集中交代问题。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大 字报揭发和开批判大会。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被大字报点名。很多老师被说 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者被用"猪""狗"这样的词骂。（见 "大字报"抄件）不允许自我辩护，也不允许质疑批判所用的准则。同时，运动重 点对象被罚劳动，和其他人分开，等候最后处理。

但是，"工作组"不允许学生打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１１日，清华大学 一些学生成立"打狗队"，打"狗"即打人。（见蒯大富６月１６日大字报，收入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１９６６）６月１８日 ，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设"斗鬼台"，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被戴高帽子、罚跪。这 些事后都被"工作组"反对。在中学，这一时期的打人的事情可见于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写的给上级的信。她在信中说 ，６月２１日，"工作组"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在会上，"我就被拷打和折磨 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 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 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见卞仲耘的信的底稿）这一描 述当为可信。她当时已被"工作组"划成"四类"，在当时情况下，写信人绝无可 能夸大。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四三班六月下旬贴在她家门口的大字报说： "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见抄件）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 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见《大动乱的十年》，第４８页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批斗会 ，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在８月５日打死人后，北京师 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当天晚上到北京饭店当面报告给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０日 ）吴德如何上报给更高级的领导，不得而知。但是以后未见他们采取任何措施制止 。打人继续升级和蔓延。出现了上一节所描绘的情景。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老师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打死。只知道在北京西城区，这是位于市中心紧靠天安门广场 的一个区，打死了七个校长。

第三阶段：从校内打到校外，从北京打到全国

１９６６年8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 运动的规定。(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９１页，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这时，北京的学生已经从校内打到 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８月２３日被中学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其时已经距卞仲 耘老师被打死有１８天。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２ ８块钱就是了。"——这是火葬场的价格。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据１９８０年１２ 月２０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仅１９６６年８、９月的统计，被打死的有１ ７７２人，被抄家的有３３６９５户。但是报纸只提到这个数字，没说及死者的详 情。

打人风传往全国。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 。比如，８月１１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 "们揪出来打了。８月１２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 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 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 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 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 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上面的学校名单也可看出，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打 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１９６６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中心 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被拉出 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打得受不 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3. "打"的主要方法

（１)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描述过斗地主 的方式。这篇文章收在普及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４）里，很多学生都读了。

（２）拳打脚踢棍子打。

（３）"坐飞机"，后来又叫做"喷气式"，是"文革"的发明。斗争会上， 被斗者弯腰九十度甚至更多，两臂后举，形似喷气式飞机。

（４）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装，外束皮腰带 ，在北京又称"板带"。用皮带抽人，上面的铜头可以造成严重创伤，会打瞎眼睛 。

（５）挂牌子。在脖子上挂一大牌子，上写"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 等罪名，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一个大叉。

（６）剃"阴阳头"。这是另一个１９６６年的发明。把老师的头发剃去一半 ，留下

一半，故名"阴阳头"。特别被用在女老师身上。

（７）建立"劳改队"，又称"专政队"，"牛鬼蛇神队"。被打入此队的老 师被罚在烈日下干脏活儿，重活儿，扫厕所，扫街等等。

（８）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强迫"牛鬼蛇神"唱，因为他们不 被当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词和曲如下：

１５　１２　｜３　１　｜１５　１２　｜３　２　｜ —— —— —— —— 我是 牛鬼 蛇 神， 我是 牛鬼 蛇 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我 有 罪！ 我 有 罪！

６５　３３　｜２　１　｜３３　２３　｜５　５　｜ —— —— —— —— 我对 人民 有 罪， 人民 对我 专 政，

６５　３３　｜２　２｜ —— —— 我要 低头 认 罪。

３３　２３　｜５　５｜６５　３３｜２　１　｜ —— —— —— —— 只许 老老 实 实，不许 乱说 乱 动，

３３３　２３　｜５　５　｜６５　３３　｜２　１　｜ —＝＝ —— —— —— 我要是 乱说 乱 动， 把我 砸烂 砸 碎，

５５　６６　｜０　７７　｜｜ —— —— —— 把我 砸烂 砸碎！注（３）

这个"歌"流传全国。在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那 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人唱它，唱得不好就打。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 个"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作的，迅速流 传到各学校，以至全国。

（９）抄家。成群闯进老师的家，拿走老师的私人财产，特别是书籍。把老师 的日记，私人书信，乃至情书等，拿去公布并上纲上线批判。

上面九种，在上述的学校中曾普遍发生。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 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 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北京 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观学习 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这个刑 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仿的。

4. 谁被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开始，大学和中学教师队伍就整个地被列为运动对象。当 时学

生对老师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极大变化。见面不再问好，也不叫老师，有的直 呼全名，有的用带恶意的称呼。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老师们若有学生与其客 气地说话，就已有受宠若惊之感。大字报可以乱骂任何老师。在８月之后，老师， 甚至学校的工友，成了随时可能挨打的人。学生如果要骂他们打他们，他们无处寻 求保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种人。

（１）学校的负责人。比如，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８·５"惨案，除了一名管总务的副校长和一名总务主任以外，其他五名校级负责人都 被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帮"。

（２）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教师。当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 术权威"。

（３）个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老师，或１９５７年在"反右派"时 被定了什么的老师。事实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经清洗了教师队伍。但总 是可以从矮子堆里找高的。

这三种人的被打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了的。但是，所谓的"黑帮"和"资产 阶级权威"，在当时有此新名词而没有明确定义。同时，要把人划进这一范畴，也 不用经过法律程序来查证核实。实际上，这些老师一直在上面的指导下作事。原有 的制度并不是老师们决定的。在当时的中学里，年龄４０岁以上，月工资一百元以 上的老师，就很可能被打。

不过，对个人来说，被不被打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地位只是相对的，一所 较大的学校的一般干部或教师，到了一所较小的学校就可能成为第一负责人或业务 尖子，尽管级别不高，还是会被打。另外，据被访者们说，老师还因各种不同的原 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 跃分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老师打得惨 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代课一次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外国语学校有 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恨，于是被打。 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象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用"牛鬼蛇神"一词指代"敌人"（《人民日报》１９ 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并不 曾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阴阳头"，弄得被打的老 师看起来确实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面对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师们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为，否则马上可能被打 死。他们怎么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被拖去游街时，"我告诉自 己这是胡闹，总会过去，不必介意。"广州第２５中学的一位老师说，他一向喜欢 运动，有点武功，学生打的时候，他往下一蹲，两手把脑袋一抱，运运气，任凭打 ，总算伤得不厉害。

物理学教授、画家孙菊生说，１９６６年他在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当过"劳 改队"第三队副队长。这个大学是比较小的，可是"劳改队"里面还有至少三个分 队之多。他的姐

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钢铁学院里挨打挨斗。他的姐姐逃到 他家，正逢红卫兵在打孙菊生，就把孙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师那时被打呢？ 据有的被访者估计，不算那些挨过零星几脚几拳的老师，在"文革"中"正式"（ 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进了"专政队"被学生当做"敌人"打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 。有的认为比例高于此数。

5. 谁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学生要骂老师"黑帮""反革命"，尽管可以骂。８ 月以后，可以随便打。骂和打当时都被看做"革命"行为。法律已不起束缚抑制作 用。但是，虽然老师们可以被随便打，能有资格参加集体性的打人的，只是学生中 的红卫兵。

打人那时是一种"革命"的特权。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朝阳区一中学学生的一 位被访者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１９５７年当了右派，他们不准我 参加红卫兵，斗人抄家也不能去，当时觉得很遗憾。"红卫兵规定只有"红五类" 子弟能参加。这"红五类"是"革命干部（在北京曾规定１９４５年以前参加共产 党的干部才算)，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

一些被访者说，那时各校出现了一批"打手"，到处打，甚至从中得到很大乐 趣。其中有的专门管"牛鬼蛇神队"，威风十足。这些"打手"不一定是红卫兵组 织的最高头头，有的大头头不动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这些"打手"中有一 些是原来就性情凶狠的，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里或学校很显压抑，这时一反常态， 比别人更残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蛇 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从上面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几个女校，也就是说，由女学生打死了老师。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据一位 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

另外，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有 关。他们当时１５或１６岁。

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据被访者说，干部子弟多的中学打 人最早也最凶，比如，在上海是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

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打人是集体打的。很多人一起动手，或者一拨接着一拨 打。学生人数是老师的十几倍，有一小部分动手就足以伤人。

也有一些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比如因父亲加入 共产党晚于１９４５年而当时不被算作"革命干部"出身，未被准许参加红卫兵， 在红卫兵打人时，也去加入或帮忙。但一般不被允许。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时被称作"狗崽子"，有相当一部分被同学打了 。

被打的老师的孩子打自己的父母，从被访者中听到一例。在上面写到的北京师 范大

学附属第二中学一个初一的学生，被迫打他的父亲姜培良。在很多学生红卫兵 打他父亲时，他也用棍子打了父亲。父亲被打死后，儿子因受刺激太大而精神失常 。据一位在１９９４年曾看到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痴呆，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

学生把老师整体性地看做运动对象，老师一般不被允许参与打老师，但是据被 访者说，有的老师挑动学生去打别的老师，以报私仇。

简单的小结

综观"文革"中发生的学生打老师，有以下特点：

1. 残酷。

以上所述，是普遍发生的，或是当时远距离看到的。很多细节要残酷得多，但 这里不及细数，有些也由于第二节所述原因难以了解。然而仅这里说的，今天似乎 已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学生会如此残酷地迫害老师。有人可能会说后来的１９ ６７、１９６８年的群众性两派"武斗"时死人更多。但武斗至少是双方互打的， 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但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老师不能还手，不能申辩， 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被打的老师只能任凭污辱折 磨，甚至于死。

2. 普遍

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在我调查过的学校中都发生了。偌大的中国，有没 有没打的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外。我以前以为小学生年小力薄，可能不会打 ，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不仅仅在北京，这个当时称为"革命中心"的地方打了， 而且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打了。还算好的是外地一般来说没有北京打得厉害。

3. 特殊

（１）在教育史上。从前的老师有戒尺，如果学生违反规则，可以打学生的手 心。这一做法在本世纪初被废除。古代发生过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主仆之间、官 民之间、男女之间各种冲突，师生之间的冲突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前几者。学生动手 打甚至打死老师大量发生，前所未闻。

（２）在法律史上。就算这些老师真是罪人，在古代的某个朝代，也需经报官 ，审判，再送法场斩首，不能由普通人自行惩罚或虐杀。这种既非由军队也非由警 察来进行的大量广泛的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无法找到可类比的现象。生活中有复仇 者或强盗土匪自行打人杀人，但也只会在小范围里发生。

四、发生的原因："文革"经历者的解释

学生打老师，事出有因。被访者们指出的直接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1. 毛泽东的引导推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 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发表了这 些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 文件。在毛泽东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 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人民日报》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发表，用黑体字印毛泽东写的句子，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仅在 共产党内传达。）教育界是五界之一。６月１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他决定 的。此后学生开始贴老师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动手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一些学生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后 ，北京大学"工作组"当天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称之为"乱斗" 。６月２０日，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转发这一简报，批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７月２８ 日决定撤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文件撤销６月２０日的文件， 说那是"错误的"。（这两个文件可见于上面已引过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上册，第４９页和７０页）在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时期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斗人的情形。既然毛泽东认为这还是冷冷清清，而且决定学生停 课的继续延长，那么，他的意向只可能是导向大规模的残酷的殴打了。不然，让几 千万已经两个月不上课的学生还能再作什么呢？

在红卫兵打死老师开始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 见了一百万的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８月５日最早打死了老师。这 个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问 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见１９６６年８ 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 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虽然从当时的公开发表物上，我们没发现毛泽东说 过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导和鼓励的结果。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对于毛泽东所要的"夺权"和"教育革命"来说，打 老师是毫无必要的。当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全面停课，接着６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决 定废除原来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时候，(《人民日报》６月１８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没有老师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８月，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人 林彪被擢升为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老师们还能对局势有何妨碍 呢？他们犹如一群羔羊。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他们呢？为什么要折磨他们甚至把他 们打死呢？

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在她被打死的前一天 ，已经被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捅伤，她回家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 员，不过象条狗。"她束手待毙，但是留下了一个解释。有的被访者认为还是可以 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过这种年轻学生的非常残酷的行为，就 能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法律秩序，不久后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经审判就关押虐待 至死。

早期红卫兵的一段地位大颠倒的经历，也可说明最初打老师对后来打"当权派 "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学校，干部子弟最早开始了打人，但几个月后，当这些人 中的很多人的父亲，所谓"当权派"也成了"革命对象"时，打人的手段似乎就被 顺势用到了他们父亲的头上。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虽然都停了课革命，中学生打人更严 重和残酷，还有别的原因。

2. 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打老师当时是在群众性的场合打的，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个或数个人发起 ，更多人一齐涌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加上事后无 人来问，所以打的人有恃无恐，越打越凶。如果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出现，这种集体 性的打人很难发生。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是先在中学出现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很具侵犯性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 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 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 毛泽东思想！"见大字报选。）这还仅仅是语言上的"砸"。７月１日，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邀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起庆祝共产党的生 日，全体学生都到了会场，在会场上，用一根绳子把"红五类"出身和"黑五类" 出身的学生隔开，后者坐在最后面。这是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的。后来，这个学校 在"工作组"撤后最早大打老师。７月底８月初，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校普遍成立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迅速传开。这种以家庭出身作为组织 成员首要条件，是很特别的。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和早期成员很多是高级干部子弟。 当时打人是一种特权。红卫兵打老师，打"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出身不好" 的同学。据一些被访者说，在"文革"中打人较早较厉害的中学，是那些干部子弟 多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一个高级干部出身的红卫兵，在她父亲后 来也被打倒以后，有人问她是不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打死了３个人，她回答说：" 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３个人。"１９６６年她１４岁。而打死人 是那时"吹牛"的内容。

从一开始，"红卫兵"名称的意思就是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给他们什么物 质利益的刺激，但给了他们生杀予夺之权，打人以及打死人的权力——一种最高而 邪恶的给予。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行为被称为"造反"。在古代，"造反 "是"犯上"并有极大风险。红卫兵的最初的实践却是在最高权力者的支持下迫害 ，虐待那些任凭宰割，死也不可以还手的老师、同学。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 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 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 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3. 人性恶。

有的被访者认为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打人的手段，全是没人教过 的，无师自通，却如此残忍。打的后果如此可怕，打人的人却不在乎。当时的学生 ，中学生年龄在１４—１９岁之间，大学生２０—２５岁，都已经受过教育七年以 上，大多高于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能用"无知"来作借口。在打人时提出 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当时的荒唐标准，也远不能落实定案。但是一些学 生大打出手，显然是他们自己要这样

做。他们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来换取痛快，发 泄自己的恶气，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师—学生之间关系确有紧张之 处，比如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有的学生被老师批评。但是，因此借"文革"之机 打老师，报复得实在太过分。这些案例都可成为"人性恶"的例证。这也许也可以 解释为什么中学生打得比大学生厉害，他们受教育少而可能更多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太一般化，难以对说明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有太大帮 助。

五、打老师之后

在北京，在１９６６年8月２０日左右，打人风从学校里蔓延到学校外，从打 老师和打死老师扩大到打各种人和打死各种人：地、富、反、坏、右、演员、作家 、民主党派成员，以至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同时，"大串连"把打人风带到全国 。

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如果不是"当权派"又没别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 １１、１２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就被允许离开"劳改队"。如果是 ，则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学打死一名女教师，北京第六中学打死一名工友的事， 曾在１９６７年2月的群众自办的小报上被谴责。(见"中学文革报"第二期，１ ９６６年2月2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但是被打死的学校领 导人或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长久不被提起。１２年之后，根据１９７８年夏天的 "北京日报"报导，那时候一些区、县为打死的校长们开了昭雪大会或追悼会。("北京日报"，１９７８年7月１６日，"为一批中小学领导干部昭雪平反"。在 这篇一千来字的报导中，列出了１３个１９６６年的死者名字。）这时有死者家属 要求法院追查惩办与打死人有重大关系者，被告之"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见"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查院不起诉决定书"，（８０）西审判字第７２号）

在１９６８年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再次成为运动重点。 但是这次不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而是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的 。清华大学整老师的"经验"被传达到全国，是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的一部 分。打人的事情仍然发生。只是一般不像１９６６年８月那样公然地在很多人面前 大规模地进行，而是常常个别施用。清华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打。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５"惨案的幸存者胡志涛副校长 被学生轮流连续斗过４８个小时，不准她睡觉，逼她"交代问题"。三位老师自杀 身死，其时都仅４０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３５岁。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 长，有七位老师因"黑五类"出身等原因挨斗挨打，其中有一位剪喉管自杀，剪断 声带，未死致残。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９号楼１门洞，从一 层到四层共住有１１家人，"文革"中自杀了三家的五口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 "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师无辜身亡。

１９６６年在校的大中学生，从６月停课后再也没有上过课。他们在数年以后 先后离开学校。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了已被废除了１１年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制度。

六、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九十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想呢？

1. 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与暴力行为有关？

近几年来，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中，开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位 在１９６６年被严重打伤的中学校长说，是检讨他们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 。在"文革"开始以前，１９６４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领导把 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单独给干部子弟听政治报告，给他们和其他学 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强调阶级斗争，这跟后来在该校出现了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最 早的"红卫兵"组织有直接关系。红卫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师当成敌人。１９ ６６年6月"工作组"进校以后，鼓励学生上纲上线批判学校领导，但是不许打人 。红卫兵反"工作组"。"工作组"被毛泽东撤走后，就发生了打老师。教育屈从 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 。

2. 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１９９３年夏天，１９６６年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 说，她收到过一个学生寄给她的日历和一封信。在信里这个学生为１９６６年８月 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２７年来她收到的唯一的道歉信，她表示她原谅打了她 的学生们。但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什 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他们参与了打死人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 中国的老师不教学生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做了的坏事有内疚 感和负罪感。

3. 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非常少数的"文革"参加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 所作，并不都错，有的还认为主要的都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正确 ，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曾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觉得，那场运动无论是手段还 是方向都是错的，不能再让"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或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论 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义。

七、作者的话

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篇文章先写成这个样子。我遗憾未能了解更多的有代 表性的学校，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统计数字，对整个事件，整幅图景的描述因而会有 很多遗漏，对因果关系的阐释也不够详细。我希望读者们给予评论和修正。

１９９５年2月１９日写毕

注（１）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被访者表示感谢，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作这 种恐怖而痛苦的回忆。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 况，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让我阅读他的材料。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 令人钦佩。另外，也要特别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是他帮助我作 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

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鼓励和建议。

注（２） 作者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看到打人的经过，曾为 此写过"女性的野蛮"一文，收于我的"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北京出版社， １９８８。）

注（３） 这是由萧卫平（１９６６年北京中学生）从计算机网络上寄给我的，并 请谭馥（１９６６年天津中学生）做过核对。谭提供的歌谱不同，但词是基本一样 的。两地唱法不同。

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

——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之一

•王友琴•

一．题目和方法：事实描述与因果分析

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１９６６年夏天在７６所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对老师的暴力迫害。这场迫害普遍、残酷，而且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发生那样的故事。于是，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疑问：学生怎么可能作出这种大规模打老师甚至打死老师的事情？也就是说，对迫害性事实的逼近的关注，自然引起了对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试图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回答的方法可能有多种。本文不打算运用现有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理论来作出解释。如同前文一样，笔者首先利用多年来和几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其次，参阅当时正式或非正式发表的文字材料，查核和纪录那些未被写出的文革事件。不同于前文的是，本文不仅着重事实的描述，而且更强调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能对那一时期的总体图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并对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

１９６６夏天，当学校发生大规模打老师事件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迫害同学的事情②。事实上这些学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妨碍革命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即他们的"家庭出身"。曾被称为"红八月"的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文革运动，并不能笼统称为一代年轻人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运动。

本文试图回答：部分青年学生遭受歧视和迫害，究竟与当时的打老师事件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两种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二．发生时间的重合

１９６６年8月４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

"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４０多名学生，其中１０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子"；有１０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另外２０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争会的时候，１０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２０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１０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１０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１５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的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副校长胡志涛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说：

８月４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③

８月４日，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不到学校去。结果，８月５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打斗了５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缺）和两位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当时有１，６００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直接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老师的死，对她和她的家庭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伤害，在文革历史上也应是历史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也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制造、纵容、默认这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１９６６年８、９两个月中，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卞仲耘老师是１，７７２人中的第一个。她的死，标志了文革中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当时有两首由北京学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别代表或者说明这两种对象同时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称《嚎歌》④（见本刊ｚｋ９６１１ｂ），用来强迫老师长唱，强迫他们自我诅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对联歌》⑤，宣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尽管当时的电台并未广播这两首"歌曲"，但是它们却流传全国，甚至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质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斗。数位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讲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头发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顶着烈日在学校操场的４００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脏东西，等等。而且，刘美德当时怀孕，学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要拍摄这所学校开展文革的照片，因为该校的学生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及其负责人彭小蒙曾经直接得到由毛泽东写于8月1日的一封信⑥（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９ａ）的热烈的支持。那天，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学生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如此摆出姿势，由记者照了下来。这一姿势是仿效毛泽东在１９２７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者拍完照片后，这个学生把刘美德一脚踢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由于先天性受伤而死亡。

数位被访者也讲述了这所学校中一些学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学生朱彤，父亲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还被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这所学校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份子"。当班里的"家庭出身好"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并在那里哀求彭小蒙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万红还是被揪到教室里斗。斗她的时候，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还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突然把她脚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在打刘美德老师和打万红同学这两个事件中，有一个相同的细节：故意使她们从高处摔下受伤，显示这完全是一种暴力虐待。施用于教师和施用于学生的暴力虐待性质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教师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远高于学生。在我发表的两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调查所及的７６所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老师是１１名，被打死的学生是１名。

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质是如此明显，以至无法用"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来解释其起因。现在有人甚至会怀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在处于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怎么可能如此折磨怀孕的女校长呢？又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们的同班同学？

这种对文革史实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报纸上从未报道这些暴力故事。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但却是当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非事实报道来阅读。当时的报纸用慷慨激昂的词语支持"红卫兵小将"的行动，为他们叫好，但并不描写他们

具体做了什么。

除了报纸以外，我们还可阅读当时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写过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文中说：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文中的"自来红"是指"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老子"，而把另一部份学生称作"崽子"。从这一类未在当时正式报纸上出现过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运用的语言的粗暴性。同时，这篇文章也表现了明确的权力意向。文章说，为了权力，要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话）斗。他们也实际这样作了，即不但斗了所谓"牛鬼蛇神"，也斗了他们的孩子。从这样的材料，可能能比从正式报纸上较多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真实情景。但是，即使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也难看出本节所描述的折磨刘美德老师和万红同学的事件。

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当时未被记载。对受虐者来说，记载这样的经历如被发现，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祸，他们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对施虐者来说，他们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无可非议。当《北京日报》记者拍"再踏上一只脚"的照片的时候，斗人的学生还异常兴奋，说是照片马上就会见报，将此当作莫大荣誉。这张照片后来未被登载。文革结束后，施虐者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受虐者无处诉说这些事情。甚至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可能会回避这些事实。这不但是因为发现事实相当费功夫，而且因为写出之后还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怎么解释这些暴力虐待？解释事实的难度可能会消灭发现事实的动力。于是，在文革历史被湮没、遗忘、掩盖和浪漫化的同时，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质也在记忆的含混中模糊了。

四．两种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长

１９６６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监狱。他们在屋顶上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电灯。第六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响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外校红卫兵前往六中参观学习。

这座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９名第六中学的老师从头到尾被关在那里。他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挨打挨骂，并受到跪煤渣、跪板凳等体罚。有一位老师被打坏了骨头。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来一个月后就死了。还有一些人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第六中学的一个老校工徐霈田，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以及一个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在这个监狱中。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参加这种暴力虐待行动的。有一部份学生甚至像老师一样被关进这座监狱殴打折磨。监狱墙上先就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有一次这所学校高中三年级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抓进监狱毒打，血流遍地。打他们的人就用毛笔蘸了他们的血，重描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字。

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在文革时又被说成"资本家"。文革前王光华曾经当过班长。文革开始后他曾经批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他未得到红卫兵的批准就到外地"大串连"。１９６６年9月２７日，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绑架进学校的监狱。一群同学拿军训用的木枪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觉昏厥过去。当天晚上，他被关在监狱中，伤势沉重，气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华又被毒打。９月２８日晚上，王光华死了，时年１９岁。

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老师把王光华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据当年抬过王光华尸体的老师说，他们在黑夜中把尸体搬出了监狱小院，又抬着尸体走过六中的校园，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他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一个多月，眼见身受了大量恐怖的事情，那时好像连害怕的心情都不会有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感觉到尸体很重，死去的人的身体似乎比活人的沉重得多。

这些被囚禁在监狱里的老师，目击了学生如何分裂成三个等级。一个等级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他们被歧视，被侮辱，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光华是其中之一。另一个等级是出身于"不好也不坏"的家庭的学生，他们不被准许参加"红卫兵"组织，只可以参加一个叫"红联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的意思是作红卫兵的联合对象。到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红卫兵"成员都到各地"大串连"去了，在夜里值班看守监狱就成了"红联军"成员的差使。最高等级是"红卫兵"成员。他们掌管狱中人的生杀予夺，还把被关在狱中的老师的工资拿去花掉。有一天，是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前，一个红卫兵在监狱的院子里高声大气地说："老子他妈的上天安门城楼都上腻了。"原来，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当时简称"西纠"）的主力之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担任纠察，能上天安门城楼。这样说话方式显露出说话人的骄狂得意，也显示他们当时所享有的相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巨大无比的恩宠。

逼近观察迫害老师和迫害同学这两种同时发生的暴力迫害，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助长的。如上文所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老师成为学生暴力的第一位受难者。但是打死人者并未受到任何惩罚或警告，甚至连批评也没有。当时领导文革的"首长"常到群众集会上讲话。查阅当时编印的各种"首长讲话集"，在这些首长们的讲话记录中，顶多能找到三言两语的对打人情况的极其温和并且间接的劝告，而且从未具体提到老师被打死的事。接着，在北京１０１中学（８月１７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８月２２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８月２５日）等学校，老师被学生打死的事件又再发生。在第六中学，十多位老师被关进私设的监狱。9月２７日，学生王光华在第六中学的监狱中被打得失去知觉之后，被关在监狱中的一位女老师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也被打断了手臂。第二天王光华继续被打，终于被打死。如果打死老师的事情先受到管束，如果老师的生命当时不那样被视为草芥，那些打死王光华的人可能还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如果他们稍有收敛，王光华或许不至于被打死。对老师的暴力虐待带来了对同学施行暴力虐待的环境。打老师的残酷程度助长了打同学的残酷程度。

另一方面，禁止一部份同学参加当时打老师打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甚至把一部份学生也当作施虐对象，使得从事文革变成了同代人中一种明显而且巨大的特权。这种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不但使这些人感激给予特权的人，而且刺激增长这些人的激烈和疯狂。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红卫兵成员不过占学生的２０％左右。但是这少部份学生拥有的前所未有的特权使他们控制主导了大局。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打

老师的暴力行动是全体学生可以平等参加的，学生对打老师的兴趣可能不会有那么狂热，另外，学生中的一部份人也可能会成为反对派来抵制暴行。而把学生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三个等级的作法，全面压倒了在学生中由于思想或者道德方面的分歧而引起争论及政治观点派别的可能性。同时，严加打击"狗崽子"，也有力地发挥了"杀鸡给猴看"的效应，使得学生中没有人敢于发出制止暴力迫害的不同声音。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当一个又一个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曾经站出来反对这种暴行。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文革中出现的某些东西，比如"红卫兵"这一名称、打老师的种种手段、学生私设的监狱等等，可能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事先策划的，也就是说，可能是自发地出现的。但是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里，无数人可能发明无数新东西，而这些事情独独能得到文革发动者的支持而风行一时，并不是偶然的。上面的分析说明了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件事互相助长的功能，进而也能说明二者是相当整合的。

五．共同后果：暴力迫害的推行与延伸

把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以及打同学称为"暴力迫害"，是因为冲突中的双方，一方占有绝对的权力，不必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关押和殴打另一方，甚至把人打死也没有关系；另一方则只能忍受侮辱和折磨，不能自我辩护，不能自卫，甚至也不能表示投降以保全生命。这样的双边关系，是典型的也是严重的"暴力迫害"范例。

有人可能会说１９６７年群众组织间的武力冲突导致的死亡比１９６６年的还多。动用暴力确实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特性，但是１９６７年的武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双方互打，可以还手也可以退出的，所以与１９６６年的暴力迫害有很大区别。打老师和打同学这两类事件则代表了同一个暴力迫害的原则对不同对象的施行。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教育工作者被当作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表示反对当时提出的"教育革命"。在６月和７月"工作组"领导学校文革的时候，工作组领导学生揭发批判老师，尽管在文革以前，老师并无权力来决定教育路线及体制。一些老师被工作组划入"四类"，面临撤职、下放、劳动改造的命运。一些老师不能忍受压力和羞辱而自杀。８月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迫害升级，变成暴力性的。游街、体罚、剃"阴阳头"、进"劳改队"、唱"嚎歌"、用铜头皮带打等等暴力手段纷纷加诸于老师们头上，尽管他们未作任何反抗。

对于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的大规模的迫害随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的广为传播而兴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当１９６６年８月初这副对联开始流行时，在北京有过辩论，有过不同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提出不同意见者的人数极少，而且在中国音乐学院礼堂的"辩论会"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会场上就被打。另外，更重要的是尚能发表不同看法的不是那些首当其冲身受其害的"混蛋"——他们根本已经失去了发言权，除了承认自己是"混蛋"以外，什么都不能说。当受害的一方不能对"对联"做任何批评时，就意味着他们只能接受对他们的或许重一点或许轻一点的虐待，而没有别的选择。至于这种虐待的轻重，全然掌握于他人之手。

暴力迫害并非新东西。但是，由一部份学生大规模地施用于老师和同学身上，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发生于１９６６年夏天的这一场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在整个文革的发展过程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红卫兵"组织最早发起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受令离开学校后，有二百多成员的"红卫兵"控制了学校，包括学校的"劳改队"。那时，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迫在胸前佩戴一块黑布，上写"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多次遭毒打。万邦儒被打得肾出血。韩家鳌不得不不断服用专治外伤的"云南白药"。团委书记顾涵芬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化学老师刘树华被斗争后从学校的烟囱顶端跳下身死，时年２６岁。

同时，这个学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斗争、被打、被强迫"劳改"。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深夜，当刘树华老师跳烟囱自杀时，高三学生郑光召也正因被毒打而病危。高二学生郭兰蕙的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斗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还有一个初二的女学生卧火车轨道自杀，未死但终身致残。

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普遍建立，这种暴力迫害也在各学校普遍发生，而且，从学校内向学校外发展。从打老师和打同学开始，发展到了打社会上的各种"牛鬼蛇神"。抄家，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打人甚至打死人，到处发生。比如，作家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被红卫兵打斗，以后自杀。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起，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的数目从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并且持续到９月２日。９月２日起才降至二位数。在８月下旬到９月底的４０天里，在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了。

这种暴力迫害的打击对象继续扩大，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教育界以外的干部——当时称为"当权派"——头上。这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中的一些人试图保护这些人。在一份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由"北京师大女附中、化工学院附中红卫兵"发出的《告工农革干子弟书》⑧中，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革命干部的家一律不许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份子的当权派的家也不应查抄。""凡没经中央、新市委批准定案是黑帮、反革命的，一律不许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

这张传单的内在逻辑相当值得分析。这张传单反对对"革命干部"施行暴力迫害，但是仅仅是对他们而言的。对"革命干部"不应该抄家或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而对别的人并非不可以。事实上，正是红卫兵开始和实施了对很多人的抄家或体罚、毒打、挂牌、剃头、劳改。他们后来只是试图反对施用这样的迫害于某些对象，而不是反对这样的暴力迫害本身。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自己实际上是在沦为由他们开始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迫害的受害者。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从热烈支持早期的红卫兵组织而转向另一些被称为"造反派"的群众组织。"造反派"虽曾部份地批评了红卫兵所为，但是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他们的作法。比如，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和"老红卫兵"（他们后来被冠之以"老"）各占一楼对垒时，有一天，"井冈山"组织中的学生曾用布蒙住万邦儒校长、韩家鳌副校长以及另外三位老师的眼睛，把五个人驱赶到四层楼顶，在楼顶上用皮鞋底打这五个人。据说这是因为对面楼上的"老红卫兵"骂他们"保守"，他们就以此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性。

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被贯彻及实施于随后的年月。１９６６年末和１９６７年，学

生组织的主要指向是"当权派"。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１９６７年７月，彭德怀元帅在学生举行的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对老师的暴力迫害的高峰之后，１９６８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教育工作者再次成为主要打击目标。第二次迫害高峰更为组织化、系统化，也持续了更长时间。在本文写到的四所中学的教职员工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三人自杀，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第六中学各有一人自杀。也有学生被打成"反动学生"。比如，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三学生闻佳，因无家可归以及被强暴而试图自杀，被发现后却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送进监狱，被判刑１８年。

上述回顾，可以帮助我们看出文革中暴力迫害发展的轨迹和一些特征。

１．这场暴力迫害兴起非常迅速而几乎未遇阻挡。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决定从学校撤离"工作组"，８月５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８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９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从功能角度分析，这种急剧增长、达到高峰后又稍降低的发展曲线，其实际效果之一是人们就此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以及普遍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则。可以设想，如果暴力行为缓慢兴起，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会不接受，也会有机会说出不同的声音——北京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者从理论上反对这种迫害。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一定会也被打。随后暴力迫害稍减，人们庆幸生存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

２．在暴力迫害中发生了超越某些施暴者的意图的情况，即当暴力迫害蔓延并扩大打击对象时，最初的施暴者最终可能变成被施暴的对象。由于这些施暴者先已帮助确立了暴力迫害原则和方式，当其身受其害时，他们也失去了保护自己的道德基础。

３．在文革的前三年中，占据学校主导地位的势力几经变更，但是暴力迫害原则却一以贯之。这几派势力虽曾互相对立，但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思想及行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项。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故意把一批又一批的人从社会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们，"斗争"他们，"审查"他们，关押他们，摧毁他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活得越不舒服越好。这种方式在文革中不断运用。在一个封闭的大环境中，很多人似乎已经把这种持续的迫害当作生活的自然的一部份。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迫害，我们的了解和研究都还很不够。文革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迫害，始于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打老师和打同学。本文涉及的只是其一角。要对史实做出更全面的描述和更深入的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①此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５年８月号（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２ａ１——编注）。

②参看拙文《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中国研究》（香港城市大学），第二期，１９９６年（见本刊ｚｋ９７０５ｄ——编注）

③胡志涛：《八·五祭》，写于１９８６年，发表于她和丁丁合作的《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④此歌词曲见注①文中。

⑤此歌词曲见注②文中。

⑥毛泽东的信可见于《"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北京，１９８８。

⑦见注①及注②文章。

⑧见美国密执安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文革传单中。

□　原载《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女性的野蛮

·王友琴·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象"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象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象。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

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１９６６年６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７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象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

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8 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借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

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像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当五个"黑帮"被押上操场角上的高台，已经个个面目全非。他们被命令自报"罪行"。又有人作声嘶力竭的"揭发"、"控诉"。"横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和"万岁！万万岁"的口号，震荡在窄小的中学校园里。过了一阵，没什么可说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来，押往校园深处，说要让他们"劳改"去。

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晚饭时分，我下楼来，走过一楼楼道，看到白墙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红色斑点，以及一个五指分明的暗红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识到这是血点、血手印。

校园已经安静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听人在说，初一的同学到开水房去打来开水，烫"黑帮"。又有人说，还把"黑帮"赶到宿舍楼的厕所里，淋了屎尿。饭厅里弥漫着残存的亢奋。

残酷的行为竟能使人兴奋快乐，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这种经验诱惑人们残杀同类，引起一连串顺之而来的灾难。

这一天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

几年以后，我下乡去了，父母后来也下乡了。中学时代的日记、笔记之类，全都失落了。尚能记得这个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时也会将此作为自己尚未完全泯灭了善性的一个证据。为什么要反对忘却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记忆有某种联系，不仅心灵常常通过反省往事得到净化，而且善恶感能在历史的评判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们坐在教室里，收听有线喇叭里的中央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停课两个多月来，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课，而且指导着人们的行动。电台的节目结束后，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说"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校园里没有人讨论"死"或死的恐怖，更没有人会从法律的、事实的、人道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死亡。我们顶多只把它看作为"革命"付出的一点"代价"。很多年里，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谓"付代价"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却不去想这"代价"已经是人的生命，已经是对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依赖的根本原则，人身安全原则的威胁和破坏。对死亡的淡漠，显然只能表明我们的心灵对于罪恶有太大的容量。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过了几天，邻近一所男校的红卫兵，又到我们中学来打了一次，打断了另一位副校长的肘骨。各个中学都在打，而且从学校打向社会。直到十四年后，公开审判"四人帮"时，我才从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后的四十多天里，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数。我记下了这个数字，１７７２人，特别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即我们校长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当人们说起从前发生过的一件件悲惨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会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闹的。"我们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释了"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切。但是，又怎么解释在我们这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发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为，我们的校长，成为北京市中学教职员中的第一个遇难者？

又过了一年，依然不上课，继续搞运动。有一段时间"集中力量斗、批、改"了，几个学校领导的"罪行"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一个人有四五十张，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长。他们的姓名上都打着大红叉叉。从大字报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龄、经历。那些动过手的同学，原先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吧。在这里，尤其说明了无知不能作为原谅的借口，如果是在弄清情况后才动手的，那么尽管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但态度还算是认真的，不弄清情况就动手，除了说明这种行为更为轻率、更为冷酷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从死者的有关材料中，我还知道了她有四个孩子，或者可以说，这时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这样的问题。此外，除了惊讶于她的经历几乎和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模一样之外，似乎没有想过别的。我真怕自己的这种冷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两年多的时间，天天在溅有血迹的楼道里走来走去，竟然熟视无睹了。新的死亡继续发生过几起。偶尔往墙上瞟一眼，会想到，"哟，这是人血"，但是贫乏而麻木的脑子里再生不出别的想法。后来，也许是为了庆祝"九大"召开之类的活动，打扫卫生，粉刷墙壁，血迹看不见了。

往事也是会淡化在时间的流水中的，除非我们加以认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种由群体公开施行的私刑，问题不仅在于使一些无辜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还在于激发了、助长了、施虐者们的野蛮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类，相信巫术，以为诅咒可以给人带来灾祸，以为往一个写着敌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针画符，就可以使其遭难。与此相仿，我们竟也相信，私下的谈话，画像的损坏，就是危害性的；反过来，又用各种恶毒的字眼，"贼"、"鬼"、"黑帮"、"牛鬼蛇神"等等，咒骂老师和校长，似乎觉得这些恶名就具有某种威慑力一样，却不顾是否拥有证据。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在姓名上打红叉叉，往身上浇墨汁……，对这类一段时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从心理方面进行分析，结果也会使人吃惊的。抛开善恶不论，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人们常常说，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

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离开中学后，我到边疆去了。当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也曾有过感叹世态炎凉、怨天尤人的念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长之死。读过历史，知道我们已脱离了宗族社会，个人已经不可能依附于某种强有力的血缘集团；列身于一个大社会中，能保护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会正义原则；如果这些遭到破坏，那么个人的安全，也许比古代还不可靠。一个人，不论是中学校长还是国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敌人，立即陷入孤立，举目无亲，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这正说明了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个人的无比脆弱。当看着一个人死去的时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时，我却又抱怨别人了。如果我不能为保卫正义原则努力，那么种种怨尤不是很肤浅、甚至虚伪吗？

当年的同学们早已风流云散。偶尔见面，匆匆忙忙，谈工作，谈学习，谈房子，谈儿女，却很少谈到往事。几年以前，在广州，我遇到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她陪我游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那里，她向我补叙了那天我没有亲眼见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来打，上面有钉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个小洞，血就从小洞中涌流出来……。

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描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抛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落实政策的时候，死去的校长被追认为烈士。作为一种待遇，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老老实实地说，这种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剧英雄色彩的。死难者的牺牲并不因为他们的反抗、叛逆等主动性的行为所致，而往往只因为他们一开始就被指定为"运动对象"。以后的人们，也许会把这种死亡想象成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样，但身历其境者应该知道，"文革"并不是大量产生悲剧英雄的背景。死者会原谅这种分析吧。在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死亡面前，粉饰掩盖，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把"文革"想象成一种英雄悲剧，那就是我们虚幻的、缺乏正视生活勇气的旧习又在作怪。同样，我们这些惨案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象成玉洁冰清、天真无邪的受骗者，或者在一开始就发觉了"四人帮"的罪恶的先知者。如果已经决定改正错误，那么首先就应面对事实。

这位同学和我一样，是教员的女儿，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目睹了这桩暴行。事隔多年我们还能讨论这件已经十分遥远了的往事，也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更富于历史感或文学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们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承担未尽力制止罪恶的责任，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暴行，没有动过手，我们回忆这些也就不太费力。人，应该对自己诚实。然而，如果连不太费力的回顾都懒于作出，那么实在是过于玩世不恭了。虽然往事早已过去，我们却还活着，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断对历史的评价。回忆历史，分析个人的行为，几分出自受骗，几分出自卑怯，几分出自残忍，并不只是一种旧事重提，这关联着我们现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观。

离开中学以后，我回去过一次。那是学校举行校庆纪念会的时候。校园里洋溢着录音机播出的乐曲声，以及久别重逢的校友们惊喜的呼唤声。什么都可能回来，除了死去的人们。我参加了初中学生的一个班会。学生们要我签名，要我讲点什么，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我在高考中考过第一。然而，我说出来的全是些文不对题的东西。我说了要学会思考，要有道德勇气。离开了对中学生活的具体回忆，这两句话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理解了看似简单的这两句话的重要程度。很多年来，我有时思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并不能证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作出了某种选择。也正因为这种选择的存在，我愿意

把这段不愿提及的往事，告诉年轻的同学们。

□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１９８６年，发表于我的《校园随笔》（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一书中，写的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发生的事。

"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王友琴•

一、题目和方法：被报导的"文革"和未被报导的"文革"

"同学"的定义一目了然，就是"一同学习"的人。１９６６年6月以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学生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到了８月，又发展到用暴力斗争老师，甚至打死老师。至于学生，不但不再"学习"，而且也并没有"一同革命"。迫害同学的事情同时也普遍发生了。一些学生象老师一样成为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而且，对这些学生实行迫害的公开理由（其中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或未被意识到的动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这完全是一种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也不可能自己决定的状况。

然而，在当时，在１９６６年，这些迫害同学的事情从来没被报导过，就像那些打老师的事情一样。

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发表了很多关于"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是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或是紧握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眼含热泪朝着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当时拍摄并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更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记录片又配入大声的"东方红"歌声，以及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的镜头，红光弥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记录下来的"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这充满了煽情、迷狂而且透着邪气，有人认为这就是热烈红火的"革命"景象。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一种"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其中之一是：许多红卫兵的同龄人，十多岁的学生，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有的甚至被打入"劳改队"，被体罚，被拷打，被打死。一些人自杀，无声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稍作抗争，在这种个人的抗争远远没能成为集体性的之前，个别的抗争者就被严厉惩罚，甚至于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在历史上，有些故事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沉没并被遗忘的，但是这类"文革"故事却从一开始就没被报导。不但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起，就是在"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印行的传单、小报、首长讲话集中，也几乎没有涉及。从那个时期的人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裂沟，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人们对死亡和暴行的回避的、无所谓的或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的态度。这种不报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一些人的心态，从而了解历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失去了重要的历史记录。

"文革"的这种不被报导的状况，导致了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及解释的种种失误。比

如，在"文革"后，有些人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代"来指"文革"期间的年轻人⑴。然而，实际上远非整整一代人都参加了"红卫兵"，而这代人中大量的被侮辱与损害者，未有机会说出他们的故事。

由于这种"文革"的大量事实的不被记载性，所以对严肃的"文革"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学者那样不能依靠既有的文字记载来作研究。他们甚至有时还没有考古学者的条件：考古学者可以从古代墓地中那些弯曲的、挣扎姿势的人体骨架，看出古代埋葬活人的野蛮作法。但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被打死的几千人已经烧成了灰。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的中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２８块钱就是了。"２８块是当时火葬场焚烧一具尸体的价钱。那时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斗后自杀的人，使得火葬需要排队。但是，如果"文革"的经历者们不说出及写出真情，未来的考古学者是不可能通过骨灰来推断出这些人的死因的。

为了了解"未被报导的文革"，几年以来，我向一百多位"文革"期间的学生及老师询问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事情。

这一调查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做的，后来还在计算机网络上作过问卷调查。在我调查所及的北京及各省的７６所学校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或同学的事，无一例外。其中有１０所学校有老师被学生打死，一所学校有学生被学生打死。关于老师的初步的报告可见我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⑵，本文则是关于学生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写出因不被报导而缺失了的历史的一部份。

在本文写作中，调查所得是主要资料来源，此外，还用了私人及斯坦福大学收藏的"文革"时代的非正式出版物，也阅读了当时的官方出版物。

二、一副对联怎么成为迫害同学的理论基础

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的高潮时期，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在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幅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要数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据一位北京的被访者说，在她的中学里，大门外面两侧贴了这副对联，大门里面两侧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学楼门的里面外面都贴了这副对联，教室的前门后门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室前部的黑板两侧贴上了，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两侧也贴上了。整个学校，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贴了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学的情况相仿。这副对联又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厦门的当时的中学生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这副对联是当时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纷纷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贴的。当时的官方报纸天天有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这副对联及其被欢迎程度与残酷效果并未上过报纸。

这副对联是针对学校里的学生说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的父亲是"英雄"，他们就是"

好汉"，如果他们的父亲"反动"，他们就是"混蛋"。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是北京郊外一座著名山峰的名字，意思是难于攀援，来指称这副对联时，意思变成了是"鬼"就怕这副对联，或者，怕这副对联的就是"鬼"。

这副对联有两层内容，第一层规定了父母和子女间在政治上属于同一类，第二层有关谁是"英雄"或"反动"，在当时的实践中，"英雄"是指"革命干部"，"反动"的是指各种被惩罚了的"敌人"。当时学生中的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原因很明显，他们认为他们的父亲是"英雄"，而他们自己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好汉"。《文革十年史》一书说这副对联出现于１９６６年7月２９日，是"干部子弟"知道父母受冲击后的反应，这不但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在思想背景方面也不对。

这副对起源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据当时那个学校的学生说，１９６６年6月间，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份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１９６６年7月１日，这个学校的学生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这种会以前一般总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但是，那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会场上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

"文革"前早就强调"家庭出身"，也给了"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的舆论场合中不曾这样绝对、粗暴、等级分明。

１９６６年8月１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１９６６年8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革命学生代表讲话，整个接见过程都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彭小蒙也早在7月２５日北京大学的大会会场上就打了人。她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未提对联，也未直接攻击同学，但是她所获得的这种显赫地位，无疑大大肯定了他们的组织的全套行为方式，并且，这一套行为因此被迅速推广开来，不仅北京，而且及于全国。

除了对联，一些新词语也开始流行，有"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又有"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后来干脆用此二词指从这些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贴出。又用"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学生。这句骂人话本来的意思只是说被骂者是小狗而不是人，这时却转变成因为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是"狗"的"崽子"也是"狗"。

这副对联在１９６６年7月底、8月初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有谁要上台讲话，先要报告家庭出身。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牟志京，上台表示不同意对联，在台上就被几个人围着用拳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同意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牟和刘都不算"黑五类"家庭出身，刘的岳父又是元帅叶剑英，他们尚遭此种对待，其他"黑五类"的学生，根本不能有机会说话。在北京第五中学关于对联的大会上，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不被认为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关于对联的大会上，红卫兵在会场上反复大唱以对联为词的一首歌。

"对联歌"据说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作了"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⑶的红卫兵做的，词曲如下：

１１　５５｜５３１　２｜——　——　———老子　英雄　儿好　　汉３２　１３｜２１６　５｜——　——　———老子反动　　儿混　　蛋１１　６５｜１　５　１２｜３　３２３｜——　——　——　——　　　———要是　革命　你　就　站过　来，要是５　５６５｜３１　２２｜１０｜　　———　——　——不　　革命，滚他　妈的　蛋！（呼口号）要是　不革｜命　　０就｜造　他妈的｜反　０就｜　　　——　——　　——　———　　　——滚　他妈的｜蛋　　０｜　　———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１９６６年８月６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可是原来的对联还是到处流行，从北京传遍全国。

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当时开始普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和条件。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比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的孩子及贺龙的孩子。刘及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致死，但是当时还在最高权力圈子中。所谓"革命干部"，一开始的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１９４９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１９４５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１９４５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１２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有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都在北京海淀区。）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贫下中农"，也少工厂工人，其他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如工程师、医生、科学研究工作者、教师等等，都不属"革命干部"范围，所以红卫兵成员总数虽然很多，但是在各个学校的人数比例实际上并不多。虽然在调查中还未接触到有家庭出身允许其参加红卫兵却拒绝参加的学生，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是"重点中学"，有一千三百多学生，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文革"前是一般的中学，也有学生一千多人，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也只有二百来人。在北京第五中学，红卫兵也只有二百多人。这也就是说，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即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１月，红卫兵所作的主要事情：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烧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都是一种特权，不是同代人都能参加的。然而，由于少数学生控制和压迫着多数学生，当时听不到后者的声音。把二者都纳入"红卫兵的一代"，不但没有道理，而且可能意味着对压迫人者的肯定以及对受害者的轻蔑。

在上海复兴中学，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

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

这套仪式在红卫兵都"串连"去了以后才停止。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有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份。窄的部份贴着"狗洞"二字，命令身为"混蛋"者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一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到一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按照当时的规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绝对不能参加红卫兵。至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只被准许加入一种叫做"红外围"的组织。在有的学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学，这种组织又叫"红联军"。其低等的身份，从名称也能看出。

由于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想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可以说明当时时代风尚的小例子是：从１９６６年9月２６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讲话，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资历不深的组员戚本禹，曾建议这位６８岁的当时的第三号大人物把家庭出身从"封建官僚"改成"职员"，因为虽然周的祖父当过县官，而周的父亲只是个职员。周说他的父亲虽是职员，但冬天还有皮袍子穿，生活优渥，他强调肃清家庭影响，表示不想改变原来填写的出身。对周来说此事关系不大，他已身居高位，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当时这种出身差别命运攸关。

关于这副对联，有两点需要指出：

１．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在社会中享有种种特权，自是事实。但是在舆论领域中，一般总是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比如，《水浒传》中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就变成了仗着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这种故事固然不大可能改变现实，但是至少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制约。"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成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于是儿子就一定也好。像这副对联事实上所主张的"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龄年轻人的特权，恐怕在古代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无法找到先例。这不是说古代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古代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至少觉得不好意思直接这样提倡。有的研究者强调从中国古代历史去找"文革"的产生原因，笼统地说，这种方法并不错，我们也确实可以发现从前有过和"文革"某些方面相仿的事，但是也要看到，有一些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比如这副对联。

２．当时既无电传，又无计算机网络上的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能用电话，但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其中原因值得深思。这不仅仅与毛泽东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及发动"大串连"等方法直接有关，而且也因为一部份青年对这副对联

有特别狂热的兴趣。这种兴趣的趋向性值得思考。

三、被侮辱与被虐待的"混蛋"

"混蛋"不是只被这样骂骂而已。１９６６年８月，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女儿在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一次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她被拉出队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６３１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他们被打成重伤，后来又被罚"劳改"。被访者中一位当时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清楚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的景像。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同学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这个学校还有一位初中的女同学因不堪侮辱而卧火车轨自杀，未死，但是遭致终身残疾。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说，"对联"一出，这个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连理都不理。７月１日，开会时把"出身坏"的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打"出身不好"的同学。比如，这个学校初一（四）班的学生万红，父亲是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份子"。这个班的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所门外。这时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首先挨了彭的一皮带。万红被拉到初一（四）班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她就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带着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另一个例子是，这个学校高三的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份子"。朱同有一天被毒打后，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边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以上两所中学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给他们表示热烈支持。那里如此折磨同学，其他学校纷纷跟上。

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实验班的女学生宇宙被剃了"阴阳头"，即剃去半边头发，还被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在厕所里，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话而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了沙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天，即８月５日，这个中学的校长卞仲耘被一些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８月４日在初二（四）班开会斗争"出身不好"的学生时，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的４５名学生，十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他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把其中一人的眼镜一下子打落在地。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写有"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强迫一位父

母"有问题"的姓杨的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打扫工作。这个中学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学校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而她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了安眠药自杀。幸亏她找到的安眠药量不够大，她昏迷了几天而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地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他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因为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第一零一中学，有学生看到这个学校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在校园里追打，因据说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者解救她。在北京矿业学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学生被剪光了头发。北京第二中学初一（一）班的一个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搓衣板有棱角可伤人膝盖，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第五中学高三学生郑大力，被强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子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虽然清朝已经在１９１１年被推翻。

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资"、学校的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１３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及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的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扎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到很远处。没有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和打老师之风一样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一个家庭出身资本家的学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女学生李晓琳，曾被吊起来打，她的父亲是教授，当时算"坏出身"。在１９６６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的"第二号通令"中，宣布他们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于９月２６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通令"规定的"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力"共有７项，其中第六项是："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第一中学，一位被访者说，１９６６年8月１８日后的一天，也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到北京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来以后，贴出了通知，让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他去了。接近会场时，听见吼叫声，他从门缝里看到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他犹豫后，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１９６６年8月２７日至9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３２５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８０岁，最小的是３８天大的婴儿。有２２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１９６６年8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１．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２．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例１：直接的对抗——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学生曹滨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这时已经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那样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时的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在曹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争吵起来，并拿起切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于是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的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园里一共打死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６天后，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２：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第六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１９６６年８月，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的老师及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一百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所以不是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后，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王抓进了监狱小院，一进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关在那里的几个老师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王光华被打死时，年仅１９岁。

例３：自杀——１９６９年，北京师范大学初中学生闻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八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贴在北京的大街上。按照当时对"反革命言论"不准"扩散"的例行规定，闻佳的具体"罪行"从来没有被公布。事实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红卫兵在北京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１９６８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１８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１０年后，１９７９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国所有因为"恶毒攻击"问题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４：理论上的反对——在所有因父母的"问题"而受害的年轻的反抗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写出了并向人们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遇罗克。他的父亲是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份子"，他１９６２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１９６６年

１０月１６日，在对联风行了两个多月以后，由于下文将讲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时的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了"对联"是错的。遇罗克写了文章《出身论》，中心论点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１９６７年1月１８日印出，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份报纸上印着"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据参与编这份小报的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便设法用这样的名义印了这张报纸。１９６７年４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１９７０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在１９６７－６８年间，有过很多"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铅印小报。这似乎可以作为"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大民主"的证据，但是如果贴近事实去看，就会知道当时对舆论划的限制界线是十分清楚而无情的。这些小报只允许竞相歌颂毛泽东以及攻击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这些"三反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这种攻击中确实攻击了一切非毛泽东思想的思想。除此以外，别的话都会被当作出格。《出身论》表达了作者反对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枪毙。

来自受迫害的年轻人的上述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击都极其严厉残酷。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革"时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这场革命的人，确乎十分稀少。现在，有些对"文革"持相对较肯定意见的人说是因为群众有理想主义，愿意为"革命"理想牺牲自我。另一些对"文革"相对持较否定意见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蒙蔽，上当受骗。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正视本节所述的这些轻微的反抗带来的血腥的镇压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得承认，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威慑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受害者。为了不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事后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这是一种自欺。

五、为什么迫害同学：在革命的名义之外

要说明为什么这种迫害会发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释之一。

"文革"的发动者用红卫兵来攻击所谓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当时可能不是或者也从未敢与毛泽东为敌，但是打击他们的过程可以强化政治权力，也可以强制改变既有制度，所以从发动者的立场和目的来说，支持和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相当合理。通过革命的名义，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体到本文所描写的迫害同学，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是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单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难以解释迫害同学的行为的。这里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牺牲，有的只是凭藉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的允准及称赞而行动；也没有对他人利益的帮助，有的只是残酷的对他人、甚至是亲近者如同学施行的迫害虐待。其中难以找到通常可称之为"理想"的成份。同样，用"利益"来解释也太简单。因为他们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钱之类的物质好处，而是下面列举的刺激。

１．不劳而获的高等级

"对联"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这种等级的特点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条件来划分高低，从而一部份人可以获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须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的第一明显区别是在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团虽然也强调成员的家庭出身，却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访者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以前成立了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梅花"小组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为不以家庭出身为标准，这个"梅花"小组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组"阵线不清"。在这种把界线划得越清楚越好的过程中，等级差别同时被强调和固定化了。

从是否让青年平等竞赛的角度来看，"文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试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段"之后，才有优先被录取权。"文革"一开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决定。８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为首要依据的红卫兵。"文革"前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负责人。只要把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道"红卫兵追求平等"的说法至少是多么主观，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及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直接有关，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低等的人看待。

２．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

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８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比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了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有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比如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８月７日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三万户；在上海，抄了十万户；在武汉，抄了两万一千家⑺。红卫兵组织并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历史上，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平常时期，除了紧急自卫，杀人必须经过报官审讯判决等程序。只有在传统的舞台剧中，宋朝的包公有过皇帝特别给予的"虎头铡刀"，可以不须报告而自行判处死刑。但包公已经身居类似法官的要职，更不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从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９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６２人，并游斗折磨致死３２人⑻；在北京打死１７７２人⑼。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１日的７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数的。还有一些人在被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直到９月２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才下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

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其时离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已经有一月之遥。用这样温和的口气来说及打死人的现象，至于上文所记述的打斗同学的事情就不会被当一回事了。事实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同学的事发生在９月２８日。

这种可以打死人的权力使人残暴。

３．暴力压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的班上一个原来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一下子变得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里确实似乎弥漫着一股振奋激昂之气。这种气氛在当时被形容为"革命气氛"。列宁的语录"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当时也一再被引用。问题在于，这种欢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节日感呢？因为那些沉浸于大欢快的人们所作的，除了普通的节日的内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会之外，还有上文及我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所写的种种行为，即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迫害。这是一般的节日绝对没有的内容。所以，从事实的观察来说，对运用暴力欺压他人的渴望和欣悦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燃起狂热和兴奋的因素。

目睹种种由暴力迫害伴生的快感，我们应该理解到，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实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之一。它使人害人，也使人受害。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也确实几乎不可能抵抗这种以暴力进行迫害的诱惑。不须付出代价，不用承担风险，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无数人的生死控制大权，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推拒的恩赐。从这方面来说，把生死予夺大权给他们的最高权力者，实在邪恶。

４．同辈虐待

有几位被访者说，有的学生当时甚至好像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以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去抄了同班同学家，并打死了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数学竞赛"之类的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这样的人如果"出身不好"，在"文革"中会因此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了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６２级学生唐守文，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的第一名，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算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被大字报骂作"修正主义黑苗子"。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曾和他谈话并照了一张照片，这时也成了"罪行"被揭发批判。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

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来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的方法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份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份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了"同辈虐待"。１９６６年夏天最典型的理论，就是一度流传各地的北京的一个红卫兵大学生谭力夫在一次讲话⑽中说的："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

这种"七斗八斗"真的发生了。但是，这种"七斗八斗"并不是事情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采取的引导。因为迫害他人可以显示迫害者的优越性，而在对同辈人的迫害之中，更能显出一己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六、红卫兵的衰落及其遗产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９、１０三个月。到１９６６年底，最早一批的红卫兵组织不再能控制学校了，开始被称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新兴起的群众组织。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被批判了。然而，其中实质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暴力迫害被受害者抵制或者反对的结果。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红卫兵，有人反对也不会起作用。红卫兵的衰落是那些把他们带上历史舞台的人造成的。

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已经足够厉害地打击了学校的老师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无一人敢声言反对"文革"的格局已经形成。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想要的打击对象，除了这些人，还要扩大到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大串连"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干部子弟很高兴地坐着免费火车到外地去"造反"，即反对当地的干部。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是由集中了大量干部子弟的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最早去冲击的。

但是，革命的对象不久就由学校的校长老师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扩大到了早期红卫兵的父母。外交部一个副部长被贴大字报。他的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成员，动手撕了大字报。外交部看门的一位老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阻止她撕。她和她的红卫兵朋友就把老人打得起不了床。１９６６年９月，当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地质部造反的时候，"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们，其中包括地质部某负责干部的女儿，到那里打了"造反"的大学生。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说那副对联是"血统论"而加以否定。以陈当时的地位，这算是成了定论。但是，这个时间就让人发问：为什么不在两个半月以前说这个话呢？如果早一点，可以减少多少年轻的受害者啊！反过来，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如果没有这副对联，如果允许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参加，红卫兵运动是否会那么狂热和暴烈呢？事隔近三十年，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老红卫兵"衰落了，对联及"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社会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延伸进后来的长达十多年的生活中去。

第一，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覆运用。１９６７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如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死；１９６７年７月，彭德怀元帅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后来，在１９６８年的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无数的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在关于"文革"的通史性的《大动乱的年代》⑾一书中，记述了"老红卫兵"如何在１９６６年夏天保护了"老干部"，却未提他们如何打并打死了老师、同学及别的人。

本文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大规模实施，正是从红卫兵开始的。

第二，"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１９６８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明确界定出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的影响及模塑作用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改变。

第三，公道的毁坏和私德的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了。当"对联"和打人的铜头皮带传遍中国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样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处说理。生活中较为平等和欢乐的关系之一——同学关系被毁了。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地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学会了冷漠地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当整个社会被操纵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而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然而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人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作者深深感谢所有的被访者，感谢他们用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痛苦的回忆。感谢印红标、丁品、王蒙一先生借我他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也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先生，他帮助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２稿写毕

□　原载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第二期，１９９６年秋季号

注解

⑴比如，李泽厚有这种说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４７０页，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７９。

⑵７６所学校的名单见于我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１９９５年８月。

⑶"嚎歌"词曲见于注⑵文中。

⑷由１９６６年时天津的中学生谭馥提供。

⑸关于"劳改队"，可参看注⑵文章。

⑹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１９８５年２月。

⑺见于《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１９８７年７月。

⑻同注⑺。

⑼《北京日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未提供死者的任何情况。

⑽谭力夫，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会上的讲话。私人收藏的油印材料。

⑾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八月祭/王友琴

王友琴

一、关于标题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但是，１９６６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

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给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着，又要他们敲着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８月５日。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１９９３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看到１９６６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房依旧。住在

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的。

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二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１９６６年8月１９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份。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名义

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１９６６年8月１７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8月２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8月２７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１０月1日，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１９６６年8月、9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打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6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１９６６年9月2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１９６６年8月4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４４岁。

以上不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

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也不知道什么法律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１９５８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为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１９６６年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们一起受难——１９７５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１９６６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

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着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异的“六月雪”，寄托着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着观众的悲悯。

１９６６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怕，因为胆小，因为对

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８月你们被打死，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